

三联
耳关

生活

® 2018.1.8
2018年第2期
www.lifeweek.com.cn

周刊



看懂大英博物馆

在一座建筑里思考整个世界

970



9 771005 360000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ISSN 1005-3603
CN 11-3224/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15元



BENTLEY



卓绝魄力, 纵贯壮阔人生

Bentayga. 宾利添越超豪华SUV

永不言最, 旨在非凡。客观而言这是宾利座驾综合性能之翘楚, 迄今为止。

敬请登陆百度, 搜索“宾利”,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广告

宾利官方网站: www.china.bentleymotors.com 宾利客户服务中心: 400 119 8880



微信扫描二维码
关注宾利汽车中国



《自然》(英国) 2017.12.21

年度十大人物

十位影响 2017 年的科学界人物，涉及不同领域，从基因组编辑工程师到为核不扩散抗争的地球物理学家，从精准预测 9 月墨西哥 7.1 级地震的地震学家到将目光瞄准了学术机构中性骚扰问题的一位律师，他们深刻影响了过去一年全球的发展。中国“量子之父”潘建伟也入选其中，其团队在量子互联网方面的探索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量子互联网是由卫星和地面设备组成的网络，可实现在全球共享量子信息。



1 / 《彭博商业周刊》(美国) 2017.12 欧洲金融新秩序?

MiFID (欧洲金融工作市场指令) 将在 2018 年 1 月 3 日正式实施。作为欧洲证券监管机构主席，史蒂文·迈约尔是该法案背后最重要的推动人。法案试图为欧洲民众提供更低费用的金融服务和为资产管理公司提供更多机会，并通过增加透明度来避免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迈约尔认为自己和该法案有两大使命——保护投资者和促进有序市场。

3 / 《纽约杂志》(美国) 2017.12.15 波多黎各飓风之后

2017 年 9 月 20 日，飓风“玛利亚”从东南向西北直击波多黎各岛，造成 81 人死亡，约 20 万间房屋受损，大批民众流离失所。与 2005 年损害严重的“卡特里娜”飓风相比，虽然灾害发生之初，后者更为严重，但由于波多黎各的道路、医疗等基础设施薄弱，人均收入和政府财力都非常有限，致使现在灾难发生三个月后，灾难的残局更加难以收拾，其毁灭程度甚至超过“卡特里娜”飓风。

2 / 《外交世界》(法国) 2018.1 特朗普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的错误

2017 年 12 月初，美国政府发表声明把美驻以色列特拉维夫大使馆搬迁至耶路撒冷，并承认耶路撒冷的首都地位。特朗普的举措不但违背了相关国际条款，也引起了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的谴责和阻挠，导致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处于孤立位置。但在当地，特朗普的倡议受到当局的公开欢迎，既成事实政策仍在继续。

4 / 《外交》(美国) 2018.1 不该遗忘的历史

德语中有一个单词专指“与过去妥协”之意，在这个妥协的过程中，每个国家都有其处理悲惨过去的不同之处。本期《外交》梳理了六个国家的国家罪行与伤痛以及“与过去妥协”的模式和教训，其中包括德国对纳粹态度的演变、俄罗斯对斯大林主义的盲目崇拜与理性思考、南非如何处理结构性种族问题 and 经济不平等，以及美国在混乱种族历史中的错误与进步。





生生不息，因你行动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是在全球享有盛誉的、最大的独立性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之一。WWF在全世界拥有500万名志愿者以及一个在100多个国家活跃着的网络。WWF的使命是遏止地球自然环境的恶化，创造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未来。为此我们致力于：保护世界生物多样性；确保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推动降低污染和减少浪费性消费的行动。

在中国，WWF的工作始于1980年的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保护，是第一个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华开展保护工作的国际非政府组织。37年间我们在中国的项目领域由最初的大熊猫保护扩大到物种保护、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可持续发展教育、气候变化与能源、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科学发展与国际政策等领域。



实际上没有你，就没有我们，现在加入WWF



P30 封面故事

在一座建筑里思考整个世界

看懂大英博物馆

34 大英博物馆：行走于百科全书的多重迷宫中

60 大维德瓷器里的中国

74 好奇心回归：大英博物馆游记

92 自然历史博物馆：万物殿堂

104 策展中国

108 在大英博物馆修中国古画

P114

非洲别墅里的中国电信诈骗犯



P134

连州，一场“摄影民主化”实验



社会

- 热点：非洲别墅里的中国电信诈骗犯 114
- 专访：王新生：明治维新无法用简单的因果关系进行说明 120
- 专访：孙歌：明治维新并非值得中国人羡慕的现代化转型方式 124

经济

- 市场分析：中国的地方政府会破产吗 112

文化

- 话题：“麦瑟尔夫人”有什么了不起？ 130
- 收藏：连州，一场“摄影民主化”实验 134
- 设计：相遇在数字设计的未来 140
- 时尚：2018 是紫色的 146
- 思想：思考的艺术 156

专栏

- 邢海洋：互联网挤上电动车 16
- 卜键：更东的东巡 152
- 张斌：好看的电影以及不错的书 154
- 宋晓军：新时代中国军事的“看点”补遗 155
- 袁越：西红柿该不该放冰箱？ 158
- 朱德庸：大家都有病 159

(封面供图：视觉中国)

环球要刊速览	2	声音	21
读者来信	8	生活圆桌	22
天下	10	好东西	26
理财与消费	18	个人问题	160
好消息·坏消息	20		

2018年第2期，总第970期，2018年1月8日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总编辑 Publisher

路英勇 Lu Yingyong

副总编辑 Deputy Publisher

常绍民 Chang Shaomin

主编 Editor-in-chief

李鸿谷 Li Honggu

副主编 Deputy Editor-in-chief

李菁 Li Jing 李伟 Li Wei

主编助理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吴琪 Wu Qi 曾焱 Zeng Yan

采编中心 Editorial Center

资深主笔 Senior Editor

邢海洋 Xing Haiyang 谢先凯 Xie Xiankai 袁越 Yuan Yue

蒲实 Pu Shi

主笔 Editor

钟和晏 Zhong Heyan 薛巍 Xue Wei 陈赛 Chen Sai

葛维樱 Ge Weiyang 贾冬婷 Jia Dongting 徐菁菁 Xu Jingjing

杨璐 Yang Lu 曹玲 Cao Ling

主任记者 Senior Reporter

李翊 Li Yi 李晶晶 Li Jingjing 蔡小川 Cai Xiaochuan

何潇 He Xiao 黑麦 Hei Mai 丘谦 Qiu Lian

吴丽玮 Wu Liwei 俞力莎 Yu Lisha 王丹阳 Wang Danyang

张雷 Zhang Lei 苗千 Miao Qian

记者 Reporter

孙若茜 Sun Ruoxi 杨丹 Yang Dan 张月寒 Zhang Yuehan

张星云 Zhang Xingyun 艾江涛 Ai Jiangtao 宋诗婷 Song Shiting

孙璐璐 Sun Lulu 王海燕 Wang Haiyan 王梓辉 Wang Zihui

刘周岩 Liu Zhouyan 刘畅 Liu Chang 王珊 Wang Shan

特邀撰稿人 Overseas Feature Writer

鲁伊 Lu Yi 赵潇 Zhao Xiao

摄影记者 Photographer

于楚众 Yu Chuzhong 黄宇 Huang Yu

视觉设计中心 Vision Design Center

视觉总监 Visual Director

邹俊武 Zou Junwu

执行图片总监 Executive Photo Director

陈晓玲 Chen Xiaoling

设计总监 Design Director

王小菲 Wang Xiaofei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黄罡 Huang Gang 刘畅 Liu Chang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覃柳 Qin Liu 陈喆 Chen Zhe 韩雅丽 Han Yali

编务总监 Coordination Director

程昆 Cheng Kun

发行中心 Circulation Center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周旭 Zhou Xu

区域经理 Regional Manager

杨雪梅 Yang Xuemei 潘海艳 Pan Haiyan 张富伟 ZhangFuWei

发行服务 Circulation Service

李卫红 Li Weihong 刘琳瑶 Liu Linyao 王霄 Wang Xiao

王荻 Wang di 金宇迪 Jin Yudi 姚贺梅 Yao Hemei

读者服务经理 Reader Service Manager

朱静 Zhu Jing

行政管理中心 Administration Center

行政主任 Office Manager

高媛 Gao Yuan

行政助理 Assistant

刘蓓 Liu Bei

财务总监 Financial Director

郝大超 Hao Dachao

财务执行总监 Financial Executive Director

袁玉兰 Yuan Yulan

出纳 Accountant

张宇 Zhang Yu 李明洋 Li Mingyang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商务推广合作电话：(010) 84681038
联系人：连华伟

E-mail: lianhuawei@lifeweek.com.cn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 84681030 84681029 (传真)

E-mail: 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51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 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禾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 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0063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15.00 \$8.00 港币 20.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 《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上海：上海汇敦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021) 63769858
成都：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28) 86667805
重庆：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3) 86359776
南京：南京星与火文化有限公司 (025) 83327129
杭州：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1) 88256120
广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 (020) 87376490
武汉：武汉春秋书店 (027) 85493562
西安：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9) 87427853
昆明：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71) 64122816
沈阳：新中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4) 23883566
哈尔滨：志诚远大书刊公司 (0451) 88341879
青岛：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 (0532) 83840608
济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31) 82903395
长春：吉林九歌图书有限公司 (0431) 82752206
大连：大连渤海书店 (0411) 84609410
南昌：江西省邮政报刊零售公司 (0791) 88820509
太原：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351) 7065397
贵阳：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51) 5661974
兰州：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 8521090
郑州：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 (0371) 67647337
天津：天津天智书店 (022) 23683854
河北：石家庄远大书店 (0311) 83993043
安徽：合肥院新书店 (0551) 64252409
新疆：乌鲁木齐市纵横文科书刊有限公司 (0991) 5582981
内蒙古：呼和浩特融联书店 (0471) 6263358
深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 22203426
长沙：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 (0731) 82253036

本期广告目录

封二~扉1 · 宾利

3 · WWF

17 · 三联全媒体

55 · 生活周刊

87 · 松果生活

119 · 三联中读

127 · 周刊20年

139 · 三联书店

封三 · 熊猫爱茶研究所

封底 · KEF



拍摄二维码直接
下载客户端



新浪微博 @三联生活
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下载
松果 APP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电信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9000。包月8元，
周一至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三联生活周刊》

全媒体广告与商务运营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

中电发展大厦B座

邮编：100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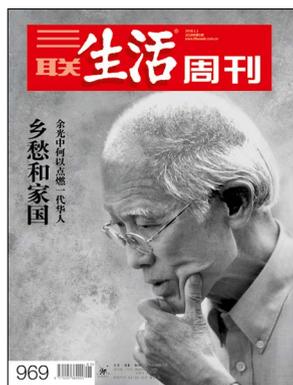
电话：+86 10 84681038

传真：+86 10 84681396

电邮：jingying@lifeweek.com.cn

网址：www.lifeweek.com.cn

三联
生活
传媒有限公司



乡愁和家园

我觉得缭绕余光中诗中的“回不去”“拔河”意象，更多已不再是年少时“故土分离”的乡愁情怀，而是回不去的华夏古典情怀。他一生不断出逃，不断回溯，年少学外文是为走出去看得更清，但又一生嗜好于古典诗词，左手诗词，右手散文，他是骨子里的文人士大夫情结与外表上的现代西学硕士。他的一生游离于不断出走不断回望的“拔河”中，如《望乡的牧神》所提到的，他正走到现代与古典的十字路口，准备为自己的回归与前途重绘地图。

（然 LEO）

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微信平台（lifeweek），回复您对封面故事的评论，精彩留言将刊登在下一期杂志中。

租房的日子

小姑子终于结束了十几年租房的生活，搬到了属于自己的小家。小家是个二手房，在顶楼，50平方米，这么小而旧的房子，在那个城市里属于下等水平，但她却很开心，每天乐呵呵的，上下班都哼着歌，又是换窗帘，又是买盆景，把家布置得格外温馨。我觉得那房子小，有些遗憾，她却一脸满足地说：“我觉得这样很好呀，至少我不用再租房了。”我顿悟，想想租房的苦，顿时也为她开心起来。

租房，是每个漂泊在外的打工仔必须面临的问题，每当因为工作的原因，或是其他因素，不得已搬家的时候，那都会产生极大的失落与落魄感，根本没有乔迁新居的喜和乐。再怎么豪华的租房，都只能算是临时住所，称不上是家，顶多算是遮风避雨的房子，不能给人踏实的安全感。

打工十几年，我搬家无数。从广东新塘到东莞，到惠州博罗，后来又转到广东常平，再到长安，那些租房的辛酸经历，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记得当年住在惠州博罗县一个小房子里，因为住房小，油烟多，住的人多，而且家家都做饭，蟑螂遍地都是，杀虫药、杀虫粉，每天换着用也无济于事。一个暴雨的晚上，我睡得正熟，一只大蟑螂突然爬进了我的耳朵，我在梦睡中被它折腾醒来，灌香油，用强光照，想尽了各种法子它还使劲地往里钻，难受的我只得冒着瓢泼大雨往镇医院跑，可值班的医生医术不行，夹了半天还是没能夹出来，我只好忍着难受，第二天一大早就奔赴县城医院，好不容易才将那只蟑螂取了出来。

有一年经济危机，没办法只好住在长安的一个旧仓库里，因为价格便宜，阳台是公用的，厨房是公用的，连洗手间也是公用的。锁是普通的挂锁，门是旧木板做的门，极没有安全感。晾在阳台上稍好一点的衣服，总

是有人趁你不注意就收走了，上洗手间和做饭都要排队不说，连隔壁睡觉的呼噜声都能听见。我那时唯一值钱的是一台笔记本电脑，怕被偷，每次临上班时，我都费力把床铺掀开，把电脑用旧棉衣包好，放在床底下。

又记得那年经济好转住在一个小区里，本来已经住了一年，各方面都还感觉不错，可老板却无缘无故要加500块钱，这是我无法接受的，没办法，我只得搬家，找来找去找到一间车库改成的出租房，连窗户都没有，一拉上卷闸门白天跟黑夜没啥区别。

那些年搬家，锅碗瓢盆、桌椅板凳，还有心爱的书，随着我不停地迁徙，从一个租房搬到另一个租房，从一座城市搬到另一座城市，它们见证了我搬家时像逃难一样的辛酸，也见证了我打工的历史和成长的历程。不停地搬家，是打工人心底的隐痛，是不想接受却不得不接受和面对的事实。

几年前，我回到故乡安居乐业，终于摆脱掉居无定所的日子。回想起那些搬家的经历，我有些心酸，但也常常会暗自庆幸，因为还有好多像我一样的兄弟姐妹，还在过着租房搬家的日子，真的希望他们能早点回家，过上安稳的幸福生活。

（湖南常德 刘亚华）

谁会工作？

有过机关工作经验的人，对调研一定不会陌生。按照常理来说，调研，上面有助于掌握基层动态，下面则可以近距离聆听上级指导，通过良性互动，肯定会更有利于下一步工作的开展。但对于吾友大刘来说，经历过一次调研之后，大刘坦言自己突然不会工作了。

大刘在市里一家国企上班。前不久，单位领导老王把大刘及其同事阿杰叫到办公室安排工作，说过几天省公司要来单位调研，单位对这次活动十分重视，很多重量级领导都会参加，

为更好地展现单位面貌，也为了给年轻人创造机会，领导决定让大刘和阿杰分头准备材料并由他俩向调研组进行主汇报。老王说到这，停顿了一下说：“你们俩都很优秀，也都到了该进步的时候，所以这次调研活动对你们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展示自己的机会。”说完，老王目光意味深长地扫过大刘和阿杰。

大刘听完老王的话，深感责任重大，从老王屋里出来的脚步都感觉有些沉重。回到办公室后，马上着手搜集资料、撰写材料。大刘在单位工作了十来年，一直以来都是兢兢业业，业务上也是一把好手，对于上级领导要来调研的题目，大刘并不陌生，但即便如此，也是不敢丝毫怠慢。反观阿杰，平日对工作就不甚上心，这会儿仍是不慌不忙，一点也不着急。这让大刘也有些疑惑：向调研组汇报这么好的表现机会，阿杰竟然毫不在意？

大刘的疑惑没有持续太久，阿杰便向领导提出，要把自己负责的那部分汇报内容也让给大刘完成，这让大刘更加疑惑和无奈：难道阿杰不想进步了？表现的机会都给了自己虽说也是好事，可活儿这么多，能保证高质量完成吗？看到大刘心有动摇，老王忙不迭地给大刘打气加油，不停地夸大刘是业务能手，比阿杰强太多了，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大刘才放心，至于阿杰，也就只能去做点检查会场之类的后勤工作了。

正如老王所说，阿杰对

会场检查这类工作倒是十分上心。这次调研，单位提前预订了市里一家酒店作为会议举办地，酒店规格、设施都还不错，但阿杰去了几次后，回来便给老王汇报，说后厨饭菜质量不行要求更换酒店。这让大刘感觉十分好笑：现在中央三令五申要求节俭办会，预订的酒店本身也比较高档，还提前预付了一部分定金，怎能说换就换。不过，最后也不知道阿杰怎么说动了领导，会议虽仍在原定酒店举行，但就餐改在了另外一家更高档的酒店。

调研那天，会议进行得十分顺利。会议结束后，一行人便浩浩荡荡赶去就餐酒店。路上，上级领导问为何会议、就餐不在一处？老王忙不迭地说，为了做好接待工作，阿杰提前好几天连续自费掏钱到这个酒店就餐，为调研组“试吃”，结果有一天饭后拉肚子，这立刻引起了单位的高度重视，马上决定更换就餐酒店，今天开会，阿杰都是带病坚持呀！一番话说下来，调研组齐声夸阿杰工作细心，考虑问题周到，这次调研还真是发现了一位难得的人才呀！

大刘听着调研组对阿杰的夸奖，心里不禁起伏不定：和阿杰相比，自己还真不会工作。（河南 关晓海）

学前班的烦恼

6岁的儿子正上学前班。从今年9月1日正式入校，将近四个月的时间里，10以内的加减法竟然还不会算，只会掰弄手指算

一个“1+1=2”“2+1=3”这么一个最简单数学题。每次放学回家问他今天在学校里学了什么，儿子都仰着稚嫩的小脸儿回答：“上午老师让我们坐好了看动画片，中午吃完饭趴在课桌上睡觉，一直睡到快放学。”怪不得每天晚上儿子特精神，都11点多了还在玩耍，我们只好强行按着他钻进被窝，第二天却赖床不起，喊破喉咙才磨磨蹭蹭起床穿衣服。检查一下他的作业，拼音字母勉强认识“a、o、e”，数学在临摹本上依葫芦画瓢写到数字50。天一冷，儿子不愿起床开始逃学了，一个礼拜去不了两三天。我们非常担心他的功课被落下，就问其他孩子的家长在校学习情况。他们的回答是：“在学校里啥也学不到，除了看动画片就是睡觉，根本不用担心落下功课，还不如私人幼儿园里的老师教得好呢！”

“与其在学校里混日子，还不如在家里玩耍呢！要不就送到私人幼儿园。这是什么学校？四五个老师教30来个孩子竟啥也不会。放学了孩子们的衣裳敞胸露怀，老师们也不帮着系好扣子穿好衣服，一点儿责任心都没有，要不孩子们不是咳嗽就是流鼻涕呢！不行的话明年不让咱家孩子上学前班了。”妻的一番唠叨也无不无道理，可我还是说：“毕竟在学校里上学前班正规些，教学师资力量雄厚，还能拢拢孩子的心，提前适应

一下学校里的生活，感受学校里的环境氛围。虽说私人幼儿园里的教学质量、孩子们的饮食起居要好于学校，但终究学校是公办的。”“公办不公办有什么用？看的是孩子们的学习效果，光有名头有什么用？不在学校里上学前班的孩子一样能读小学，你看在私人幼儿园里直接升入一年级的孩子，学习成绩都不错，还懂得一些学前班里没学到的知识呢！”妻一口回绝了我。

想想也是。上学前班每个月交380块钱的托管费，学校中午不管餐，每月还得额外交200多块小饭桌钱，合计起来是500多块钱的花费。私人幼儿园里的花费也是500多块钱，不仅中午管饭，且老师们照管精心周到，还能教孩子们多方面的知识。两者一比，私人幼儿园明显好于学校里的学前班了。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我认为：1. 学前班不考试，没有成绩好坏一说；2. 学前班里的老师没有压力，不像私人幼儿园之间存在着竞争，因而教学水平松垮垮；3. 学前班的老师们都是国家统一按月发放工资，教学质量的好坏与其工资不挂钩，这就使得老师们懒于勤政。每次放学接孩子回家时，各位家长都会聚在学校门口议论交谈一下孩子们在校学习情况。家长们一番牢骚感慨，道出了大家的心声，无疑不是每位家长们的烦恼。（天津 农夫）

本期截稿时间：2017年12月29日19时

本栏目欢迎来信，投稿请发信到：letter@lifeweek.com.cn

波多黎各 | 灾后圣诞

2017年12月25日，波多黎各当地一名飓风幸存者怀抱1岁的儿子站在圣诞树旁。2017年9月，波多黎各遭遇飓风“玛利亚”袭击，导致数十人死亡，当地电力系统被完全摧毁。三个月过去，全岛电力系统只恢复了65%，不少灾民是在黑暗中度过的圣诞节。







印度 | 猫头鹰

(右图) 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迈索尔，一只猫头鹰将头从树后探出，仿佛在玩捉迷藏。该图发布于2017年12月26日。



乌克兰 | 战俘交换

(左页上图) 2017年12月27日，乌克兰政府同乌东部民间武装进行了自冲突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俘交换，乌政府用238人换回74人。近一段时间，乌克兰东部局势处于僵持状态，乌克兰问题三方联络小组明斯克会谈作为冲突的调解机制，仍在继续，但难以达成共识。大规模释放战俘是乌克兰东部和平进程中呈现出的积极因素。

英国 | 节礼日

(左页下图) 2017年12月26日，节礼日期间，很多传统哑剧表演者在马什菲尔德街头表演。图为一名表演者身着用旧报纸做成的衣服。节礼日是英国特有的一个圣诞期间节日，就在圣诞节的第二天12月26日，是全民参与的疯狂购物节。

印度尼西亚 | 火山喷发

(右图) 2017年12月27日, 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锡纳朋火山再次喷发岩浆, 喷出的火山灰高达4600米。

利比里亚 | 选举

(下图) 北京时间2017年12月27日, 利比里亚总统选举最终轮结束, 前世界足球先生乔治·维阿击败民主变革大会党与团结党候选人、现任利比里亚副总统瑟夫·博阿凯, 成为利比里亚第25任总统。图为2017年12月26日, 乔治·维阿现身投票站投票。





互联网挤上电动车

文 / 邢海洋

刚被法院认定为“老赖”的贾跃亭，其FF海外融资10亿美元，他的造车计划峰回路转。被国内一众互联网大佬热捧的蔚来汽车则推出了一款车型，高调造势。中国的电动车产业又进入了一轮创业高潮，比亚迪、江淮、北汽等低端造车者未能追上特斯拉的传奇，似乎需要交由互联网创业者了。

国内声名狼藉的贾跃亭究竟凭什么获得了10亿美元的融资，使人浮想联翩。就公开的消息而言，只能从盛大文学原CEO侯小强寥寥数语的描述中“管窥”，“FF91在设计、性能、原地打转、加速等方面都堪称惊艳”。后来，侯小强又进一步解释道：“上千人热火朝天地研发、生产，这是我亲眼看到的。”而就在不久前，特斯拉发布了其全新电动跑车Roadster，该车0~96公里/小时的加速时间仅1.9秒。马斯克还声称，他或许会考虑将火箭技术用在新款电动跑车上，让下一代Roadster电动跑车拥有短途飞行的能力。

爆发力和易操控性本来就是电动车自带基因，如果仅仅是和传统内燃机汽车相比，电动车的所有“开挂”优势都没必要重述了，所以，电动车之间只适合横向攀比。如果说电动汽车还能带给观众以“颠覆性”的观感，除非是马斯克这次宣称的“会飞”，因为电池的蓄能远不及煤油，带着个笨重的电池在天上飞未免太不讲求效率了。可迪拜要运营的“飞的”就是中国产的电动飞行器，说明电动汽车无论如何“开挂”，都属于想象力所能企及的正常范围。

2017年电动汽车的一个大新闻是腾讯以18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特斯拉5%的股份，成为特斯拉的第五大股东。但就全年而言，当特斯拉的市值与传统汽车大厂站到同样起跑线上，它似乎触及到了一个隐形的天花板。于是，腾讯的投资行为可被解释为确保了一张未来电动车产业的门票——燃油车大势已去，传统车企在转型图变，中小创业者万舸争流，此时投资事实上的电动车“大哥大”特斯拉就确保了在未来电动车世界里拥有一定的席位，不被产业滚滚浪潮落下。

但投资特斯拉之前腾讯早就投资了具有国产互联网基因的电动车蔚来。2017年底蔚来汽车的首款量产车ES8高调亮相，其背后拥挤一众闪亮的投资人，腾讯、京东、联想和淡马锡等等。相比传统的造车者，互联网造车的优势在哪里？互联网思维，也就是华丽的PPT么？一轮苹果式的“高逼格”发布会后，消费者对互联网产品的高调登场已有所警惕，无论是互联网造车还是传统汽车，除了“未来派”的外观，电动汽车已经进入到性能比拼阶段。此时各路大军仍跑步进入电动车初创公司，看重的也只能是它颠覆传统车企后这个巨大的市场蛋糕。

互联网汽车成功颠覆了零售、电信后，成长起来的互联网巨无霸们想要获得万亿级别的下一个市场，非交通出行这个有着巨大的市场容量的产业莫及。在完成了对交通业信息提供方式的颠覆后，互联网巨头们本来再难找到新的市场缝隙了，幸好有了电池技术的小步慢跑，让外界看到了挤入汽车行业的机会。不过，通过展现在公众面前的蔚来ES8和道听途说的FF91，我们看到的却是互联网公司进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由远芯片和线路板更粗大的钢铁零部件主导的行业的行业的不适应。互联网公司可以重金挖来传统车厂的外观设计师，可电动车的未来在于电池的革命性突破，这个行业百年来的发展也证明了技术才是造就企业成长的决定性力量。这里不由得联想到董明珠女士对电动车的投资，她投资的电动车外观一般甚至有点土，可价格便宜，更重要的是董明珠的电动车拥有充电6分钟续航超过200公里、寿命30年等这些和互联网基因完全不搭边的东西。■

特斯拉一年来的股价走势图



生活在碎片时代

三联生活
传媒有限公司

生活在碎片时代，
不能像碎片一样生活。

三联生活周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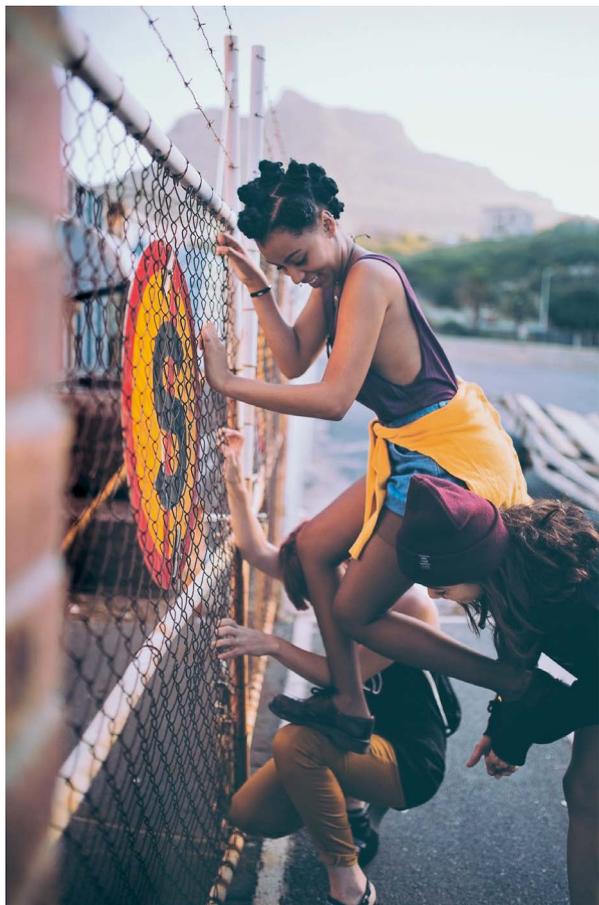


节气



新知
WISSEN

三联爱乐 PHILHARMONIC



那些鲁莽又聪明的年轻人

偷偷抽烟喝酒、结交狐朋狗友、为一点小事就大打出手……每一代父母，都会为孩子青春期间突然间的性情大变而头痛担心不已。但荷兰莱顿大学的研究小组在《自然·通讯》上发表论文指出，大脑纹状体在青春期的异常活跃固然会带来这些负面效果，但同样的机制也帮助青少年成为最高效的学习者。研究者在5年时间里对300名8~29岁的志愿者进行了736次大脑MRI扫描，结果显示，青春期的大脑纹状体对新知识、新经验和其他人的反馈极其敏感，当这些刺激来自酒精毒品和反社会行为时，青少年并非不知其风险，但大脑却会放大与之相对应的益处和快感。然而，如果刺激来自正向的学业追求，他们也会成为不用扬鞭自奋蹄的莘莘学子。

好消息



墨镜党有好梦

原谅那些大晚上在室内也要戴茶色墨镜的人吧！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的一项最新研究结果，临睡前两小时佩戴茶色墨镜，可以有效拦截手机和平板电脑屏幕发出的蓝光。众多证据显示，后者是干扰褪黑素分泌、影响生物节律、导致现代人慢性失眠的罪魁祸首之一。



常出门转转

对3375名70~95岁的老人进行长期跟踪调查后，以色列哈达萨—希伯来大学的研究小组发现，在身体状况和行动能力都相似的老者中，那些喜欢经常出去遛个弯的，健康活到下一个十年的概率更高。年纪越大，散步对心理健康和社会联系的意义就越大，“宅”只会让人更疲倦多病。

坏消息



虚不受补

骨质疏松和骨折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负面影响极其显著，但发表于最新一期《美国医学会会刊》上的综述分析了33项相关研究后指出，至少对这些研究所涉及的51145名50岁以上的老者来说，摄入钙和维生素D补剂并不能降低骨盆骨折的风险，不应作为常规预防手段。



气候难民知多少

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在《科学》上警告称，即便在温室气体排放得到遏制、全球变暖速度放缓的情景下，到本世纪末，来自伊拉克、巴基斯坦和非洲等国，因环境不再适宜人类居住而迁徙流亡至欧洲的气候难民，人数依然可能增加28%。而在加速变暖情景下，增幅可能达到188%。

一直存在着两种艺术：逃避的艺术，因为人类需要逃避，就像他们需要食物和酣睡那样，以及格言艺术，教导人们要忘掉憎恨、学会爱。

——奥登，《心理学和今天的艺术》

——四角裤还是三角裤？我们不回答这种问题。——瑞秋还是莫妮卡？瑞秋。——《金装律师》还是《傲骨贤妻》？《金装律师》。——只剩五美元，买汉堡包还是彩票？要看那个汉堡包是否好吃，但我喜欢好吃的汉堡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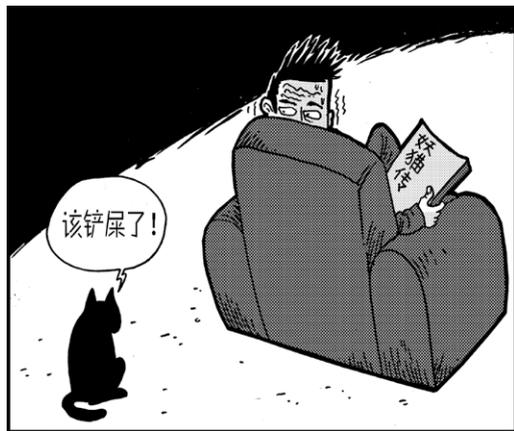
——哈里王子采访奥巴马，快问快答环节

奥威尔这位伟大的城市集体拥护者自己喜欢的是乡村田园的与世隔绝，这个仇视私立学校的人把自己的养子送进了伦敦最大的私校之一威斯敏斯特公学读书。奥威尔是矛盾的：是矛盾使作家有趣；把前后一致留给厨子吧。

——詹姆斯·伍德，《私货》

创新能力不限于某个天才或某个非常有创见的思想家在创作作品时的一次单独的努力。无论是在做物理实验、进行艺术创作，还是在维修机动车，甚至在安排自己微薄的收入不致沦为“月光族”的思考过程中，创新存在于人类生活的每个角落。

——美国人类学家奥古斯汀·富恩特斯，《一切与创造有关》



（插图 山羊哥）

男人根本不具备身体。看看那些杂志吧！女性杂志上的封面是女人的身体，男性杂志的封面上也是女人的身体。男人只出现在关于钱和世界新闻的杂志封面上——侵略战争、火箭发射、政变、利率、选举、医学上取得的最新突破——现实，而非娱乐。这类杂志只展示男人的脑袋。我们如何能知道，在那些谨小细微的斜条纹衣物下藏着身体？我们不能。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外星领土》



+/-

数字

29

美元

2017年12月28日，美国苹果公司为旧款手机系统升级后“变慢”道歉，将在2018年1月底至2018年12月把iPhone6之后的型号电池更换费用从79美元降至29美元。

67.82

%

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了《2016年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结果公报》，北京绿色发展指数得到83.71分，排在全国首位，但公众满意度为67.82%，排在倒数第二位，仅高于排名垫底的河北。西藏绿色发展指数排名倒数第二，公众满意度却高居榜首。

1.3

亿

关于英国王室的时代剧《王冠》第一季制作成本达到1.3亿美元，平均每小时花费1300万美元，而王室每年的花费在3亿英镑左右，女王和她的家人还是比电视剧他们的角色花费更高。《王冠》预计播出六季。王室每年的开销可以支持三季《王冠》的制作。

送年轻时的自己哪些书？

文 / 贝小戎

图 / 谢驭飞



前几天，有人问送给 14 岁女孩什么书合适？我马上想到的是《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但或许人家读初中的时候已经看过了。14 岁读很火的写女性友谊的小说《那不勒斯四部曲》，不知是不是又有点早了。好像没有谁是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在什么年龄就读什么阶段适合看的书，有时候该看的没看，却看了好像是长大后才该看的书。比如小时候你该看过《长袜子皮皮》《骑鹅旅行记》，却机缘巧合读了《1984》《人，诗意地栖居》也说不定。高清杂志免费下载QQ群：280594200

《卫报》半个月前做了一个专题，问一些著名作家会送给年轻时的自己什么书。也就是说，作为懂书的人，他们回过头来看，哪些书更适合青少年读。约翰·班维尔说，他年少时一直沉迷于后浪漫主义如迪伦·托马斯和劳伦斯·德雷尔的放肆，后来才在特里林的论文中得知狄德罗的哲理小说《拉摩的侄儿》，“它是欧洲文学中最振奋人心、最具颠覆性的文本之一。这本小书跟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的《论木偶戏》和霍夫曼·斯塔尔的《钱多斯勋爵书信》一起彻底改变了我对写什么、如何写的观念。《拉摩的侄儿》的语言是反讽的、辱骂的、充满歇斯底里的自我厌恶，又睿智地认识到世人喜欢那些逢迎者、骗子而不是真正的艺术家。狄德罗是一个杰出、有趣、睿智的人。如果我能回到过去，把一本《拉摩的侄儿》

按到 12 岁的我手上，我会避免许多蠢行。但是我能读懂吗？萧伯纳说得对：青春虚掷，总在青年”。我在大学阅览室里看到过这本书，后面的借书卡上显示，我的大学班主任、一位博士是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才看了这本书。

朱利安·巴恩斯说，他年轻时错过一些书，但他并不感到后悔，反而挺享受直到 40 余岁才发现《哈克贝利·芬恩历险记》《麦田守望者》《失落的庄园》这件事（到现在也没看过《小王子》）。他说：“文学方面我后悔的事与此相反：我希望自己没有 11 岁拿到一本康拉德的《秘密的分享者》，导致我抵制了他几十年；我希望我没有在能够像福斯特那样采取恰当的措施之前读他的作品。我会送给年轻时的自己的，都是非虚构作品，关于战争、帝国和种族的本质的书，关于政治和经济的本质，阶级、金钱和权力如何相互关联的书；还有关于自然的本质的书，我会指导年轻的自己去了解土、风和水，树、动物、植物和鸟类，还有蜜蜂；我还会送给年轻时的自己一些关于性的诚实的书。”

我希望自己年轻时就读到斯蒂芬·金，读到《肖申克的救赎》，读到他的回忆录《写作这回事》，更早地体会到坚韧与专业的重要性，更早地读到《第二十二条军规》《魔鬼辞典》，认识到世界的荒谬并学会苦中作乐。☑

西餐中吃的古往今来

文 / 二公子

图 / 谢驭飞



在网上搜索出国旅行必备品清单，前四名是方便面配榨菜、证件、衣物、应急药品。“快餐双子星”上榜的理由是：“在漫漫旅途中你必定会挂念祖国佳肴，有了方便面配榨菜，在国外超市买个鸡蛋，一壶开水泡下去，明智如你立刻会发现满满的幸福感如此容易实现。”

视西餐为畏途的国人，非今独有，中国第一所官办外语学校“京师同文馆”的首批毕业生张德彝就是一例。张在鸦片战争后赴欧，搭乘的跨洋轮船每日提供三次点心、两顿正餐。对此他记录道：“先所食者，无非烧炙牛羊鸡鱼……再则面包……饮则凉水、甜苦洋酒……另有黄薯、白饭等物。”从描述就看得出，他对这样的伙食明显不适应。“牛羊肉都切大块，熟的又黑又焦，生的又腥又硬……”到了后来，他自称已经到了“一嗅即吐”的地步。

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无锡人薛福成也认为：“是饮食一端，洋不如华。”1889年出访英、法、意、比四国时，他曾描述：“中国宴席，山珍海错，无品不罗，干湿酸盐，无味不调。外洋唯偏于煎熬一法。”言外之意，西餐“味不调”，是被千篇一律的烹饪技术坑了。

西餐如此不堪入口，自然有人挺身而出，将西餐汉化。清朝的徐老高，就因此名声大噪。他原本在广州沙面的洋行厨房里做事，学到了西菜烹调手艺，后来开了一家主营“西餐”的太平馆，虽然远近闻名，不乏达官贵人青睐，但菜单却和真正的

西餐相去甚远。不仅有老外不太吃的鸡翼、乳鸽登堂入室，还有瑞士汁炒牛河、鸡丝炒饭交相辉映，谁主谁辅，一目了然。名为西餐，实则中餐西做。

百年之后，西餐中吃的精神依然如故。用可乐煮鸡翅者有之，用啤酒煮鱼者有之，用西班牙火腿煲汤者也有之。而且国人早已经把西餐中吃之法发扬到国外去了。有一个冬夜我在巴塞罗那，逛完了兰布拉大道，晚餐还没着落，衣着单薄紧赶着往酒店走。在饥寒交迫的节骨眼上，乡音不期而至。“大哥去哪儿啊？进来暖和暖和吃顿饭吧！”顺着声音看过去，一个中年大叔操着东北口音拿着一摞子菜单，正在马路上乐呵呵地向我招手。到了跟前，我礼貌性地回答，想尝尝当地口味。

“那还不简单吗？咱家专做海鲜饭呐！”从他手里接过菜单一看，上面果然都是西班牙图文。我看前方还有两家店，就有点犹豫。他看出来：“那两家吗？你不用去了，都被我们老板盘下来了，西班牙人哪有我们中国人勤快。走走走！”就这样半推半就，我跟他往店里走去，路上，他拍着胸脯跟我们夸口：“兄弟，你就点我们的海鲜饭，我给你加上锅盖煮，保证不像老外做出来那种饭夹生。你家里吃啥味儿，咱这里就啥味儿。”

那个晚上我像是穿越到了广州西关，因为吃的是有些另类的海鲜煲仔饭。徐老高泉下当有知，西菜中做，海外后继有人！

看起来很有营养

文 / Harps

图 / 谢驭飞



生孩子以后，豆浆机被我推崇为坐月子神器。食品柜里的各种干果谷类加点水或牛奶，随心所欲混合起来放进机器，不过半小时就能得到一升液体，烫热浓稠，散发着坚果五谷的香气。当我请配偶品尝用小米、玉米、大米、核桃和巴旦木打成的坚果米糊时，他谨慎地闻了闻，说：“这东西看起来很有营养的样子，不过我还是不要喝。”

他的这句话进入我的脑海，就像一个带电粒子穿过云室，激发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营养作为一个抽象的定义，有具体的形象吗？什么东西看起来有营养，什么东西看起来没有营养？“有营养”的形象，在不同的时间、地点由不同的人来描述，会有多大区别？

人需要的大量营养素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微量营养素是各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虽然食品风潮从不同的方向一阵一阵刮过来，科学上对营养的基本定义并没有质的变化。维生素片可以说是集营养之大成，但很少有人会觉得维生素药片看起来“很有营养”，也许因为维生素药片不是食物。各种配方代餐食物，包括婴儿的配方奶粉在内，净是一些灰的白的粉末子，也不让人觉得看着有营养，尽管商业研发部门下了大功夫确保这些产品含有人体所需的各种物质。

所谓包子有肉不在褶上，一种食物看着有营养，仔细推详起来，与它含有的营养丰富和全面

程度关系并不大。现在的流行“营养色”是绿色，大自然的颜色，连维生素片的包装盒也以绿为主。发达国家的人民普遍吃蔬菜水果太少，吃精制碳水化合物和脂肪肉类太多。大力水手吃菠菜，意在诱导小孩吃菠菜。现在用绿色来代表营养，说明全民在吃蔬菜这件事上都长期滞留在儿童状态，靠权威的明哄暗骗来达到目的。无可否认绿色蔬菜含有人赖以生存的维生素、纤维素和微量元素，不可一日无之，但是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极低，如果人不是已经吃够了别的，顿顿只吃绿叶菜定会导致营养不良。

用各种杂粮和坚果煮成的糊糊多呈棕黄色，营养可以说相当不错。如果吃的数量够多，大致能满足一个人的能量和代谢需求。配偶说我的糊糊“看着很有营养”，有点道理。中国人过去歧视玉米、小米等粗粮，视吃窝头为耻，以吃大米、白面为荣，这种观念现在已经转变了很多。然而在人们只有粗粮可吃的时候，白面馍馍无疑看上去最有营养。且看《绿野仙踪》是如何描写的：“此谷馍馍也。谷得天地中和之气而生，其叶离离，其实累累：弃其叶而存其实，磨其皮而碎其骨；手以团之，笼以蒸之，水火交济而馍馍成焉。夫猩唇熊掌，虽列八珍，而烁脏壅肠，徒多房欲；此馍壮精补髓，不滞不停，真有过化存神之妙。”

所以，觉得一样东西看着有营养，还是要想一想它是不是真的有营养。☑

傻瓜穿法

文 / 中读 @ 月照花霖

图 / 谢驭飞



我对穿衣的重视缘起老师的冲冠一怒。那一年我读大一，还是在上素描课时，同学们正对着画板聚精会神，老师却在一旁望着我们直摇头，几度欲言又止之后，终于，老师开口了：“你们怎么可以那么平淡？你们可是学工艺美术的！”这两句话砸得我晕头转向，停笔细看：大多数同学包括我就是普通的T恤、牛仔裤，好像是平淡了点。对哦，美是有意味的形式，难怪老师怒不可遏。

老师的话如醍醐灌顶。自此，我及我的同学们在追逐衣饰的路上一路狂奔。学生时期囿于财力有限，我们就自己动手，淘回来的大路货略加改造就有了层次美。简单的深色短风衣，在肩线的一侧加上一层同色的轻纱，既有烘云托月的审美又可缠绕在颈间抵御早晨的轻寒。掐腰的青花连衣裙，点睛之笔却在一副耳环，是用连衣裙的同款面料制作。至于自己做的手镯，手绘的衣服，加工的绣花鞋，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

工作以后，经济独立，时间有限就更倾心于追逐现成的时尚。不过，我特别钟爱文章或是绘画中的留白，喜欢那种虚实相映、言尽意未休的感觉。我不大喜欢从头到脚统一为一种风格，那样就过于平铺直叙，缺乏回味。比如：明明一身休闲装束，我却有意拎一个正装包，看似不和谐却又在色彩上做一个呼应，都是同一色系，只在

明度上有区分。正装又偏要加入休闲甚至是酷辣的单品，换成当下的说法就是混搭了。

我还喜欢“逆天而行”。成都的冬天本就少有阳光朗照的日子，天色大多阴沉晦暗，再穿了符合季节色彩的黑色、深蓝、深灰，更觉得心情沉重如奔丧。我偏穿了明黄、冰蓝或是浅粉的外套，如此明亮柔丽的前进色，单是看着，也能从积郁的情绪里开出花来。再是冻雨寒风，于我又何加？

有设计感的单品总让我心动不已。一条短裤，前面看是百褶裙，后面看分明又是短裤。加了银链的浅口鞋，链上的星星就在脚踝处跳动。最贴心的是银链是可以取的，看腻了，取了银链又是一种样式。

时光匆匆，时尚兀自变化飞快，人潮在其后亦步亦趋，有身不由己的累，也有踏浪戏潮的乐，追逐或不追逐，它自前行。正如康德所说：“成为一个处于时尚之中的傻瓜，总是要比成为一个处于时尚之外的傻瓜要强。”反正总是傻瓜，不如各自随心。☑

本栏目投稿邮箱更改为：roundtable@lifeweek.com.cn



栏目插图 | 范薇

明星收入资本化

华谊兄弟收到证监会警示函，起因是 2015 年收购两家明星公司，这些公司主营收入一部分来源于明星股东的个人收入。明星的个人收入，装入子公司中，再出售给上市公司，这一做法将明星收入资本化。对影视公司来说，本来的成本不仅不再是成本，而是变成了收入，一进一出，亏的转为盈利，盈利的变成赚疯。大牌艺人付出了一两年的劳动拿回了 6~10 年回报，虽然绑定一些义务，却难以实质制约。

中一签仅赚 2400 元

作为新股申购新规实施后首只顶格申购能百分百中签的新股，华能水电却很快打开涨停板，按新股收益的常规计算方法，即以开板当日的最高价计，中一签的投资者仅赚 2400 元，创下年内网上打新收益新低。2017 年，收益较高的新股均集中在一季度，四季度新股上市连板次数出现明显下降趋势，全年中一签新股的平均收益约为 23500 元左右。

“谁家的孩子谁抱”

江苏、贵州两省 20 个市县违法违规举债担保问责情况公布后，财政部提出，坚持中央不救助原则，做到“谁家的孩子谁抱”，坚决打消地方政府认为中央政府会“买单”的“幻觉”，消除金融机构认为政府会兜底的“幻觉”。审计署曾发现，至 2015 年底，浙江、四川、山东和河南四个省份通过违规担保、集资或承诺还款等方式，举债余额为 153.5 亿元。还有地方约定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支付建设资金等方式对社会资本做出兜底回购、固化收益等承诺。



12 万亿商品房

2017 年，被称为中国楼市“史上最严调控年”，尤其是一、二线城市，全面迎来“五限时代”。可全国范围内商品房销售额首次突破 12 万亿元，商品房销售面积突破 16 亿平方米。千亿房企阵营已达到 14 家，碧桂园则成为历史上首家达 5000 亿的房企。此外，2017 年龙头房企补库存意愿高涨，6 月以来土地购置面积同比基本保持两位数增速。



苹果概念股

刚刚过完“黑五”，迎来圣诞假日之际，销售不如预期的苹果下修 iPhone X 的 2018 年首季销量预估，降幅达四成。此前传苹果对原本的追单反转为砍单，大砍针对台积电的 A11 处理器订单，而独家组装 iPhone X 的富士康郑州工厂紧急宣布暂停招工。12 月 25 日，消息传来蓝思科技盘中大跌 7%，立讯精密、江粉磁材等跌逾 2%。另外，多家知名手机品牌纷纷曝出砍单的消息，或预示智能手机产业寒潮将至。

“新三板”如何改

全国股转公司发布分层与交易制度，释放了改革信号。交易制度的改革包括引入集合竞价、优化协议转让、巩固做市转让等具体措施。此前，市场认为现行协议转让方式存在定价不公允、市场不认可、监管难度大等诸多问题。原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盘中交易方式统一调整为集合竞价，盘中时段的交易方式为集合竞价与做市转让两种，供挂牌企业自主选择。交易制度的改革解决了定价的问题。有了价格才有交易的可能。

基金的秘密

招商证券发布了《我国权益类公募基金业绩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的报告，通过十余年的数据梳理，试图发现影响净值涨跌、起伏的关键因素。结论是，曾任卖方研究员的基金经理、基金经理年限以及持股集中度，这三项特征对于基金业绩均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且相关系数较大。而基金经理性别、学历则影响甚微。而频繁跳槽，以及同一只基金由多位基金经理共同管理，则会产生负面影响。



半悬空镶口

love link 悦动系列改变了传统宝石镶嵌的静态效果，巧妙的镶嵌接口让钻石处于半悬空状态，伴随着轻微的摆动而熠熠闪光。

变色体重计

连接 APP 的体重秤 Shapa，不仅会显示体重数量，还能通过体重波动幅度显示不同的颜色：灰色是增重，绿色是保持相同，蓝色的体重减少。此外，算法会根据个人习惯和喜好，推荐健康建议。如此设计是为了减少微小波动数据对人们情绪的负面影响。



艺术电视

获得 Wallpaper* 设计奖提名的概念产品 Bild X Concept TV，其设计者从帆船上风帆的悬挂方式获得灵感，创造了一个薄薄的金色框架，突出了其超薄 OLED 屏幕的特点。

勃艮第红色珐琅

欧米茄星座系列尊霸年历腕表限量版仅推出 52 枚，经过喷砂处理的 950 铂金“派盘”表盘的每一个刻面都标记月份名称，成为年历指示功能的组成部分。勃艮第红色珐琅点缀在白色 18K 金指针、刻度以及表背的天文台徽章上。



西柚风扇

这款 Creamsicle 风扇看起来就像西柚的横切面，整个扇叶不是传统的中心轴，而是圆盘式旋转，带动圆盘内侧的扇叶。半透明的叶片看起来像极了西柚的质感，虽然颜值高但安全系数有点低。



人造蝠鲼

水下机器人 Mantadroid（人造蝠鲼）的两个翅片由各自的电动机带动上下拍动推行前进，尾鳍控制前进的方向。它能以每秒 0.7 米的速度移动，运行可长达 10 小时。其研发目的在于研究海洋生物多样性，测量水文数据并执行搜索操作。

互动灯光装置

出现在第十届北京蓝色港湾灯光节上的装置“宇宙之花”外形酷似一朵巨大的漂浮在水面上的花朵，其花蕊部分模仿了脑细胞的形状。当参观者围绕装置走动时，“宇宙之花”会记录下这些在它周围移动的色彩，并在花体上呈现出与之相对应的活泼变化。





石榴与可可豆

蒂芙尼 Schlumberger 系列珠宝中的“可可豆”和“石榴”胸针用沙弗莱石、绿松石、蓝宝石、石榴石等彩色宝石镶嵌，传递出热带果物的生动造型。



套嵌花瓶

阿尔多·齐比克 (Aldo Cibic) 为 Paola C 品牌设计 Base & Cuppino 花瓶，黄铜底座与绿色吹制玻璃套嵌在一起，构成色彩与材质的鲜明对比。

披头士钢笔

万宝龙披头士乐队特别版书写工具，笔帽和笔杆饰以炫彩条纹，配色来自《佩珀军士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专辑的乐队成员服装，笔锥形似混音台上的按钮。





微绘蝴蝶

Bovet 1822 “蝴蝶”腕表以大明火珐琅微绘技术在表盘展示精致的蝴蝶图案，表圈、弓形环及表耳栓以全手工刻凿，与微绘图案互相映衬。

橄榄绿烛灯

圣路易品牌的 Apollo 系列吊灯采用古典烛灯的形式，15 个橄榄绿色调的水晶灯杯悬挂在金属支架下，灯杯中隐藏了 LED 灯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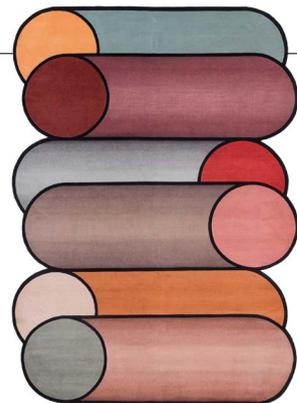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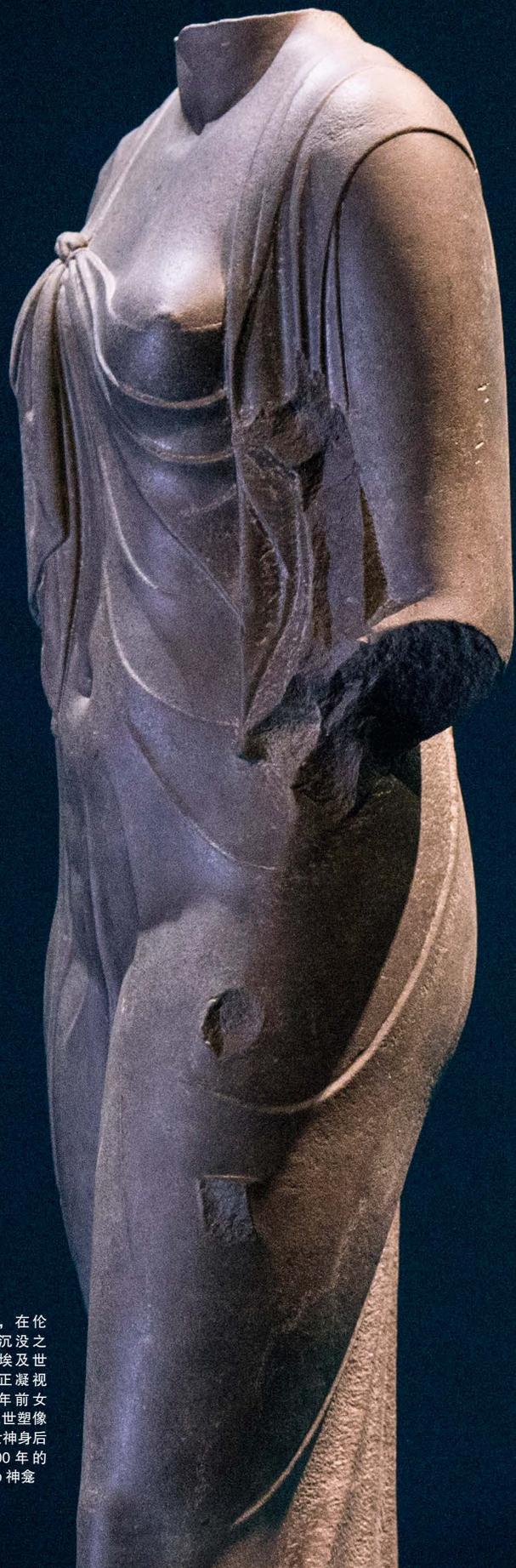
森林绿梳妆台

Angela Adams 品牌的 Lily 梳妆台系列，梳妆台和搭配的镜子、椅子都是采用森林绿色的清新色调，让使用者如同置身于自然之中。

视错觉地毯

CC Tapis 品牌的 Visioni 真丝地毯是在尼泊尔手工制作的，其抽象的设计图案具有三维视错觉效果，为传统技术增添了当代气息。





2016年5月，在伦敦举办的“沉没之城：失落的埃及世界”展上，正凝视着公元300年前女神Arsinoe二世塑像的观者。女神身后是公元前100年的Amun-Gereb神龛

看懂大英博物馆

在一座建筑里思考整个世界



文 / 蒲实

迷失在大英博物馆是很容易的事。每周六上午9点开始的“特别之旅”，将在一个半小时里带你“环游世界”。导展员谦虚地说：“这里有200万年的历史。今天我们收敛起野心，只游3500年。跟紧了，别掉队，别迷路。”

我们从建筑师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设计的玻璃穹窿包裹下的大厅出发，拾级而上二层，到40号展厅，进入1050~1500年的中世纪，在刘易斯棋子的玻璃橱窗前停下。这套在苏格兰刘易斯岛发现的棋子是大英博物馆的宠儿。海象牙和鲸齿制成的87个小人少有能全部聚在一起的时候，时常忙着全世界旅行。不久前它们刚参加了大英博物馆的“世界史百物展”，巡游世界回来。威严的国王和陷入沉思中的忧郁皇后接见了我们。它们沉默不语的巨大叙述力量，只需翻阅近几年的“参展日程”就一目了然：在“百物展”之前，它们去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出席了“国王的游戏”特展，去日本一系列博物馆和美术馆出席了“世界文化的珍宝”巡展，在德国参加了“21世纪的图像与符号”和“欧洲与东方”这样的展览，在挪威和丹麦接见了“海盗与基督教”“海盗、斯堪的纳维亚和欧洲”等一系列展览的访客。象棋这种游戏公元500年左右在印度发明，从波斯传入伊斯兰世界，又从伊斯兰世界传入南欧，再北上到达北欧，然后北欧扩散到苏格兰。这一套神情各异时而滑稽的小人内在，有一个漫长辽阔的故事，把伊斯兰与基督教世界、苏格兰与挪威联系起来。

我们加快脚步。下一站是41号厅，600~650年中世纪的英格兰。萨顿胡船葬的展柜前人头攒动，这是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个眉毛、鼻梁与胡子上的装饰构成了一只巨鸟的萨顿胡头盔，频频出现在英国的报纸和电视屏幕上，成为重建英国人国家认同的形象符号。这套连墓葬主人究竟是谁都还不清楚的作品，见证了罗马帝国撤离后英国没有文献记录的一段历史。它是一个并未完全解开的谜，漂浮在历史与想象之间。然后我们在68号钱币馆聆听，纸币是如何说服世人相信它们代表着同等价值贵金属的故事；在70号展厅罗马帝国馆观看，公元前50年至公元30年罗马一个玻璃加工厂制造的波特兰花瓶，奥古斯都统治下帝国的繁荣和奢华从它的身上静静浮现。

时空开始跳跃。我们穿梭到61号古埃及馆，进入到公元前1350年新王国时期一个中下层官员尼巴

蒙(Nebamun)的墓葬，与他一起欣赏带着超自然神力的猫儿在春色中捕捉飞鸟；跳跃到6号展厅公元前600年左右的巴比伦王国，站在伊师塔门(Ishtar Gate)的狮子像前，遥想尼布甲尼撒二世征服犹太国和耶路撒冷的历史，描摹已消失不见的“空中花园”。然后我们走下楼梯，在585年制造的佛像注视下，穿越中国古代的南北朝，来到1000~1200年的复活节岛雕塑前，倾听它与旁边的当代装置有关“生与死”的跨时空对话。在最后的半个小时里，我们去了16~17世纪的尼日利亚的贝宁，穿行到亚历山大统治下的埃及阅读罗塞塔碑的文字，最后在18号厅的希腊帕特农雕塑前结束旅程。

在大英博物馆时空交错的小径里和展厅间穿行，我常想起博尔赫斯想象里的巴别尔图书馆。无穷多的六边形房间和联结各层各空间的旋梯，构成了那个通过分类排序组织起来的百科全书图书馆的知识空间。每个房间里都有若干书架，每个书架有五个书栏，每个书栏上有32册的书，每本书都有410页纸，每页有40行，每行大约能写80个的字母，字母有22个，3个标点符号。这些符号的排列组合，将包含着世界知识发展延续的无限可能，宇宙因此有了“无穷无尽的希望”。某个书架上，还藏着一本图书馆所有书籍的总目录，那将是一本包含着混乱无序、澄清世间所有奥妙、一次次解释重构世界秩序和探索世界本质的书。我时常感到，那些六边形蜂巢般的房间在大英博物馆化身为一个个展厅，那些文字符号则化身定义为了一件件藏品物质属性的复杂编码。覆盖人类七大洲、200万年历史的700万件藏品，在这个博物馆的容器织成了迷宫般错落时空的网络，它们如果打破既定的展厅、区域和历史时期的划分，相互生发联系和排列组合，就将产生近乎无限的可能性，又将储存和容纳多少的知识。更何况，这些藏品还处于一个全球性的博物馆网络中。它们还可以与成百上千个百科全书式或主题性的博物馆里的无数藏品对话、关联和重新排列组合。这些藏品叙事的可能性将有多少种呢？必然是趋于无限的。

这样的事情正在发生着。在大英博物馆里，你能看到古希腊的陶器、古埃及的浮雕与当代伊朗艺术家对话西班牙艺术家戈雅的装置排列在一起，共同讲述“战争与美学”的主题；你也能看到来自柏林博物馆的南亚湿婆雕塑、来自圣彼得堡冬宫的东正教器皿、来自大英博物馆的唐卡与来自世界博物

馆网络的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展品一起陈列，叙述着宗教信仰的共通性。2010年，大英博物馆与英国广播公司的合作，每一期用一件藏品讲述一段历史，遴选100件藏品，讲述世界史。4年多时间里，400多位馆内工作人员、100多位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作家参与到遴选展品和讲述展品的故事中来，创下了1100万人次的收视率，大获成功。节目最后变成了一本书，《100件物品里的世界史》，这本书就像博尔赫斯“巴别尔图书馆”里的那本总目录，推动了一次全球巡回展览。大英博物馆的“百物展”在北京3个月就创下了约30万人的参展纪录，令人想起1966年大都会博物馆那场推动博物馆变革的“图坦卡蒙大展”。大英博物馆的空间逻辑也在发生着变化。欧洲展厅的钟出现在重新开放的中国展厅时间线上的近代时刻，各个展厅之间正在寻找着打通和对望的新方式。

在大英博物馆里穿梭，你会发现三种叙事的迷宫。第一种是线性的，你只需顺着展厅里的时间线索向下走。第二种是树状的，人类文明的起源就是大英博物馆隐形的树干，你每进入一个地区的一段历史，顺时间河流往下漫溯，都无法再连续进入另一个地区历史的开始。你需要折返到时间岔岔的地方，重新开始。第三种类型是网状的，一个点可以和许多其他点联结，构成一个无中心的网状组织——而这，正是意大利学者翁贝托·埃柯所说的“百科全书式”的结构。物品的那些多维属性——产地、时间、流转、归属、材料、价格、图像、风格、装饰……让它们每一个都成为很多可建立联结的点；而这些内在的属性，就像一个个互联网的“超文本链接”，可以生发出多重路径的叙事。博物馆的空间里每一个出乎意料的物与物之间的联系，都将把你带入一本可以穿行其间的百科全书。

从催生了大英博物馆的最初收藏和分类开始，大英博物馆慢慢建造起一座路径岔岔的迷宫。而“迷宫”这个概念，不仅在17世纪的数学家莱布尼茨的思想中就已成形，而且在18世纪狄德罗《百科全书》的论述中也以清晰明确的方式呈现出来。那正是大英博物馆起源的启蒙时代，启蒙思想突飞猛进地从自然科学扩展到了人文历史领域。

大英博物馆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成长时期，伴随着殖民扩张和帝国的历史。它对世界文明的兴趣和关注、对全世界藏品的大量收藏，都与这段历史无法分开。今天，藏品的征集方式已发生了

根本性的改变。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闫志告诉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文物主权”概念兴起，大英博物馆征集和策展的思路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们的主导地位，从收藏、陈列，更多的转为体现在“研究、展览、议程设置和主题性展览”。公共博物馆的职能领域不断拓展，从“历史的收藏者”，逐渐变为“历史的参与者”，通过策展提供一个公共话语的“论坛”空间。在大英博物馆里，你能看到它对叙利亚难民问题的关注、对宗教交融与冲突的讲述、对伊朗局势投注的目光、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反思，以及让古代文明与当代人身体和健康问题的对话。

我们今天对博物馆的认识，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知识界、艺术界对启蒙运动与理性的反思。在沃尔特·本雅明的一篇文章《开箱整理我的收藏》中，他谈到，他之所以需要一个图书馆，看重的不是图书馆里书的内容，而是人与书相遇的过程和书本身的命运。获取书的过程中，“每个回忆、念头、感觉以及书籍的全部细节（出版日期、地点、装帧工艺等）一同形成了一部百科全书，其精髓是一本书被收藏整理的命运”。米歇尔·福柯用同样的方式，讲述了档案的作用。他说，我们接近历史的方式，不仅仅是靠读取档案中的内容，实际上，置身于档案架之中就是接触历史。知识的“考古学”，强调的既不是向作者这个源头进行追溯，也不是向思想的历史源头进行追溯，而是强调文献和文献之间、档案和档案之间断裂、发散、破碎的关系。“昔日玫瑰以其名流芳，今人所持唯玫瑰之名。”当“所指”与“能指”的关系随着岁月流逝已变得模糊，甚至因为过于丰富而变得虚空，那么就无需再去挖掘档案的“所指”。文献因不再是一个纵深的载体，而是在一个空间系统中占据着序列特定位置的话语。这种物质状态，正是博物馆里那些有着内在地质时间的物品所具有的特性。

艺术批评家约翰·伯格说，观看先于语言。“在观看的范围内，我们可以更确切地在词语难以达其意的领域内，界定我们的经验。不仅是个人经验，还包括关于我们与过去的关系本质性的历史经验，也就是那些求索给予生活以意义的经验，尝试理解历史、使我们能在其中成为创造者的经验。”神庙的石柱间，含混不清的词语浮现出来，好似悠长的回音于远方混同，归入幽暗而深沉的和谐里。博物馆里，“广大如光明，浩漫如黑夜”。■



大英博物馆

行走于百科全书的多重迷宫中

主笔 蒲实

大英博物馆的大厅，在原来的建筑上，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设计了圆形的玻璃穹顶



(视觉中国 供图)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大英博物馆，大概非“浩瀚”莫属。这座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建立于1753年，馆内有700万件藏品，覆盖地球七大洲的文明和人类200万年的历史。它的馆墙构成了容纳漫长历史和辽阔地理的容器边界。如何穿越这迷宫般的被弯曲的时间和错落的空间？

跳跃的时空

14:30，大英博物馆64室。博物馆导览手册说：此时，此地，你将开始一场约公元前3000年的古埃及之旅。在志愿者导展员的带领下。

“15:15，70室，古罗马之旅。”

“11月10日，13:00，33室，中国之旅。新

馆开幕之际，馆长霍吉淑亲自导展。”

“周六，9:00，特别之旅，一个半小时环游世界。”

“这样好，不用漫无目的地逛，从一个展品跳到下一个展品，有的放矢。”有一次穿越去罗马时代的英国之前，导展老太太和蔼地说。立在这些展厅里的集合站牌，就像博物馆小宇宙里的一个个时空穿梭机发射台，每天自动按照时刻表发射去不同的地方。在大英博物馆的两周时间里，我每天都等不同的导展，几乎“乘坐”了所有班次的“穿梭机”。只要时间一到，自然有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聚集在站牌下，一位渊博的志愿者将准时出现。

你很快会发现，从一个展品到下一个展品之间，时间并不连续。在一件展品前停留，你身处某个漫长历史时期的某个时间横截面，然后，你跃迁至下一个时间横截面。从第三层的51号展厅走到相邻



左图：大英博物馆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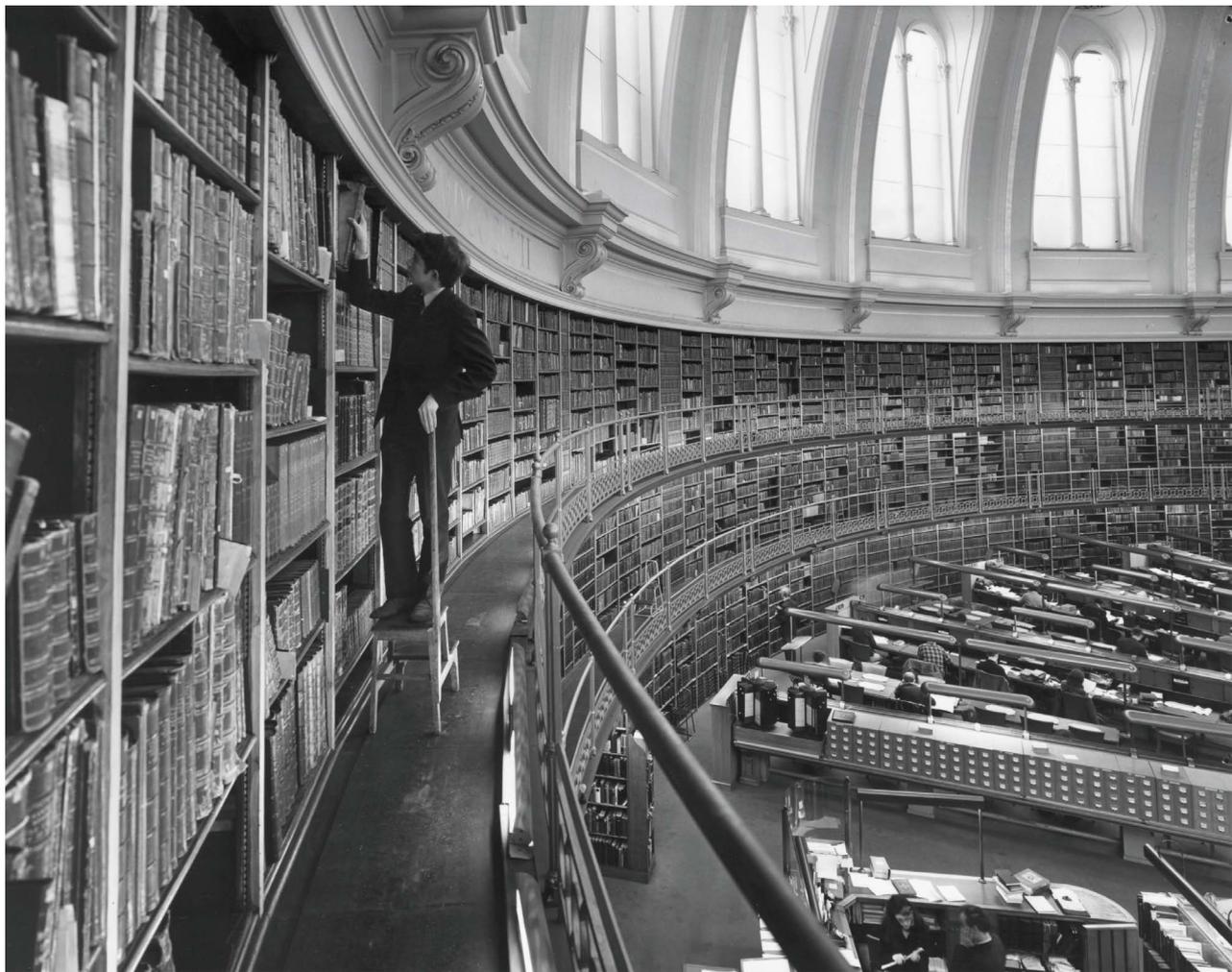
右图：大英博物馆展厅内，正在听导展员讲解的游客

的50号展厅，再进入连续的49号、40号、41号展厅，拐个角依次走过46、47号和48号展厅，在这些连续的空间中，你从遥远的公元前10000年至公元前800年的欧洲与中东，穿越到罗马时代的英国，再跳跃到1050~1500年的漫长中世纪，滑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15~18世纪的欧洲，一路跃进到19世纪的近代，抵达切近的20世纪和21世纪。展厅与展厅之间的那道没有门的门框，是时刻的尺度，时间的断点，某两个时间段之间的历史横截面，时间跃迁的临界点。博物馆就像为戏剧而搭建的迷宫般的舞台，法国戏剧家让-米歇尔·里博形容那种从一个展厅到另一个展厅的感觉，“迅速地、曲折地、向后面、向旁边、在中间，然后慢慢地腾空而起，就像清晨的一个思绪。时间支离破碎，参观弯弯曲曲，导游线路漫无目的。……不乏淡淡的哀愁，却也迅速流畅，总是趣味盎然，好似一个梦幻的游戏滑道”。

公元前3500年基波林人自然形成的木乃伊干尸，与公元前240年霍尼吉提夫大祭司的木乃伊相距并不远，两者之间却有3000多年的时间悄然流逝。陈列在展示柜里、悬于空中的每个物件，都代表着一个不可分割的时刻，物与物之间的时刻并不连续。导展员用他的想象联结起这两片漂浮于远古埃及世

界的时间切片，“基波林人的尸体被发现时，头朝向南方。后来制作的木乃伊头则朝向西方——埃及人所认为的灵魂永恒之地。很有可能，正是这种自然形成的干尸启发了古埃及人制作干尸。”“也许”“很有可能”“推测”，这样的词时常闪烁在鲜活的导展词中。一位导展员有一次说出“也许”之后，专门为“也许”这个词做了说明：“我刚才说到‘也许’。是的，待会儿你们还会听到很多次这个词。在讲述一个物品的故事时，我们需要一些想象力。”

有时，两段看似毫无关联的历史会被两个藏品启发性地联结起来。一天下午的埃及之旅，我们沿着尼罗河从古埃及一直行进到南部的努比亚王朝，今天尼罗河上游的苏丹，最后在塔哈尔卡的狮身人面像前停驻。这是一个与埃及人在外貌和肤色上有明显不同的努比亚人的狮身人面像，尺寸很小，脸带有很明显的非洲黑人特征，与埃及法老的脸不一样。他是库施与埃及联合王国的第四任法老。库施在今天的苏丹，那时候被更强大的埃及视为南部的属国，但也短暂征服过埃及，建立过全新的国家，塔哈尔卡就是一位将埃及纳入治下的库施统治者。这尊狮身人面像上，塔哈尔卡作为库施统治者化身为埃及法老。塔哈尔卡统治下的王国，吸收了许多



(视觉中国供图)

上图：大英博物馆著名的环形阅读大厅（摄于1968年）

下图：大英博物馆外排队等着看“图坦卡蒙的宝藏展”的游客（摄于1972年）



(视觉中国供图)

埃及人的习俗，包括在库施按照埃及模式修建了金字塔、敬拜埃及的阿蒙神、按照埃及风格重修神庙、用埃及象形文字作为官方记录语言；但也保留了库施的很多习俗，比如敬拜本地的狮神。这是历史上成功征服一再出现的模式，“征服者沿用原有的权力系统与王权象征，来统治已经接受了这些符号的大众”。比如，帖木儿家族作为蒙古统治者，在中亚驻扎了三代人后，接受了伊斯兰教、波斯和突厥文化的熏陶，建立了许多清真寺、宗教学院和陵墓；又比如，鲜卑拓跋族建立了北魏以后，迁都洛阳，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

这尊狮身人面像雕塑是古埃及之旅的终点。这时，年轻的导展员从挂在胸前的书包里取出一张彩色图片，是公元前27年至公元前25年制作的罗马帝王奥古斯都青铜像。这尊青铜像制作的时间距塔哈尔卡狮身人面像的年代又过了600多年。为什么会在塔哈尔卡的花岗岩雕塑旁呈现这张头像的照片？导展员说，这尊青铜像也是在库施所在地——苏丹古城麦罗埃被发现的，当时位于罗马帝国的南部国境之外。他接着讲了一个故事：“苏丹的军队曾经攻占过罗马帝国疆域内的埃及南部城市，把奥古斯都全身雕塑的头摘下来，运回麦罗埃城，埋在神庙的台阶下，让每个沿台阶走入神庙的人都能把罗马皇帝踩在自己的脚下。”罗马帝国国境的最南端，既是埃及与苏丹的分界线，也是古埃及与库施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将尼罗河流域的人分隔开来，是地中海文明和非洲文化的断层线。短暂征服过埃及的塔哈尔卡雕塑与征服了埃及的第一任罗马皇帝的头像奇妙地并列出现，是因为它们的发现地在地理上如此接近，也都曾是生活在强大王国或帝国边缘的人群对强大者取得短暂胜利的象征。当我的罗马帝国之旅紧接着在相距不远的70号展厅开始时，第一件被观看和讲解的展品就是奥古斯都的这尊青铜头像。苏丹就这样将古埃及与罗马帝国奇妙地联系在一起，两大强国边缘地带通常被忽略的历史此刻被加注了一个奇妙的重音符号，成为一个时间联结的纽带。这位不知名的导展员讲述故事的新角度，给了这段旅行新的灵感。

大英博物馆的物品讲述着不同的故事。有的物品讲述着权力运作和统治术的故事，比如遍及罗马帝国疆域的帝王雕塑和铸币上的头像。这种权力造像术，直到现代仍然被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所借鉴。而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却并没

有大规模传播的皇帝造像，造像术被用来塑造了大量的宗教形象，比如南北朝时期的佛像和明代时期的道教人物形象。权力运作形式以不同的形式得到体现，比如中国汉代漆杯上刻着6位工匠名字和7位监督人员名字的文字，反映了工业生产与官府管理的结合，它的组织模式仍然延续在现代的国有企业里。有些物品讲述着文明承续和与外部广泛联系的故事，比如英国科布里奇发现的4世纪银盘上描绘希腊神话故事和阿波罗圣殿场景的雕饰。基督教那时虽已在英国盛行，但罗马帝国留下的希腊文化的影响依然存在。又比如33号展厅里良渚文化中很可能用于祭祀的玉琮，在97号大维德瓷器馆的展厅演变成了宋人模仿它而制作的日用瓷瓶，这是一种对祖先的崇拜与文化的传承。再比如英国发现的萨顿胡船葬，斯基的纳维亚式头盔上很有可能来自印度和斯里兰卡红色石榴石，船里的法国金币、英格兰西部的凯尔特悬碗、拜占庭的宫廷餐具，表明罗马帝国撤离后，迁徙到英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与北欧乃至更广阔世界的联系。有些物品讲述着美的故事，有些物品讲述着生与死的思考，而有些物品所讲述的历史不断被现代语境和新的科技手段重新叙述和改写。

离大英博物馆不远的梅菲尔区新邦德街上，佳士得、邦瀚斯、苏富比这些老牌拍卖行的展厅里，即将拍卖的藏品在这些地方的陈列遵循着不同的原则，每一件物品都标明了拍卖的底价。就像超市货架的排列顺序是为了说服你买更多的商品一样，拍卖行的空间是一种经济等级体系和购买动员：最贵的藏品摆在最显著的位置，拍卖行的当季主打拍品总能让你在观展路线上触目可及。拍卖行的展厅是一个小型名利场，香槟红酒觥筹交错间，绅士太太们相互交谈个人生活与收藏爱好，把这里当作半私人空间与社交场所。而在大英博物馆（和其他所有公共博物馆）里，物品没有价格。博物馆的物品是按叙述意图来陈列的，每一件物品处在它所在的空间序列位置上，都是为了讲述，讲述集体的历史。



物的顺序：百科全书迷宫

有两种方式去古罗马。你可以乘飞机到意大利，迷失在历史层层叠叠、随处都是遗迹的绝美之城；也可以在70号罗马帝国展厅里，沿一条清晰的帝国统治脉络游历古罗马，历代罗马皇帝的雕塑是清晰的线性时间标记。有两条路径通往波斯波利斯。你可以在伊朗伊斯法罕的夏夜体验完桥孔下的热闹夜生活后，次日从伊斯法罕出发，开一天车到设拉子，然后坐大巴进入波斯波利斯宫遗址的空旷山谷，沿着遗址的巨石台阶拾级而上，穿过只剩残骸的万国门与百柱大殿，走向波斯大帝的宫殿。你也可以在大英博物馆里，走上一楼到二楼的东楼梯之间，经过波斯波利斯宫的照片、复制的大流士接受各国使节进贡的石雕，再进入二楼52号古伊朗展厅。

展品脱离了它最初所属的遗址，以不同的序列和本来不会排在一起的东西组合在了一起。这是一种人为创造。这些漂浮的物，有时就像水族馆里的鱼类，按照大自然的安排本来生活在不同的海洋里，也许永远都不会见面，现在却被人为地聚集、分类、组合、展出。不过，博物馆的这些物也因不再散布于相隔遥远的地方，变得近在咫尺，从而有了相互对话和更紧密联系的机会。有一些物品还从此开始了环球旅行，参与到和许多它从未谋面的物品的对话中；这些物的对话，也就是它们所属的人和地点的对话。博物馆由此重新排序了时间与空间。

已经很难准确描述对大英博物馆的起源至关重要的英国大收藏家汉斯·斯隆（Hans Sloane）的形象。在不同的时期，他都曾被不同的传记作家赋予过不同的形象与意义。20世纪50年代，进化生物学家、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前馆长加文·德·比尔（Gavin de Beer）为斯隆写了一本传记，把他视为不带偏见、寻找真理的人。传记出版于核战阴影笼罩的冷战时期，德·比尔把斯隆塑造成一个超脱和超越于政治事务纷争的科学家。半个世纪之后，斯隆又以一种新的形象被塑造出来。女权主义科学史学家隆达·席宾格（Londa Schiebinger）在她的《植物与帝国》一书中，则把斯隆在自然历史方面的工作视为欧洲资本主义军事扩张的一部分。大英博物馆的起源，和斯隆在英国与全世界建立的收藏网络紧密相关，也和

（视觉中国 供图）





2014年10月3日，大英博物馆内，工作人员正在检查当代艺术家 Ernst Barlach 的装置《盘旋的天使》。这件雕塑是为了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人，它是大英博物馆2014年举办的“德国：一个国家的记忆”展览上的一件展品。

他在亚洲、北美等地方的通信对象有关。这些遍及世界的网络，本身就是斯隆收藏的一部分。如今，斯隆化身为1号启蒙大厅里的那尊雕塑，默默注视着最初陈列自己一生收藏的地方。然而，就像电影《公民凯恩》里的媒体大亨凯恩，在他死后，试图在他大量的藏品中找到蛛丝马迹的调查最终都徒劳无功；斯隆海量的收藏，也让他自己成了一个谜。

1679年，汉斯·斯隆穿越爱尔兰海来到伦敦，成为一名内科医生。那正是一个欧洲对自然界的认识哲学处于变动中的时代。古希腊和罗马哲学家关于自然哲学（物理学）、医学和自然史的书写，随着希腊衰落和罗马帝国崩溃，在欧洲遗失了。然而，许多希腊和罗马的科学文献在伊斯兰哈里发帝国时代被翻译成了阿拉伯文。8世纪末至9世纪初，阿巴斯王朝的巴格达设立的“藏书馆”（The House of Wisdom）是为希腊、罗马、中古波斯的文献专门设立的翻译机构，这也是伊斯兰世界数学和实验科学高度繁荣的时代。1453年，奥斯曼帝国占领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的东罗马帝国陷落，大量的学者和经卷迁徙到西方，特别是意大利半岛，促使文艺复兴的人文学家将它们翻译为拉丁文。16世纪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就是使用了穆斯林马拉加学派的方法，从而为地球围绕太阳运行提供了数学解释，一些欧洲人开始质疑在大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古代教义的正确性。1619年，威廉·哈维公布了血液循环论的发现；1621年和1626年，牛津植物园和巴黎植物园先后建成；1632年，伽利略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的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出版；1665年，罗伯特·胡克发明了显微镜；1668年，艾萨克·牛顿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架反射望远镜；1676年，博物学家尼赫迈亚·克鲁利用显微镜对开花植物的结构进行了研究；16世纪下半叶，笛卡儿、皮埃尔·伽桑狄、波义耳阐明了“机械哲学”，否定了过去所认为的大自然运行是有其自身目的的哲学。就在斯隆到达伦敦8年后，牛顿划时代的科学著作《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问世，将所有物体的运动都简化为可以通过数学公式计算的运动和引力原理。至此，17和18世纪的世界观进入了“机械宇宙”时代。17世纪的这段历史，科学研究的不断进步，唤起了人们永不满足的好奇心，“知识如洪流一般，从科学的各个方面喷涌而出，相互影响，相互碰撞”。

斯隆也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殖民扩张与奴隶贸易时代。航海家和冒险家的环球旅行，东印度公

司的海上探险，更多新的地理发现，拓展了欧洲人的空间感。斯隆曾在牙买加待过15个月，与岛上的当地人和非洲奴隶都建立了私人关系。1707年至1725年，他通过研究在旅程中收集的800个植物物种，写了一本两卷的《牙买加自然史》。在他之前，像威廉·特纳和托马斯·约翰逊这样的英国植物学家所进行的植物科考，都还是在英国境内。在这本书里，他把分类变成了一种科学的艺术；他的收藏网络与私人交往在殖民扩张的地理背景之下，也与北美、非洲、亚洲、西印度群岛建立起联系。作为一位有名的内科医生，斯隆的病人许多来自富裕的贵族阶层，比如国王乔治一世和二世，这些病人成了他交际网络的重要组成。他在英国、荷兰东印度公司和驻外使馆工作的朋友从好望角、马达加斯加、孟买、中国、波斯、马来西亚、苏门答腊、雅加达、日本等地为他收集了很多诸如种子、贝壳、墨水、毛笔、鞋子、香水、墓碑、茶具等异域奇物，他也开始为英国越来越庞大的殖民地编写资源目录。18世纪，收藏也不再是贵族阶层延续家族谱系的特权，英国“光荣复辟”以后，苏富比和佳士得这样的拍卖行开张了，拍卖行成了社会流动的主要通道，让“新钱”可以瞬间购得绅士阶层的身份点缀。在这些拍卖行里，吸引斯隆的是大自然和英国之外的奇珍异物。1695年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工作过的荷兰医生保罗·赫尔曼（Paul Herрман）去世后，他通过在莱顿的联系人，在荷兰拍卖行拍下了赫尔曼的植物与鸟类收藏，他珍贵的好望角物种收藏也是最早到达欧洲的南非植物收藏之一。用这种方式，他也获得了一些收藏家的藏品，比如威廉·查尔顿（William Charlton）和詹姆斯·佩蒂夫（James Petiver）的藏品。通过在罗马的联系人，他还拍下过大主教菲利波·瓜尔提耶里（Filippo Gualtieri）的古币收藏和古希腊罗马古董——最初他的兴趣还非常广泛，后来他逐渐把自己的重点放在了自然史上。

收藏是一回事，组织、分类、记录，通过信息管理让这些收藏品各就其位，又是另一个大工程。斯隆的收藏非常庞大，他雇用了一群在语言学、古物研究、自然科学和图书管理学方面很渊博的助手，来为他做分类和目录——这种分类与排序，正是博物馆知识体系的基本结构。启蒙馆的橱窗里仍然保留着他的小部分动植物标本和矿石收藏，这些放在一个个分类小隔间里的“珍奇物”，就是催生了大英



从古希腊馆望向亚述馆的古希腊雕塑

博物馆的最初的好奇心的模样：丰富、辽阔、庞杂，对万物充满热情，有一种想认识一切的冲动和野心，但还不够复杂精细和完备。1668年，英国语言学家、皇家学会创始人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发表了论文《创造一种真的符号和哲学语言》，倡导变革语言，让语言更加视觉化、与图像更紧密地对应，这样才能更准确地表达科学。那是一个“名物”变得至关重要的时代，命名与各个学科的分类体系都在确立的过程中。就拿斯隆所钟爱的植物学来说，瑞士医学家鲍欣·加斯帕德在《有关植物之同物异名的详尽专著》中对6000余种植物进行了分类和精确定义；英国植物学家约翰·雷发表了《英格兰植物图谱》和《分类纲要》，记录了大英帝国的所有植物群，并且创造了一套严密的植物分类体系；瑞士自然学家、分类学家林奈·卡尔创立了依照门、纲、目、科、属、种的现代植物分类系统。精心绘制植物的插图也变得非常重要，从达·芬奇首次绘制出植物的叶脉构造以来，插画家汉斯·魏迪兹为《活植物

图谱》绘制的插画、画家丢勒绘制的《青草地》，都真实展现了自然界的形象。在启蒙馆的橱窗里，你能看到当时的女性精修绘制甚至绣制的植物图，它们是命名的“所指”，这些植物画像为后世学者按图索骥的漫长探索创造了条件。

1753年斯隆去世，他留下了71000多件藏品。除了自然历史标本，他的藏品还包括23000枚钱币和奖章，50000册书籍、版画和手稿，一个植物标本室和1125件“有关古代习俗的收藏”。这些遗赠给乔治二世的收藏，就是大英博物馆创始之初的藏品，他获得的回报是给他的女儿2万英镑。建立一个公共博物馆并非斯隆这个时代的创造，早在14世纪，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就是一个公共博物馆的一部分。斯隆的创造性是他的视野：他想建立的是一个普遍性的博物馆，收藏全世界所有的物品，并对全世界所有的公民免费开放。

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让20世纪初的艺术家和思想家开始质疑现代性的概念和基于理性、科学和

技术的文明进步。像安德烈·布列东这样的超现实主义，就对“好奇”这个概念很着迷，因为正是好奇心定义了理性的分类和秩序。1966年，福柯在他旨在重建欧洲历史的著作《词与物——人类科学的考古学》一书的前言里说，博尔赫斯《约翰·威尔金斯的分析语言》这篇文章，启发了他写这本书。博尔赫斯的这篇文章，叙述了前面提到的威尔金斯在1668年是如何尝试设计一种普遍和自然的世界语言，从而对世间万物进行分类的。他把世界分为40大类，再分为中类和小类。比如，第八大类是石头，分为普通的（燧石、沙砾、页岩）、中等价值的（大理石、琥珀、珊瑚）、宝贵的（珍珠、蛋白石）、透明的（紫水晶、蓝宝石）、不溶的（煤、石灰岩、砷）。博尔赫斯认为，威尔金斯的分类法实际上是武断的分类。他想象了一本“中国百科全书”《天朝仁学广览》，滑稽地把动物分成很不对称的类别：a) 属于皇帝的动物、b) 散发香气的、c) 驯服的、d) 乳猪、e) 美人鱼、f) 臆想的……h) 包括在此分类中的 i) 像疯子般激动的、k) 用精细的驼毛笔画的、l) 其他、m) 刚刚弄碎了罐子的、n) 远看像苍蝇的。博尔赫斯的用意，并不是把欧洲过去比作一个远方

的东方中国，而是为了指出，早期欧洲分类法存在着另一种可能。当福柯和后来的学者开始重建历史时，他们的核心观念就是：科学和理性不是静止和绝对的，而是随着时间和空间而变化的。

一个在大英博物馆里游览的现代人，也许不再会被那些分类法和知识系统所困扰。事实上，大英博物馆已经变得如此浩瀚和庞杂，你已经很难再像植物学家一样，将这些不同文明和不同历史时期的藏品纳入到一个纲目系统中。你也许反而会发现，博物馆的时空如此接近无限，以至于有了创造出新联系的自由度，就像汉斯·斯隆把从世界性的网络得来的藏品排列在一起时，所发现的新联系一样：从几内亚来到牙买加的黑奴贸易船舱里，黑奴随身携带了一种坚果（拉丁语名为 *Arachidna Indiae Utriusque Tetrphylla*）充饥，这种植物的转移把西非和加勒比海联系起来；当西班牙植物学家和荷兰医学家对马鞭草进行研究和使用时，非洲黑人对马鞭草的认识则完全不同，还带有神的崇拜。这种认识不是植物学家的知识体系构建，而与今天万维网的超链接文本有一些相似：一个词条解释的某处特征，打开了一个相关联的词条，而这个词条里又将某个特征链接到另一个词条，无穷无尽，直至漂浮的物链接成一张网络。

就像美索不达米亚乌尔旗背景上独特的蓝色，就为我开启了一段寻找蓝色的旅程。“蓝色”的超文本链接，将我带入这种被称为“天青石”或“青金石”的蓝色矿物质档案里，它来自今天阿富汗的巴达赫尚省，当年途经伊朗的扎格罗斯山来到乌尔。“青金石”的超文本链接，则让我穿越到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中国明代和清代玉器里的青金石玉器。“伊朗”的超文本链接，则将我发送到大维德瓷器馆的元代青花瓷，青花瓷器里的蓝色最初来自于伊朗的颜料蓝钴，这种蓝白配的中式审美实际源自伊朗。“蓝色”的另一个超文本链接，则把我带向了日本葛饰北斋的《神奈川冲浪里》，卷起的深蓝色浪花如此深邃浓郁，竟然是18世纪早期在德国合成的普鲁士蓝，这种颜色的运用是日本从欧洲汲取所需之物的信心，却通过画面的形象表达出即将步入现代世界时间大门的犹疑和焦虑。在百科全书式的意大利学者翁贝托·艾柯那里，叙事的迷宫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呈线状，以希腊神话讲述的迷宫为象征，最终有一条把入口或者出口同中心部连接起来的“阿里阿德涅之线”。在罗马帝国展厅，你能看到这种叙



古希腊的帕特农神庙石雕，希腊人与波斯人的战争是帕特农石雕经常重复的主题



帖木儿帝国 (1370~1507 年)



17 世纪末的莫卧儿帝国



述模式，它是以最重要的罗马皇帝的雕塑和他们的权力（比如罗马军团）作为陈列线索的。

第二种类型呈树状，是以迷路为象征。你每次都会在岔路口面临选择，走进一条死胡同，再折返回来，只有往复才能抵达一个出口。每一个地区的每一段历史，都可以理解成博物馆树干上的树枝，你无法从一个地区的历史连续地进入另一个地区的历史，你需要回到时间的源头，开始另一个地区的历史之旅。第三种类型是网状的。在这里，一个节点不仅通过单一的结节点和单一的方式结合，而且通过另外的方式与其他结节点结合。艾柯认为，所谓百科全书是属于第三种类型的、无中心的网状组织。博物馆的空间里，到处都是复杂的图像、交叉的路径、秘密的通道和出乎意料的联络，它就是一本你可以穿行其间的百科全书。

英国考古学家巴瑞·坎利夫爵士 (Sir Barry Cunliffe) 告诉我，大英博物馆的藏品最让他感动的一个发现，是所有陶器底部烧制时所钻的三个排列成三角形的洞。“无论是古希腊罗马，还是中国、中亚，全世界所有地区、不同时代的工匠在处理陶器技术时，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一模一样的方案。”这种普遍性让他着迷。作为大英博物馆的理事，他告诉我，大英博物馆正准备对展厅的空间做出调整，更好地让不同展厅之间、不同楼层的展厅之间，可以相互看到，打破地区的界限，“或许可以站在古希腊望向波斯帝国，或站在中国展厅看到日本”。

物的叙述：一只玉杯里的乾坤

2017年，大英博物馆“百物中的世界史”巡展到了北京的国家博物馆，然后又到了上海博物馆。巡展的这100件物品中，有一件展品是来自中亚的翡翠玉杯。这只碗状椭圆形的杯子是用橄榄绿翡翠制成的，天然云状纹理飘在光滑的表面。把手上一只中国龙用嘴和带蹼的前爪抓住杯子的上沿，后爪蹬在碗底，正从杯沿上向杯内张望，好像随时都会一跃而入杯中。可以想象，使用这只玉杯的人举杯仰头饮酒时，与这只活泼的小龙四目相对的亲密感受。玉器就像瓷器一样，成百上千年的岁月从它们温润的表面滑溜溜地流走，刻不下什么磨蚀的痕迹，只是让它们的仪态显得更古老沧桑了一些。

这只玉杯上的阿拉伯语铭文“驸马乌鲁格·贝格”，表明了它所属的主人。和帖木儿一样，“驸马”这个身份，是以女婿的身份成为成吉思汗打下的蒙古帝国的继承人的封号。这只杯子很可能是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制造的，时间在1417~1449年间。正是在大约15世纪初，乌鲁格·贝格——帖木儿的孙子，开始接替父亲治理撒马尔罕。“乌鲁格·贝格”这个名字随即叩响了记忆之门，将我带入几年前在撒马尔罕旅行的时空：在那里，我曾寻访过这位撒马尔罕统治者的踪迹。

在撒马尔罕乌鲁格·贝格修建的雄伟天文台脚下，有一尊他的巨大石雕。他的手里拿着一卷经



(于毅文摄)

一层与二层楼之间的中国 6 世纪南北朝时期佛像



左图：撒马尔罕的翡翠玉龙杯 右图：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中可能是来自撒马尔罕的白玉杯

卷，望向远方，可能是在测量星空；也许在抬头观星时，他曾经使用过这件翡翠龙杯小酌——玉器是他一直所钟爱的器物。那天，一对年轻人正在他的雕塑脚下拍婚纱照，雕像周围围满了他们的家人，可见乌兹别克斯坦人对他的尊崇。这位撒马尔罕的统治者通晓乌兹别克文、波斯文和阿拉伯文，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谙熟宗教经典和教义。他博学多识，尤精于天文历算。当他短暂地身居统治者之位时，帖木儿帝国正处于鼎盛时期，东至蒙古，西至罗马与埃及，南至印度中部，北至钦察沙漠，辽阔无垠，经济繁荣，学术文化昌盛，宫廷学者荟萃。一位西班牙人在这时来到撒马尔罕，发现说各种语言和来自不同城邦的代表人物，“有文学、史学、天文学、绘画、建筑大师，都渴望在此建功立业，实现人生抱负”。翡翠龙杯上的阿拉伯铭文，反映了撒马尔罕与伊斯兰世界的紧密联系，布哈拉、撒马尔罕、塔什干的许多清真寺和宗教学院都在这时基于一张宏图而兴建。乌鲁格·贝格就是这个繁荣成熟的社会孕育的高度文明的体现：在他所建的这个天文台上，曾装置着巨型精密天文仪器，收藏着天文历算等大量图书，一批穆斯林和印度的天文学家曾会聚于此，共同进行过天文测量和研究；他编绘的囊括了千余颗恒星方位和运行的星表，成为亚洲和欧洲的标准参考资料，17 世纪在牛津被翻译为拉丁文和波斯文。月球的一座环形火山因此被命名为“乌鲁格·贝格”，他的名字与哈雷、伽利略、哥白尼等伟大科学家的名字并列。

撒马尔罕的天文台现存遗址已难以从视觉上复原撒马尔罕曾经的辉煌。它原本是一个三层高的建筑物，有六分仪、水平度盘和象限仪等精密的天文仪器，但当它重见天日时，却只剩下巨大的大理石六分仪，被安装在地面下 11 米深、2 米宽的斜坑道里，供人们参观。坑道上面是新建的天文台博物馆。博物馆里有一张乌鲁格·贝格曾经使用过的天球仪

的图片，文字注明实物陈列在大英博物馆里。当我在大英博物馆寻找那个从孕育它的遗址被带离的天球仪时，发现与乌鲁格·贝格最紧密相连的那个伊朗天球仪并未展览出来。它最近一次的展出记录是在2014年9月至2015年1月大英博物馆举办的“明朝：改变中国的50年”特展上。大英博物馆中国馆馆长霍吉淑与牛津大学中国艺术史专家柯律格所编辑的策展图册里，这个天球仪奇妙地与明朝宦官和宫廷国际化的历史叙述结合在一起：从宣德皇帝开始，年轻的太监接受良好的教育，至1450年左右，出现了一批精通历史和古典学的太监精英，他们不仅成为太子和公主的教师，而且逐渐代替了女性成为宫廷乐师。这些太监有非常国际化的背景，永乐皇帝就雇佣了蒙古、中亚、越南、韩国的“外国”太监，有一些人后来在宫廷内升至高位，比如主持营造紫禁城的越南太监阮安。在全球化的明朝初年宫廷内，中亚来的穆斯林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在司天监（后改名钦天监）工作，四夷馆也翻译了大量的中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天文著作。而这只根据波斯天文学家阿卜杜勒·拉赫曼·苏菲的《恒星之书》所绘制的天球仪，被广泛用于教学和观察，既是乌鲁格·贝格在撒马尔罕天文台所用的仪器，也为明朝宫廷里的西亚穆斯林天文学家所用。

然而，乌鲁格·贝格并非一位杰出的统治者。他缺乏指挥才能，以致在位短暂几年后就在宫廷内部斗争中被杀害。大英博物馆前馆长尼尔·麦格雷戈在他带有导览性质的书——《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中，如此写道：“仅靠个人忠诚维系的帖木儿帝国在历史上昙花一现。作为统治者的民族习惯了草原生活，觉得官府缺少自由。他们未曾建立一个有序的中央政权，也没有成功运作的官僚体系。每一任统治者的去世都造成了混乱。”继承王位的乌鲁格·贝格在父亲去世后，一度想借帖木儿的威名来稳固自己的大权，在祖父的墓地上立了一块用稀有黑玉制成的纪念碑，用阿拉伯文宣告世人：“在我苏醒之际，世界将为之战栗。”他渴望看到一个他自知无法企及的强权的回归，却未能遂愿。在撒马尔罕古米·埃米尔陵墓的蓝色穹顶之下，停放着他的棺材。考古学家对墓葬的发掘发现，他尸体的头颅被斩，与历史文献的记述相吻合。麦格雷戈引用乌兹别克斯坦作家伊斯马利洛夫的话，写出了这个翡翠杯里诗意的隐喻况味：“玉杯被视为个人命运的象征。当我们说，‘杯子已满’时，意味着命数已定。乌鲁

格·贝格的侄子、诗人巴布尔在一首诗中写道：‘哀兵不可尽数，唯有斟上烈酒，以杯为盾。’这就是酒杯的象征意义——它是抵挡哀兵的抽象盾牌。”乌鲁格·贝格被斩首后，帖木儿帝国的统治结束了，中亚再次分崩离析，成为各方势力纷争的战场。这只玉杯却存续和流传下去，记录了后续的发展。在它的杯口一端有一块白银，是后来为了修复可能被摔坏的裂痕而“包扎”上去。白银上有一句雕刻于17或18世纪的铭文，是奥斯曼土耳其文，上面写着“神的仁慈无远弗届”。这说明，这只玉杯当时已经辗转来到了伊斯坦布尔，当它被刻上另一种文字时，距乌鲁格·贝格被刺杀，300多年的时间已然流逝。

大英博物馆的官方网站上记载着这只玉杯的参展记录。与天球仪一样，它曾参加过“明代：改变中国的50年”的展览。在那个展览里，它与描述孟加拉使者向永乐皇帝进贡长颈鹿的《瑞应麒麟图》，波斯历史学家哈菲兹·阿布鲁的《历史纲要》一书中描绘中国明朝皇帝的插画对开页，斯里兰卡加勒的三语（中文、泰米尔语和波斯语）石碑、琉球群岛的中式漆盒等放在一起，讲述了明代永和年间郑和下西洋和明朝世界贸易地图的历史。当时，明朝使臣陈诚曾多次出使西域帖木儿帝国：1414年抵达帖木儿帝国国都哈烈，1416年护送哈烈、撒马尔罕等国朝贡使臣回国，1418年护送哈烈沙哈鲁、撒马尔罕乌鲁格派遣的朝贡使臣回国，1424年再次出使帖木儿帝国。这只翡翠杯把手上的龙，很可能就是中国文化影响的产物。那时，盛产玉的和阗正处于帖木儿帝国的统治下。而在陈诚的眼中，撒马尔罕还是一片未开化之地：“凡相见之际，略无礼仪。下之见上，则近前一相握手而已。妇女出外皆乘马骡，道路遇人，谈笑戏谑，略无愧色。且恣出淫乱之辞以通问，男子薄恶尤甚。”展览记录里，这只玉杯1989年4月至11月还曾到过洛杉矶和华盛顿，参加了当年影响力很大的“帖木儿与王子的视野：15世纪的波斯艺术和文化”（Timur and the Princely Vision: Persian Art and Cultur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特展。那个时候，撒马尔罕正处于苏联的版图内，而不久这个帝国就将解体，乌兹别克斯坦也将再一次在中亚变动不居的统治权力剧变与陷落之后，寻求新的身份认同。乌鲁格·贝格的头像和他为祖父所建造的墓碑，出现在新乌兹别克斯坦的货币上。

不久后，我在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看到了



伦敦摄政公园内玩耍的孩子

另一件可能也是在撒马尔罕制造的白色玉杯，与大英博物馆的这一只几乎处于同时代（大约 1460 年），几经流转，在印度被发现。这只圆柱形的白色玉杯体形很小巧，在展柜里静静闪耀着剔透的光芒。玉器上原来的铭文是阿拉伯语，后来的收藏者又在杯沿上加刻了波斯语，标明它的所有者是莫卧儿王朝的帝王贾汉吉尔，阿克巴大帝之子。刻上波斯语时，这只杯子已经流传了 150 多年。莫卧儿帝国是乌鲁格·贝格的侄孙、帖木儿的第五代后裔巴布尔在印度建立的帝国。巴布尔已是突厥化的蒙古人，但他和他的子孙仍把自己视作帖木儿的后代。与大英博物馆那只被刻上奥斯曼土耳其语的玉杯不同，这只玉杯上的波斯语（莫卧儿帝国的宫廷和官方语言）表达了帖木儿的后代对祖先和失落的帖木儿帝国的缅怀。两只玉杯遥相呼应，它们的流转和铭文将撒马尔罕、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王朝联系起来，默默见证着撒马尔罕的文化巅峰、波斯文明在中亚与东方的传播、帖木儿帝国的崩塌、明朝初期中国的文化开放和世界联系、奥斯曼帝国在中亚的争战、帖木儿后

代去往南亚的迁徙、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宫廷文化、俄罗斯帝国和苏联的兴衰，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地理画卷。

多重解释

汉斯·斯隆所具有的这种好奇心，成为之后 200 多年大英博物馆持续生长的心理动因。到了 19 世纪，收集动植物标本和奇珍异物的的好奇心，变成了欧洲人在全世界的考古。他们热切想要认识和收藏别的文明，也热切想证明自己的文明在道德与理性上的优越性。考古热的兴起也恰好是英国殖民地扩张和欧洲民族主义越来越高涨的时候。奥古斯都的青铜头像在米罗埃发现的过程中，苏丹和英国殖民者正进行着战争；乌尔战旗被挖掘出来运到大英博物馆时，中东的很多国家正处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在欧洲书籍和大英博物馆介绍里被敬称为爵士的中亚考古学家和冒险家奥雷尔·斯坦因，正是从半殖民地的中国运走了大量文物。而当世界殖民帝国的空间开始松动塌陷，将世界藏品聚集于以伦敦

布鲁姆斯伯里为中心的网络也就削弱了。1947年印度脱离英国独立后，收藏中国器物的大维德爵士在印度的萨松家族丧失了工厂和财产，他毕生的瓷器收藏险些离散。

当这些本不属于布鲁姆斯伯里这个封闭墙体内的物品，纷纷来到大英博物馆时，这样的疑问就不断被提出来：“霍尼吉提夫和他的物品该出现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吗？”“过去的物品现在应该归属于谁？”“应该把帕特农的雕塑按希腊政府的请求归还给雅典吗？”“它们的最佳展示地在何处？”“是否所有物品都应在原制作地展出？”“所有的古代艺术都是一个政治问题吗？”

近代历史上，很多国家都希望通过历史上的某一特定时期，定义并加强现代的国家认同。1971年，伊朗巴列维王朝的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在波斯波利斯举行了纪念波斯帝国建国2500周年的隆重盛会。历史上疆域辽阔的强大波斯帝国的遗址波斯波利斯是巴列维国王构建现代伊朗民族国家的精神源泉，大量关于伊斯兰时代之前的古代历史的考古发现都在巴列维的鼓励下进行。当年，几百万张精美的波斯波利斯画报吸引着伊朗的读者怀古溯源，这是一个唤起他们内心历史沧桑感和自豪感的视觉符号，也是巴列维王朝将古代帝国塑造造成现代民族国家神话一部分的努力。然而，如果阅读波斯波利斯遗址的介绍，你会发现这里也是亚历山大大帝摧毁和掠夺波斯帝国的屈辱象征，与圆明园的断壁残垣有同样的伤痕意味。

雅典的帕特农神庙今天无疑是希腊民族与历史的象征，但在它修建起来的公元前400多年，希腊其他城邦的居民都将帕特农视为名义上的祭祀场所和事实上的雅典金库。在持续不断的希波战争中，雅典以老大多自居，要求希腊的其他城邦向它缴纳军费和保护费，强迫它们成为雅典的附庸，修建卫城的钱就来源于这些军费和保护费。对附属于雅典的城邦来说，它就是屈从的标志，对雅典来说，它则是挥霍财富的象征。继神庙之后，帕特农做过天主教圣母玛利亚的教堂，成为清真寺，直至18世纪末脱离奥斯曼土耳其独立之后，希腊有了一位巴伐利亚的希腊国王，他开始重建伯利克利的雅典，这才开启了新的希腊王国对帕特农的认同，它摇身一变成为现代希腊国家的“伟大”象征。某种意义上，公众对过去历史的好奇心本质是一种身份的寻找。遗迹原址上的物，因为它在自己原本所属的空间里，

与过去的历史从未发生断裂，它更能让这里的民族或阶级通过它把自己置于历史之中，成为塑造“想象的共同体”的场所。

这些多重解释，构成了大英博物馆的另一层迷宫。

另一种展品：指向个体的日常体验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小说《纯真博物馆》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一次读，我把它视为一个爱情故事；再次读，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关于博物馆诞生过程的故事。为纪念逝去的爱人芙颂，凯末尔收集了与她在一起时的很多相关物品，这些物品具体而微地唤起他的回忆和思念，从而构建起一个时间消失的永恒空间。我很喜欢读凯末尔满世界旅行，去参观各地的博物馆——通常是纪念某个人或主题而建的小型博物馆，从那些藏品里想到芙颂；也很喜欢读凯末尔去伊斯坦布尔的后街深巷里，找那些落魄无名的收藏家收集关于芙颂曾在这座城市里与他经历过的点点滴滴（比如一起看的某场电影的海报）。帕慕克说，有两类收藏家：一类以自己的收藏为荣并希望把它们展出（通常出自西方文明）；另一类则把收集、积攒起来的东西藏起来，那些私人的并不是为了扩展知识而收藏的器物，就像附着灵魂一样，能让人感受到内心的情感躁动。对后者来说，积攒物件是对人生烦恼、伤心事或难以启齿的心灵创伤的一种反应，它是一种安慰；但对这些收藏者来说，那些承载着人们回忆的东西，绝大多数时候将在没到达任何博物馆、没进行任何分类、没放进过任何展柜和镜框之前消失。

帕慕克写到过一个孤苦伶仃的伊斯坦布尔收藏家，他在我脑海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个人的藏物堆满了他的寓所，最后这些纸堆和旧物倒塌下来把他压死了。这位“垃圾屋”的主人在街区里是被讽刺的对象，他死后，家里的那些东西就被人在街区的一块空地上烧毁。当我一天天在大英博物馆里，面对那些通常属于王公贵族的古老文物时，有时我会想起那个孤独的收藏家来。我疑惑，如果物可以讲述记忆与故事，那么记忆与故事有更重要或更不重要之分吗？为什么有的记忆，比如贵族的首饰器物、上层阶级的墓葬品或统治者的雕塑更值得像建立纪念碑一样永久保存，而另一些平凡的日常生活物品，比如产自某个工厂而后散落到世界各地的普通盐瓶、一个

左图：英国考古学家伦纳德·伍利正在中东进行考古挖掘，这尊小雕塑是在一个小巴比伦礼拜堂里发现的

右图：古埃及馆的拉美西斯雕塑



曾被人爱过的普通女人的发夹，却可以任由其飘散？那些讲述集体记忆——宗教、仪式、迁徙、战争、民族、帝国的物品，总比那些讲述个体和私人记忆的物品，更值得被收藏和观看吗？

大英博物馆里有一些器物，通过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解读，可以呈现它们还在被使用时的日常生活场景。比如发现于英格兰萨福克郡的霍克森银质胡椒瓶，反映了它被制造出来的4~5世纪，来到不列颠的罗马人带来的使用昂贵胡椒做调料的食谱；又比如一套维多利亚时代在英国斯塔福德郡韦奇伍德工厂制造的红棕色陶瓷茶具，它价格低廉，很可能属于一个工人阶级或新型中产之家，表明19世纪茶已成为各阶层流行的饮品，贵族倡导的下午茶成了盛行的公共生活方式；又比如，萨顿胡船藏的墓室里的大锅、酒器、乐器、磨损的武器、皮草和金银财宝，呈现出《贝奥武夫》史诗中那个由武士荣耀与丰美盛宴组成的英雄世界。然而，面对面注视这些器物时，我仍会感到一种情感交流的阻隔：胡椒瓶和陶瓷茶具的主人是谁呢？萨顿胡头

盔的主人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他们曾如何生活？这些物件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会通向他们的哪段记忆、唤起他们的何种情感？我叫不出银质胡椒瓶上那位挂着长耳环、发辫盘在头顶的罗马贵妇的名字，也无从得知那套平凡的陶瓷茶具的主人叫什么、住哪儿、喝茶时与谁在一起谈过些什么，彼时的生活境况和心情如何。甚至那个肯定属于某位显赫统治者的萨顿胡头盔，由于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主人生活的具体情况与精神世界，也只能借助史诗去想象了。

文本在有些时候，因此显得比物品更有说服力。漂浮在博物馆展柜静谧灯光中的物品，像一个个彼此孤立的时刻、时间的断点，只有叙述能将它们联结成平滑连续的时间。当我长时间凝视着古埃及馆大祭司霍尼吉提夫的精美术乃伊，充满疑惑的大脑却并未接收到来自远古的讯息时，我想起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小说《死亡终局》里栩栩如生复原的那位埃及祭司。1921年至1922年，考古热正席卷西方。考古学家赫伯特·温洛克（Herbert E. Winlock）



(三联生活周刊)

带领“大都会博物馆埃及之旅”的考古，发现了埃及第十五王朝一个祭司的书信，这些当时尚未公开的书信为阿加莎的小说提供了大量的生活场景的信息。阿加莎能拿到这些资料，与她第二任丈夫是英国著名考古学家伦纳德·伍利（Leonard Woolley）的得力助手不无关系。在大英博物馆的第56号美索不达米亚展厅，那件一下子就能在诸多展品中攫取你关注视线的蓝色乌尔旗旁，你能看到伍利与他太太在乌尔考古现场的黑白照片。那位蹲着的凯瑟琳太太是一个美貌的女人，但也有不寻常的生活经历、古怪的性格和很强的控制欲。端详着大英博物馆里的这张照片（历史博物馆有一种将陈列的所有物品都历史化的神力），再想到阿加莎在《古墓惊魂》里把这位凯瑟琳作为被害者路易斯的原型写进了小说，像一种妙不可言的复仇，我不禁因为这种不严肃的恶作剧与大英博物馆肃穆气氛的反差而暗笑了起来。还是回到那位留下了许多文字的埃及祭司上来。他就像一位埃及的曾国藩，只要出差去北方的孟菲斯履行公务，把家族事务交给他的长子来打理时，他

就开始写家书与长子交谈，用书信的方式远程施加他的父权。他在信中警告家人不能怠慢他新纳的妾，敦促年轻人履行抚养一个中年穷亲戚的义务，讨论儿子们必须实现的粮食产量，定下如何分配油和大麦的规矩；当尼罗河泛滥季饥荒肆虐，很多人开始吃人的时候，他因为拥有大量的土地而维系着家族运转。另一位祭司的这些日常生活，让眼前这位托勒密三世时期的祭司变得不再只是一件作为物的木乃伊，而有了一些可供想象的远古生命气息。

直到我进入24号主题为“生与死”的展厅，在大英博物馆里，我看到了一件与其他古代藏品都有所不同的物品。那件物品与复活节岛雕像陈列在一起，它自身的体量也形成了24号厅的引力场。

不过，一踏入24号，首先抓住你视线的，还是那尊矗立在展厅中央的巨型复活节岛石雕。它正陷入沉思，目光空洞又深邃。这位叫何瓦·何卡奈纳阿的石头人面朝东南方向，正对着14000公里外的拉帕努伊岛方向。他向下撇着嘴，露出一丝不满和委屈的神情，但这神情又赋予了他那2.7米高的



(于慧众摄)

“生与死”主题馆里，正在观看当代艺术装置《从摇篮到坟墓的药典》的学生

坚硬玄武岩躯体一些天真的灵性。他有一种和奥古斯特·罗丹的巴尔扎克雕像一样的简洁力量。如果说罗丹用一件睡袍罩住了巴尔扎克身体的细部，让雕像面部的精神力量专注地凸显出来，那么何卡奈纳阿的整个身体则像是表情生动的头部潦草的补充，寥寥几笔，没有腿，双手消失在隆起的肚子处，只有突起的乳头像身体上雕琢的细致装饰。他大约制作于1200年，是复活节岛上1000座巨型石像群中的一员，极有可能是用来给祖先灵魂居住的躯壳。

可是，这尊石雕和“生与死”的主题有什么联系？只有转到他的背部，你才会看到与充满活力的正面完全不同的另一面。1600年左右，这种雕像的制作突然停止，过去的雕像也被大量遗弃。这位何卡奈纳阿之所以没有被遗弃，是因为它幸运地被选中，参与了和过去祖先崇拜截然不同的新仪式。它

的背部刻满“文身”，是对400年后变迁的新仪式的刻画，左右对称的繁杂浅浮雕有一种用尽心思的繁复。石雕两侧的肩胛骨上各有一个鸟人的标志，长着人类的胳膊，爪尖相对，喙在石像的后颈相互触碰；后脑上有两支船桨，手柄上带有类似石像脸孔的图案，船桨中间站着一只鸟，而这种鸟所下的鸟蛋，就是拉帕努伊岛上“鸟人崇拜”仪式的核心。尼尔·麦格雷戈解释了这种新仪式出现的原因：1600年左右，复活节岛上的生态环境已急剧恶化，岛上居民逐渐把植被砍伐殆尽，将鸟类捕杀绝迹，海鸟不得不迁移到更安全的岩石和岛屿上筑巢。为了应对生态危机，复活节岛的居民转向了“一种完全与稀缺资源有关的仪式”：“举行一年一度的竞赛，参赛者去邻近的岛屿收集迁居的鸟燕鸥本年下的第一枚鸟蛋。能够穿过海洋和峭壁，将鸟蛋带回来的男人就成为

这一年的‘鸟人’，挂一根仪式用的船桨作为神圣地位的象征”。

从这个“鸟人仪式”的故事里，我读出了何卡纳奈阿背上的“文身”图案里令人不安的东西，与正面简洁有力的形象所表达出的希望不同，这些繁复的浮雕里暗藏着不祥和悲伤，满是对现实的权宜之计——它是衰落的预兆。在美国生理学、地理学和进化生物学专家贾雷德·戴蒙德的《崩溃》一书里，我找到了对何卡纳奈阿的另一面做出注脚的讯息：人类最初抵达复活节岛定居时，它曾是一个树木繁茂的亚热带森林，到了20世纪，它只剩下了48种本土物种，其中最高大的托罗密罗树也仅有7英尺高，巨型棕榈树等树木已经灭绝。1722年，欧洲人登上复活节岛时，它已沦为不毛之地，“鸟人仪式”延续了100多年后，这个脆弱的文明终于崩溃。先是海豚、金枪鱼和陆鸟逐渐从岛民们的餐桌上消失，然后是木材的匮乏意味着岛民无法点火取暖，只能以焚烧草本植物、甘蔗渣等充当燃料，接着土壤的侵蚀使农作物的产量巨幅减少，饥荒和冲突接踵而来，直至人吃人和敲骨吸髓。那些焦灼与胆怯的背部“文身”，不正是面对生存与死亡时，凡人本能里的温顺吗？

走过13世纪的复活节岛雕像，几步路，我转瞬来到了21世纪的一个大型装置前。这就是我说的，在大英博物馆里显得与众不同的那件展品了。它的名字叫“从摇篮到坟墓的药典”(Cradle to Grave by Pharmacopoeia)，创作者有三位，分别是当代艺术家苏茜·弗里曼(Susie Freeman)、戴维·克里奇利(David Critchley)和全科医生利兹·李(Liz Lee)。这件大型装置是一个近10米长的巨型展柜，里面就像1号启蒙馆的分类展柜一样，陈列着两组药丸和胶囊，每组14000片，五颜六色，被嵌入一张密密麻麻织就的尼龙大网里。这就是21世纪的英国人对待健康问题——当代版的“生与死”主题——的隐喻。与复活节岛上的波利尼西亚人面临脆弱生态环境的威胁不同，现代社会里的人主要在面对疾病威胁时生发出对生与死的思索，而药物与医学，无疑就像复活节岛雕像背后的“鸟人仪式”一样，是一种现代的求生宗教。在一个普通英国人的一生中，他大概平均要消费14000片药丸，其中包括维生素K、疫苗、抗生素和止痛药等。现代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在不停地服用或注射药物，以维持健康和延长寿命。

这是一个与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有相似动机的装置。展柜的四周，贴满了指向个人体验与回忆的照片，都是日常生活里的点滴细节。这些照片里，有一个年轻时患有哮喘和花粉热的男人，他一直健康地活到50多岁。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他接受了高血压的治疗，70岁的时候他患了胸腔感染，之后他戒了烟。在66岁至76岁之间，他服用了一生中服用的绝大部分的药丸，最后在76岁时死于中风。这些照片里，也有年轻时服用避孕药的女人，进入中年后，开始进行荷尔蒙替换疗法。在一次乳房X线检查后，她被诊断为乳腺癌，她的治疗很成功。老年的时候她得了关节炎和糖尿病，但她一直活到了82岁。这个装置里的“历史”，是非常个体化的历史，是每个平凡人身体与生命的历史——疾病史与治疗史。装置里展出的与健康有关的个人物品、文件和照片，以及这些物品的主人在上面所做的注解，都标明了这些物品和这些个体生命中的某一个健康或疾病事件相关。

我沿着长长的展柜一张张照片看过去，这个家庭的私密故事支离破碎地被讲述着：刚出生的婴儿、在浴盆里洗澡的儿童、喂奶的母亲；30岁时徒步登山；家庭聚会派对上舅舅与客人跳舞；1996年与朋友罗宾和路易斯湖上泛舟；在法国格勒诺布尔登山后，稀薄的空气是对吸烟者的治疗；2002年斯托克波特郡对布伦特福德的足球赛；米克与穿着白色婚纱的黑人新娘；即将要过100岁生日的弗兰斯·帕特里奇；路易斯的85岁生日，蛋糕上插了太多的蜡烛，都快坍塌了；与黑人朋友在一起的年轻祖父；祖父去世前的8个月，由于疾病变得骨瘦如柴的样子；祖父在病房里抱着儿子刚出生的女儿安妮·索菲，很享受；1995年在汉默史密斯医院刚刚做完癌症手术的特瑞；1999年特瑞参加女儿曼彻斯特大学的毕业典礼……观看着这些有的已经泛黄的家庭照片，渐渐地，我不再有那种在刚刚开馆、游客尚不多的清静时分，独自置身于古埃及、美索

从这个“鸟人仪式”的故事里，我读出了何卡纳奈阿背上的“文身”图案里令人不安的东西，那些焦灼与胆怯的背部“文身”，不正是面对生存与死亡时，凡人本能里的温顺吗？

不达米亚或史前文明展厅的恐惧。在大英博物馆的某个展厅里停留久了，我时常会产生一种整个人类都生活在另一段时间里，而我独自滞留在另一个地方的错觉。如果现在有一扇窗户，能够望向新牛津大街北面的罗素广场或布鲁斯伯里公园，我想我不会像身处古希腊罗马馆，或观看大维德的汝窑瓷器时，听到窗外马路上汽车开过的声音便觉得恍若隔世。此刻，我有一种在当下的感觉，这种当下与我身处的这个现实世界连成一体，那道让人产生疏离感的无形的时间之墙消失了。我想到了一直患有哮喘，76岁因肺心病心衰而去世的外公，也想到不久前因心衰竭、肾衰竭去世的外婆，“生与死”这个展厅此刻变成了一条通向我个人记忆与体验的隧道。

古典博物馆的巨大魅力也许在于，它能拔高日常生活，给人一种崇高的历史感。但情况也在发生着变化。在瑞士策展人汉斯·奥布里斯特的访谈录《策展简史》里，居住在荷兰的独立策展人赛斯·西格尔劳博（Seth Siegelau）说道，博物馆展览的限制在于，它不仅有着沉重的行政架构，更重要的是，

“博物馆空间”的“权威”总想把每件事情都弄成“博物馆式的”，通过把事物“从日常语境中隔离开来并赋予权威”，完成“历史化”的定论，从而让博物馆成为“僵死之物”的坟墓。这个访谈完成的时间是2000年。如今，当代艺术开始进入古典博物馆，在一个主题下，可以在历史之外提供另一重与当下日常语境关联的时间维度，这是博物馆让自己依旧“活着”的变革。在让-米歇尔·里博那部《高低博物馆》的戏剧里，巴黎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拎着博物馆商店的购物袋，一边观看着伦勃朗、委拉斯凯兹、德拉克罗瓦和雷诺阿的油画，一边争论着在停车场停放汽车的位置，给博物馆商店里的餐垫、咖啡杯和餐具安上了“凡·高”“提香”的名字，也给生活里的经济萧条和失业命名了“巴洛克”和“超现实主义”风格。最后，这家的母亲发现，“在毛利斯、停车场和毕加索之间，我还在现实生活中，甚至在生活之下。空空的，好像我们根本就没有把脚迈进巴洛克”。这是一个博物馆处在现代生活边界的绝妙隐喻。☑

封面荐书 · 扫码听书



《大英博物馆日记(外二种)》

陈平原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年2月第1版
ISBN: 9787108057808
定价: 39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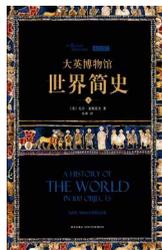
陈赛推荐: 跟随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漫步大英博物馆。



《观看之道》

[英]约翰·伯格著, 戴行钺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7月版
ISBN: 9787549558575
定价: 42元

陈赛推荐: 对一个游客来说, 去博物馆最重要的动作, 除了“逛”, 就是“看”了。这是一本讲看的方法论书籍, 也是一本艺术评论。



《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精装)》

[英]尼尔·麦格雷戈著, 余燕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7月第1版
ISBN: 9787305165856
定价: 128元

蒲实推荐: 大英博物馆前馆长麦格里戈对精心遴选和各行各业人士细致解读的这100件藏品做了充满美感的流物讲解。



《词与物——

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修订本)》

[法]米歇尔·福柯著, 莫伟民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16年7月第1版
ISBN: 9787542656520
定价: 66元

蒲实推荐: 我想找一个不全是历史又不全是认识论的分析形式, 我把它叫作考古学。



阅读之美

喧嚣时代
给灵魂一个栖息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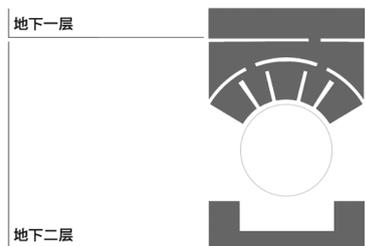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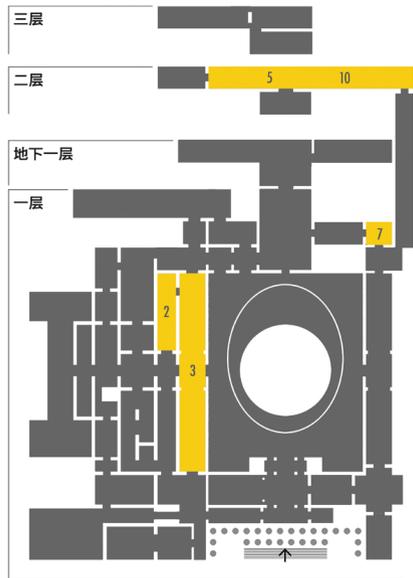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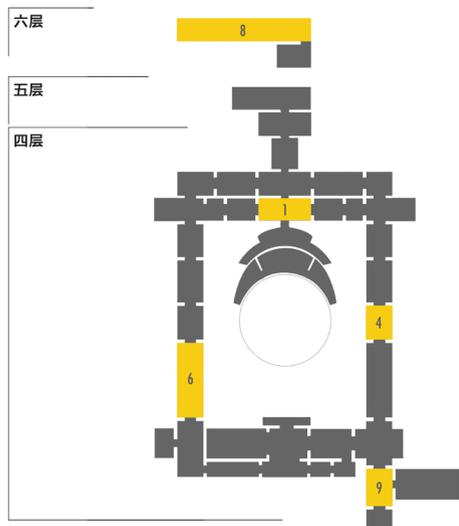
绘画·阿槿

在这里，有杂志有书籍
还有各种美好的趣味

扫码订阅2018年度《三联生活周刊》



二十件推荐馆藏(上)



1 乌尔旗 The Standard of Ur, 公元前 2600 ~ 前 2400 年。56 号展厅

乌尔为苏美尔人所建，是世界上最早的城市之一，5000 年前诞生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境内）。

20 世纪 20 年代，考古学家伦纳德·伍利（Leonard Woolley）在乌尔（City of Ur）的一个皇室陵墓里发现了“乌尔旗”。它的材料为木质，长约 58 厘米，宽约 19 厘米，相当于一个小手提箱，顶端收窄，两面镶嵌着贝壳、红石与天青石。被发现时，它靠在一个男性的肩上。根据安放的位置，伍利推测，它是一面固定于手杖顶部的仪仗队的战旗，在行军或者战斗时高高举起，因此将它命名为“乌尔旗”。也有学者认为，它是一件乐器，或者存放珍贵物品的盒子，但“乌尔旗”的名字仍被沿用。

“乌尔旗”让我们看到早期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权力的运作，以及暴力与财富的关系。它的图案分为“和平的一面”与“战争的一面”。在“和平的一面”，下两层里，是百姓排队献上鱼、羊、牛等供品；在最高一层，国王和地位较高的人享受盛宴，有人在一旁弹里拉琴。在“战争的一面”，国王身穿长袍，手握大矛，士兵领着囚徒们向前冲，战败者被剥去衣服；最底层画着的车，是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双轮战车，它体现的绘画艺术堪称经典：拉着战车的驴从走到慢跑再到飞奔，展示了一个动态的过程，是电影问世前表达这一过程的最好的手法。

伦敦政经学院前院长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在传统的小型农业社会里，每个人都要劳动。而伴随着粮食的富余，阶级开始出现，因为有人可以依靠别人的劳动而生存，因此，贡品、类似国家的组织、战士阶层开始出现，新的权力形式诞生。

在伊拉克考古学家拉米亚·阿勒盖拉尼看来，乌尔旗展示了苏美尔民族的生活，以及苏美尔人旅行的范围：青金石来自阿富汗，红色大理石来自印度，贝壳来自波斯湾。而把各种材料黏合在一起的沥青则产自本地，正如现在伊拉克的财富的重要来源之一是石油。



2 亚述浮雕

Assyrian Relief, 公元前 700 ~ 前 695 年。9 号展厅

这块浮雕板出土于古亚述的首都尼尼微，在今伊拉克北部尼尼微省。它曾用于装饰辛那赫里布王的宫殿，材质为石膏，高 160 厘米，长 111 厘米，厚 9 厘米。

公元前 700 年左右，亚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征服了位于现如今中东的大部分地盘。这块浮雕板中的两个人物是国王近卫队的士兵。左边的弓箭手是阿拉姆人，其居住地阿拉姆位于今叙利亚北部地区。右边的枪兵则来自黎凡特，他的装饰表明他和族人很可能出自现今巴勒斯坦或巴勒斯坦周边。

浮雕之于亚述，相当于雕塑之于希腊，绘画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这块浮雕反映了当时的亚述王国在世界各地征讨，将不同的血液纳入自己军队的历史。

3 埃及猫雕塑

The Gayer-Anderson Cat, 公元前 600 年。4 号展厅



这件猫雕塑出土于埃及古代大型墓地萨卡拉，材质为青铜，高 42 厘米，宽 13 厘米，由盖尔·安德森（Gayer Anderson）少校捐赠给大英博物馆。它看上去灵动而高贵，佩戴着金耳环、鼻环，胸前所刻银色荷鲁斯之眼，在埃及具有神圣的含义，代表重生的可能性和神明的庇佑。

在埃及历史中，“猫”的形象经历了一系列改变。在古埃及，生活在沼泽地带的猫被人类捕杀，以获得皮毛。在古王国时期，猫开始被驯养，到了中王国时期，猫的形象开始出现在墓穴的绘画里，一些女性的名字里也开始有“猫”字。而在家中，猫则成为主人的陪伴者，从早期被捕猎的对象成为人类捕获猎物的帮手。猫与人类的关系，渐渐给猫的形象带来了宗教意义。比如贝斯特女神，在埃及文化中，她最初的形象是狮神，代表复仇和毁灭，后来转化为猫，主管人间性爱。后王朝时期，贝斯特女神特别受到人们的崇拜，被制成木乃伊放入墓穴之中。

4 下于茨酒壶

The Basse-Yutz Flagon, 约公元前 450 年。50 号展厅

1927 年，在法国东北部的洛林地区下于茨镇附近，一位掘地工人无意中发现了这对青铜酒壶，每个的大小和容量相当于 1.5 升大酒瓶。这两把酒壶的出土在文物拍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当时，许多考古学家认为它们并非文物，但是大英博物馆的馆员却认为，它们代表欧洲史上一个尚未被发现的记忆，以在当时看来价格高昂的 5000 英镑买了下来。研究证明，这对酒壶的确是目前已知最重要也最古老的两件凯尔特文物。

这对酒壶让人仿佛看到 2500 多年前早期北欧人的活动范围：他们生活在小型社群里，已经掌握了金属加工的复杂工艺，制作酒壶的材料显示他们曾与多国进行国际贸易——铜来自阿尔卑斯山以南，锡来自遥远的康沃尔，壶底的花纹与布列塔尼到巴尔干一代的艺术元素相类似，而每件酒壶上所装饰的数量超过 120 片的珊瑚，则很有可能来自地中海。



5

中国汉代漆杯

Chinese Han lacquer Cup, 公元 4 年。33 号展厅

这只漆杯发现于朝鲜平壤附近，据推测，可能是公元 4 年左右中国皇帝赐予其在朝鲜的将军的礼品。

漆杯的外形如同一个椭圆形浅碗，直径约 17 厘米，有两个镀金把手，容量相当于一个大的葡萄酒杯。材质为木质，这一点从杯的破损处可以观察到。碗体由红棕色漆层覆盖，外壁镶嵌着黄金、青铜，并绘有数对相对而立的鸟，以几何图案和螺旋纹饰为背景。在杯底一圈有 67 个汉字，是 6 位工匠和 7 位监造人的名字。

根据剑桥大学中国史教授胡司德（Roel Sterckx）的分析，这只漆杯的制作费时费力，需要从漆树上提取汁液，与颜色混合并晾干，层层涂抹到木胎上。高级漆器需要光滑和坚固并存，这个漆杯涂抹了 30 多层漆，每次都需要等待上一层漆干燥变硬，因此制作周期需要一个月。在价格上，一只漆杯相当于 10 只青铜杯，因此只有驻守边疆的将领有权使用。

漆杯也代表了帝国体系的一部分。在 2000 多年前，汉代的疆土南至越南，西至中亚草原，北达朝鲜。

6 波特兰花瓶

The Portland Vase, 公元5~25年。70号展厅

波特兰花瓶高25厘米，直径17.7厘米，是现存最精美的古罗马宝石玻璃制品。在18世纪，它开始成为许多玻璃和陶瓷制造商的灵感来源。18世纪后期，此花瓶为第二代波特兰公爵夫人所有，因此得名。在大英博物馆里，它曾被一位醉酒的人打碎，经过辗转修复，恢复了原状，但仍可见到碎裂的痕迹。

在制作方法上，它先把深蓝色的玻璃吹制定型，然后把温热的深蓝色玻璃瓶浸入白色玻璃液，将两者合二为一。成型后，花瓶冷却，在外层玻璃上雕琢图案。而雕刻看起来以爱情和婚姻为主题，也似乎寓意着奥古斯都王朝的诞生。清晰而干净的艺术风格，渗入了古希腊艺术的痕迹，显示了奥古斯都时代宝石玻璃制品的高超工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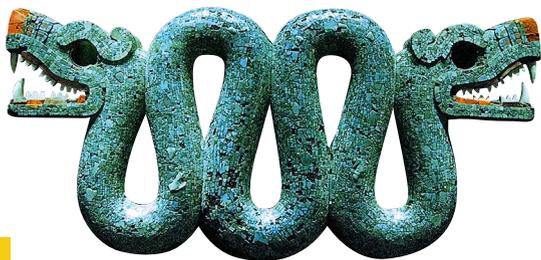
8 《神奈川冲浪里》

The Great Wave off Kanagawa,
公元1830~1833年。92~94号展厅

《神奈川冲浪里》是最畅销的日本浮世绘，由葛饰北斋于1803年左右绘制，是他的“富岳三十六景”系列之一。大英博物馆藏有它的三个版本。

这幅木版画使用了日本传统的桑纰纸，主色调是柏林蓝，在18世纪早期制于德国。富士山的绘画手法，被认为来自葛饰北斋从欧洲版画中学习的透视法。19世纪初，日本还处于江户时代的闭关锁国时期，“柏林蓝”很可能是荷兰进口，或者辗转运自当时也正在调制这种颜料的中国。这幅画在欧洲受到欢迎的原因，是它融合西方材料、绘画手法于日式审美当中。日本专家唐纳德·基恩（Donald Keene）将海浪看作日本社会变迁的隐喻：我认为他们对海浪的兴趣表现了对出海远行的向往，以及在日本以外发现新财富的可能性。

19世纪中期，日本开始与外界交流，日本绘画出口到欧洲，获得了惠斯勒、凡·高和莫奈等画家的高度评价。“日本风格”掀起一股热潮，渗透到西方艺术传统之中。



7

双头蛇

Double-headed Serpent, 公元1400~1600年。27号展厅

双头蛇是墨西哥古文明中的阿兹特克文明的代表性艺术品。其内部为木质，表面贴有2000块左右的小绿松石。整体宽约40厘米，高20厘米，身体呈W形。在蛇的头部，鼻子和牙龈的材质为鲜红色贝壳，牙齿为白色贝壳。绿松石的光泽变幻，赋予了蛇以原始的生命力。

双头蛇显示了阿兹特克人当时的活动范围。鲜红贝壳来自海菊蛤，需要潜入深海采集，由于其采集难度和漂亮的颜色，在墨西哥具有很高价值。镶嵌的墨绿色松石则很有可能来自距离当时的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提特兰很远的地方。这些信息说明，以上材料曾在此地区进行贸易。

蛇对阿兹特克人来说，是重生和复活的象征。绿松石在阿兹特克文化中也具有特别的意义。对于16世纪初的阿兹特克人来说，他们制造出的绿松石马赛克是比黄金更为珍贵的艺术品，价格昂贵。在统治者蒙提祖马二世的时代，绿松石是他主持活人献祭仪式时所穿盛装上的重要装饰。蒙提祖马在1502年的登基大典上，很可能佩戴着这条双头蛇。

这只双头蛇具有双面的意义。一方面，双头蛇的制作原料，很可能是阿兹特克人征服外族后，强制征收的贡品。昂贵的绿松石体现了阿兹特克的贡品制度，这一制度令当时的属民不满，因此很多人加入了后来入侵的西班牙军队。双头蛇既见证了阿兹特克帝国的艺术、宗教与政治；也让我们看到了帝国崩塌的根源。





9 维多利亚早期茶具

Early Victorian Tea Set, 公元 1840 ~ 1845 年。47 号展厅

在中国历史中，1840 年几乎是一个与“鸦片战争”无法分割的符号。而我们很少知道的是，这场“鸦片战争”同时也是一场“茶叶战争”，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将其在中国出售鸦片获得的银两，用来从中国进口茶叶。这套茶具就属于这一时期，由英国最著名的陶瓷制造商韦奇伍德（Wedgwood）出品。它由三件陶瓷茶具构成：一个约 14 厘米高的茶壶、一个糖罐、一个奶罐。茶具上镶嵌的白银蕾丝装饰，带有纯度标记。

与韦奇伍德在 18 世纪制造的昂贵瓷器不同，这套茶具面向大众市场而设计，普通家庭也消费得起。它与茶文化从英国上流社会专属，到成为社会各阶层青睐的饮品的转变密切相关。普林斯顿大学历史教授琳达·科利（Linda Colley）说：19 世纪时，如果你坐在一张红木桌旁边饮用了加了糖的茶，便几乎与世界上所有大洲产生了关联。到了 19 世纪，茶叶已经成为英国的国民饮品，人均茶叶消费量达到每年 3 公斤。因此这套英国茶具不仅见证了英国的历史，和中国近代史的联系也是千丝万缕。

10 湿婆和雪山神女像

Shiva and Parvati Sculpture, 公元 900 ~ 1000 年。33 号展厅

这件雕塑是湿婆（Shiva）和他的妻子雪山神女帕瓦尔蒂（Parvati），二者的爱情故事出现在许多的古印度文献之中。雕塑材质为玄武岩，高 40.6 厘米，宽 25 厘米，厚 13 厘米。

湿婆是印度教的三位主神之一，他的性格充满矛盾，代表生殖和创造，也代表破坏和毁灭。雕塑中，湿婆扶着妻子的胸部，并轻托起妻子的下颌。帕瓦尔蒂则侧坐在湿婆蜷起的腿上。湿婆脚下，是他的坐骑公牛南迪（Nandi），象征男性的生殖能力，也是湿婆神的忠实信徒。在印度教中，浪漫的爱情是神性昭显的一个方面，湿婆和帕瓦尔蒂的结合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和犹太教和基督教只信奉唯一的神不同，印度教的神灵之间可以形成伴侣关系。宗教史学者凯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认为：“在一神论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中，要解释性与性别的问题十分困难。个别宗教，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初期肯定女性，但类似观点在发展过程中遭到劫持，乃至退守旧有的父权制。人们对性的看法存在巨大差异。如果你认为性是神圣的，是人理解神意的方式，那一定会引发某种结果——你会发现印度教的婚礼便是一种神圣的行为。性与性别问题一直都是基督教的死穴，体现了一种调和的失败，没有把一项人类生活中的基本事实与宗教成功地结合。”



大维德瓷器里的中国

文 / 李想



(于德众摄)

元青花对瓶，又叫“大维德对瓶”

斐尔西瓦·大维德爵士的收藏的整体性不仅赋予了他新的个人身份，而且他同时也在收藏中国——对他来讲，藏品的来源地和使用者的属性，比单件器物更重要。

一条瓷器的河流

从二楼的亚洲部研究所出来，一进93号展厅，那对举世无双的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就陈列在门左手边的玻璃展柜里。柜顶的射灯在瓷器表面投射出静谧的光，瓶身上飞舞的中国龙和环绕的祥云，立即表明了它的中国身份。大维德爵士的中国瓷器收藏近1700件，自晋至清，包括大量明清宫廷精品、传世珐琅彩瓷器和极为稀有的汝窑，是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外最丰富的瓷器收藏。每个带着些“朝圣”心情来此的游客，经过这元青花对瓶的感觉，大概与来朝的使臣穿越波斯波利斯宏伟的“万国之门”时相似。在这对花瓶出现之前，青花瓷一直被认为是明初的发明；这对花瓶的断代和真伪研



大维德瓷器馆，明朝单色瓷器展柜



(于晓众摄)



左图：1986年，在荷兰嘉士德拍卖行，参观者正在观看“南海一号”古沉船里打捞出的瓷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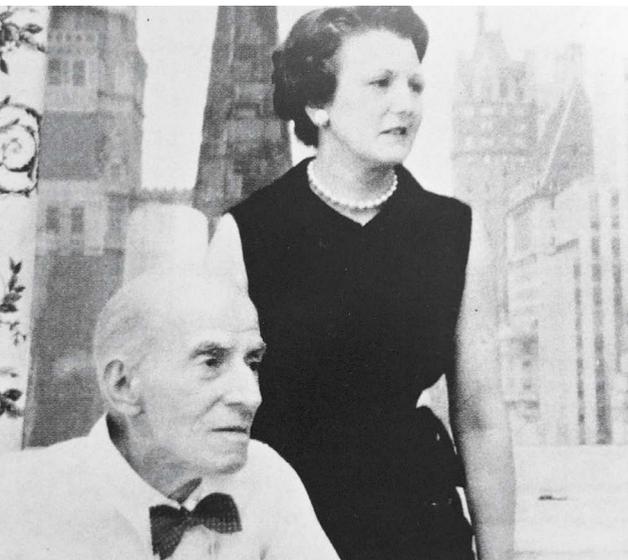
右图：收藏家斐尔西瓦·大维德爵士和他的第二任妻子

究，改写了中国瓷器的历史。

由于放在大英博物馆里，这对元青花没有估价，但它们是公认的国宝。拜访它们之前，前大维德基金会瓷器馆馆长毕宗陶（Stacey Pierson）告诉我，“每逢借展，这对花瓶从来只能单只出行。就像皇室成员不能同乘一架飞机一样，必须保证若有意外，另一只能够存活下来”。任馆长的时候，这对花瓶的每次出行，都由她亲自陪同。“给它们都是订头等舱机票，放在一只特制的箱子里，拎上飞机，单独有一个座位。降落后，得等它安全下了飞机，其他乘客才能离开座位。”最有意思的是，有一次美国博物馆借展，按照美国人的一贯做派，竟然给她派了两个荷枪实弹的美国大兵做贴身保镖，“一路看到的英

国人都惊呆了”。这对花瓶从未进入过市场，但有一次她与一位护送伦勃朗油画的人在机场相遇，伦勃朗的画在拍卖行早已拍出高价。“一聊发现，给一只青花瓷上的保险，与给伦勃朗油画上的保险金额一样。”

这对花瓶形制高大，高约60厘米，最宽处直径20厘米，上下窄、腹部圆。细细打量，其中一只并不完全对称，略微有一点倾斜。这么大的尺寸，一定不是摆放在案头用的。左边那只瓶子的瓶颈上，有几行题字：“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里荆塘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捨香炉花瓶一副，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通过这句信息量很大的题字，



可知瓷瓶的制作目的是供奉在寺庙里，供奉者为张文进，他的家乡顺城在今天的江西，离景德镇不远。他供奉的是一对花瓶和一只香炉，但其中的香炉未被发现。受供的胡净一元帅是谁，有好几个考释的版本。一种说法认为，星源祖殿是宋元时期供奉五显神的婺源灵顺庙，胡净一元帅就是五显神之从神。无论如何，这位元帅在婺源地区被信为地方神，类似青城山二郎神庙的李冰父子，张文进供奉花瓶是为了祈求他的保佑。

大维德爵士在1935年最终从两位不同的藏家手中购得这两只花瓶，让他们重聚。20世纪20年代，英国瓷器专家R. J. 霍蒲孙曾提出元青花存在的可能性；但世人公认元青花，已是20世纪50年代的事。1952年，美国华盛顿佛利尔艺术馆的研究者约翰·波普博士出版了《14世纪青花：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所藏一组中国瓷器》和《阿德比尔神殿收藏的中国》两本书，以大维德收藏的这对青花瓶为标准，对照土耳其托普卡帕宫收藏的几十件与之风格相近的中国瓷器，将所有具有这对青花瓶风格的青花瓷定为14世纪青花瓷器。从此，被波普称为构成他研究理论基石的这对“大维德瓶”，成为陶瓷界公认的“至正型”元青花断代标准器。

在为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所写的《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中，前馆长尼尔·麦格雷戈把这对花瓶的故事放入了广阔的蒙古帝国版图中。他写道：“在蒙

古帝国的统治下，中国制造出了一种在世界上最负盛名、历久弥新的奢侈品，它的华丽不输安乐宫，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传遍世界，它便是青花瓷。如今，这种蓝白配色已然被我们视为中国特色，但事实上并非一贯如此，这种中式审美实际上源自伊朗。”蒙古入侵中东，给当地的陶瓷制造业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伊朗受创尤其严重。重归和平之后，中东成了新兴的中国出口市场，为迎合当地市场上受欢迎的白地青花，中国陶瓷工匠效仿当地风格，开始使用源自伊朗和今天伊拉克的颜料——蓝钴。他还引用了英国的中国艺术史专家柯律格教授的一段话：“这种来自异域的技术告诉我们，当时的中国作为自太平洋横贯地中海地区的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对亚洲其他地区采取的开放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开放为中国带来了青花瓷。”麦格雷戈进而提到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忽必烈治下的中国旅行笔记，这也是英语中“porcelain”（瓷器）一词的起源处，而正是蒙古帝国治下的和平，保障了马可·波罗的沿途安全。这种描述非常符合大英博物馆对世界历史的认识方式：每一件器物通常都会打开一幅广阔的地理图景，强调的是世界不同地区的联系与交流。但现在在伦敦大学亚非研究所教授中国瓷器艺术与考古的毕宗陶会有一些不同的视角。她告诉我，虽然这种蓝色最初来自伊朗，但后来中国人在中原地区也发现了可以制造出同样颜色的材料，“实际上，来自中国本土的颜料，更多被用在宫廷御用品中”。

看过这对元青花，右手边的第一个展柜就是汝窑了。我来的这天早晨，这只柜子没有开灯，略有些暗，但柜中陈列的7件汝窑瓷器的光滑表面仍然泛着微微的光，细看圆润如玉的表面有几乎不易察觉的细纹。几百年的时间已从这些器物身上流逝，但它们看上去依然像刚刚制造出来一样鲜活，细看却又感到一种岁月沉淀的古老气息，充满灵性。汝窑全世界有记录的传世器仅存不到70件，大维德收藏了12件。瓷器鉴定专家、原嘉德拍卖陶瓷部总经理刘越告诉我，对“不到70件”这个数字说法不一，“有说60多件，现在说增补到八九十件。但这八九十件其实水分很大，有些是后来考古发现窑址出土的残次品，有些经过修补，有些状态很差，品质高的非常少”。这几十件，除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最多，就是大维德基金会。

这个展柜里的汝窑件件被视为罕见的精品。比如那个葵瓣式盏托，只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

左图：展示着7件汝窑瓷器的展柜

右图：伦敦大学亚非艺术学院研究院陶瓷研究专家毕宗陶，她曾是大维德基金会伦敦大学瓷器收藏博物馆的馆长。大维德的瓷器收藏现已迁往大英博物馆



【原文第十二】

物馆还有另一件，推测产地在河南宝丰县清凉寺。还有那只天青釉弦纹奩式炉，另一件较小的藏于故宫博物院。现在人们找到文献，南宋人周密在《武林旧事》中记载过“大奩一、小奩一”的两件汝窑礼品，是南宋权臣张俊进奉给皇帝赵构的16件汝窑中的两件。张俊进奉的16件汝窑在当时也是非常贵重的礼品，因此是宋代历史文献中记载汝窑最多的一次。《武林旧事》所记载的，被推测可能就是大维德基金会和故宫博物院的这两件。

这种柱形的奩身和水平的弦纹，是对战国和汉代青铜器的模仿。宋朝是一个金石学兴起的时代，宋人也有“复古”的爱好的，模仿前朝的古董。另一个例子是大维德所藏的两件宋官窑琮式瓶，摆放在展厅正中的官窑展柜里，全世界留存不多。它模仿的是良渚文化中出现的玉琮。在大英博物馆中国馆的展厅里，陈列着一只大约公元前2500年的玉琮，高49.5厘米，比琮式瓶细长很多，显然不可能用作插花装饰。现任大英博物馆馆长霍吉淑（Jessica Harrison-Hall）在她的《中国：器物中的历史》一书中提到，玉琮在新石器时代的用途仍然还是个未

解之谜，很有可能用于墓葬。这种器型被宋、明的手艺人模仿，比如四川遂宁金鱼村发现的龙泉窑琮式瓶和青石琮式瓶。有趣的是，到了宋代，琮的用途却发生了变化，变成了日用品。扬之水在《终朝采蓝——古名物寻微》里写道，这种琮式瓶“即明人眼中的花器之雅品，名作‘蓍草瓶’，而鉴赏的品味当是遥承宋人”。这些器物间幽微的关联汇成了一条传承的河流，几千年几百年后，还能循着器物与它们的名字踏入这条漫长的河流，令人感怀。

除了展厅中间这几个展柜，环绕着瓷器展厅的是几面由地及顶高的展墙。沿着一面又一面摆满瓷器的展墙看过去，从西晋的绿釉双鱼炆器，到唐朝的越窑青瓷，再到宋元明清的各类瓷器，时间的河流延续不断。大维德收藏了约550件明代瓷器，20件乾隆御题陶瓷（据郭葆昌《清高宗御制咏瓷诗录》，清宫旧藏中有乾隆御题的瓷器共计约199件），还有31件传世珐琅彩瓷器，他的收藏具有皇家品位。他是那个时代英国贵族收藏家中唯一精通中文和古文的收藏家，对铭文和题字很感兴趣。在他的瓷器藏品中，不少底部有“大明宣德年制”“大明成化年



（图）

制”“大明万历年制”“康熙御制”“雍正年制”和“乾隆年制”的字样。1934年英国瓷器专家霍蒲孙所著的《大维德所藏中国陶瓷图录》中提到，大维德注重稀有品种、带款识的资料性瓷器。如磁州窑“至和三年”、“张家造”瓷枕，指出了制作者的姓名；如“元祐年造”“洪武五年”的青瓷砚，记录了制作的年代；如明“内府供用”蓝釉尊，说明了陶瓷曾经的归属者。这些款识是大维德收藏的重要特点，也是研究中国陶瓷史的重要史料。

博物馆的物品是故事的讲述者，也是历史的记录和叙述者。与其他类型的藏品不同，“如果说有些藏品讲述的是历史和权力，那瓷器必定不属于那一类”。毕宗陶告诉我，“瓷器讲述的是审美和品位”。大维德展厅里，讲述的不是朝代的故事，而是讲述着美的故事，比如颜色、器型与工艺。我们并不知道大维德自己本人最爱哪一件藏品，他从未明确表达过。毕宗陶告诉我，大维德自己最欣赏的可能是一件杭州老虎洞的官窑细小口颈瓶，瓶口和底座有铜边，“他曾经在一封私人信件里提到，他喜欢这只瓶子在煅烧过程中自然出现的美丽细纹”。毕宗陶自

己最喜欢的则是一对景德镇明代永乐年间的单色红釉碗，“红釉爬到碗口，留出一圈白地，表明了瓷器的纯正质量。它上面的针刺小孔比皮肤的毛孔还微小，上色的层次非常深，产生一层又一层浓淡相宜的红色，从技术上难度很大”。15世纪中期，这种红釉的技术一度失传，直到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初才得以恢复。

并非偶然的相遇

大维德与中国瓷器的“缘分”，据说源起于一次对英国朋友的拜访。据他的第二任妻子希拉·约克-哈蒂回忆，他1913年娶了堂妹，开始第一次婚姻，从孟买搬到伦敦定居。不久，他在剑桥生了一场病。“为了恢复健康，他去一位南部海边有房子的朋友那里居住。在他朋友起居室的壁炉架上摆放着一只中国花瓶。斐西瓦尔·大维德爱上了这只花瓶。”这是他开始收藏中国艺术，并将它作为一生职业的起点。

斐西瓦尔·大维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1892年出生于印度孟买，是萨松·大维德公司的所

有者萨松·大维德爵士与汉娜·萨松的长子。毕宗陶告诉我，萨松家族和大维德家族是两个源于伊拉克、18世纪末和19世纪定居孟买的显赫犹太商业家族。他们家族的业务包括银行业、面粉厂、煤油、纺织业和之后的鸦片贸易。萨松·大维德在岳父去世后继承了萨松公司，生意很兴旺。他后来是印度中央银行的创始人之一，曾任孟买总督。1911年，英国皇室访问印度之际，他捐赠了一大笔巨款用作慈善，其中包括在伦敦建造一座犹太公会。在大英帝国的构架里，斐西瓦尔·大维德属于特权阶层的后代。他以一个英国新移民的身份来到伦敦——大英帝国“朝圣之路”的终点。在伦敦，中国瓷器的收藏是上流社会社交的一部分。

启发大维德对瓷器一生兴趣的那只起居室内的中国花瓶，是什么样子已不得而知；但它在那里的出现绝非偶然。摆放中国瓷花瓶作为室内装饰，在20世纪初的英国是风靡已久的时尚。17世纪以来，中国瓷器通过对外贸易成为欧洲的流行商品，以英国最甚。英国皇室对中国瓷器情有独钟。17世纪初，查尔斯一世还只拥有60件瓷器；50年后，玛丽二世就拥有800件瓷器。到18世纪中叶，英国贵族与商人对瓷器的热情达到了高峰：大约有200万件瓷器进口到伦敦，而那个时候英国的人口还不足600万人。在英国，瓷器既是奢侈品，又是日用品；由于中国瓷的价格非常高，甚至取代了黄金和白银的地位，所以也成了最佳的炫耀性消费品。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在他的作品中描述过18世纪早期的人家中到处都摆着瓷器的场景，甚至连墙壁上全都是陈列瓷器的架子。英国人对它如此如醉，不惜为之挥霍财富。让他们感兴趣的不仅是这些轻薄如纸，蓝白相间，坚韧度远胜陶器，且很耐高温的半透明材料，这些瓷器上对一个遥远神秘的国度的描绘也深深吸引住了他们。

随着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开拓，这种稀罕的上层贵族消费品也进入了新兴中产阶级家庭。东印度公司从亚洲进口了大量的丝绸、瓷器、茶和香料。当年伦敦的东印度公司有一座很像大英博物馆的古典主义建筑，里面有自己的博物馆和拍卖行。工作日拍卖行人声鼎沸，每个人都在高声叫卖商品。东印度公司派去中国的船是最大的，吃水量达上千吨，既是为了运回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也是为了装载武器与海盗作斗争。

直到19世纪末，英国人对瓷器的收藏和陈列



仍是日常消费行为，以传统乡村庄园的瓷器收藏和展示为主，很符合西方口味，主要体现的是19世纪早期英国皇家和上流社会对室内装饰品的趣味。据毕宗陶的研究，1818年夏洛特女王去世后，她在佳士得拍卖的东方瓷器里，就有装饰性极高的中国器皿，比如镀金配饰的广彩蓝地八角瓷杯和适用于皇家宫殿的超大白地蓝彩描金龙纹碗。查尔斯·兰姆在《老瓷器》里写道：“我几乎像女人一样钟爱老瓷器。每当我去看任何豪宅，我总是询问瓷器柜在哪儿，然后再找画廊。我几乎是情不自禁……但谈到那儿，我们都有相同的感受或表示，就是日子太久远了，以致我们都记不清这是购买的了。我记得第一次看戏和看展览的情景，但是我对瓷碟什么时候进入我的脑海已经记不清了。”对他而言，一套新近购买的老蓝釉瓷器，不过是一件消费性购买的“琐事”，购买完了就开始日用。

当大维德与那只英国乡间别墅的中国花瓶相遇时，中国瓷器早已充满了英国上流社会的私人起居空间。

有关品位

英国对中国的认知随着1793年马嘎尔尼访华而恶化。一系列源于外交礼节的交恶后，中国被视



(于慧文摄)



(视觉中国供图)

左图：大维德基金会原址，伦敦布鲁姆斯伯里戈登街 53 号

右图：2017 年 11 月 8 日，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宣布大英博物馆中国与南亚馆重新开馆。中国馆馆长霍吉淑正给女王讲解

为老朽衰落的古国。19 世纪 30 年代，中英两国政治关系变得紧张，中英贸易日益不平衡，中国商品继续在英国社会走俏，但中国不需要英国的商品，陶瓷就成了与中国的负面联系。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贸易遭遇清政府禁令，鸦片战争爆发。对中国人停滞、堕落、滑稽可笑的形象描述，在英国社会变得根深蒂固。中国瓷器不再被当作日用消费品购买，而渐渐被视为古董。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中英关系伴随着战争和冲突，却是英国收藏家收藏中国瓷器的“黄金时代”，以致他们在这个时间所建立的系统收藏前无古人，后也不会再有来者。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又面临义和团的内乱，八国联军对圆明园进行了洗劫。王朝分崩离析的过程中，一些“宫廷”物品也流入市场。西方收藏家开始接触到 1860 年英法联军掠夺来的中国皇室财物，许多物品在欧洲被拍卖和出售，从而由战利品变为了艺术品。比如，1861 年佳士得拍卖的一橱柜精选玉雕，就是由费恩骑兵师的官员从圆明园带来的。

与此同时，19 世纪末中国开始了全国性的铁路建设，在铁路建设中发现和挖掘了很多墓葬。外国工程师开始发现和挖掘出原先不为外国所知的随葬品，其中包括陶器和炆器。英国陶瓷藏家第一次开始在中国，或通过中介人和古董商，购买 14 世纪之

前烧造的早期中国陶瓷。英国收藏家乔治·尤摩弗帕勒斯 (George Eumorfopoulos) 在 1925 年这样描述他的收藏活动：“19 世纪的最后十年，‘东方’意味着清瓷和少量混入的明瓷。那时已知的明瓷是一些青花和较粗糙的彩瓷。我们知道更精致的明代彩瓷是最近的事。近几年这些瓷器才来到西方。……我收藏的主要强项在于早期器皿。1906 年我第一次见到几件随葬品，就立刻被吸引住了。”他也阐明了英国收藏家收藏器物的原则，“如果仅仅是从考古学上的吸引，从未诱使我购买一件物品。想要成为我的收藏，那在审美上无论如何也必须具有某种吸引力。出于此原因，我的收藏中汉代之前的器物数量有限”。刘越告诉我：“西方收藏家在构建中国，尤其是中国藏品时，主要是站在审美和艺术价值的角度来构建的。他们不一定那么深地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那些。他们直接的出发往往是审美，包括最早收藏的雕塑性的青铜器和石窟造像。”这就形成了由这些藏家群体所捐赠的藏品而成的大英博物馆的特点。

这些新藏品在英国启发了与中国瓷器相关的新的通史文献，在此之前，英国人的趣味和关注范围还集中在高度装饰性的清代瓷器。同时，19 世纪英国传教士和军人被派遣到中国，到了 20 世纪初，他们开始在中国当地形成完整的收藏，比如从红顶商



(于毅众摄)

人胡雪岩手中购入大量藏品的乔治·维奇。这些物品开始与中国本土的藏家联系在一起，被认为具有“更纯粹的中国趣味”。

对更久远的中国历史的认识，比如唐代陶器，逐渐扩展到了对宋瓷的知识。像尤摩弗帕勒斯这样的收藏家认识到，英国人“对宋代陶瓷的看法不着边际”，而中国人对早期陶瓷的描述却很准确。1915年，霍蒲孙在《中国陶瓷》中这样定义宋瓷：“宋瓷是真正的陶艺产物，用最简单的工艺制作，只用真正的陶艺手法来做主要装饰。”从这个时期起，“宋瓷”在英国被描述成纯粹、简洁和质朴。毕宗陶告诉我，“英国藏家认为宋代的美学特征具有现代性，因而很喜欢它”。对于什么是“中国趣味”，1929年古董交易商布鲁特在收藏图录中提到，就是“受到

本地藏家喜欢并对他们有意义”，源自本地，最好是皇家来源。比如，奥斯瓦尔德·利德尔1899年从上海私人藏家手中购得一对花瓶和从庆亲王那里购买藏品，这就是“中国趣味”。这里提到的“中国藏家”，表明英国的中国瓷器收藏正在发生变化。“中国趣味”的收藏日益成为衡量质量的标准，而非传统英国乡村庄园的瓷器收藏和展示。

1920年，一位从亚洲回到英国的收藏家观察到，“当我1909年离开英国的时候，西方世界的博物馆几乎没什么陶器。大多数陶器是那以后中国和韩国的墓葬挖掘品。……当我1920年回到英国，宋瓷已经在欧洲和美国的博物馆享有尊贵地位。而在我东行之前，占主导地位的是明清瓷器。陶瓷价值的变化甚至比同期发生在绘画和音乐领域的重新定位更



（图）
大维德瓷器馆的展柜

左、右图：大维德瓷器馆的展柜

大”。在伯灵顿收藏俱乐部的杂志《伯灵顿杂志》上，一篇文章总结了英国人关于宋瓷的理想主义：“以观看一件宋碗为例，我们渐渐理解它外部的轮廓，完美的曲线和某种特定曲线的微妙变化；我们还感受到内壁凹陷的曲线和外部轮廓的关系；我们意识到器壁精确的厚度与制作它的特定材料、材料的密度和摩擦力相一致；最终我们意识到让我们满意的所有这些特质的表现是色彩和哑光的釉色。”

当大维德开始收藏的时候，英国社会对中国的感知已经有所好转，中国又开始受到英国人欣赏。在英国人看来，这个古老的文明摆脱了专制，走上了一条与西方文明平行的新道路。作为一个从印度到伦敦的新移民，大维德可能也希望通过收藏来建构身份。他在1914年从古董商那里买了第一件瓷器，那一年11月他买了四件。他一生最重要的收藏时期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时候的英国收藏圈已形成了对中国瓷器很富现代见解的品位。

中国式鉴赏与聚合

1924年，大维德访问了中国。清朝统治在1911年被推翻后，末代皇帝溥仪仍然居住在故宫，直到这一年被转交给民国政府。故宫博物院委员会也是

在这一年成立的，大维德是为委员会提供咨询的几个外国人之一。这个委员会不仅讨论藏品，而且给了大维德亲自上手宫廷御用品的机会，他对“宫廷收藏”的兴趣，就是这个时候培养的。

最初故宫博物院的全新展示也依赖外国资金。据毕宗陶的研究，1937年的故宫博物院指南中，曾列入了大维德的名字，作为对“表示了极大兴趣”和“提供了大量资金捐助”的中外朋友的感谢。这份名单明确记载了，大维德捐赠了6260.40美元用于将景阳宫御书房改建为宋、元、明瓷器的专门展厅，从展品遴选、展览设计到说明标签的撰写，都得到了他的指导和参与；另一笔1000英镑的捐款用以购置御书房两侧厢房的展示柜。

也是在这一次旅行中，他被中国的艺术鉴赏传统深深吸引。在中国的现代考古学出现之前，中国式的古典鉴赏传统依赖于文献，名物是经学中的一个分支。特别是到北宋，在刘敞、欧阳修的倡导下，学者们致力于对古器物进行系统的收集、描述和研究，这就是金石学。金石学家那个时候就认识到，古器“非特区区为玩好之具而已”，或“非敢以器为玩也”，更重要的是可以“决经义之疑也”。14世纪，“经典”器物确立，这些“经典”包括由宋徽宗组织编辑著录的古代青铜器，以及收录在皇家和藏家著

录著作中的玉器和瓷器。大维德把1388年出版的《格古要论》翻译成英文的《中国式鉴赏》，这本著作对陶瓷等器物已经进行了分类和分级。这本译作直到他去世后的1964年才得以出版。牛津大学中国艺术史专家柯律格评价，在翻译和研究《中国式鉴赏》时，大维德关注的基本是“以物为中心的鉴赏家和藏家，在文献记录中寻找与幸存器物有关的确证或矛盾的观点”。

1926年，大维德的父亲去世后，他继承了爵位，成为家族企业的董事长。这个职位的一些旅行，为大维德提供了足够多的途径去收藏。他的家族企业在香港、上海和神户都设有办事处，他对这些地方的访问和了解，都让他与同僚收藏家不同。他在20世纪20年代就掌握了流利的中文书写，是屈指可数的能够发表中国陶瓷学术论著的收藏家。1927年，他再次访问中国，并成功购得宫廷旧藏的50件瓷器。毕宗陶说，这50件瓷器“构成了大维德基金会1700件藏品的核心，对大维德作为‘中国式鉴赏家’的声誉至关重要”。对于大维德为何能够被允许参与宫廷收藏的出售，又如何能带着它们离境，他本人没有留下文档和传记，只有他的夫人对这个故事做过无法被证实的叙述。其中的一个关键点是，这批藏品是溥仪（一说为慈禧太后逃离北京时）抵押给盐业银行的，而大维德说服了盐业银行高层将藏品出售给他，冒险将这批藏品带出了京，辗转运回伦敦。这批清宫旧藏精品，大部分为宋代名窑瓷器，其中官窑、哥窑近20件，很多上面有乾隆御题诗，以及少量明、清官窑精品。这些皇家精品在各种动荡时期——洗劫圆明园、义和团运动和清王朝覆灭后，都变成了可出售的物品。

刘越告诉我，20世纪的第一个20年，从古玩商处购买也是文物流散的一个重要渠道之一。皇室成员经常把宫廷物品拿出来出售以换取资金，“欧美人出得起价，而国内没有这样的藏家群体构成的实力，所以当时都是想办法把这些古玩拿到英国、法国使馆，卖给大使和高官”，“大多数可移动文物，像瓷器、书画、玉器珠宝，基本都是购藏”。正如溥仪在他的自传中所记录的，除了1860年和1900年被掠夺的收藏品以外，大部分藏品仍保存在宫中，未被收编入册，无人知晓遗失的物品和数量，行窃也就变得很容易，“地安门新开出了许多间古董铺子，一些铺子据说是太监开的，其他则是内务府的官员或他们的亲戚开的”。

20世纪20年代，“皇家”开始成为英国收藏的最高品位，“宫廷来源”成了出现频率最高的宣传词。当中国的收藏书被翻译为英文后，这些指南上所记录的中国物品的等级制度和在中国艺术文献中所推广的“皇家”观念，就受到了英国的推崇。清帝国在政治上的灭亡，也让“皇家”成了对失落帝国的怀旧，一段不复存在的过去。大维德一开始就专门收藏这一类物品，他对藏品来源于宫廷的证据，比如铭文或皇帝款印，非常关注。如毕宗陶所说，“效仿某位（可能是乾隆）皇帝的收藏，是他构建收藏主题的主要关注点”，与收藏外销瓷或随葬品不同，“他收藏的整体性赋予了大维德新的个人身份。而他同时也在收藏中国——藏品来源地和曾经所属者的属性，比单件物品更加重要”。

1930年至1931年，大维德再访中国，与故宫官员一同工作，组织展览，为展馆的内容编写完整的目录清单。同时，他继续收购更多精美的器物。1932年，他还抽空访问了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宫。毕宗陶告诉我，很可能正是这次伊斯坦布尔的旅行启发了他对那对带铭文的元青花瓷对瓶的收藏——这对花瓶原来分属收藏家查尔斯·罗素和蒙斯多德·艾玛斯通。艾玛斯通将其中一只转让给大维德，另一只卖给了查尔斯·罗素。1935年，大维德在苏富比举办的查尔斯·罗素专场拍卖中购得另一只，两只重聚。早在1929年，霍蒲孙就提出，明代之前还存在元代的青花瓷，而两件铭文纪年为1351年的中国陶瓷可以为中国瓷器的断代奠定基础。刘越告诉我，“‘大维德对瓶’是元青花断代的标准器，这个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都没有。明清两代都不知元青花，乾隆皇帝内府收藏中即使无意间混入了元青花，也往往被当作明代作品，而从未加以特别重视。大概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元青花作为一个独立而重要的品种才逐渐在学术界普及起来，进而被中国人逐渐认识”。仔细端详这一对元青花瓷器，也许它的工艺并不是臻于完美的杰作，在审美上也不及宋瓷的质朴温润，但它被英国人视为元朝文化开放的积极产物。它恰好不像明清官窑瓷器那么制式，风格比较自由，有中东文化影响的印记。这也是另一个收藏元青花的欧洲大收藏家埃斯卡纳齐特别喜欢元青花的原因。

1937年，大维德出版了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汝窑评述》。这篇文章发表在陶瓷学会的会刊上，讨论了11~12世纪中国瓷器汝窑的中文文献，确定

汝窑为北宋御用瓷器。在这之前，对这种陶瓷有很多不确定的地方，几乎没有可供藏家收藏的器物。汝窑在1124年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即有记载，大维德基金会图书馆有这本古籍的影印本。在大维德的学术论文中，所有已知的汝窑均有文献记载，他所编写的文献列表的所有参考文献都是中国古文——从1918年买到一件刻有乾隆皇帝御题诗的定窑碗开始，为了读懂瓷器上的款识，他就开始自学中文了。汝窑窑址的准确位置要到1985年才被确定，大维德远远领先于他的那个时代。

收藏家的纪念碑

布鲁斯伯里的戈登街53号，大维德基金会的旧址，现在是伦敦大学的教学楼。它在一排楼转角的位置，一面对着街另一边的一片小型英式花园。搬入大英博物馆之前，大维德的瓷器收藏就陈列在这里。作为大维德基金会的前馆长，毕宗陶曾在这里工作过很长时间。她指给我们看，这栋楼的下面三层都曾是瓷器展厅，一楼是晚期瓷器，二楼是早期瓷器，三楼是晚期瓷器，第一层还有一个小画廊，

四楼有一间为大维德夫妇准备的房间。大维德开始繁忙的收藏时，曾把自己的藏品存放在伦敦梅菲尔酒店的几个房间中，后来又转移到新开的多切斯特酒店的房间中，1939年转移到了他乡下的弗莱尔园。从1939年起，这些藏品被打包保存起来，大维德则开始了“二战”期间漫长的海外旅行。之后，当他的收藏来到布鲁斯伯里戈登广场53号时，他又与这些瓷器重聚了。这些藏品已不再属于他私人所有，而成了公众博物馆的一部分。但这里还不是大维德收藏的最终归宿。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维德在夏威夷珍珠港遭到袭击后抵达上海。他可能是为了萨松家族的生意（与飞机制造有关）出差，他自己则记录是“为战争出力”。他在中国被日本人拘留了9个月，其间健康状况恶化。被释放后，他开始了四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旅居生活。那时，他正忍受着肌萎缩侧索硬化症的折磨，在南非也是为了治疗疾病。也是在南非，他可能感到自己濒临死亡，对藏品未来的计划和安排也就紧迫起来。他在一封从美国写给伦敦大学副校长的信中写道：“从1942年底起我一直在南非，被一个医生换一个医生接手，直到最后一



正在观看明清瓷器的游客

位医生强烈要求我转到这间医院……我向伦敦大学捐赠事宜的时间因素变得紧要起来。我的观点是我的收藏品和藏书应该被独立安置在一个独立的单元中……这个单元也许日后可以扩大成为一间展示和研究所有远东艺术形式和考古的机构。”

1948年，伦敦大学仍处于战后恢复阶段，为大维德的藏品准备独立的空间是很奢侈的行为，但最后还是找到了这栋原本是女学生和女工校外宿舍楼的19世纪建筑，由大维德出资整修成一个博物馆。1952年6月，英国社会众多名流参加了开幕式，其中包括英国皇室成员。新中国与西欧官方的联系切断了，英国既没有中国大使馆，也没有政府的任何代表，所以没有中国人参加。展厅陈列着大维德基金会的1700件藏品，以及有关中国和远东艺术的8000多本中外文图书。它的内部看上去更像私人住所的风格，灰色的墙面、粉色天花板和高度抛光的镶木地板。基金会一周开放六天，开放的第一年，博物馆的参观者有2000多名。中国艺术品投资顾问钱诚告诉我，在他读书的时候，他常去那栋楼，“楼下有个图书馆，我会在楼下查资料和学习，感觉很冷清，那栋楼可能一天100个人都没有。人们那时还不清楚这些东西的价值。现在想，你在一个不起眼的房子里，周围放的全是汝窑、官窑瓷器，是不是不可思议？”

现在大维德的收藏以永久借展的形式放到了大英博物馆，大概每年有35000多名参观者。钱诚说：“这些器物终于找到了最终的归宿。大英博物馆这样的平台，更能显示出大维德收藏的重要性。”

毕宗陶告诉我，从戈登街53号迁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伦敦大学无力再将这个博物馆运营下去。“1947年印度独立，大维德在印度的公司也不复存在。他那个时候已不再富有，所以在捐赠的安排中，并没有设立维持基金会运营的后续款项。伦敦大学和亚非学院每年为博物馆的运营支付沉重的开支，最终无以为继。”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进行可持续收藏的购买基金。大维德担心，如果没有新的藏品，基金会的收藏将停滞在目前状态中，学者和公众将逐渐失去兴趣，收藏面临着成为化石的可能性。他认为大学应该推进大维德的知识藏品，比如他曾要求学校购入一些拍卖会的拍品，“它们将提供缺失的论证链，从而推断许多藏品的年代”。但学校没有钱。大维德的藏品也一度面临着流散的可

能性，但最终一些收藏家通过捐赠，让它们完好保存下来。最终，在何鸿卿爵士（Sir Joseph Edward Hotung）的资助和协调下，大英博物馆接手了这批旷世珍藏，大英博物馆在2009年成了这些器物的新家。

沃尔特·本雅明曾在“拱廊计划”里写道：“也许可以这样描述一个收藏者最深藏的动机：与流散进行斗争。”大维德和他同时代的收藏家，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在他之前的传统收藏家大都并非如此，出售藏品是自然而然的事。比如同为东方陶瓷学会会员的阿尔弗雷德·克拉克，就是传统的收藏家，他最直接的需求是要用瓷器装饰屋子，建立一个适合室内装饰的收藏。毕宗陶在她的书中描述，“收藏的青花瓷摆放在家中古老的玻璃门书柜里，楼上的一间屋子用沿墙的展示柜来存放宋瓷，在客厅里有一些较晚些时期的瓷器”。这种收藏从包含大量宋瓷的角度，是“现代的”；但这些瓷器仍然是在柜子中作为室内陈设的一部分来展示的。克拉克1950年逝世，之后他的夫人出售完了藏品，这批藏品也就不再保持完整，分散四处，只能通过出版物来回忆。

而当大维德一开始在酒店房间里集中展示收藏时，这些物件就不再被使用了；当他为这些藏品找到大学博物馆的归宿时，他期待的是艺术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能推进他所建立的知识体系和收藏的学术价值。也正因如此，20世纪初的大藏家们大多选择把他们的藏品捐赠给博物馆作为最终归宿。他们渴望向公众展示藏品，并因此感到快乐。在1921年建立的东方陶瓷协会里，会员中的博物馆专家、交易商都鼓励会员们更大范围地展示藏品，藏家、交易商和博物馆专家经常在一起交际、研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博物馆清楚谁真正的大藏家，谁是潜在的捐赠者；也正是这一批大藏家一生的收藏和捐赠，构成了大英博物馆复杂多变的起源的一部分。

毕宗陶在她的《中国陶瓷在英国》一书中写道，“二战”后东方陶瓷学会培养的藏家捐赠的动机，虽然与18~19世纪的收藏家一样，反映了受到启蒙的维多利亚式理想，含有渴望永恒的愿望，但却显示出一种新维度，“学会的藏家们在捐赠之前已经同博物馆发展了密切的联系，捐赠便不可避免地成为一段收藏生涯的终点”。大维德是通过德高望重的收藏家引荐给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在结识了博物馆的专家后，大维德很快捐赠了三件中国瓷

器，之后又邀请博物馆的人去观赏他在帕特尼山的瓷器收藏，并不断向博物馆赠予他的藏品。那个时候，在没有正式引荐的情况下要直接接触博物馆，基本不太可能。20世纪20年代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大英博物馆都不对外开放，藏家必须通过捐款和捐赠物品来培养关系，以获得博物馆提供的信息。大维德明显也把博物馆作为信息和研究的渠道，比如要求博物馆翻译他器物上的“款识”。

而今天，大维德这样的大收藏家和博物馆捐赠者已不再成群出现。一位收藏圈的人士告诉我，今天，几乎不再有英国收藏家会把自己的藏品全部捐给公立博物馆。就拿中国藏品来说，“市场这么好，如何说服子女同意？苏富比两年前拍卖过一个收藏，拍卖之前在剑桥大学的菲茨威廉博物馆展览了一段时间，目的是通过这个展览，可以减少遗产税。现在英国藏家的藏品，主要还是留给下一代或卖掉。大英博物馆接受藏品的标准也很高，必须是很有财力的、很有高度的大藏家的藏品，他们才可能收”。大维德财力雄厚，眼光独到，又身处一个动乱不安的年代，他所经历的是一个不可复制的收藏时代。

在1934年霍蒲孙所著的那本《大维德所藏中国陶瓷图录》前言里，大维德写道：“明高濂《遵生

八笺》论官、哥窑器，其结语云‘后此不知凋谢如何，故余每得一睹，心目爽朗，神魂为之飞动……更仿后人闻有是名而不得见是物也’慨，夫余于高氏此论辄有同慨，爰节取其言以弁吾书之首。”他亲自编写了这本书的每一条藏品说明，以使“物”与“名”互不离散，让不断随岁月尘封而模糊的历史记忆不至消散。与这些器物内在于近乎永恒的地质时间相比，人的生命短暂。每一代藏家不过是这些器物的临时保管者，以使其存续和流传下去。而博物馆，就是为这些收藏家所立的一座纪念碑。■

（本文写作参考了所专访的毕宗陶女士的两本书：《中国陶瓷在英国（1560～1960）：藏家、藏品与博物馆》，赵亚静译，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版；以及《从物到概念：对明瓷的消费与变形》（*From Object to Concept: Global Consump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Ming Porcelain*），香港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本文写作还参考了：Reginald Krahl & Jessica Harrison Hall：《中国陶瓷：斐西瓦尔·大维德爵士的重要收藏》（*Chinese Ceramics: Highlights of the Sir Percival David Collection*），大英博物馆出版社，2017年版。感谢傅婷婷整理刘越、钱诚的采访录音。）

古典画风穿越现代美学的雅趣

王赫 绘

生活历

【接受团购及广告定制，详情致电：010-846 81051】

《三联生活周刊》
天猫旗舰店

《三联生活周刊》
微信书店

好奇心回归：大英博物馆游记

主笔 / 陈赛



启蒙馆，最初用于收藏国王乔治三世的7万册私人藏书与硬币、印章，2003年重修后推出了一项新的长期展览——“启蒙运动：探索18世纪的世界”



“物”所能提供的最宝贵的知识，是如何观看。

好奇心的回归？

在大英博物馆的书店里看到一本小开本的《彼得兔的故事》，翻开一看，竟然是用古埃及象形文字写的，不禁哑然失笑。

在大英博物馆里待了几天，对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已经颇为熟悉，虽然弯弯曲曲的线条勾勒的仍然是一个个奇奇怪怪的符号，偶尔也会有一些一眼就能辨认的图案，比如一个人、一只鸟、一条蛇，或者一只兔子……

更有趣的是，这本小书没有英文原文，这意味着你必须大动干戈，去找到一本原版的英文书，再对照着英文自己翻译出来。

这就是好奇心被撩拨起来时的滋味——对于一种陌生、遥远的东西，突然产生一种奇妙的亲密感，仿佛似曾相识，仿佛一段历史突然爬过你的指尖。于是，你想知道更多：这是什么？它从哪里来？它为什么会在这里？

在大英博物馆里，我经历过许多次类似的撩拨。比如在古埃及馆看到一只小小的鳄鱼木乃伊，无论从时间或者空间，无论从文化还是仪式，它对于我都如此陌生，但看到这样一种如此强悍的物种，却以如此幼小、脆弱的姿态留存了数千年，摆脱了死，也否定了生，让我感到一阵奇异的物伤其类的悲伤。

穿过透着冰冷的死亡气息的木乃伊馆，突然进入一个铺满了墓室壁画的房间（内巴芒墓室），其中一幅描述男主人在池边狩猎，花鸟虫鱼，猫扑蝴蝶，小女儿在河边戏鱼。画面罕见的明亮、生动，充满了生的欢愉与温暖，而无半点腐朽之气。

在中世纪馆看到玻璃柜里的刘易斯棋子，骑士狂咬盾牌，教皇老谋深算，国王志得意满，王后则一脸无聊到死、生无可恋的样子，这是一个中世纪贵族们玩的战争游戏，但无名的雕刻家给这些棋子注入了如此丰富的人性幽默感，仿佛它们自成一个戏剧舞台。一切都在那里：权力、性别、政治、



宗教、美、恐惧。你忍不住怀疑，到了夜深人静时，它们之间是否会上演一场荒诞的战争剧？

在阴暗的墨西哥馆，一片蛮荒气息之中，一个石头台阶上，一条盘绕的石蛇和两个蹲坐的人形石像，一尊是爱与艺术之神，一尊却是死神，茫然地望着远方。

在罗马馆，一位馆员老太太给我看一枚小小的薄薄的硬币，上面是一位罗马国王的头像，她告诉我，那是哈良德大帝，是罗马国王中第一个蓄胡子的皇帝。

第一次进入大维德瓷器馆，看到满屋美丽的瓷器，在昏暗的灯光下，仿佛发着光。作为中国人，瓷器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器物，但这些瓷器太过美丽，美得近乎抽象，近乎神秘，反而显得陌生。我听到一位英国老太太在一旁喃喃自语：“这些中国人，他们如此爱这些美丽的东西。”

在古代欧洲馆，有一块鹅卵石，被雕刻成一对情侣对坐相拥的姿态，脸上没有五官，也许本来就没有，也许是已经被时间磨损掉了，但他们的胳膊和腿都紧紧地缠绕着对方，没有丝毫缝隙。更不可思议之处在于，从不同的角度看过去，石雕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形象：从侧面看是一个两人拥抱的远景，仰视像一根阴茎，俯视则像阴道。这个雕像被简单的命名为“情人”（Lover），正对着的是一个古老的磨具，代表欧洲农业时代的到来，而不远处则是一具当时出土的完整的人类骸骨，孤孤单单地躺在棺木之中，让人想到“食色性也”“红粉骷髅”。

可是，为什么？古埃及人为什么要把一个小鳄鱼做成木乃伊？他们希望向神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墓室的主人是谁？他在世间的真实人生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中世纪的象棋棋子有着如此呆萌的表情？为什么阿兹特克人的死神以这样茫然的目光凝



左图：刘易斯西洋棋，约于公元1150~1200年制作于挪威，在苏格兰的外赫布里底群岛中的路易斯岛被发现，棋子由海象牙和鲸鱼齿精心制作而成，是大英博物馆最受欢迎的文物之一

右图：大英博物馆前任馆长尼尔·麦格雷戈，他也是“百物展”的主策划

视远方？那位罗马国王为什么要蓄胡子？中国人为什么执着于制造这些美丽的瓷器？那块一万多年前的小石雕，代表的只是性，还是爱的表达？最初雕刻这块鹅卵石的人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情制造了这样一个图像？人类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表达爱情的？

我发现自己频繁地伸出手指，隔着玻璃柜，无意识地指向那些玻璃柜背后的东西，仿佛在这样的动作中能得到某种答案。

“指”通常是一个小孩子才有的动作，尤其是在学会说话之前。当他/她想得到某个东西，或者想了解某个陌生的东西时，就伸出手指，挑起眉毛，望向身边的大人，意思是，“那是什么？”

好吧，我的心智恢复到了幼儿状态，身边却没有一个大人可以解答我的疑问。

后来，在采访剑桥大学考古系教授托马斯·尼古拉斯(Thomas Nicholas)时，他告诉我，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今天博物馆存在的目的不是给你答案，而给将你引向问题。

在《好奇心的回归：21世纪博物馆的复兴》(*The return of curiosity: what museums are good for in 21 century*)中，这位教授提出，博物馆在我们这个时代最根本的存在价值在于鼓励一种“好奇心”——对于那些新的、不熟悉的事物的渴望，

对于差异的开放性，以及一种悬置判断的意愿。

他认为，对于新奇的事物、经验或者境况的兴趣，深植于人性深处。人类之所以有能力进入并真正主导许多环境，不仅生存下来，而且繁荣昌盛，都是拜好奇心所赐——“如果我们从来不想吃点什么新东西，尝试点新技术，或者对陌生的远方心怀向往，你能想象，人类历史上的一切变化，农业的实验、技术的革新，或者旅行、跨文化贸易是如何可能的吗？”

事实上，大英博物馆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人类的好奇心之上的。

启蒙馆：在一座建筑里思考整个世界

踏入大英博物馆的大厅，你会发现脚下镌刻着这样一行大字：

And let thy feet
Millenniums hence

be set in the midst of knowledge

这是英国诗人丁尼生的诗句，意思是“让你的双脚，在此后的千百年里，都站在知识中间”。

这首诗里令我有一种隐隐的不安：即便再多的好奇，以有限的智力与生命，渴求千年的知识，岂



荷兰裔英国画家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1836~1912）作品，表现了亚历山大逝世后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

（视觉中国供图）

非虚妄？

大英博物馆创立于1757年。那是一个与今天很不一样的世界——距离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已经过去两个世纪，而距离达尔文发现人类和猿类有共同的祖先还有100年。启蒙之光渐渐照亮世界，但世界仍然布满未解之谜。地球到底有多古老？人类的历史始于何时，始于何处？人类最早的语言是什么？是神的启示，还是人的发明？

作为启蒙时代诞生的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经常被拿来与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对比。概念为先的法国人写了一套书（1751~1776，35卷），而经验主义的英国人搜集物，并将它们置于一个建筑之内。更重要的差异是，狄德罗被扔进了监狱，《百科全书》被禁，而英国议会建立了大英博物馆，支持对过去之物、对异域文化的智性探寻，以理解地球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从而重新认识当下的世界。

大英博物馆的前馆长尼尔·麦格雷戈（Neil Macgregor）在谈到这段历史时曾经指出，英国人的这一决定背后显然带着启蒙时代独特的理想——知识与理解是公民社会不可或缺的元素，是狭隘与偏执的解毒剂。对不同社会与宗教的研究，能促成宽容与理解，“就像格列佛归来，知道了这个世界的组

织方法不止一种”。

同时，他也提到这一决定背后还有很实用主义的考虑。18世纪中期的伦敦正处在一个很特别的历史阶段——因为航运的发展，这座城市正史无前例地处在同时可以与全世界做交易的状态。要跟全世界做交易，就必须先了解全世界。当时的伦敦没有大学。牛津和剑桥太过强势，阻挡了任何在伦敦建一所大学的企图，所以他们建造了一座博物馆——“你可以从全世界搜藏东西，比较它们，在一座建筑里思考整个世界。”

“思考整个世界”意味着什么？

尼古拉斯教授建议我去大英博物馆的启蒙馆（Enlightenment Gallery）绕一圈。

“看，看，再看，”他说，“这是参观博物馆唯一正确的方式。”

启蒙馆位于大英博物馆大中庭的中央位置，又称“国王图书馆”，曾经用于收藏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7万多册私人藏书以及大量的硬币、印章。1998年这些书被移至英国国家图书馆之后，这个图书馆就空了出来。2003年经过重新装修，变成了一个以启蒙为主题的展览馆。

这是一座巨大的圆拱形建筑，其古希腊复兴式建筑风格被认为是启蒙理想的一种视觉表达——古

希腊的艺术代表了当时欧洲人对美的理想，也是古希腊人向当时的欧洲人展示了如何质疑既定的观点与权威。

一张卡片上这样解释道，所谓“启蒙”特指一个“理性、发现与学习的时代”（1680年到1820年之间），彻底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经过启蒙的男人与女人相信，揭开过去与宇宙之谜的钥匙，在于对自然世界与人造世界的直接观察与研究。他们狂热地收藏化石、火石、希腊花瓶、古代文字，进行编目、分类、对比，是为了给它们重新赋予秩序。”

启蒙馆的入口处是一块罗赛塔石碑，这是一块橡胶材质的仿制品，真正的罗赛塔石碑位于不远处的古埃及雕塑馆里，封锁在一个巨大的玻璃柜里，在古埃及的石狮、法老、众神的簇拥中，被世界各地的人们膜拜着。

导员说，启蒙馆的这块仿制石碑每隔几年就要换一块，因为每天被来往游客们摸来摸去，没多久文字都被抹平了。我仔细看这块石碑，果然已经磨损得颇为严重，尤其是几个被椭圆圈出来的图案。

这些椭圆圈据说是揭秘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关键之一——英国学者托马斯·杨（Thomas Young）第一个意识到，被这些圆圈圈住的很可能是法老的名字（也许古埃及人深信名字是有魔力的，外面加个圈可以起到保护的功效），也就是“托勒密五世”。这就是最早被破译出来的古埃及象形文字。

罗赛塔石碑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时间机器。托勒密王朝时期刻下的一段枯燥的税收法律条文，因为同时以三种语言书写，其中一种语言是拿破仑时代的人们十分熟悉的语言（古希腊语），而另外一种语言是已经失传了上千年的古埃及象形文字，从而拯救了整个古埃及文明的文化记忆。

资讯：为什么罗赛塔石碑是用三种文字写成的？

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在他死后，他的大将托勒密一世统治埃及，之后他的后人一直统治了埃及300年。

托勒密不愿意学埃及语，就命令所有的埃及官员都使用希腊语。于是，在长达1000年的时间里，希腊语一直是埃及的官方语言。（事实上，在托勒密王朝300年的历史中，埃及艳后是第一个学会埃及语的统治者。）

还有另外两种语言，都是古埃及语的两

种形式，一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通俗文字，另一种是祭司使用的象形文字。在罗赛塔石碑制作的时期，象形文字的使用已经大幅减少，只有神庙里的祭司才会用。500年后，再也没有人能阅读这种文字。

在此后2000多年里，继希腊人之后，罗马人、拜占庭人、波斯人、阿拉伯穆斯林以及奥斯曼土耳其人都曾经统治过埃及。

罗赛塔石碑之于大英博物馆，大概就像蒙娜丽莎之于卢浮宫。它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一门语言，甚至古埃及文化本身，而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对于过去的好奇心，以及理解过去的种种企图与努力。

我曾经问过一位历史学家，人为什么会过去的东西感兴趣呢？

他的答案是：“今天的我们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部分的答案要从过去寻找。”

澳洲原住民相信，这个世界是要通过“做梦”来维系的——包括日月星辰、山川河流以及动植物。故事、歌曲、绘画、舞蹈都是做梦的一部分，都是在讲述它们过去的记忆。他们相信，一旦梦停止了，所有这些东西、包括植物、动物甚至夜空，都会死亡。

对现代人而言，博物馆是存放“过去”的地方。以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历史与文化范围之广，几乎涉及了整个人类的“过去”。而我们千里迢迢从四面八方来到大英博物馆，大概就是觉得这里隐藏着某些线索，能帮助我们在今天的茫茫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吧。

启蒙馆大概是整个博物馆里最安静的所在。古老的地板踩上去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特别响，所以经过这里的游客都不自觉地有点踮着脚尖走路。你还会注意到，午后的光线从二层巨大的窗户照进来，落在一排排的玻璃柜上，光线的重重折射有时候会让人的视线迷失，不知道往哪里看才好。

在启蒙馆（事实上，在整个大英博物馆），这

我曾经问过一位历史学家，人为什么会过去的东西感兴趣呢？他的答案是：“今天的我们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部分的答案要从过去寻找。”



左图：在“安提凯希拉”沉船事故现场进行水下考古的考古学家

右图：埃及雕塑馆中的几尊赛克迈特雕塑，赛克迈特是古埃及神话里的战争女神

种失焦的感觉都一直如影随形，因为收藏规模实在太太——一排一排的玻璃陈列柜仿佛没有尽头，里面陈列着书本、雕塑、植物、昆虫、矿物、化石、硬币、印章、钟表、显微镜、美索不达米亚的写字板、埃及的木乃伊、古希腊陶罐、罗马墓碑、中国瓷器、印度佛像、非洲象牙、美洲面具、中美洲的花盆和祭坛……

这些陈列柜有个专业名词叫“好奇橱柜”（curiosity cabinets），是那个时代的英国绅士们图书馆里的标配，是财富、品位、文化以及隐秘的癖好的象征，相当于现代人的自拍照。

其实，200多年来，大英博物馆在体积上虽然一直在扩大，但就其智力野心而言却一直在缩小。1824年，博物馆的绘画收藏转移到英国国家美术馆；1880年，岩石、矿物、化石以及动植物标本等

自然科学藏品转移到位于肯辛顿的自然历史博物馆；1973年，大英图书馆从大英博物馆中独立出去，馆内所有的藏书转移到大英图书馆。

今天的大英博物馆，只剩下了800多万件文物。虽然以这些文物涵盖的历史时空范围之广，仍然一定程度上保留着“百科全书”的气质。但只有在启蒙馆，你才能感受到这个博物馆最初的智力野心——所谓“思考整个世界”是字面意义上的，人类的、自然的、超自然的，都聚集在一个屋顶之下。

一张解说卡片上这样写着：“在那个时代，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应该吸收一切人类的知识。那是一个博物的时代。哲学与科学无法离开神学。男人，以及越来越多的女人，并非专于一职，而是集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于一身。”

在现代人看来，接受知识的限制本身是对待知识最基本的态度与常识。但当时的英国知识精英，比如大英博物馆实际上的创立者汉斯·斯隆（Hans Sloane），他真的相信可以为世间一切东西取样，然后一一分类、对比，梳理万物的秩序与结构。当然，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一切的智性求索都是为了理解造物主的意旨。

他曾经热衷于收藏世界各地的鞋子，以对比不同文化的服饰与日常生活的差异。启蒙馆的一个柜子里仍然能看到他当年收藏的一些样品，包括日本的丝绸拖鞋、比利牛斯山脉的草鞋、印度的彩木鞋、摩洛哥的羽毛鞋，甚至包括一双用人皮制造的鞋子……

当时的大英帝国在全球的军事和贸易力量登峰造极，随着新航线、新大陆的开拓，商人、探险家和外交官源源不断地将这些“自然与人造的curiosities”带回伦敦，以满足当时英国人近乎贪婪的好奇心。

这些好奇心，经过各种整理、分类、对比以及实验，一部分促成了现代自然科学分支的发展，比如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等，另一部分则衍生出了考古学、钱币学、文字学、民族志、艺术史等新人文学科。在启蒙馆里随便转转，约翰·雷、詹姆士·赫登、玛丽·安宁、约翰·温克尔曼、理查德·佩恩·奈特等人的名字、收藏、塑像时常会冒出来，提醒我们当年这些学科的开创性人物与大英博物馆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

我印象最深的，是玛丽·安宁发现的鱼龙头骨（侏罗纪早期的海生爬行动物）。静静地躺在一个装

满了贝壳、海螺化石的玻璃柜里。隔着昏暗的玻璃，几乎看不出来是一个曾经有过生命的动物头骨，更像是一段朽木，带着洪荒深处的平静与漠然。玛丽·安宁自幼家贫，在父母死后靠挖化石供养自己与家人，不料在发掘中显示出了对这份工作的惊人天分，而后成为一名出众的古生物学家。她发现这块鱼龙化石的时候才12岁。

玛丽·安宁（1799～1846年）是一位英国早期的化石收集者与古生物学家。她曾有过三次重大的发现，1811年发现了史上第一具完整的鱼龙化石；在1821年，玛丽·安宁发现了史上第一具蛇颈龙亚目的化石；1828年，玛丽·安宁发现了双型齿翼龙化石，也被认为是第一个完整的翼龙化石。是她发现生物会灭绝的关键证据。

那个时代的人们多少相信《圣经》的说法——世界的历史始于公元前4004年，但玛丽·安宁发现的化石让人们开始怀疑，大洪水之前地球上也许生存过一些没有拿到挪亚方舟船票的动物，而地球之古老也许超乎人们的想象。

这些化石为“深层时间”（Deep Time）提供了最初的证据。英国生物学家斯蒂芬·琼斯教授在解释这个概念时说：“启蒙运动以来，最大的转变就体现在人们对时间的态度上。我们认识到，时间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无论是已过去的还是未曾到来的。我们应该记住，在深层时间的语境里，珠穆朗玛峰在不久之前还位于海底，因为一些最为完好的鲸化石便是在喜马拉雅山上发现的。”

在伦敦的时候，我专程去过一趟位于南肯辛顿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其中一个关于“人类进化史”的展馆完整记录了人类在地球上200万年的时光。那是一个由各种古人类骸骨组成的展览，而其中最让我震动的是一个孩子小小的头颅，大概不超过三四岁，眼眶处有一处触目惊心的裂痕，解说上说可能是被鹰袭击过。

那个受伤的小小颅骨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回国以后，我还时常会想起非洲大草原上，那个人类小男孩在深层时间里无所依傍的脆弱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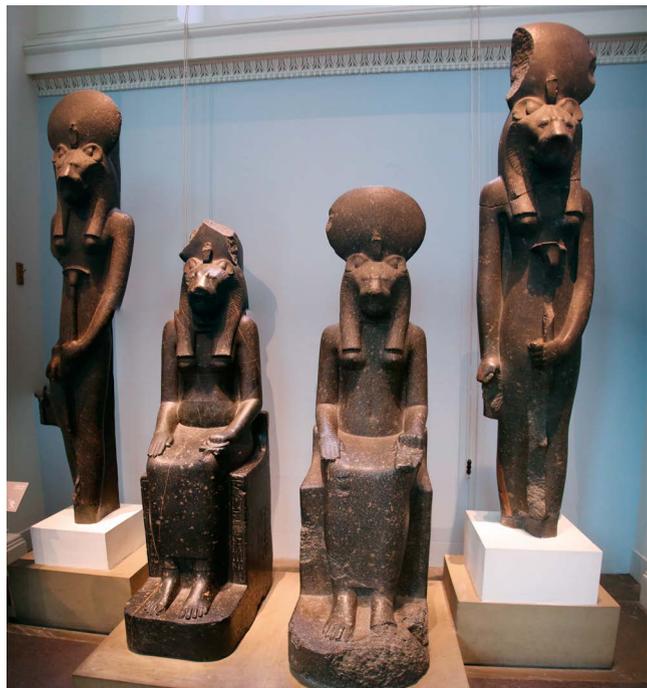
关于人之为人的本质，英国考古学家克莱夫·盖博（Clive Gamble）给出过一个很有趣的答案。他说，人之为人，就是包裹（wrapping）——无论是包裹

在衣物里、包裹在礼盒里、包裹在各种概念里：我是谁？什么是英国人？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世界公民？层层包裹的过程，就是关于我们的身份建立的过程。所以，人类的本质性特征，“就是以物、以思想、以关系包装、包含、包围自己”。

深层时间是没有包裹的时间，人类活动唯一能留下的物只是石头，或者自己的残骸。但在被包裹的时间里，人与物的关系是考察人类社会与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人创造了物，而物又在很大程度上“包裹”了人的生活，并在“包裹”中层层构建了意义。

从某种角度来说，博物馆是物的“避难所”。它们都失去了自己的世界，被聚集在一个本不属于它们的时空里。但它们身上仍然保留着曾经被使用过的印记，它们的取材、工艺、用途以及之后漫长时光里的各种辗转，被掩埋、被发掘、被收藏、被阐释、被分类，都为我们提供关于过去的线索，个人的兴趣及动机、社会的价值，以及那些生活中太过基础而无需书写下来的东西。于是，一个物的阐释可以有无数种可能，取决于阐释者的身份、目的、视角、立场、技术。

在大英博物馆建立之初，人们更期待的是从这



（视觉中国供图）

些物中寻求某种“连接”，或者说“统一性”，无论是在文明的进展过程中，还是在宗教的共性中。按照前馆长尼尔·麦格雷戈的说法，即使到今天，这仍然是大英博物馆最珍视的一种传统——“博物馆里的东西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跨越时间、空间和人，建立不同文明之间的理解。”

阿兹特克与玛雅的象形文字被摆在一起，被用于探寻拉丁文的起源；古希腊硬币上的文字被用于破解犍陀罗文（一种通用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4世纪的古印度文）。学者们对比来自不同宗教的神，试图从中寻找某种共同起源的证据。在18世纪，不少学者认为埃及可能是世界上所有宗教的摇篮。大英博物馆的第一本指南上还特别指出了古埃及的神像与美洲的神像之间的相似处。



（视觉中国供图）

英国艺术家马克·奎恩

启蒙馆最蔚为壮观的一个玻璃柜里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神：美索不达米亚的神、古埃及的神、古希腊的神、古罗马的神、印度的神、中国的神、日本的神……

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神像背后，其实指向一种共同对于世界、对于存在的好奇与不解。就像天文学家卡尔·萨根在《宇宙》中所写的：“我们的先人热切地渴望理解这个世界，但苦于没有偶然发现合适的方法，于是他们想象了一个很小的、奇怪又整洁的宇宙，其中的主要力量来自各式各样的神，如安努神、埃亚神、沙玛什……”

有一些神我已经能辨认出来，比如那个头上顶着太阳光盘的狮头女神，是古埃及神话里的战争女神赛克迈特（the mighty one）。她是太阳神“拉”的女儿，传说中是她的呼吸创造了沙漠。她曾经因为与人类共谋反叛父亲而导致人类的灭顶之灾。她与毁灭和瘟疫有关，但又有治愈之力。

世界各地的神话里似乎都有这样集创造与毁灭于一身的的神。比如湿婆，印度教里的三大主神之一，既负责创造，又热衷毁灭。他是妖魔鬼怪的统帅，也是舞蹈之神，他的舞蹈象征着宇宙的永恒运动，但在一个时代结束时，他通过跳坦达瓦之舞完成世界的毁灭并使之合并到世界精神之中。欧洲高能粒子中心摆着一个湿婆坦达瓦之舞的青铜雕塑，是否暗示着科学在这个时代某种与神相似的角色？

自启蒙时代以来，科学看似全面接管了关于这个世界的解释权，但神灵并没有真正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过。事实上，这段时间，大英博物馆正在办一个“与神同在”的展览。一个小小的狮头人雕像（Lion Man）是这场展览的主角。这个雕像是4万年前冰河时代的东西，狮子的头、人的身体，由猛犸象的象牙雕刻而成。猛犸象是当时最庞大的动物，狮子则是当时最凶猛的动物。它的脸上挂着一抹神秘的微笑，看上去很强大，很自信，但又处在一种警觉的状态，踮着脚尖，仿佛在倾听，在凝视。策展人说，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关于宗教信仰最古老的证据。

4万多年前，恰恰是人类文化上一次惊人的认知变革发生的年代。考古学证据显示，那段时间的智人在日常用具上显示了一种明显的时间组织上的变化：工具在使用之前就已经造好，住宿的空间设置显示主人有了长住久安的意思。当然，食物和庇护所都是生存所需，提前安顿好也算理所当然，

但还有一些更奇怪的现象：洞穴壁画、工具的多样化与风格化，身体饰物的制造以及新的墓葬仪式。考古学家认为这些壁画和墓葬起到了一种类似于“物理道具”的功能，以召唤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想象世界。

考古学家还告诉我们，“与数百万年的进化相比，想象力只是最后一分钟的飞越，但它对于人类历史与文化的影响之大却无可估量”。

但是，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想象力呢？冰河时代，苦寒之地，连温饱生存都是奢求，为什么会有人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在一块猛犸象牙上刻下一个并不存在的狮头人的形象？“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知道它是谁，或者是什么，但一定是有无数人不断用手抚摸过它，它的躯体才会变得如此光滑。”

即使对它一无所知，但仅仅看着这个雕像，仍然会让人产生一种奇异的平静感。狮头人那穿越了4万年时光的微笑似乎带着一种笃定的确信，确信自己会被发现，确信自己的故事会被无尽地讲下去。

英国艺术家马克·奎恩在谈文物与艺术品的区别时曾说：“文物是历史性的，它来自过去，并停留在过去的时间里。而艺术品则是当下的，它也许来自过去，但随着时光流动，永恒地处在当下。”

按照这个标准，这个狮头人雕像显然是一个艺术品，一个情感的时光机器——一个人创造了一个东西，仍然能够直接与4万年以后的人对话，仍然能够抚慰4万年以后的人心。

有一瞬间，我甚至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伸出手去，将这个小小的狮头人握在手里，感受汹涌的时光在手心倒流，带我回到4万年前那个黑森林的篝火旁，听一听它的故事。

按照康德的说法，启蒙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选择，是一个人勇敢地使用理性，去解释和理解周围的世界。但是，如今我们再次面对博物馆里的这些物，仅仅知识与理性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古老的想象力。事实上，真正让我们与那些冰河时代的人类连接起来的，不是知识，而是想象：我们都在创造一个想象的世界，并生活其中。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博物馆，其实是一个关于过去的想象的世界。这里所有的物都有赖于我们的想象才能变得真实。

尼古拉斯教授在那本《好奇心的回归：21世纪博物馆的复兴》中一直在强调现代博物馆应该鼓励这样的观看与想象。他提到格里森·佩里（Grayson

与数百万年的进化相比，想象力只是最后一分钟的飞越，但它对于人类历史与文化的影响之大却无可估量。

Perry），英国新生代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曾经在大英博物馆组织过一场特展“无名工匠的墓地”（The Tomb of the Unknown Craftsman）。

这位艺术家从大英博物馆的800多万馆藏中挑选了一批与他自己的风格与题材产生共鸣的手工艺品，包括25万年前的石器刀具、爪哇的蜡染、埃及雕像、日本的神龛等，并将这些来自不同时代、来自无名艺人之手的文物与自己的作品混在一起。隔着数千百年的时光，那些古老的工艺品竟然仍能赶上当代视觉文化的演变，令人难以分辨哪些是馆藏，而哪些出自佩里自己之手。

那可能是大英博物馆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展览之一。《卫报》当年的评价是：“不仅佩里的作品像一个迷路的孩子重归家园，而透过他的眼睛，过去以一种光彩照人的方式再度复活。”

文本与物，各说一半

2010年，大英博物馆与BBC合作推出一档广播节目，从大英博物馆收藏的800万个文物中选择100个，叙述人类200万年的历史。这个节目后来不仅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巡展，还被出版成了一本书《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包括中文。在英国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在抱着这本书啃。

逛博物馆是一件很累的事情。常常走上两三个小时就觉得腿脚发软，头脑发昏，可能是大脑因无法消耗太多的知识而制造的罢工行为。但阅读这本书却是一种绝对的愉悦。至少我从未想过，原来物可以提供这样有趣的看待历史的视角：

一把6000年前的玉斧，记载了人类对于远方最初的迷恋——后世的研究发现，当时制造这把玉斧的人，明明山脚下就有同样的玉石块，却选择爬到2000米高的山巅去采集一块同样质地的石头。

日本浮世绘画家葛饰北斋的《神奈川冲浪里》中那种充满“日本风情”的蓝色原来是一种18世纪

早期在德国合成的染料。一种代表了日本在18世纪遗世独立的姿态的色彩，恰恰是这个国家从欧洲汲取所需之物的象征。

一套小小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茶具背后，隐藏着19世纪的英国作为一个帝国大规模生产和大量消费的情况，隐藏着对工人阶层的驯服，对各大洲农业的重塑、数百万人的流动，以及全球航海业的发展。

阅读的快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物与文本、科学与想象的配合——物提供问题，而文本提供背景；科学提供解释，想象则提供某种诗意的连接空间……

就像往水中投下一块石头，在考古学、人类学、材料学、生物学等各种现代学科的帮助下，隐藏在这些物件背后广阔复杂的历史经纬，如权力、战争、宗教……一一呈现出来。

穿过物的层层面纱，我们看到，如此异质的文化背后，人性的共通之处如此之多。这些来自过去的、遥远异域的人，与我们一样，有着生的欢愉，死的恐惧，失去的悲伤，同样为万物的意义而困惑。

正如作者尼尔·麦格雷戈所说，过去几千年来，我们主要是通过文献解读历史，“关于如何评判文献，我们有好几百年的经验可供借鉴。关于如何判断文字材料的坦白、失真与诡计”。而文物的价值一直以来是被忽视的。即使到今天，如果没有文本的支持，历史学家对于使用文物，包括图画、雕塑、陶罐作为历史证据仍然保持高度警惕。

当然，物的问题在于，它们的信息量很少。如果不了解古埃及的一些基本历史与事实，就不可能在凝视拉美西斯二世的目光时，感受到其中的力量、不朽以及最终的荒芜。

如果不了解古巴比伦人的智慧，你看着亚述馆里那些鹰翅狮身兽，会觉得是很陌生很遥远的存在，与现代世界毫无关系。（古巴比伦人发明了轮子、60进制以及星象）

如果不了解罗赛塔石碑辗转的命运，你不会理解这个大英博物馆里看似最平淡无趣的文物为什么如此重要，以及它是一个多么幸运的意外。它曾经只是摆在古埃及某座神庙里的一个石碑，刻着你能想象到的世上最无聊的税收法令，然后王朝变更，神庙被毁，石碑沦为建筑材料。直到1000多年之后，拿破仑出兵埃及（1799年），几个法国士兵在重修古堡时发现了这块残缺的石碑。是什么让它幸存了千年？是什么让它被挖出来？又是什么让那个最初

发现它的士兵心中一动，停下来朝这块貌似平凡无奇的石碑多看一眼，做出这样的判断——“这块石头可能挺重要的。”而那些当初建造罗赛塔石碑的人，谁又能想到，2000年后，这样一个无趣的石碑会成为解读古埃及文化的唯一工具？正如大英博物馆的策展人理查德·帕金森所说：“如果一块石碑，在各种战火与争夺之中，最终成为一种理解与同情的象征，说明人类历史并没有那么令人绝望。”

但是，确实有一些历史，有一些故事，只有物能够讲述，比如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或者失败者的故事。毕竟，书写的发明不过6000年。在大英博物馆，你能看到人类最古老的书写系统——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刻在一块块黏土板上，沉闷、破旧、歪歪斜斜的，像烤坏了的饼干。

大英博物馆号称有13万块这样的黏土板，覆盖中东古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商业、法律、医学到诗歌、情书、文学，包括那首人类最早的英雄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当初刻下文字的人早已死去数千年，但这些文字却随着这些泥板经历岁月的侵蚀而一直留存下来。

但是，书写的发明并没有提高我们的记忆力，它真正给予我们的，是遗忘的能力。我们不必再在个人的头脑中记录那些过去的记忆，而是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但文字的问题在于，它是可以编辑的，容易被操纵。

对此，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教授深有体会。罗森教授是牛津大学的考古学家、艺术史学家，多年潜心于商周青铜器与汉代墓葬的研究。在成为一名学者之前，她在在大英博物馆工作了20多年，曾经任东方古物部的主任。

我们去拜访她的时候，她的书房茶几的案头刚好摆了一本厚厚的商代青铜器的书。上面是一个奇特的神兽造型的青铜器。她告诉我们，多年来她如何在挖掘和挑选这些古物中培养了一种对“物”的本能，就像小提琴手对于琴弦的本能，“通过触摸一个东西，甚至不用看，我能告诉你它们是什么”。

她所研究的中国，青铜器时代的中国，很难想象其中具象的细节，因为文字记载太少。“明朝的生活是可以想象的，因为有小说，我们可以在小说里想象这些瓷器是怎么被使用的。”

但是，她相信从中国人日常生活最细微之物的观察入手，可以揭示出社会、文化与宗教的深刻变迁。比如，她说，在她的心目中，最能代表中国的物品



英国考古学家、汉学家杰西卡·罗森女爵士

是新石器时代煮饭用的陶罐。

“早在青铜器时代之前，你们的祖先已经用陶罐来煮饭，因为你们种的是稻谷，稻谷必须高温煮，而我们种的是大麦，大麦不需要煮，只要研磨，加一点水，烘焙就可以。所以，你们的食物是软的，而我们的食物是硬的。你们开发了湿的食物，而我们开发了干的食物。直到今天，在英国吃东西仍然是又干又硬，无论蔬菜肉类，都是如此。”

煮的传统可以解释很多关于中国的疑问。比如，西方人用青铜制造刀剑武器，而中国人却用青铜制造祭祀的容器（这个在技术上非常难，西方没有人做这个），为什么？

“这是因为你们对祖先的态度：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供奉祖先。早在青铜器时代之前，你们已经开发了非常复杂的仪式，为死去的人提供食物和美酒。”

罗森教授在史学研究上的独特视角，与在大英博物馆的工作经验有很大的关系。

大英博物馆丰富的古代文明馆藏，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古埃及、古希腊、中国，使她可以在不同的古文明之中进行比较，思考中国的特殊性。比如，每次她跟学生谈论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总是要提到海，提到船，提到动物。

“我对海有很多恐惧，同时又很敏感。因为它离我们很近，在我们的生活中很重要。我们有很多关于海洋的传说与童谣。”她说，“英国的天气变化很大，这都是因为海洋——风来自海洋。”

“我们的文明来自西亚，到希腊、罗马，然后由罗马帝国向北扩张。我们的整个古代文明基于地中海，地中海出土了成千上万的古沉船的残骸，而中国的海岸几乎没有沉船出土。”

“中国是一个内陆，百万人都远离大海。但我们跟海很近，离河流很近。从史前开始，我们就有船。与法国、德国相比，英国又比较穷。就像荷兰人、葡萄牙人，英国人之所以热衷于探险，是因为我们有海岸线，我们有好的造船技术，以及相对的

贫困——需要找到新的资源。”

“如果你研究为什么欧洲人到处迁移，是因为这三个主要国家不怎么富裕，是为了贸易的需求，而不是政府的意志。当然，这跟地理位置也有关系——我们在大西洋北部，比你们离美洲近得多，你们离哪里都很远，最近的是日本。同样的历史时期，你们跟日本、东南亚有贸易，而我们正在去非洲、美洲。”

“船的另一个特点是，你需要更平等，在船上不能有太严格的等级，你有一个船长，但每个人都需要帮忙，否则大家都会淹死。我们的整个政治系统都与此有关。”

“在船上，你还得思考迅速，行动迅速，不能总是等待命令……”

其实，即使从普通人的角度来说，西方人也比中国人移动性更强。因为“你们的农业是相对固定的，人被系于土地，土地就是生计。而我们则更动态，因为我们有动物。动物必须整天走来走去，冬天栖息山谷，夏天带着入山”。

“同样的土地要么用来种粮食，要么用来饲养动物，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因为没有那么丰盛的农业，我们的人口稠密度也与你们不可同日而语。你们有庞大的人口量，又导致了社会结构的不同。”

进入诗的世界，想象的世界

英国作家约翰·伯格在《观看之道》中说过，站在一幅名画面前，你感受到的最重要的是“寂静”。这种“寂静”就像一种桥梁，将画中的时光与你当下正在凝视的时光连接起来。

但埃及雕塑馆是一个人声鼎沸的地方，永远人头攒动，正襟危坐的法老、女神、动物神、圣甲虫……

我试图想象是谁雕刻了这些神？他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他如何看待日月星辰？他如何感受自然的节奏与力量？他如何理解生死的循环？

“古埃及人如何看世界，可能与沙漠有很大的关系。”剑桥大学古典学学者多萝西·汤姆森(Dorothy Thompson)告诉我们，“一旦你离开埃及，离开尼罗河河谷，两边都是巨大的沙漠，触目所及，全是沙子沙子沙子，这些巨大的雕像与那片风景是相衬的。他们建造这么庞大的东西，可能是一种与神连接的方式”。

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强烈的惊奇感和敬畏感，会让人们在身体上感觉自己比实际的要小。这大

概就是为什么古埃及的一切，包括金字塔、神庙、雕塑，都给人留下如此强烈的视觉印象——它以各种夸张的手段制造一种压倒性的、超越性的感官体验，以召唤一种对神的敬畏感。如今，即使是我，一个来自完全不同时空、不同文化的人，也能感受到其中召唤的力量。

从根本上来说，启蒙运动给予我们的，是一套科学的观看方法——通过系统的观察和分析得出某种理论，而该理论的真伪可以通过重复的实验加以验证或者推翻——这种方法逐渐改变了我们对于一切事物的看法。但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摘取了知识的结果，而无视这种观看方法背后的好奇、观察的耐心以及诗意的想象和重构。我想古埃及人凝视世界的目光恐怕比我们强烈，也深邃得多。毕竟，那时候他们对世界充满了敬畏和好奇。他们不会给一个东西贴上标签，就以为自己了解这个东西了。

一个年轻人正坐在一张凳子上，对着拉美西斯二世的目光，在素描本上画着。

拉美西斯二世是古埃及历史上最伟大的法老。自公元前1279年即位，统治埃及长达66年，正值埃及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的黄金时代。他极有福气，享年超过90岁，儿女近百人。他在位期间，尼罗河的洪水带来了一连串的大丰收。他一直被当作“人间的神灵”而崇拜。

我很羡慕他专注的样子。画画是最古老，恐怕也是最好的观看方式。它放慢了观看的时间，也展示了“当你没在画画时，目光是多么的贫乏”。

这是一位画家告诉我的。他说，画画这件事情，不在于你画得有多好，而是一旦开始画画，观察的方式就改变了。你开始学会展平和扩展空间，以心之眼观察它，而不是像照相机那样捕捉它，并注意它到它与周围时空之间的关系。

只有在这种近距离的、专注的、个人式的凝视中，你才会意识到一个“物”的物理存在本身的复杂性——它就在那里，它是真的，带着时光留下的所有的印记，物理的、社会的、情感的，等待着与你建立独一无二的连接。

正如英国19世纪艺术评论家约翰·罗斯金所说的：“一个人的灵魂在这个世界上能做到的最伟大事情就是‘看见’某样东西，然后用平实的方式表述出来。清晰的看，是诗、是预言、是宗教——一切的合体。”

【主办方】



生活周刊

【战略合作伙伴】



请回答，



扫描报名购票

LIFE+ 生活家演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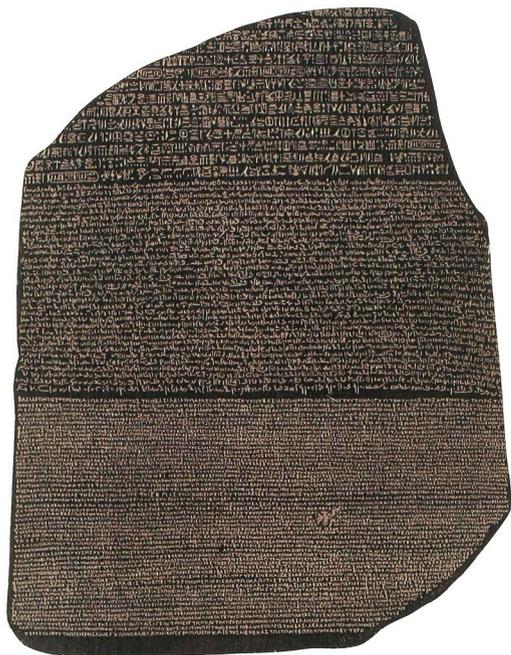
年度专场

2018年1月7日 14:00

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

带着你的疑问, 和时代算笔账

二十件推荐馆藏 (下)



1 罗塞塔石碑 Rosetta Stone, 公元前 196 年。4 号展厅

罗塞塔石碑发现于埃及拉希德镇。石碑的文字讲述了一个权力与妥协的故事，内容的本质是一场交易：古埃及托勒密四世突然辞世，社会动荡。公元前 205 年，年仅 6 岁的托勒密五世接管了王朝，只能借助祭司的力量巩固自己的地位。石碑实则是一份关于税收优惠的诏书。诏书上的条款之一，是祭司们不再需要每年去王朝的新都亚历山大港朝拜，而只需前往古都孟菲斯。剑桥大学的多萝西·汤普森 (Dorothy Thompson) 解释道：“这是从未有过的事，表明王室向祭司做了让步。”

石碑的价值在于，它把同样的内容用三种语言进行了记录，分别是官方的古希腊语、古埃及语，以及欧洲人数百年都无法破解的祭司使用的象形文字。1822 年，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商博良 (Jean-Francois Champollion) 完成了罗塞塔石碑的破译工作。石碑的破译对后来人们阅读古埃及文物和文献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同时，罗塞塔石碑本身的辗转经历，也记录了埃及被异族统治的历史变迁。

2 帕特农神庙石雕：半人马与拉庇泰人 Parthenon Sculpture : Centaur and Lapith, 公元前 440 年。 18 号展厅

帕特农是一座献给雅典娜·帕特农女神的神庙。中央大厅是雅典娜的雕像，建筑物四面柱子的顶端，环绕着 92 个系列方形石雕，被称为排挡间饰，“半人马与拉庇泰人”便是其中之一。

人像高达一米，半人马正在攻击传说中的希腊民族拉庇泰人。这幅图像表现了日常生活和神话传说穿插下的一个由神、英雄与凡人组成的雅典。雅典大学古典考古学教授奥尔加·帕拉吉亚 (Olga Palagia) 描述道：“这种新风格是要在人物形体、动作与服装之间创造出新的平衡……它创造了完美的人体比例。”剑桥大学古典学者玛丽·彼尔德 (Mary

Beard) 则认为：“在古希腊人的世界里，凡事都通过争斗来解决。输赢决定一切。希腊人在世界上为自己定位的方式之一，就是将‘敌人’及‘他者’都视作‘非人’。这便是他们与自己征服或痛恨的人之间的关系。帕特农神庙的雕像展示了表现敌人的‘他者性’的不同方式。”



3 度母雕像 Statue of Tara, 公元 700 ~ 900 年。33 号展厅

度母雕像由青铜打造而成，外层镀金，大小约为真人的四分之三。19 世纪 30 年代被大英博物馆收藏。

度母的身材为完美的沙漏形，上半身裸露，胸部圆润，髋部围着一条轻薄的纱笼。雕像完工之时，佛教已经在斯里兰卡作为主要宗教存在了千年以上。度母本是印度教的母亲神，后来才被佛教信奉，表明佛教与印度教之间的交流。如今，度母在斯里兰卡的地位已不复当年，但是在尼泊尔和我国西藏等地仍然具有重要地位。





4

刘易斯西洋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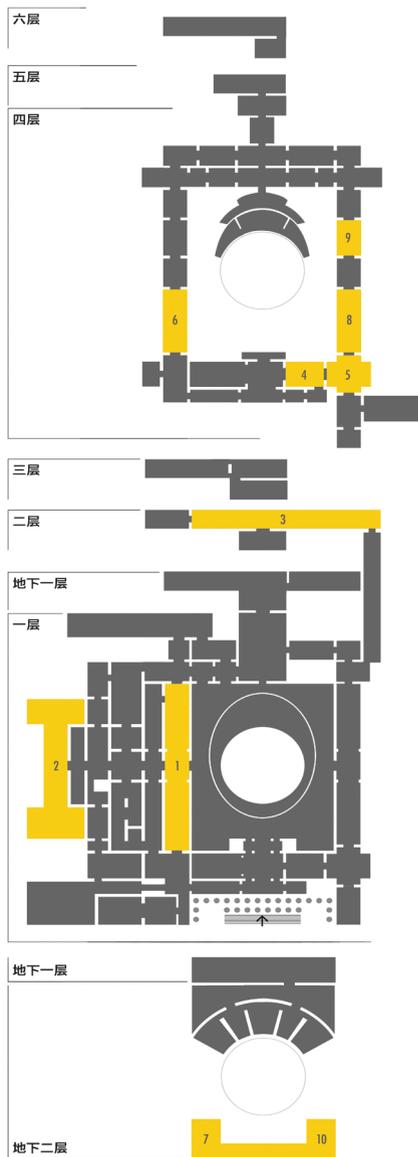
The Lewis Chessmen, 公元 1150 ~ 1200 年。40 号展厅

刘易斯西洋棋一共有 78 枚，发现于赫布里底群岛中的刘易斯岛，一间掩埋在沙丘中的小石屋中。如今，其中 67 枚藏于大英博物馆，其余 11 枚藏于苏格兰国家博物馆。

这套棋子由残缺的几套拼凑而成，比常见的棋子略大，大部分用海象牙雕成，少数为鲸齿。其中有一些颜色一度为红色，日久褪色为浅棕色。棋子的形象中，有个性鲜明的国王、王后、骑士、卫兵，以及 19 枚没有以人形出现而仅仅是直立牙板的兵。

国际象棋在公元前 500 年后始创于印度，后传播到中东，接着传入了基督教盛行的欧洲。刘易斯棋子中的人物，反映了中世纪北欧的权力结构。棋子中的王后代表了欧洲的宫廷，而“狂暴战士”(Berserker)体现了北欧战争的恐怖；19 枚兵则代表在中世纪社会处于底层、没有身份的被强征充军的农民。

在中世纪欧洲，主教是最有权势的群体之一，掌控着土地和人命，并能够控制民众的精神生活。棋子中的主教形象表明，教会是当时欧洲国家战争机器的关键部分。



5 萨顿胡头盔

The Sutton Hoo Helmet, 公元 600 ~ 650 年。41 号展厅

萨顿胡 (Sutton Hoo) 是位于英格兰萨克福郡的古迹，一个 7 世纪皇家墓地。17 世纪，萨顿胡头盔发现于这一古墓遗址，是英格兰罕见的 4 个中世纪头盔之一。

头盔表面的装饰嵌板上，点缀着在当时的日耳曼社会流行的动物装饰和人物场景图案。头盔的鼻子和眉毛的位置之间，是一对镀金龙头，鼻子、眉板和龙由此看上去像一只展翅的鸟。青铜眉板镶嵌着银丝和石榴石、末端刻着鎏金铜野猪头图案，象征着勇气和力量。



6 沃伦杯

Warren Cup, 公元5~15年。70号展厅

公元10年左右,这个银质高脚杯制作于罗马时代的耶路撒冷。1911年,这个杯子被美国富翁爱德华·沃伦(Edward Warren)在罗马购买并收藏,因此被称为“沃伦杯”。

杯子上的图案描绘了男子之间的性爱场景。两个场景中的器具、服装和发型,都是希腊风格。在古希腊,贵族之间存在着同性恋文化。早期的罗马帝国十分推崇古希腊,接受了大部分的古希腊文化。古希腊提供了一个视角,让社会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去思考和表现同性恋情。

1928年爱德华·沃伦去世后,大英博物馆对沃伦杯持拒绝的态度。1999年,公众对同性恋的态度有了改变,大英博物馆才购藏了这个杯子。沃伦杯经历了从宴会用品到有伤风化的容器,再到博物馆重要展品的历史变迁,也展现了人类社会对同性关系态度的转变。



7

复活节岛雕像

Hoa Hakananai'a, 公元1000~1200年。25号展厅

复活节岛是智利的一个小岛,早期的居民称之为拉帕努伊岛(Rapa Nui)。荷兰人抵达这个岛之后,将其命名为“复活岛”作为纪念,这里的土著则是波利尼西亚人。

复活节岛雕像则是一群巨型人像,被称为“摩艾”(Moai)关于他们的来历,至今没有定论。Hoa Hakananai'a就这些摩艾的其中之一,在1869年,被大英博物馆收藏。这些雕像体现了波利尼西亚人对祖先、神灵、生死的关注。



8

米尔登霍尔宝藏

The Mildenhall Treasure, 公元300~400年。49号展厅

1942年,戈登·步切(Gordon Butcher)在英国东部萨福郡的米尔登霍尔附近耕地的时候,发现了34件银器,并把它们交给了土地的所有者。这些银质餐具包括盘子、碗和勺子,无论在技术还是艺术上,都具有高超的水平,是罗马银质餐具的典范之作。其历史可追溯到罗马人统治时期的不列颠。



9 游泳的驯鹿

Swimming Reindeer, 公元前 11000 年。51 号展厅

整个大英博物馆最古老的艺术品，制作于末次冰河时代末期，约 13000 年前。发现于法国蒙塔斯特吕克，猛犸象牙制成，长约 20 厘米，形状细长微曲。由于材质已经极其脆弱，所以被保存在恒温箱里。

两头驯鹿挨得很近，一前一后呈现游泳的姿态。雌鹿在前，象牙尖正好是它的鼻尖，身后较粗的部分则是体形较大的雄鹿。下方的鹿腿完全伸展，呈流线型。可以看出，制作它的人花了很多时间观察驯鹿游泳过河。

13000 年前，成群的驯鹿正在当时寒冷的欧洲大陆上游荡。对于靠狩猎和采集维持生活的人来说，驯鹿

是衣食和工具的重要材料来源。这件展品也表明了冰河时代的雕刻风格与技巧。

这件展品的另一重要之处在于，它是人脑运作方式发生改变的依据。英国雷丁大学的史蒂芬·米森 (Steven Mithen) 教授这样描述说：“在大约 5 万至 10 万年前，人类的大脑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奇妙的创造力、想象力及艺术能力。冰河时代的自然条件起了很关键的作用：生活在漫长严酷的寒冬，对人类来说是极大的挑战，他们需要建立真正紧密的社会纽带，需要仪式，需要宗教，而这一切都带来了艺术的繁荣。”

10 伊费头像

Ife Head, 公元 1400 ~ 1500 年。25 号展厅

1938 年，伊费头像出土于尼日利亚伊费城的一座王宫遗址。头像比真人略小，椭圆的面部布满了雕刻精致的竖线。头顶是一顶串珠王冠，王冠上是一根羽毛状饰物。

伊费头像是西非中古文明的代表作，被认为是某个没有留下文字记载的民族的最重要的证据。它的出现，使欧洲人对非洲艺术传统的认知多了一个新的层面，也成为后殖民时代非洲对自己文化传统的信心的重要来源。它表现出的理性与克制表明，它来自一个秩序井然、技术发达、神权与王权都很稳固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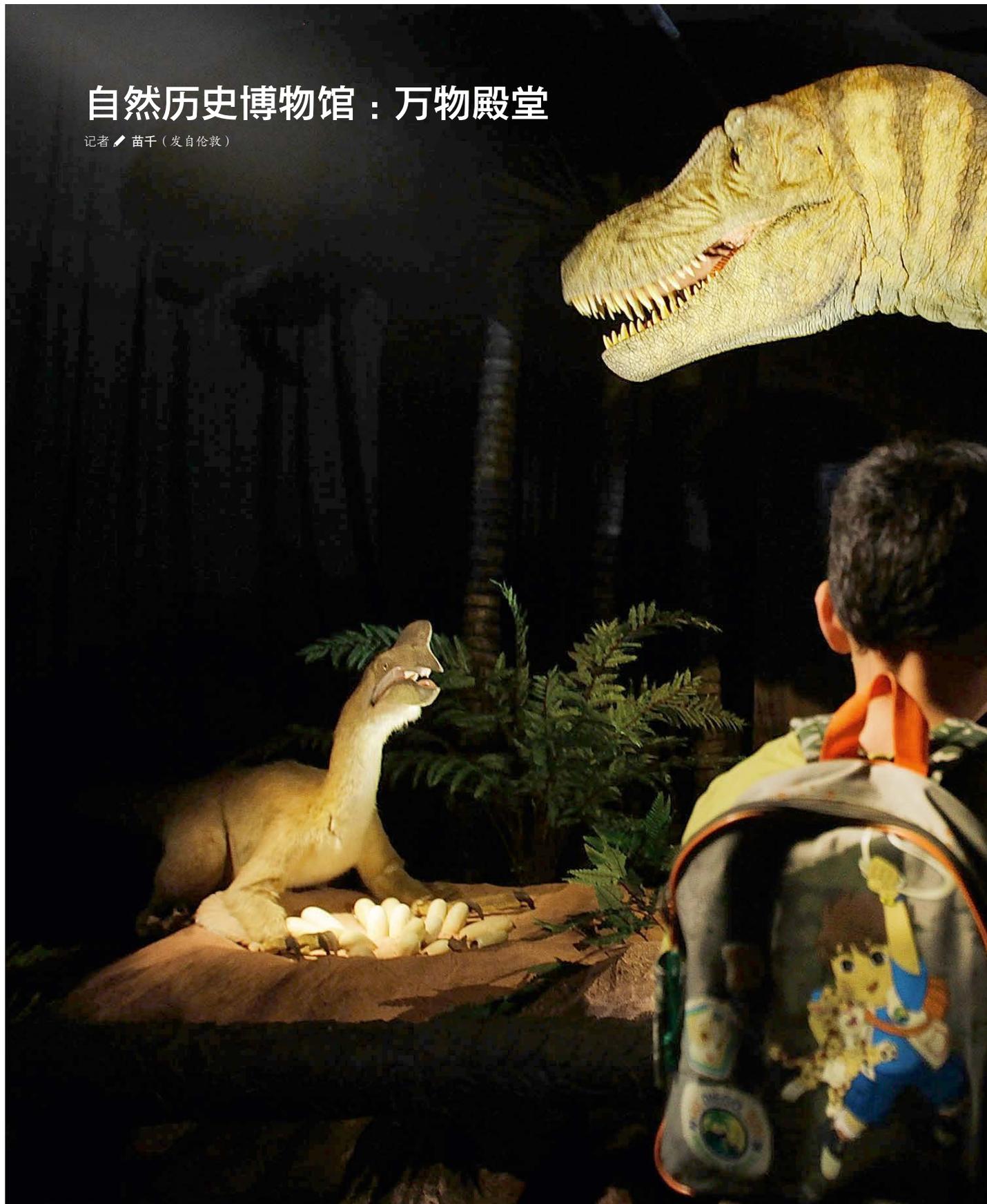
弗吉尼亚联邦大学艺术史教授巴巴汤迪·拉沃尔 (Babatunde Lawal) 认为：“如今许多非洲人，尤其是尼日利亚人，对自己的过去引以为豪，而这段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世人误以为是原始野蛮的。这种新的认识使他们体验了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在我们这已经成为地球村的世界，现代艺术家也开始从这一历史中寻找灵感，激发自己探求身份认同。”



(傅婷婷整理。内容主要摘自《大英博物馆百物展》，上海博物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尼尔·麦格雷戈著，余燕译，新星出版社；《伦敦大英博物馆》，卢卡·莫扎蒂编著，应倩倩、许琛、曾美祯译，译林出版社)

自然历史博物馆：万物殿堂

记者 苗千（发自伦敦）



一对双胞胎小兄弟在英国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观看“恐龙时代”电子动画模型展览



(视觉中国 供图)



（视觉中国供图）

1

1. 一只大象标本被搬运到英国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摄于1900年）

2. 自然历史博物馆外观（摄于约1890年）

3. 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最杰出的代表托马斯·赫胥黎



（视觉中国供图）

2

文类藏品的宏伟的博物馆，实际上，在伦敦的南肯辛顿区，还有一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也同属大英博物馆的一部分。它所展示的是有关地球的另一方面。

一分为二

大英博物馆的创始人汉斯·斯隆（Hans Sloane）爵士本人就是一个热心的博物学家。他不仅精通植物学和医学，还曾经亲自去牙买加花费15个月搜集大量的植物、动物、化石和矿物标本。他虽然没有做出过什么重大的科学发现，却能够非常详细地描述和细心保存自己的藏品，因此在1727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主席。

在18世纪早期，斯隆爵士的私人博物馆就已经成了伦敦一景，相传他在布鲁姆斯伯里区的博物馆里收藏有“7000种不同的水果，还有所有动物的皮毛”。时至1753年1月11日，当爵士于92岁的高龄去世之后，英国议会以极低的2万英镑价格收购了他的藏品，这些珍贵的收藏从而成为建立大英博物馆以及后来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基础。

作为世界上第一座向公众开放的国家博物馆，盛名之下大英博物馆自身的负担却也越来越重。虽然这座博物馆源于私人捐赠，而随着大英帝国在全世界范围的快速扩张，它的藏品数量急速增加，以至于博物馆只能向外界展出其中的一部分——关于那些并未展出的藏品，坊间则有各种传闻。有传言说大英博物馆所展出的藏品只算是九牛一毛，数量尚不及在地下库房内总藏品的十分之一——我带着这个问题向曾经在大英博物馆工作了20多年的杰西卡·罗森女爵士（Pro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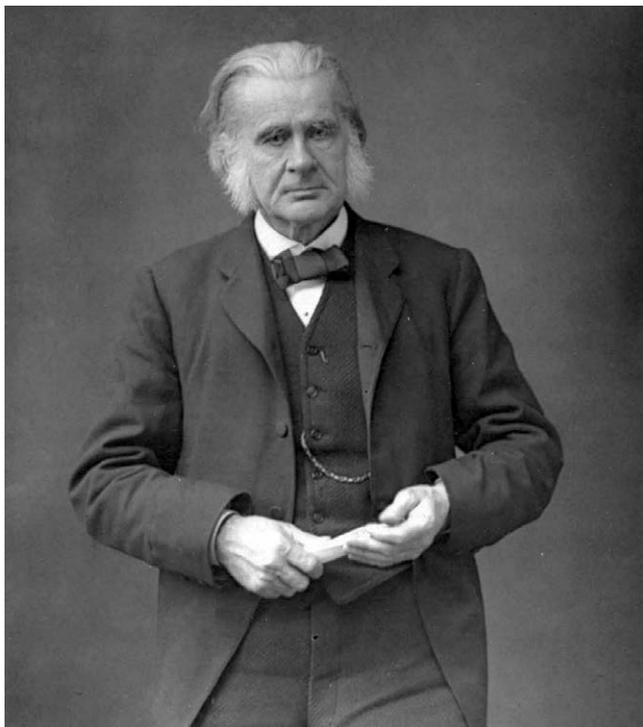
Dame Jessica Rawson) 求证, 她回答真实的数字远没有这么夸张, 目前在大英博物馆地下储藏室中的藏品与展出的藏品数量相差不多, 只不过摆放得更加紧凑而已。

而到了 19 世纪, 于 1753 年开放的大英博物馆所面临的已经不只是藏品数量过于丰富这一个难题, 该如何有序地展示藏品同样成了一个大问题。博物馆内展示了代表世界各地各种文化的珍贵藏品, 而同时数量众多的来自自然界的藏品却无缘面世。数百万件来自世界各地的植物、动物、矿物等样本被堆放在条件欠佳的博物馆地下室

内。早在 19 世纪 30 年代, 把自然历史部分搬离出去就成为大英博物馆中一个常被讨论的话题: 藏品数量急剧增多, 前来访问和进行研究的科学家也越来越多, 而博物馆中用来储藏的空间则越来越小。众多珍贵的自然历史藏品被储藏在条件欠佳的湿润拥挤的地下室里, 一些珍贵的收藏就被放在博物馆的抽屉里, 就连展柜里用来展示的藏品也要一个紧挨一个地摆放。

在这种情况下,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古生物学家理查德·欧文 (Richard Owen) 爵士于 1856 年说服了大英博物馆的理事们, 在馆外另建一座分馆, 以展示大英博物馆中关于自然界的藏品。欧文爵士在英国学术界中始终是一位饱受争议的人物, 他精于古化石研究, 著作颇丰, 却也以心胸狭隘、侵占和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而闻名, 最终被英国皇家学会取消其成员资格。但无论如何, 一座源于大英博物馆, 后来又独立于大英博物馆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成为欧文爵士最重要的遗产。

人们之前也曾有过计划, 将不同类别的展品分别送到不同的地方: 将化石藏品送往皇家外科医师学会, 将矿物藏品送往经济地质学博物馆, 所有植物样本则送往伦敦郊外的邱园 (Kew Garden)。欧文爵士详细计算了摆放自然历史类藏品所需要的空间, 然后向大英博物馆的理事们宣布: 将大英博物馆一分为二的时刻到了, 需要把博物馆中的来自人的藏品 (有关于人类文明的藏品) 和来自上帝的藏品 (自然历史类的藏品) 分开收藏。到了大英博物馆的理事们投票表决的日子, 总共 50 位理事只有 17 位愿意前来参加投票, 支持与反对的投票结果为 8 比 7——这意味着大英博物馆的一个全新的自然历史部分即将诞生。



3

包含万物

确定要建设一个自然历史新馆之后, 选址就成了人们所争论的焦点。大多数人都希望新馆能够在伦敦的布鲁姆斯伯里区的老馆附近, 但是这个区域无法找到建设一个新博物馆所需的空地。最终地址被定在伦敦的南肯辛顿区, 那里正好有一个曾用于国际展览的临时建筑准备拆除。

欧文爵士认为自然历史博物馆应该是自然的一个缩影, 不仅要有不同的生物, 还要包括生物不同的种群、不同性别以及不同的生长形态。一只羚羊可能要比另外一只羚羊更重要, 因此要尽量把所有的藏品全都展示出来——这将是一个包含万物的博物馆。除了供科学家们进行科学研究之外, 自然历史博物馆还要对社会所有阶层都有指导和教育的功能。按照欧文爵士最初构想, 在博物馆的中央大厅应该构成一个“索引博物馆”, 在其中摆放最能够吸引普通访客的大型动物标本, 让没有太多时间也没有太多背景知识的访客也能有所收获。中央大厅的索引博物馆还应该在夜晚也开放, 这样一些在白天需要工作的人就可以夜里来博物馆参观。不仅如

左图：1967年1月19日，在自然历史博物馆装修过程中，工作人员用塑料布罩住恐龙 Dippy 的骨骼化石模型以防止其被损坏

右图：体长50米的蓝鲸骨架悬在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空中



(视觉中国供图)

此，在索引博物馆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还可以开设课堂，为访客进行讲解和介绍。

如果说自然历史博物馆是整个自然界的缩影，那么这个欧文爵士所设想的“索引博物馆”就是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缩影。与欧文爵士的观念针锋相对的是当时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的支持者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他建议建造一个相对较小的公共博物馆，只展出少量的展品，而把更多的展品存放在其他部分，供专业人士进行研究。两人甚至在报纸上也展开辩论，欧文爵士胜利了，博物馆最终以他的想法设计建造。

分馆从1863年开始进行设计建造，建筑师最初选为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设计师弗朗西斯·福克(Francis Fowke)，但福克于1865年在42岁的年纪就意外去世，只能将人选换成来自英格兰北部，当时只有36岁尚且默默无闻的年轻建筑师艾尔弗雷德·沃特豪斯(Alfred Waterhouse)。沃特豪斯稍微修改了福克的设计，将博物馆原本的文艺复兴风格改为罗马风格——虽然在设计过程中沃特豪斯借鉴了一些德国教堂的样式，但实际上它与其他任何

建筑都不相似，注定将成为一座醒目的地标性建筑。

在建造过程中，沃特豪斯又不得不疲于应对资金短缺的问题，原本计划中的50万英镑资金被削减为33万英镑。面对永远有缺口的资金状况，沃特豪斯也只能在博物馆的内部装饰上做出各种妥协。尽管如此，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央大厅顶部的装饰性面板也仍然会令今天的访客们感到难忘。中央大厅的屋顶由162块绘制了各种植物的精美图像的面板组成，共分为18组图形。这些美轮美奂的面板由曼彻斯特一家事务所制作。面板的布置也显示出了设计者的用心，越是绚丽的颜色越被布置在接近屋顶中轴线的部分，而且面板上所展示的图像，都是在当时对于经济有重要意义的植物。这位善于设计中世纪风格建筑的年轻建筑师，用了14年的时间将自然历史博物馆设计建造成为一座教堂般鲜明宏伟的建筑。高清杂志免费下载QQ群：280594200

自然历史博物馆建成之后，5万件大英博物馆的矿物藏品首先被运送了过去，十几万件植物藏品随后也被运到南肯辛顿。接下来是最难以处理的化石藏品，如巨型爬行动物，乳齿象一类大型动物珍

贵的骨骼化石，加上不计其数的牙齿、骨头、贝壳类的化石藏品，总共用马车运输了394趟，耗时97天才得以完成搬迁。外加5.2万个装有鱼类样本的玻璃瓶也被一一运到自然历史博物馆——尽管大多数藏品都没有注明来源，实际上它们大多都来自当时大英帝国在世界各地控制的领地。

欧文爵士意识到，博物馆内不应该只收藏人们认为漂亮的动物标本，还应该有一些令人着迷的有趣的标本，而且在面向公众时，还需要有一些“明星标本”用以吸引眼球。在这方面只能选择一些巨大的动物，例如鲸——于是一具在苏格兰发现的巨大的抹香鲸骨架在1882年被摆放在了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中央大厅。

于1881年正式开放的自然历史博物馆，直到1963年，在法律上一直都属于大英博物馆的一部分。它在最大限度上体现了欧文爵士对于一座博物馆的期待，其中所陈列的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展品正是关于地球上最大的奇迹：生命。在其逾8000万份藏品中，从大洋底部到各大陆，从最小的甲虫到如恐龙和巨鲸之类的庞然大物，都有所展示。

19世纪的人仍然普遍认为博物馆不应该对公众开放。大多数访客只需见识到博物馆的一小部分展品即可，博物馆最重要的职责应是供专业人士进行研究。而在欧文爵士的领导下，自然历史博物馆从开放之日起就免费对所有人开放。不仅如此，欧文爵士还热情邀请工人前来参观，这种行为在当时的科学界算得上是离经叛道，却也大大改变了人们对于博物馆功能的认识，使博物馆的公共性大大增强。

自然历史博物馆建成和开放的时间正好与大英帝国在全球急速扩张的时期重合，英国的博物学家们有机会见识到全世界各地在不同条件下产生的各种新奇的生命形式，也有机会从全世界各地带回各种珍稀的动物、植物和矿物标本，其中很多标本后来都被收藏在自然历史博物馆内。在这家博物馆刚刚开放之际，来自世界各地、生活在不同气候条件下的千奇百怪的植物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社会引发了热潮，热爱园艺的英国园丁们一时都以成功驯化来自英国以外的珍稀植物为自豪，各种奇花异草也刺激了当时英国的艺术家和手工业者们的创作灵感。

由于场地的限制，馆藏中大约只有2万件藏品可以永久展示。尽管欧文爵士最初的设想非常美好，但实际上博物馆内极少举办“不需要任何知识就可以参加”的讲座或是展览，而且要让博物馆内的大

多数藏品对于公众来说有趣并且便于理解，对于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自然历史博物馆中藏品的标签和说明相比于大英博物馆更为详细，工作人员也在各个展厅里为访客们准备了价格便宜的展品介绍。对于现在的访客来说，在游览博物馆之前，最好的准备莫过于先在博物馆网站上浏览一番，起码可以了解馆中的一些明星藏品。

除了众多惊人的动物标本之外，还有一件标志性的植物样本，这是自然历史博物馆在1892年从美国购入的一棵巨杉的树干切片。这种巨树最高可以生长到接近100米，树干直径可以达到17米，存活3500年，而且只生长在美国加州内华达山脉区域。博物馆花费700美元购得这个直径5米、厚1.7米的巨杉树干切片，而后，重达36吨的标本又被切割



(于筱丛摄)



【视觉中国供图】

2013年2月5日，一位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员工在馆内标本前

成数块，其中的一块被保存在自然历史博物馆，上面大约 1335 圈年轮记载了这颗巨杉的生命历程，如今它被摆放在博物馆中央大厅的顶层。

馆中最容易被人所忽略的部分就是其收藏甚丰的图书馆，其中藏有大量的书籍、期刊、手稿、绘画以及电子资源，这对于研究和教育工作都有极大的帮助。与其他科学领域的研究不同，在自然历史研究方面，陈旧的书籍和资料，对于新发现物种的描述和命名的资料，对于研究者来说总是有特殊的重要性。在自然历史博物馆搬离时，博物馆理事会决定馆藏中自然历史方面的书籍不随之搬动，仍然留在大英博物馆，只有当时自然历史部门的几千本书随之搬到了南肯辛顿。这对于当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研究人员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只能恳请英国国会每年拨款，才得以在自然历史博物馆内修建一个总图书馆以及 5 个专业的部门图书馆。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图书馆因为其收藏的各种珍贵书籍——包括对于珍稀物种的描述文本和水

彩画，对一些无法取得标本而对一些动物所做的文字描述手稿——已经令其在国际上大有名气。

令人怀念的 Dippy

对于大多数访客来说，自然历史博物馆内给他们留下最深印象的展品，无疑是刚刚进入馆内就能一眼看到的站立在中央大厅（Hintze Hall）的恐龙化石。这具化石模型标志着人类历史上一段研究恐龙、搜寻恐龙化石的热潮。

从 19 世纪中后期开始，考古学家们在英格兰、法国、德国等地陆续发掘出恐龙的骨骼化石，但是这些局部的化石让当时的人们尚且难以描绘出恐龙的全貌。在当时古生物学家们的想象中，恐龙是一种用四足走路的巨大的蜥蜴状哺乳类动物。

而后在美国的新发现迅速改变了古生物学家们的看法。随着拓荒运动，很多人搬到当时尚且荒凉的美国西部。随即拓荒者、工程师乃至农民们都不断

挖掘出令人吃惊的骨骼化石，其中就包括第一副完整的恐龙骨架，这些发现自然在科学界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收集恐龙化石的竞赛。科学家们愿意花大价钱资助队伍前去美国西部挖掘恐龙骨骼化石，而不同的队伍之间甚至曾经爆发出激烈的冲突，在当时被称为“骨头战争”。也正是在19世纪60~80年代之间，在挖掘恐龙化石和研究恐龙的狂热时期，各种各样的恐龙首次被人类认识且归类。

时至1878年，耶鲁大学的教授奥斯尼尔·马什(Othniel C. Marsh)命名了一种新型恐龙。人们此前只在1877年挖掘了这种恐龙的一部分骨骼化石，马什教授注意到这种恐龙化石的尾巴部分与此前发现的任何化石都不一样，他推测在尾巴下方的小骨头是用来保护恐龙尾部的神经丛和血管，于是将这种新发现的恐龙命名为“*Diplodocus longus*”(梁龙属)。这种身形巨大、脚的形状类似蜥蜴的恐龙生活在大约距今1亿5000万年到1亿4000万年之间。后来人们又发现了很多这类恐龙的化石，但都是在科罗拉多、蒙大拿、新墨西哥、犹他和怀俄明等位于美国西部的州内发现的，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见到过这种独特的恐龙化石。

1898年，美国铁路工程师和化石收集者威廉·里德(William Reed)在怀俄明州发现了一部分巨大的恐龙化石，这个消息通过媒体迅速传遍了美国，并被冠名以“地球上曾经存在的最大的动物”。英国出生、后来移民美国并且成为巨富的商人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看到消息之后，意识到这具恐龙化石正好可以成为以他名字命名建造的匹兹堡卡内基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最好藏品，决定将其买下。

这具恐龙化石最后被证实属于梁龙，并在1899年夏天被完全挖掘了出来，随后被运往匹兹堡卡内基自然历史博物馆。在清理和研究恐龙化石的过程中，博物馆内的研究助理约翰·哈彻(John Hatcher)博士发现这具梁龙化石与此前马什教授发现的梁龙外形有较大不同，应该被认为属于一种新的种类，于是他将这个恐龙以卡内基命名为“*Diplodocus carnegii*”。

1902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访问卡内基位于苏格兰的城堡，在交谈中王看到了梁龙化石的照片，得知详情后英王非常羡慕，表示非常希望在大英博物馆中也可以收藏一具如此巨大的恐龙化石。领命之后卡内基迅速与卡内基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工

作人员联系，在得知可能无法再发掘出一具同样规模的恐龙化石之后，他决定制作一套与这部化石完全相同的石膏模型。1903年，3名意大利工匠前往美国进行模型制作，而后这些模型又被涂成黑色，令其看上去与真正的化石相仿。实际上，因为无法找到完全完整的梁龙化石，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所展出的这具模型来自于5具从美国西部挖掘出的梁龙化石。

292块梁龙骨骼化石模型(46颗牙齿不算在内，头骨和下颚算作一块)被分装在36个集装箱内运到了英国。这具模型于1905年5月12日在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正式亮相。身形巨大的恐龙化石模型立刻成为观众们最喜欢的展品和媒体的宠儿，在当时英国的报纸和卡通上随处可见这个巨大恐龙的形象。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亲切地称它为“Dippy”。相比之下，存放于匹兹堡卡内基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梁龙化石原品，因为工作人员一直没有找到办法能在室内支撑起这具过重的恐龙化石，直到1907年才正式亮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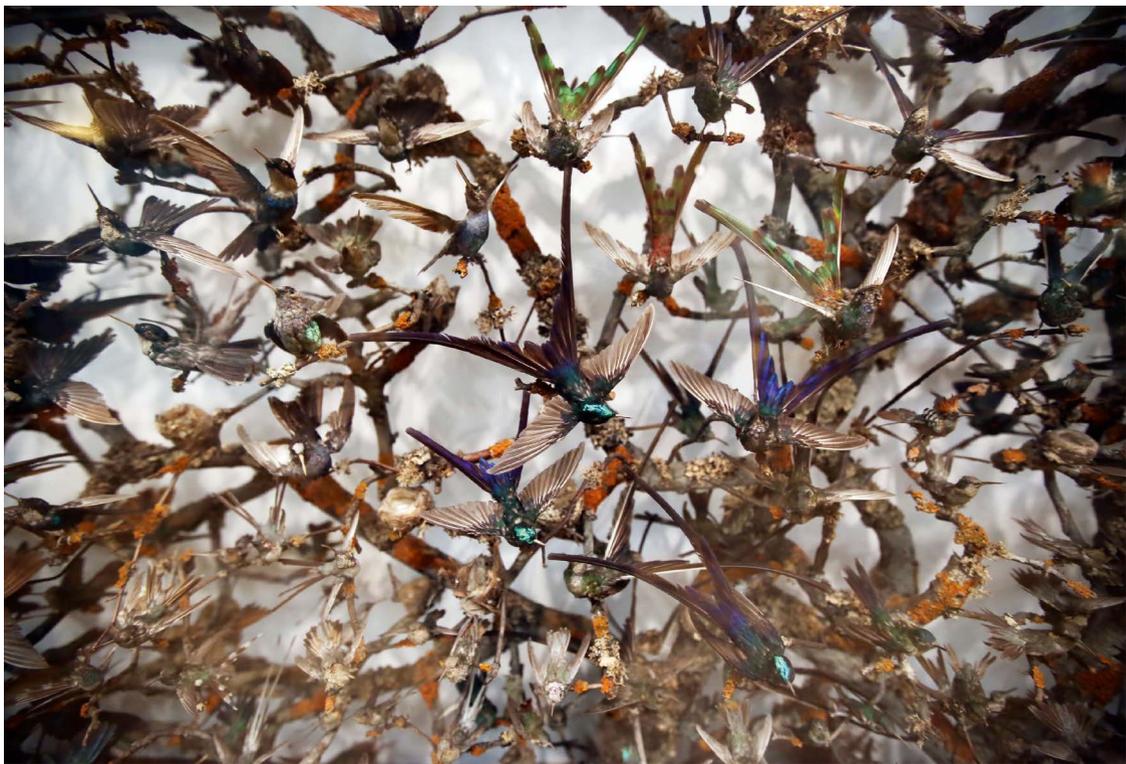
Dippy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位置屡次变更。在1931年，它被移到爬行动物化石馆(Fossil Reptile Gallery)，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避免被破坏，它又被分解存放在博物馆的地下室内。从1979年起，它占据了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央大厅中最显著的位置，成为博物馆的标志。

Dippy的形象也几经变更。此前它的尾巴一直拖在地上，直到1993年，随着人们对于梁龙研究的逐渐深入，才使它的尾巴优雅地越过人们的头顶翘了起来。而通过电脑模拟，科学家们又发现梁龙可以通过脖子自由移动头部，使自己无需多走路就可以吃到目光所及的位于高处的植物，科学家们也就随即调整了Dippy头骨的位置。

在2017年2月，备受人们喜爱的恐龙化石模型Dippy暂时离开了中央大厅，它将于2018年开始在英国各地进行一次为期两年的巡回展览。几十年来Dippy一直占据着自然历史博物馆中最引人注目的位置，它的离去让很多访客怀念不已。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名叫“希望”(Hope)的蓝鲸骨骼样本。这副蓝鲸骨骼来自于一头在1891年搁浅在爱尔兰海滩的蓝鲸，自然历史博物馆以250英镑的价格将其购入，从1935年起将其陈列在哺乳类动物馆展出，直到2017年它被选择搬到中央大厅，悬挂起来摆出俯冲的姿态，以代替刚刚离去的Dippy。博物馆希望这具长达25.2米的蓝鲸骨骼能够提醒人们关注人类

左图：世界各地的丽鸟标本云集于此，形态各异，栩栩如生

右图：2015年3月31日，一名小女孩在自然历史博物馆举办的蝴蝶展上与一只猫头鹰蝶亲密接触



（于慧拍摄）

与环境的关系，以及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责任。

弦歌不辍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自然历史博物馆也可谓弦歌不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博物馆不仅继续为公众提供学习的机会，同时也尽可能地帮助英军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生存：博物馆的昆虫学部门在军队中普及各种小虫如螨虫和蝉虫可能对人造成的伤害，动物学部门教授军人如何通过沉船上的贝壳类生物分辨沉船沉入海底的时间，而植物学部门则负责教授如何在陌生的野外环境中寻找可食用的野菜。

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惨烈，但是对于自然历史博物馆来说，更严峻的考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1938年至1947年间，原来在剑桥大学工作的动物学家克莱夫·福斯特·库珀爵士（Sir Clive Forster Cooper）成为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对库珀爵士的任命出乎很多人的预料，他当时已经58岁，只比因为年龄原因被迫去职的前任馆长查尔

斯·里根（Charles T. Regan）小两岁，而且库珀爵士自身的健康状况也不大好。但在这些不利条件之外，库珀爵士不但是位优秀的动物学家，也在剑桥大学动物学博物馆和其他国家的博物馆工作过，有着丰富的博物馆管理经验。

新馆长上任之初，尽管当时世界局势急剧变化，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的集权主义情形急速恶化，尤其是德国越来越使它周围的邻居们感到不安，但当时的世界局势之下仍看得到一丝和平的希望。因此在一开始库珀爵士还有着许多改革计划：他希望以更加现代的方式展示博物馆中的藏品，并且像一些美国的大博物馆一样派遣远征队前往世界各地搜寻新的藏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库珀爵士不得不放弃自己之前的一切计划，而是试着用一切方法在这段最为特殊且艰难的时间里保全博物馆免遭战争毁坏。从1938年开始，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理事们就计划挑选和转移馆中重要的藏品免遭可能发生的空袭的摧毁。到了1939年1月，博物馆计划把其藏品向伦敦西北部的特灵（Tring）分馆转移，同时加固博物馆



的地下室，并安装了电话。

1939年8月29日，自然历史博物馆被迫闭馆。几天之后德国攻占波兰，“二战”爆发，对伦敦的空袭也如期而至。到了1939年10月份，按照计划装满了三卡车的标本被转移到了特灵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中，矿物藏品被转移到博物馆的地下室，但博物馆中还有不计其数的珍贵藏品无法转移，人们只好在一些无法移动的巨大且珍贵的化石和骨骼标本周围堆满沙袋。

在战争稍微平静的时期，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理事们决定在1940年2月28日重新开馆，前来参观的访客则必须戴着防毒面具入场参观以防意外发生，到了5月29日，博物馆又不得不关闭，直到1942年8月1日才重新开馆。在遭受空袭期间，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损失不可谓不惨重。到1940年8月末，共有28枚炮弹落在在博物馆周围，虽然在当时并没有造成太

大损失，但爆炸震碎了很多窗户玻璃，雨水随之进入博物馆；9月9日半夜，德国轰炸机扔下的两枚燃烧弹和一枚汽油弹落入博物馆东侧厅引发了火灾，幸好在当时值班人员的及时扑救下控制住了火情，但为了灭火而喷洒的水不可避免地对大量藏品造成损坏，很多书籍也随之被毁掉，而令人惊奇的是，一些在1793年从中国带到伦敦的木棉树种子在被干燥储存了147年之后，被水浸泡之后竟然发芽了。

在“二战”期间，馆长库珀爵士大多数时间都住在博物馆的办公室内，一边自己做饭一边坚持工作。而在战争期间另一个不可避免的情况就是食物短缺，在无奈之下英国政府号召大家在自家的花园里种菜，开展垦荒运动（Dig for glory campaign）以渡过难关。从1941年3月14日开始，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在博物馆的空地上种植了各种蔬菜以图果腹。即使是在这种困难条件下，自然历



一名游客在自然历史博物馆内观看现已灭绝的大型哺乳动物化石

史博物馆在 1942 年仍然接待了 59767 名访客，到了 1943 年，访客的数量增长到了 137195 人。

到了 1945 年 5 月战争结束时，可想而知自然历史博物馆处于一种极为混乱且脆弱状况之中：玻璃破碎，屋顶破漏，各个展览馆也显得混乱肮脏。尽管如此，大多数在战争期间被分散储存的藏品仍然逐渐从各地被运回到伦敦。而馆长库珀爵士原计划在 1947 年 9 月 30 日退休，但他在 1947 年 8 月 23 日便去世了。他陪伴着这座博物馆在数年间惨淡经营，共同度过了一段最为离奇且艰难的时间。

从收藏到研究

自然历史博物馆不时会接受各种各样的礼物或捐赠，在这期间，一份来自著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的礼物显然最为珍贵。

第二代罗斯柴尔德男爵沃尔特·罗斯柴尔德 (Walter, 2nd Baron Rothschild) 自幼就对自然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他在 7 岁时就声称以后要建立一座博物馆。在 10 岁时，沃尔特·罗斯柴尔德已经收藏了众多甲虫、蝴蝶、鱼类、鸟类和哺乳动物的标本。

他在 18 岁前往剑桥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在 24 岁时终于在父亲的帮助下在特灵建立起一座自然历史博物馆。此后为了丰富自己的收藏，沃尔特·罗斯柴尔德不仅雇佣人帮他收集各类藏品，他自己也曾亲自前往北非收集蝴蝶和蛾类、鸟类的标本。

尽管沃尔特·罗斯柴尔德生性害羞且离群，但因为其在自然历史学界的声誉，仍然在 1899 年被选举为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理事。在 20 世纪 20 年代，沃尔特·罗斯柴尔德做出了决定，要把自己在特灵建立的博物馆捐献给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在他于 1937 年去世之后，自然历史博物馆收到了这份大礼。如今坐落在特灵的博物馆已经成为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个重要分馆，收藏有 250 万个蝴蝶和蛾类标本、2000 个鸟类标本。

在 100 多年的时间里，自然历史博物馆一直都是进行生物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场所。依托该馆所进行的研究，可能会涉及纯科学或是应用科学，可能应用到多年不曾改变的传统科研手段或是应用到最新技术的新手段，无论如何，都是为了能够让人类对于自然界有更深刻的认识。

历经了三个世纪，馆内研究者的研究方向也不

断发生着改变。因为发现的新生物越来越多，收集到的标本也越来越多，研究者们意识到无论如何扩充馆藏都不可能涵盖自然界中的所有生物，因此人们研究的范围开始逐渐缩小，多数研究者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个特定的生物种类，这样反而可能发现更多的生物类型。另一方面，因为意识到一座单独的博物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体现出自然界的物种多样性，从20世纪初开始，自然历史博物馆就开始和世界其他博物馆进行交流，共同进行物种的分类研究。

直到20世纪上半叶，科学家们都认为生物化石是研究地球生物最重要的工具，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博物馆研究人员的注意力也开始转移到其他方面。除了生物系统学之外，研究者们逐渐开始关注诸如历史气候的变迁、矿物的结构和成分、动物飞行的进化、鸟类的求偶行为、声音和拟态对昆虫的作用，还有例如珊瑚礁的种类和结构等课题。

自然历史博物馆在1881年正式开放时，总共只有109名员工，其中57人为了博物馆每天的运营事务工作，只有52人进行科学研究（其中还有22人留在布鲁姆斯伯里的大英博物馆工作）。如今该馆已经有将近800名员工，其中将近300人是进行研究的科学工作者，还有41名员工负责维护博物馆内的图书馆和提供信息服务。实际上，也有很多长时间依托自然历史博物馆进行研究工作并取得了卓越成就的人并非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正式雇员，例如通过在大英博物馆研究蚊子而享誉世界的科学家弗雷德里克·塞博尔德（Frederick Vincent Theobald），就从未被自然历史博物馆正式聘用。

自然历史博物馆一直在发展扩张，它在1986年合并了临近的地质学博物馆，又在2009年开放了茧状的达尔文中心（Darwin Centre），它的中央大厅也在2017年重新装修布置。无论是否作为大英博物馆的一部分，它从开放以来一直与重在展示人类文明的大英博物馆交相辉映，在人文与自然两方面为全世界展示地球上的种种奇观。如今它自身也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本文写作参考了自然历史博物馆网站，以及《Dippy, the tale of a icon》，Paul Barrett, Polly Parry, Sandra Chapman 著；《Nature's Treasurehouse, a history of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John Thackray, Bob Press 著；《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at South Kensington》，William T. Stearn 著）



位于伦敦的福尔摩斯博物馆

（视觉中国供图）

英国人显然对于建造各种各样的博物馆有所痴迷，或许是博物馆自身的条理性与怀旧意味与英国人的国民性有所契合，访客进入博物馆就如同进入一个时光隧道，怀念起美好的旧日时光。在网上搜索伦敦的博物馆，上面列出了278家机构，其中艺术类博物馆的数量最多，所涉及的范围也最为庞杂，总共68家以艺术为名的博物馆遍布于伦敦的大街小巷，其中既包括宏伟的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亦称国家画廊）、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 Albert Museum），也有名不见经传的诸如卡通博物馆。

除各种艺术主题的博物馆外，伦敦最为常见的就是由著名历史人物的故居改建的博物馆。这其中最为离奇的大概就算是为神探夏洛克·福尔摩斯所建的博物馆。福尔摩斯本来只是英国侦探小说作家柯南·道尔虚构出来的人物，后来柯南·道尔厌倦了创作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于是安排他在瑞士坠崖身亡，没想到结局在报纸上发表之后，伦敦人竟不约而同地佩戴黑纱以纪念这位小说人物，作家也遭到了死亡威胁。无奈之下他只能安排侦探复活。福尔摩斯迷们于1990年在伦敦贝克街237号和241号之间开设了一家福尔摩斯博物馆，地址则标记为“世界上最有名的地址”：贝克街221B号。这家虚构人物的故居博物馆在底层售卖纪念品，上面几层按照小说中的描写装饰展示，如今已经成为伦敦的必去景点之一。

对于文学青年来说最不容错过的莫过于大作家查尔斯·狄更斯位于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区的故居博物馆。这里尽最大可能保持了狄更斯当年在此居住生活时使用的家具和生活用具，参观者们大可在此畅想作家当年在书房中进行创作的场景。

另外还有位于伦敦舰队街附近的约翰逊博士故居博物馆，这乃是英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之一、以一己之力编写《英文字典》的萨姆埃尔·约翰逊博士的故居改建而成，只不过这栋房子在“二战”期间曾经被伦敦市消防局征用，里边原有的家具陈设已所剩无几了。☑

策展中国

——专访大英博物馆中国馆馆长霍吉淑

文 / 李想

研究展品,基于新的研究发现对展品进行新的诠释,这些都是让博物馆依然生机勃勃的功能所在。作为老牌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有很深厚的阐释功力:用新的理念把展品组合起来,和别的藏品组成新的叙事结构,并在这种叙述下,让藏品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第一次见到霍吉淑女士是在邦瀚斯拍卖行的一场讲座上。正值伦敦亚洲艺术周,这位大英博物馆中国馆的馆长在邦瀚斯介绍了当时即将开幕的新中国馆。在座无虚席的房间里,她首先在身后的屏幕上播放了几张现代中国的照片:20世纪90年代上海密密麻麻都是自行车的马路,以及21世纪北京国庆期间堵得水泄不通的公路。她说,这20多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与此同时飞速发展的,还有中国的考古学。新的中国馆想尽可能呈现这些新的考古成果。

第二次见到霍吉淑,是在大英博物馆的何鸿卿爵士中国及南亚馆里。这天,她为大约20位游客做了导展,这也是中国馆在修缮之后向公众开放的第一天。在此之前的一天,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刚参加了中国馆重新开馆的仪式,这是25年来她第二次来为中国馆宣布开幕。霍吉淑向我们重点介绍了陈列在展厅中央的唐代墓葬俑,她说,她希望这件展品对中国馆来说,“就像蒙娜丽莎画像之于卢浮宫”。这12只栩栩如生的陶俑,高度在60厘米至115厘米之间,形象包括阴间判官、人、兽以及人面兽身。墓葬的主人是唐朝名将刘廷荀,他曾任忠武将军、河南道与淮南道校尉以及中央枢密使,728年去世。这些信息都来自于他命人撰写的墓志铭,墓志铭的文字让我们得以窥见1300年前唐朝人的生死观。刘廷荀的仕途正处于盛唐时期,当他去世时,唐朝的疆域北至朝鲜、南抵越南,向西循丝绸之路一直延伸到中亚。陶俑里随行的骆驼与马匹,就说明了唐朝与中亚紧密的贸易联系。

在陈列唐代的展柜前,霍吉淑说,大英博物馆看待中国的古代史,“更强调文化交流”。唐朝在大

英博物馆的介绍词中,被称为“伟大帝国”,与中东阿巴斯王朝的伊斯兰帝国同时代并列。这个唐帝国的“帝国国际秩序”,通过丝绸之路上与中亚、西亚的文化交流体现出来,比如丝绸玻璃器皿(很可能来自伊朗或伊拉克)和敦煌的佛像。在霍吉淑编写的中国藏品目录(《中国:物中的历史》)一书中,你会发现泉州作为马可·波罗的停靠港口被单独呈现,画着黑仆和中国瓷器的荷兰油画与明代的《出警图》并列在同一页的空间里。走到中国馆明代与清代展品交界处的时间线上,摆放着一个从欧洲部借展来的机械钟,隐喻着中国历史开始在这里跨入现代时间的大门。那段中国人所熟悉的半殖民地历史,在这里因为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叙述视角,被忽略掉了。霍吉淑重点讲述的一件展品,是乾隆的一个极为精致的漆盒,里面有很多小格子,分别放他的收藏品,比如象棋、印章、一个微型的象牙柄放大镜、一个皮盒装的龟壳望远镜、天香等。

后来在大英博物馆与大维德瓷器展厅相连的亚洲部办公室里,霍吉淑告诉我,她之所以重点介绍唐朝墓葬陶俑,是因为它的墓志铭石碑是近些年才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位工作人员发现的。从20世纪20年代这套陶俑来到大英博物馆以来,墓葬的主人是通过翻译中文文献而确定的,但现在有了实物的确认。这20年间中国有很多重大的考古发现,比如2001年湖北梁庄王墓的挖掘;还有20世纪70年代就已做的考古挖掘,近些年才开始出版研究成果,比如2016年出版的朱檀墓葬研究。每天,挖掘遗址上都有大量的新数据产生,研究这些数据的分析技术也在不断改善,比如稳定同位素研究和基因学的引入,都让我们对人类历史的认识发生着幂数级别的变化。每一刻所讲述的故事都是当时的故事,第二年这个故事就会发生改变。这些变动不居的动态,她都希望能在大英博物馆呈现。临时展常常都围绕着一个新的观念展开,但对一个永久展厅来说,“你需要反映25年的变化,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2014年至2015年,霍吉淑与牛津大学中国艺术史专家柯律格(Craig Clunas)共同策展的“明



高清杂志免费下载QQ群：280594200

大英博物馆中国馆馆长霍吉淑

朝：改变中国的50年”在大英博物馆展出。霍吉淑告诉我，策划这个展览时，他们的重点并非是有关明朝的热点，而是关注15世纪早期地方性的亲王宫廷。“我们从中国10个不同的博物馆和约20个世界性的组织借来展品，中国和世界各地研究明朝的专家为此出了30篇关于明朝这50年的论文。”

选择1400年至1450年的这段历史，也是一种新的研究和展览尝试。过去对于16世纪以后晚明的研究和介绍比较多，但当霍吉淑开始策划这场展览的时候，她发现对于明初的这50年，还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目录。“明初这50年，北京的故宫建设了起来，首都从南京迁移到了北京；在16世纪欧洲人来到中国之前，这一时期的中国也与世界发生着紧密的联系。过去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是在欧洲人到来后，才‘觉醒’被‘卷入’与世界的联系，但对明初这50年的研究表明，那种说法毫无依据。我们希望把自己的观点展示出来。”明初的藏品也能够非常全面的展示时代风貌。“再往前回溯一点，回到宋朝。宋朝留下了一些数量不大的画卷，但你很难在宋朝找到许多金饰、纺织物这样的日用品物品。

进入15世纪，这样的情况一下就发生了改变，你能找到家具、金饰、书籍、书画等，把日常生活呈现得很丰富。”

在柯律格和霍吉淑编辑的《明朝：改变中国的50年》这本展品目录和图集中，你能看到大英博物馆从湖北博物馆借展的金盆、帽顶、一组云形金累丝镶宝石簪和金丝镂空双鸾鸟簪。梁庄王墓是明仁宗朱高炽的第九个儿子朱瞻垺与魏妃的合葬墓，2001年挖掘，是中国已发掘的明代亲王墓中等级最高的，随葬物品的丰富与精美仅次于明十三陵中的定陵。这些物品，与山东博物馆朱檀墓出土的九缝皮弁和九旒冕、四川省博物馆朱悦嫌墓出土的宦官陶俑、大英博物馆从收藏家乔治·尤摩弗帕勒斯（George Eumorfopoulos）处购得的南京或北京金帽顶、费城博物馆的镶宝石金壶陈列在一起，共同呈现了明初皇族家族在中央与地方的宫廷生活。柯律格和霍吉淑都去湖北省博物馆看过这些物品，她挑选了一些能够讲述故事且极具审美价值的器物。霍吉淑说，这些地方亲王的用物，中国之外还很少被人知晓和观看。过去的关注都在中央皇宫，“但正是

这些地方性的宫廷和文化，构成了中国人地方身份的重要来源”。对欧洲人来说，“中国和欧洲差不多大，每个省都与一个欧洲国家的面积相当。这些亲王都是中央帝王权力在地方的代表，他们的墓葬留下了丰富的物品。展示这些地方性的东西非常有趣”。这些地方和中央的用品都采用了统一的视觉符号和语言，15世纪初，明朝宫廷将皇室的装饰图案都标准化了，包括龙的象征含义、凤凰的具体形象等，这一套标准化的规定一直沿用到1911年。

1421年从南京迁都到北京，是明初发生的重要空间转移。霍吉淑在策展中挑选了首尔韩国国家博物馆的一幅《送朝天客归国诗章图》，与大英博物馆所藏的《酣觥无梦闲章图》一起，呈现了宫廷生活从南京皇城内转移到紫禁城的变化。选择韩国国家博物馆这个展品时，她正坐在大英博物馆研究部这间我们进行采访的办公室里，与韩国的博物馆同行一起讨论她的策展想法。她说她想呈现南京，“明初在南京的皇宫今天已成遗址，很难复原当时的建筑了”。韩国的同行说：“啊！你知道我们在韩国国家博物馆有一件这样的藏品吗？”霍吉淑说“不知道”。对方说，他们有一幅很美的画，反映的是韩国使节与中国官员的联系，描绘的就是当时的南京，“在韩国之外，还没有人看到过这幅画”。她说她感到“非常幸运”，很愉快地借展了这幅画。这张《送朝天客归国诗章图》，罕见地描绘出15世纪的南京国际大都会的面貌。画面上，韩国使节正坐上小船，准备离开，明朝的官员站在岸边相送，附近的一个亭台里，三个官员正在下围棋。这些官员的背后，是清晰的城墙内的都市。通过与明都城图的木版印刷地图对比，可以明确这就是明初的南京，它非对称的规划是为了顺应长江的地貌。画中你可以辨识出明初皇宫的模样，它的空间布局、建筑风格 and 色彩，都与后来北京紫禁城几乎一模一样，它就是建造北京紫禁城的蓝图。这张图是霍吉淑目前所知的唯一一件展示迁都之前南京明初面貌的图，而它竟然存放在

高清杂志免费下载QQ群：280594200

霍吉淑在策展中挑选了首尔韩国国家博物馆的一幅《送朝天客归国诗章图》，这幅画罕见地描绘出15世纪的南京国际大都会的面貌。

首尔，这更增添了趣味。

在这之后，霍吉淑用了很多物品来呈现明朝宫廷的生活。大英博物馆的视野和联系是全球性的，你能在这50年的明朝时空里，看到来自故宫博物院的《朱瞻基行乐图》和《明宣宗斗鹤鹑图》，来自台北故宫的《明宣宗上马图》和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及历任皇后的肖像画，来自华盛顿史密森学院阿瑟·塞克勒美术馆的《颍国武襄公杨洪像》（镇守北京西北边关的将领），来自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博物馆的明代官员牵白马中国画，来自费城艺术博物馆的《应瑞麒麟图》，来自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描绘明代皇帝的波斯插画。霍吉淑说，这些画反映出北京皇宫的战略重要性，也呈现出皇帝的起居情况，“这些物品的顺序，以及对它们各自叙述的组合，传达出这个意向”。给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一件撒马尔罕出产的、很可能属于乌鲁格·贝格的翡翠龙杯，和一件伊朗的天球仪，也参与到对明初国际化的宫廷人员来源的叙述中。

明展也通过大量的文献，将物的叙述和文字的叙述结合起来。霍吉淑说，她把这50年的呈现，分做了“宫廷”“武”“文”“信仰”“贸易”等这些近乎于一本书篇章的章节，每一个章节，都有所依托的文献。比如，“贸易”这一章节，参考了中国和中文本中描述明宫廷招待外国使节宴会的场景；“宫廷”这一章节，在描述宫廷内国际化背景的太监群体时，参考了对明朝翻译机构四夷馆的描述；同时参考了一些描述如何与明朝中国人做贸易、朝廷礼节的文献。霍吉淑既是研究中国明朝的专家，也是瓷器专家。她说，有很多文本与物品冲突的时候，比如对景德镇的记载文献里，提到景德镇也产藤帽，但显然我们今天只看到了它生产的瓷器；龙泉据记载也生产剑，但我们从来没有找到过。然而，物的叙述与文字的叙述，都是不完善的。“我们对物的研究，只能基于那些能够保存下来的物品，但许多有机的物品却未能保留下来。仅仅靠物的叙述，也无法完全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

（主要参考资料：Jessica Harrison-Hall, China: A History in Objects, the trustees of British Museum/Thames & Hudson Ltd. London, 2017; Edited by Craig Clunas and Jessica Harrison-Hall, Ming: 50 Years that Changed China, the trustees of British Museum, 2014. 特别感谢实习生史晨瑾对霍吉淑采访录音的整理。）

封面引荐

窦文涛：走进博物馆的最深处

窦文涛是博物馆超级爱好者：朋友们没人愿意与他同行，因为他每一趟都要比别人多花至少两小时。

当然，逛寻常博物馆才如此；若是遇上个世界级艺术殿堂，两小时不够，一趟更远远不够。它们就像被无数斯芬克斯把守的迷宫一样，年复一年地使几百万人迷失在浩瀚的馆藏中。想要寻得其中真意，需要点亮三项技能。

先要加满体力值：在卢浮宫，想要在旺季一探蒙娜丽莎的真容需越过上百个攒动的头颅、推开上百具坚如磐石的身躯。其次攒够耐心值：对窦文涛来讲，耐心即是对知识与信息的贪婪，“除了闭眼睡觉，我什么都想看”。最后，若是要看难得公开的馆内藏珍，还需小小利用“金手指”。

5年前，《锵锵三人行》被大英博物馆馆长特批进入中国馆不对外开放的书画修缮室，观赏顾恺之《女史箴图》唐人摹本。窦文涛戴上口罩、脱掉鞋子，感官系统全开，恨不能看尽每一根线条，问尽每一个细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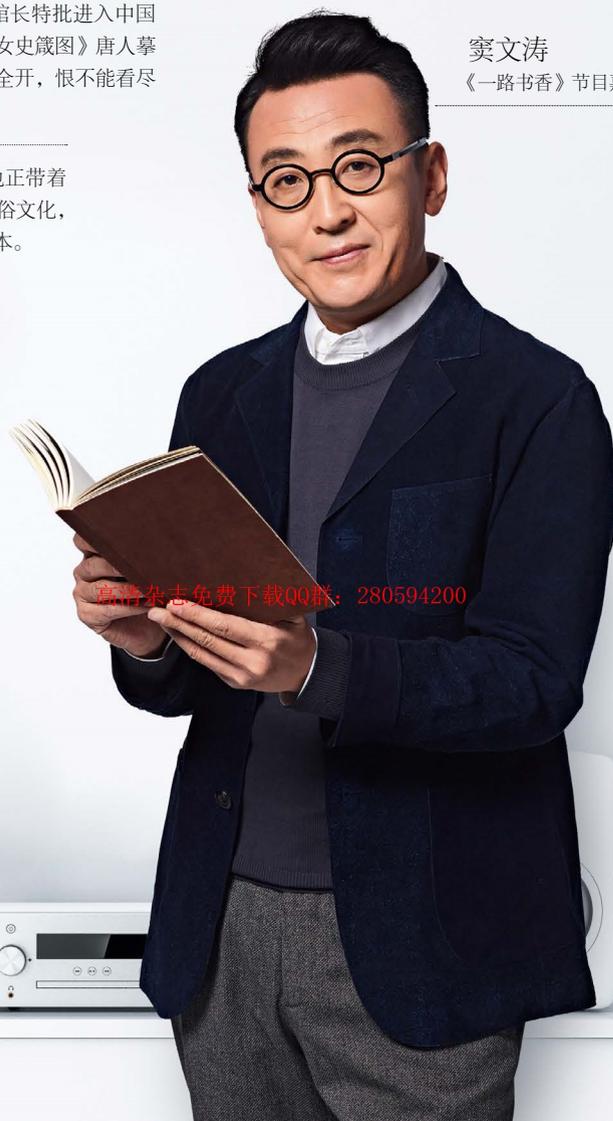
窦文涛的深度探索从未停止——现在他正带着各路明星名人探访书与作者的故乡和当地民俗文化，寻寻觅觅、风风火火地开启了全新的闯关副本。

这种一路打怪、一路成长的游戏，
窦文涛一直在玩，你要和他组队吗？



欲知详情，扫一扫二维码，听窦文涛
为你道来“大英博物馆”深处的故事。

窦文涛
《一路书香》节目嘉宾



高清杂志免费下载QQ群：280594200



在大英博物馆修中国古画

记者 苗千

我访问邱锦仙的工作室时，她的墙壁上还挂着一幅明代的画作，凑近仔细看才能发现画上原有些破洞，被补好后填上了与原作相同的颜色。邱锦仙介绍，要修补这幅明代作品的蛀洞，就需要找到明代同时期的赝品画作作为原材料，取其空白处的材质进行填补，就连用墨也要古墨才好。她恰好有一块明代的松烟墨可以用来着色，修补过后画作看上去颜色全对，修旧如旧。这块墨她已经用了30多年。

邱锦仙是上海人。1968年她在17岁时作为知青青年到了她父母的老家插队，1972年，邱锦仙回到上海，进入上海博物馆学习。当时上海博物馆总共只招收了30人，对于知青来说，这在当时是难得的返城机会。从此以后，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的纽约、波士顿，或是伦敦，这30人的一生大多都与博物馆牵扯在了一起。

当时21岁的邱锦仙在馆里学习了三个月之后，开始跟随师傅们学习修复中国古画，当时和她进入同一部门的还有5人，大家彼此以师兄弟姐妹相称。修复中国古画没有一定之规，没法照本宣科，要根据古画的年代、材料和破损程度随机应变决定修复的方法。遇到破洞，需要尽量用相同年代、相同质地的材料，按照画卷原来的经纬填补，而后填补颜色，也要尽量用古墨，注意到不同朝代不同的技法风格，按照画意来决定怎么修复。这工作学习起来上手慢，起码要五六年才有所成，10年以上才能大约有所心得。

邱锦仙在上海博物馆跟随徐茂康和华启明两位师傅，用她师傅的话说，“这辈子就被糨糊粘起来了”。直到1987年她远赴伦敦，邱锦仙在上海博物馆工作了15年，她没想过换工作，更想不到自己之后的30年时间要在大英博物馆里度过。

1987年，邱锦仙应一位台商的邀请赴伦敦修理中国古画，随后被闻讯的大英博物馆请去表演，修复馆中收藏的中国古画。邱锦仙在大英博物馆的成名之作，正是初次去时所表演的修复一幅傅抱石的山水画。当时大英博物馆里只有一位修复日本古画

的师傅，面对这幅满是破洞的中国画束手无策。这幅画是从火堆里被抢救出来的，当时受损严重，只能放在博物馆的储藏室里。邱锦仙烧了一壶滚烫的开水，用一把刷子蘸开水从正面清洗画作，这让在场的人看得目瞪口呆。从正面用开水清洗五六次之后，画作不掉色，色彩也没有晕开，邱锦仙继续再做修补，颜色跳脱出来，参观的人尽数折服。

见识了邱锦仙的技艺，当时大英博物馆的东部主任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执意留她在大英博物馆工作。罗森联系了当时的上海博物馆馆长、青铜器专家马承源，说服对方同意让邱锦仙留在伦敦工作几年。邱锦仙在大英博物馆工作的前三年并不算是正式员工，著名收藏家、港商徐展堂为她捐赠了三年的工资，按照计划她会在三年后回国。

到了1990年，英国经济衰退，大英博物馆也面临着大裁员，政府部门来了巡查员逐个审查博物馆中2200多个员工的岗位。博物馆中过半的工作岗位消失了，却单单出现了一个中国古画修复师的新职位。当时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上千件中国古画中，很多珍品因为年代久远或保存不当而处于危急状态需要修补，却只有邱锦仙一人有此技艺，她于是留下来接受了这个工作。直到现在，在大英博物馆总共800多名员工中有大约50人从事文物修复，邱锦仙仍是其中唯一的华人。

让邱锦仙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是她在2014年与从上海博物馆来的同事们一起修复了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顾恺之《女史箴图》唐摹本。顾恺之是晋代画师，即便其唐摹本距今也有1400多年的时间。这幅画曾是乾隆皇帝的最爱，据传当年就挂在乾隆的书房“三希堂”里，从画作上的痕迹来看，上一次有人对其进行修复也是乾隆年间了。大英博物馆收藏这幅处于破损状态的名作多年，却一直束手无策，不知道该如何修复和保养。在邱锦仙之前，博物馆中两位修复日本古画的师傅曾试着按照修复日本古画的方法处理《女史箴图》，却适得其反，让画作表面更显脆弱。

邱锦仙和同事们商量，采用保守疗法，对画作添浆，用的材料是邱锦仙通过多年经验摸索出来的



邱锦仙（右二）与同事和徒弟一起修复中国古画，她是30年来在大英博物馆修复中国古画的第一人

淀粉糨糊和化学糨糊的混合物，修复之后再重新裱起。如今这幅经过了抢救的名画被存放在一个由一位华侨捐赠10万英镑建造的储存箱内，里面环境恒温恒湿，光线黯淡。邱锦仙对此感到非常满意，相信这幅名作再保存个二三十年完全没有问题。

在修复傅抱石的画作与修复《女史箴图》两次引人注目的工作之间，是邱锦仙在大英博物馆里一心修复中国古画的20多年，其间她还修复了众多名作，包括明代画家吴伟的《凤凰仕女图》与宋邦的《北京宫城图》，这些画作只有在经过修复和装裱之后才有可能被妥善保存和展出，否则只能放在条件欠佳的博物馆储藏室里——在传世珍宝和垃圾之间往往只有一线之隔，修裱师能多抢救一件，世界上就多了一件珍品。

这30年间，作为在大英博物馆修复中国古画的第一人，邱锦仙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中国元素越来越受重视是原因之一，修复中国古画的独特技巧同样引人注目。相比于作于宣纸或是绢上的中国画作，西方的版画和油画往往质地更结实，也更容易修复。邱锦仙的工作似乎也有着中国哲学独特的神秘感，她用刷子蘸着开水在画作正面进行清洗，

看似大开大合却不会损坏画作本身，而修补、着色、重新装裱，让一幅有几百甚至上千年历史的古画的颜色重新跳脱出来，充满立体感，又几乎相当于一次重新创作。

邱锦仙自称是救治古画的“画郎中”。实际上不只是古画，大英博物馆中收藏的一些现代中国绘画也需要邱锦仙进行装裱才能展出。邱锦仙今年66岁，粗略算了一下，她说30年来在大英博物馆她起码修复了200多件中国古画，其中仅敦煌画卷就超过100件。如今处于半退休状态的邱锦仙每周工作三天，面对的仍然是看似无穷无尽的工作，她还要对自己带的两个徒弟言传身教，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够独当一面。

大量遍布世界各地的中国古画需要修复，但如今具有这门特殊技艺的人才短缺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中国也不例外。邱锦仙回忆，在1972年她刚刚进入上海博物馆时，博物馆里尚有20多人专门修复中国古画，到了2006年时她回国开会，听说全国从事这份工作的已经不足百人。现在国内的一些大学里开设了相关专业，为博物馆培养专门人才，但学生们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继承衣钵，完全取代上一两代人尚未可知。☑

大英博物馆历史上的重要收藏家



汉斯·斯隆
Hans Sloane, 1660 ~ 1753

汉斯·斯隆爵士是一名内科医生，更是一名大收藏家，其藏品来自世界各地。1753年他去世时，将自己一生的藏品全数捐赠给国家，这些藏品便成为大英博物馆的发端。

汉斯·斯隆出生于爱尔兰基利里（Killyleagh）一个家境普通的家庭。他从小就对自然历史怀有莫大兴趣，先后在伦敦与法国接受了医学教育。1689年，斯隆在他家的布鲁姆斯伯里广场（Bloomsbury Place）3号楼开设了一家诊所——恰好在现今博物馆大楼所在街道的旁边。作为一名优秀的内科医生，斯隆研制出了天花接种疫苗，推广了奎宁（治疗疟疾）的使用并发明了一种增进健康的牛奶巧克力饮料。他在1719年成为皇家医学院院长，1727年成为皇家学会会长。

而斯隆的收藏生涯则始于1687年，他作为阿贝玛公爵（The Duke of Albemarle）的随行医师前往牙买加，旅程中他收集了800个植物物种及其他活标本并将它们带回伦敦。此后，他的收藏网络与私人交往在殖民扩张的地理背景之下，与北美、非洲、亚洲、西印度群岛等地建立起联系。他在英国、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及驻外使馆工作的朋友从好望角、马达加斯加、印度、中国、波斯、马来西亚、日本等地为他收集了很多诸如种子、贝壳、墨水、毛笔、鞋子、香水、墓碑、茶具等异域奇物，他也开始为英国越来越庞大的殖民地编写资源目录。

1753年，93岁的斯隆去世。在遗嘱中他将自己所有收藏赠给乔治国王二世——他留下了71000多件藏品。除了自然历史标本，还包括2.3万枚钱币和徽章，5万册书籍、版画和手稿，一个植物标本室和1125件“有关古代传统和古物有关的收藏”。这些遗赠便是大英博物馆创始之初的藏品。



威廉·汉密尔顿
William Hamilton, 1730 ~ 1803

汉密尔顿是英国外交官、考古学家和火山学家，出身于贵族家庭，从小和乔治三世一起长大，被乔治三世称为“寄养兄弟”（foster brother）。

在短暂担任议会议员之后，1764年，汉密尔顿成为英国驻意大利那不勒斯大使。大使汉密尔顿每隔10天左右就要向国务卿报告当地情况，以促进英国在这一地区的商业利益。这些官方的职责使他有足够的时间发展自己对艺术、文物和音乐的爱好，也激发了他在火山和地震等方面的兴趣。汉密尔顿对庞贝（Pompeii）、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等深受希腊文明影响的意大利南部城市着迷，由此开始收藏各类希腊花瓶和其他文物，他不仅从经销商或其他收藏家那里获得收藏，甚至还会直接亲自掘墓考古。很快他便成为希腊、罗马和伊特鲁里亚文物的狂热收藏家，尤其热爱古董花瓶，获得了大量古代文物，包括大奖章、钱币、珠宝、青铜雕塑以及大量受到高度赞扬的古代彩绘陶器花瓶。汉密尔顿的藏品对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的新古典主义艺术和设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汉密尔顿收藏的花瓶不一定本身出名，更多是因为他制作的相关出版物将文物的理想化图像传播给了英国和欧洲读者。从1776年开始，汉密尔顿相继出版了四卷本自己收藏品的雕版印刷品《来自尊贵的威廉·汉密尔顿陈列室的伊特鲁里亚、希腊和罗马文物收藏》。

1771年，汉密尔顿在第一个任期休假回国时，将自己的收藏以8410英镑的价格卖给了大英博物馆。他收藏的希腊花瓶是大英博物馆第一个主要的古典时期文物藏品，其他著名的还有：赫拉克勒斯石像的巨大头部、古意大利制浮雕容器波特兰德壶、古代希腊罗马壶及古瓮，以及他搜集的苏威火山地质和矿物资料等。1798年，汉密尔顿任期到任，他将自己的艺术收藏品和二手收藏花瓶送回英国拍卖。收藏家托马斯·霍普（Thomas Hope）购入了他藏品中大部分的南意大利花瓶。



查尔斯·汤利
Charles Townley, 1737 ~ 1805

除了威廉·汉密尔顿，还有不少旅居在罗马的英国贵族加入了发掘意大利遗迹的行列，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查尔斯·汤利，一位古董商人和收藏家。

1767年开始，汤利开始自己在意大利的三次“大旅行”（Grand Tour）。汤利经济实力雄厚，在罗马、那不勒斯、帕埃斯图姆等地巡游期间，他从众多意大利没落贵族以及罗马文物经销商手中购买了大量古罗马时代的文物，包括古董雕塑、花瓶、钱币、手稿和绘画作品。他最热衷收藏大理石，远近闻名的“汤利大理石”（Townley Marbles）现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的希腊和古罗马文物部。

随着收藏品的不断增多，1778年汤利在伦敦西区公园街（Park Street）修建了一所专门用来存放藏品的房屋，很快这个地方便吸引了大量观众参观。1791年汤利当选为大英博物馆的托管人，对当时大英博物馆的拓展起到了很大作用。1805年，汤利在伦敦公园街的家中去世，他的继承人将他毕生收藏，300余件大理石雕塑、陶器和青铜器藏品，以2万英镑的价格卖给了大英博物馆。其中包括克吕提厄半身像、哈德良半身像、掷铁饼者、汤利花瓶等，此后，这些收藏都成为大英博物馆的核心藏品。



奥古斯都·沃拉斯顿·弗兰克斯

Augustus Wollaston Franks, 1826 ~ 1897

弗兰克斯爵士是英国文物学家、博物馆管理员。大英博物馆的历史学家马乔里·凯吉尔 (Marjorie Caygill) 形容弗兰克斯为“大英博物馆历史上最重要的收藏家，也是他所在时代最伟大的收藏家之一”。

弗兰克斯出生于日内瓦，他早年主要在罗马和日内瓦度过。作为剑桥文物学会早期成员之一，他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期间奠定了对古代和中世纪艺术知识的基础。

1851年弗兰克斯被任命为大英博物馆古文物部助理，正式加入大英博物馆。此后在此工作的45年间，他创立了五个新的文物部门。弗兰克斯还是英国研究中世纪古代文物的权威人士，包括瓷器、玻璃制品、人类学相关的工艺品和其他稍晚于古典时期的艺术品。

1866年至1896年，弗兰克斯担任大英博物馆托管人期间，激发了博物馆对亚洲文化、民族志和历史的极大兴趣。弗兰克斯用私人财富收购了大量物品，包括英国和欧洲的史前材料。同时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人脉，为大英博物馆增添了许多藏品，比如印度考古调查首任总管、考古学家亚历山大·坎宁安 (Sir Alexander Cunningham) 爵士的礼物，其中包括雕塑、铭文、硬币和圣物箱等。

此外，弗兰克斯拥有丰厚的个人财富，他曾经与博物馆的收购工作并行，个人致力于收集中世纪艺术的陶瓷和珍贵物品，累积了一些非凡的个人收藏品。虽然这是作为独立收藏家的活动，但从长远来看对大英博物馆的收藏也十分有利。

1897年，弗兰克斯去世。这一时期大英博物馆伊斯兰艺术收藏品迅速发展，弗兰克斯和弗雷德里克·杜卡恩·古德曼 (Frederick Du Cane Godman) 贡献了许多重要遗赠，其中包括大量伊斯兰金属制品和釉彩陶器。此后，波斯和印度微缩细密画鉴赏家，也是弗兰克斯爵士众多继承人之一的劳伦斯·宾扬 (Laurence Binyon) 对亚洲文明继续保持极大兴趣，在其领导之下，大英博物馆创建了独立的东方版画和绘画分部。

精英阶层的捐赠极大丰富了大英博物馆的藏品，但在18、19这两个盛产慷慨收藏家的世纪里，世界各地的文物资源也就此源源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汇入到大英博物馆，成为20~21世纪的博物馆伦理之争议。



詹姆斯·库克

James Cook, 1728 ~ 1779

詹姆斯·库克，人称库克船长 (Captain Cook)，是英国皇家海军军官、航海家、探险家和制图师。库克船长出身于一个农场之家，年轻时担任英国商船队中的见习学徒，定期往返英格兰沿岸各地运载煤炭。在此期间，库克学习了代数学、几何学、三角学、航海和天文学各方面的知识。

1755年，库克加入英国皇家海军，他参与过七年战争，后来又在魁北克围城战役期间协助绘制圣劳伦斯河口大部分地区的地图，战后在18世纪60年代为纽芬兰岛制作多张精细的地图。库克绘制地图的才能获得海军部和皇家学会的青睐。

自1769年开始，在12年的时间里，库克三度奉命出海前往太平洋，在数千公里的航程途中深入不少地球上未为西方所知的地带。他带领船员成为首批登陆澳洲东岸和夏威夷群岛的欧洲人，也创下首次有欧洲船只环绕新西兰航行的纪录。在探索旅途中，库克也为不少新发现的岛屿和事物命名，大部分经他绘制的岛屿和海岸线地图，都是首次出现于西方的地图集和航海图集内。

在库克船长远航太平洋期间，他获得了大量民俗资料和手工艺品，主要有澳洲土著居民新西兰毛利族?的精致木雕细工、石制和动物骨头制的雕刻品、仪式用具等。其中还有很多当地原住民所赠送的物品，比如塔希提岛族长赠送的葬仪用祭服便是以银细工和珍珠贝编织成的华丽服饰。这些有关大洋洲文化的民俗资料和手工艺品首次丰富了大英博物馆民族志文物馆藏，也为西方认识澳洲和新大陆提供了窗口。



奥斯丁·亨利·莱亚德

Austen Henry Layard, 1817 ~ 1894

莱亚德是英国考古学家、楔形文字研究学者、艺术史学家和外交家。他出生于巴黎，少年时代大部分时间都在意大利度过，在那里他培养了对艺术和旅行的热爱。

1839年，莱亚德离开伦敦一家律师事务所，在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的马背上开始了冒险旅程。1842年，英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斯特拉福德·坎宁爵士 (Sir Stratford Canning) 交给他非正式的外交任务，由此他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摩苏尔附近投入大量时间，开始对发掘研究伟大的古巴比伦文明越来越有兴趣。

这之后，莱亚德在尼姆鲁德和尼尼微的亚述遗址发掘使得其收藏品大大增加了。1845~1851年，在尼姆鲁德，莱亚德发现了公元前9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的亚述巴尼帕二世的西南官殿 (North-West Palace) 遗迹和大量艺术品。包括其统治时期的众多雕塑，比如今在仍是大英博物馆最珍贵藏品之一的人首翼牛像 (Winged bull)。

在尼尼微的亚述王辛那赫里布的官殿里，他发掘了超过70个厅堂和通道，发现了大量的石刻浮雕和石碑，其中包括撒缦以色三世的黑色方尖碑，巨大的守卫雕像等。莱亚德的当地助手霍尔木兹德·拉萨姆 (Hormuzd Rassam) 在尼尼微发现了亚述巴尼帕官的北官殿以及著名的皇家狩猎狮子系列在内的许多浮雕。他们还发现了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皇家图书馆——亚述巴尼帕图书馆的遗迹，以及可能是迄今发现的最重要的一组楔形文字片，莱亚德从中了解到很多有关亚述和巴比伦的文化历史。

莱亚德的考古探索极大增加了西方对于美索不达米亚古代文明的知识。1953年他出版《在尼尼微和巴比伦遗迹中的发现》一书，记录了自己探险的全过程，一经出版就受到极大欢迎。1866年，他被任命为大英博物馆的托管人。☑ (整理 吴扬)

中国的地方政府会破产吗

主笔 谢九

近日，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提出探索地方政府破产制度，引发了市场的各种猜想，中国的地方政府未来真的可能会破产吗？

最近几年，随着地方债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隐患，这已经不是国内第一次有人提出地方政府破产的想法。早在2014年，财政部的一份地方债课题研究报告就曾经建议研究制定《地方政府破产法》，从法律上明确地方政府应承担的债务风险责任，在地方政府资不抵债时，允许地方政府宣告破产。从3年前财政部提出研究《地方政府破产法》，再到现在央行研究局局长提出探索地方政府破产制度，可以看出关于地方政府破产的研究已经在较高的层面进行，如果未来中国出现地方政府破产的事件，应该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在很多发达国家，地方政府破产都有法可依，而且在现实中也时有发生，比如美国的汽车之城底特律，就曾经在2014年破产。对于中国地方政府而言，破产之所以还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件，一是因为中国政府对于稳定有很高的需求，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多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都很难被允许破产，更遑论地方政府，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地方政府，爆发危机后通常都由中央财政兜底，由此也形成了中国的惯例。第二个原因在于，中国的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不同于美国的联邦制，尤其是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地方政府的财权有限，而承担的事权过多，中央也很难对地方的债务危机坐视不理。

由于市场对于中央政府的兜底形成了强烈的预期，因此，很多地方政府都不顾自己的实际财力而大肆举债，金融机构也不顾地方政府的实际偿还能力而随意购买，由此形成的后果就是，地方政府官员享受了经济增长带来的政绩，金融机构无风险分享了地方债的收益，而潜在风险最终不得不由中央政府买单，而一旦各级地方政府的这种疯狂举债达到一定的量级，最终也就形成了中国经济的整体风险。最近几年，中央提出中国经济既要防“黑天鹅”，也要防“灰犀牛”，地方债被普遍视为中国经济最大的“灰犀牛”。

2015年以来，我国开始实施地方债券置换，通过发新债偿还旧债，为地方政府偿债争取了更多的时间，同时降低了地方政府的利息支出，为缓解地方债起到了积极作用，截至2016年末，全国法定限额内政府债务余额27.33万亿元，负债率（债务余额/GDP）为36.7%，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水平，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5.32万亿元，债务率（债务余额/综合财力）为80.5%，低于国际通行的100%~120%警戒线。

虽然从总体规模上来看，地方债已经告别了过去高速增长的势头，但是并不意味着地方债的危机警报已经解除。首先，我国的地方政府存在大量的隐性债务，很多地方政府通过PPP、政府投资基金、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变相举债，实际上也构成了地方政府的真实负债，但是这些负债并未出现在官方统计数据之中，其规模之大不容忽视。其次，地方政府负债即使总量上开始放缓，但是结构上的压力和风险并未减轻，公开资料显示，我国有100多个市本级、400多个县级的债务率超过100%，部分城市的负债率甚至超过400%，其中有些地方政府从技术上而言已经处于资不抵债的地步。

2017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未来三年的三大攻坚战，其中头条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下，防范地方债风险显然会成为监管重点。从最近一段时间来看，对于地方债的监管明显开始升温。财政部网站日前公示了江苏省和贵州省处理部分市县违法违规举债担保问题的信息，两省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共计70多人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处分，其中不少前任官员也被追责，终身问责制开始生效，应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地方政府官员的举债冲动。

近几年，中央虽然反复强调对于地方政府债务实行不救助和不兜底的原则，但是在没有真正地方政府破产之前，这些警告对于地方政府很难形成有效的约束，中国经济也始终难以摆脱地方债的潜在风险。允许地方政府发生破产可能才是真正的王牌，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打破地方政府对于中央无原则兜底的幻想，地方债的无序扩张才能从根源上被斩断。

地方政府破产，并不意味着政府关门大吉，更

准确地描述应该是地方政府财政破产，政府仅仅保留最基本的功能，除了维持基本的民生支出和正常运转之外，其他的政府开支被大力压缩，政府职能被控制在最低限度之内。地方政府破产之后，购买地方债的金融机构也应该按照市场化原则承受应有的损失，而不会得到政府的救助。唯有如此，地方政府才可能遏制举债的冲动，而投资者才可能以市场化原则判断地方债的收益和风险，在市场化定价的原则下，很多实力不足的地方政府将失去举债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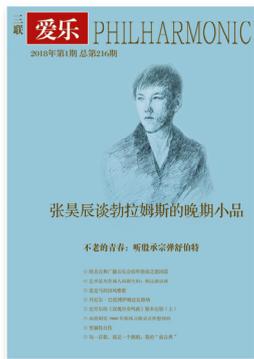
2014年，财政部的研究报告提出研究制定《地方政府破产法》，此事虽然并无实质性进展，但其实最近几年我国的一些政策性文件还是变相提出了地方政府破产。2016年11月，国务院发布《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其中就提出了地方政府的财政重整计划，“高风险地区通过实施一系列增收、节支、资产处置等短期和中长期措施安排，使债务规模和偿债能力相一致，恢复财政收支平衡状态。”某种意义上，地方政府的财政重整，其实就已经和地方政府破产相当接近。

《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其实对于地方政府的债务重整已经有了一套相当详尽的办法。当市县债务管理领导小组或债务应急领导小组认为

确有必要时，可以启动财政重整计划。市县年度一般债务付息支出超过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0%的，或者专项债务付息支出超过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0%的，债务管理领导小组或债务应急领导小组必须启动财政重整计划。财政重整方案主要包括：拓宽财源渠道；依法加强税收征管，加大清缴欠税欠费力度，确保应收尽收；落实国有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增加政府资源性收入；除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财税优惠政策之外，可以暂停其他财税优惠政策，待风险解除后再行恢复；优化支出结构；财政重整期内，除必要的基本民生支出和政府有效运转支出外，视债务风险事件等级，本级政府其他财政支出应当保持“零增长”或者大力压减；处置政府资产；指定机构统一接管政府及其部门拥有的各类经营性资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国有股权等，结合市场情况予以变现，多渠道筹集资金偿还债务；以及申请省级救助。从上述举措来看，其实已经形成了相当完备的破产重整流程。

从长远来看，地方政府破产其实并非坏事，和公司的破产重组一样，都是一种保护措施，破产的公司在度过短期阵痛之后，如果重整得当，未来还有重新起飞的机会，地方政府的破产也是如此。☑

大家都来听一点古典音乐



邮购部电话：
010-84050425 010-84050451
E-mail: aiyuetougao@foxmail.com
《爱乐》杂志官方微博 @ 三联爱乐

《爱乐》2018年第1期要目

封面话题

张昊辰：“勃拉姆斯是一位敛藏者”

声音 聆听空气中的现场
每月康塔塔

专栏·恒常变奏 寂静：准古典纯音乐谈话开篇
专栏·斑狐说乐 布里顿：关于美国音乐的畅想
话题 再次苏醒的阿里奥丹特

笔记

录音中的费尔曼和卡萨多
艺术是为普通人而诞生的：帕拉兹访谈
（海边的卡夫卡）中的舒伯特

早期音乐 从洛可可到曼海姆乐派
现代音乐 回声与噪音中的《偏狭的1960》
专栏·浮生碎乐 不老青春：听殷承宗弹舒伯特

专栏·藏彝爱乐 灯下琐记一二三
作品之眼 亨德尔的管风琴协奏曲
歌剧物语 20世纪西方歌剧物语

人物 倡导建立中国艺术歌曲的规则：范范马的国风雅歌
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论瓦格纳
文萃 舒伯特与施莱格尔兄弟：浪漫主义的黎明
资料库 贝多芬的《玫瑰经奏鸣曲》版本比较
唱片 新曲产生美：由波利尼1960年版练习曲录音所想到的

书房 诗人之乐：评《世界的声音：陈黎爱乐录》
乐迹 里赫特自传
往事 每一首歌，就是一个拥抱：我的“前古典”

《爱乐》2018年订阅须知

2018年《爱乐》月刊，每期160页，全年12期，零售单价：20元，全年定价：240元。2018年《爱乐》邮局发行，邮发代号：82-24，读者可到各地邮局直接订阅，也可汇款至杂志社订阅。

银行汇款：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燕莎支行
户名：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账号：0200012709201646336

邮局汇款：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收款人：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网上支付：www.lifeweek.com.cn

网络购买方式：天猫旗舰店、官方微信



天猫旗舰店



官方微信店



【新华社中国供图】

非洲别墅里的中国电信诈骗犯

文 / 于杰

2017年12月21日宣判的“4·13”特大跨境电信诈骗案中，犯罪团伙通过越洋网络电话，骗取了总额达2900余万元的赃款，其中金额最高的一笔案额超过400万元。人们发现，瞄准中国大陆居民的电信诈骗集团在20年间已经远征全球，开到了非洲。

46号别墅的火灾

如果不是一起发生在非洲的意外火灾，或许会有更多中国大陆居民因为一通电话而财破人亡。

2014年11月29日，肯尼亚内罗毕“46号”别墅起火。火情被控制后，肯尼亚警方觉察到屋内有蹊跷，一共有30余名中国人居住在这个两层别墅

内，现场还散落着几十部电话、语音网关和电脑等物品。肯尼亚警方马上起疑此处是一个电信诈骗“窝点”，他们以涉嫌“非法架设电信设备罪”逮捕了在场的23名台湾犯罪嫌疑人和13名大陆犯罪嫌疑人，这些犯罪嫌疑人随即被遣返回中国。

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金融犯罪检察部副主任孙晴是此案的检察官，她对本刊记者讲述了由此引发的系列案件。她告诉我们，以嫌疑犯从案发地肯尼亚被押解回国的时间点——2016年4月13日为节点，这一案件被称为“4·13”特大跨境电信诈骗案。她说，在这次押解过程中，肯尼亚警方发现犯罪嫌疑人中有多人频繁要求上厕所，形迹可疑。随后，一部手机在机场停留区厕所内被发现，多条可疑电话和短信曝光，号码显示来自中国的台湾地区和大陆。当地警方按图索骥，三天后，另一个疑似电信



(殷刚摄/新华社供图)

左图：2016年8月5日，肯尼亚法院于当日上午9点对电信诈骗案进行宣判，并在当天判决后将所有涉案者遣送中国大陆

右图：2016年4月13日，北京首都机场，第二批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从肯尼亚押解回国

诈骗窝点“201号窝点”浮现，张凯闵、林金德等22名台湾犯罪嫌疑人和19名大陆犯罪嫌疑人落网。

戏剧性的是，在甄别张凯闵、林金德管理的“201窝点”的电子证据时，恢复的电脑数据中又现可疑，其中一些“返乡订票记录单”显示，该窝点的负责人及其部分成员曾在2012年两度进入印度尼西亚。之后查实，部分人员在来到肯尼亚之前曾在印度尼西亚两度进行电信诈骗。随后，11名曾在印尼参与电信诈骗、而后返回大陆未赴肯尼亚继续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又陆续被缉捕到案。至此，因为一场意外的火灾，远涉非洲的两个跨境电信诈骗窝点曝光，相关的77名犯罪嫌疑人、物证均交由大陆警方遣返回中国。

近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了这起特大跨境电信诈骗案：诈骗窝点为台湾人组织，招募大陆和台湾地区居民赴肯尼亚充当“话务员”。他们假冒北京、上海的公安及检察机关人员，通过越洋网络电话，以审查中国公民个人账户的名义骗取总额达2900余万元的赃款。受害者来自北京、江苏、山东等地，共185人，其中金额最高的一笔案额超

过400万元。

这种骗术并不新鲜，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类似的骗局就已出现在台湾地区。20年间，它从台湾传入大陆，荼害无穷，因遭遇电信诈骗而家破人亡的惨剧频频发生。2015年12月，河南一雄姓菜农因被台湾诈骗分子骗走了1万元，在汇款的农业银行门口上吊自杀，他原本希望用存下的这笔积蓄做点小生意改善生活。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2016年4月的新闻发布会上披露，还有一名来自吉林的女士因电信诈骗而跳楼自杀，犯罪分子骗走了她丈夫的死亡抚恤金。

“4·13”诈骗案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是，77名被抓捕并遣返的犯罪嫌疑人中，44名是中国台湾籍。而在近年破获的多起特大跨境电信诈骗案中，中国警方也发现，类似的诈骗分子中有很大比例是台湾籍人士，且多为团伙头目或领导层级。而据公安部门统计，2015年，全国电信网络诈骗发案金额222亿元，其中100多亿元被卷入台湾。而在2014年，107亿元电信诈骗赃款有80余亿元在台湾被取走。

2017年12月21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了此案。作为窝点组织管理者的两名台湾人张凯闵、林金德刑期最长，均领刑15年。这也是跨境作案的台湾电信诈骗分子首次在大陆被审判。

“电脑手”、“警察”和“检察官”

去肯尼亚前，台湾人王玮琨对外声称，他要去一个非洲的“公司”上班。王玮琨有海外留学经历，但在台湾投资失败，债台高起，为了挣一笔“快钱”，他在2016年10月来到肯尼亚。

肯尼亚时间每天凌晨3点，王玮琨就开始了工作。这家“公司”按照北京时间作息，早8点上班，晚5点下班。因为能力优秀，王玮琨在“201号窝点”担任“三线”话务员，他在二层楼有自己的单独房间。等级次之的“二线”话务员两人一个房间。“一线”话务员有十余个，他们一起挤在一层客厅里接听电话。“一线”话务员多数由大陆人担任，他们技术不甚熟练，到非洲先培训，每天记背“话术单”。

一天的诈骗工作由“电脑手”开启，由他按下发送键，成千上万条语音包信息从“公司”的网络电话平台飞出，穿过大陆运营商的通讯线路，到达被选定的大陆手机号。“您的医保信息被泄露”“您有一个快递未查收”，语音包先抛出诱饵，接听者随后会听到一句“要了解更多信息请按9键”。

担任“电脑手”的台湾人刘泰廷在庭审现场供述，窝点管理者一天指定一个要诈骗的省份，如选定了山东，他就会查询山东手机的号码段，系统即可群发语音包信息。

海量诱饵被抛出，若有人咬钩，“一线”话务员就登场了。他们自称是快递公司或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发现来电者的“快递里是护照”或“医保卡消费异常”。电话那端往往会质疑，表示自己并未办过签证或近期末使用医保卡。“一线”话务员这时

会说：“您的个人信息已泄露，如需报案，请按×键……”

电话被转接给“二线”，“二线”冒充警察。“警察”开始引导来电者说出姓名、家庭情况、职业、收入、银行账户等个人信息。随后，他先挂断电话。不久，一个以“010”开头，显示为相关公安局公开号码的电话响起，受骗者将被告知，经查实，其已是相关经济犯罪嫌疑人，或涉嫌洗钱犯罪。受骗者急于自证清白。“警察”继续严词诱骗，称需要受骗者将个人账户余额转移至“安全账户”，让公安机关审查。如果电话那端还有疑虑，就需要像王玮琨这样的“三线”出场了。

“您涉嫌经济犯罪，需提供财产明细，请按#键转接检察院……”有人按了#键，在王玮琨冒充的北京检察院金融犯罪科“科长”的电话指示下，一步步在ATM机或网银上向一个“安全账户”进行转账。为了增加可信度，在打电话时，话务员们会播放预先录制的公安局等场景的背景音。同样的做法还包括，他们会提醒“客户”拨打114查询来电是否为公安局电话，但这些越洋电话早已通过改号软件做了修改。

孙晴称，“4·13”案件的受害者涉及面较广，从事各行各业，也包括各种学历水平。他们对此类诈骗并不熟悉，在听到涉嫌犯罪时急于自证清白，或担忧信息泄露资金有安全威胁，而一步步掉入诈骗陷阱。

跨境诈骗产业链

46岁的林金德是台湾台中人，他是惯犯，早在2011年，他就在台湾岛内从事电信诈骗，去肯尼亚前还多次前往印度尼西亚行骗。在印尼，他先担任“电脑手”，因为业绩优秀，被提拔为“201号窝点”的负责人。

被抓获时，“201号窝点”刚在肯尼亚开张一个月。林金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肯尼亚窝点的作案方式与此前“基本一致”。“201号窝点”从2016年1月开始招人，两个月就在台湾和大陆招了41名话务员，多是“文化程度低、不好找工作的人”，其中还有很大比例从事过电信诈骗。林金德告诉他们，若被发现，就说是来“旅游的”。

林金德生活的台湾地区，是跨境电信诈骗的发

“4·13”案件的受害者涉及面较广，也包括各种学历水平。他们在听到涉嫌犯罪时急于自证清白，或担忧信息泄露资金有安全威胁，而一步步掉入诈骗陷阱。

源地。上世纪90年代末的台湾社会深受其扰，在多方打击下，当地民众提高了警惕性。2003年，台湾电信诈骗集团开始将诈骗目标对准海峡对岸的福建，其后又蔓延至中国其他地区。随着受骗者增多，中国于2007年开始打击这种犯罪，诈骗分子在2009年后将犯罪窝点转移到柬埔寨、印尼等东南亚地区，并招募两岸居民当话务员。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随即联手打击，他们又远涉非洲和欧洲等地区，足迹逐渐扩散至全球。驱使他们远征的是电信诈骗的暴利。一位担任“三线”话务员的台湾人向媒体透露，他在肯尼亚3个月就挣了20万元。

暴利之下，围绕着跨境电信诈骗的一整条地下“产业链”铺展开来。现公安部副部长王小洪曾结合多年刑侦经验，在一篇论文中分析指出，经过多年发展，台湾地区的跨境电信诈骗呈现明显的“职业化”特征，各环节高度分离，“搭建诈骗网络电话平台”“拨打诈骗语音电话”“到银行开户卖卡”“提取转移诈骗赃款”等各个环节都有人专门负责。

远征外国的是“话务组”，他们随身携带着诈骗集团编写的“话术单”和“问答单”，其中详细记载着冒充“医保局”“公安局”等不同身份人员实施诈骗时的“话术”策略。孙晴告诉本刊记者，用“快递”和“医保卡”作为诱饵，是犯罪分子结合大陆地区近年的社会现实而更新的“话术”。

在国外，话务员被要求深居简出，证件和手机统一管理，但允许和家人进行联系。他们由台湾组织者安排食宿和日常生活，有统一的作息时间。“4·13”案件罪犯曾供述，在每日开始工作前，“公司”会开会布置任务，每日工作结束后也会进行总结。

按照行规，话务人员每月根据等级按不同比例提成。“4·13”案件的一位话务员曾向媒体透露，“一线”的工资为“底薪+提成”，每月5000元加成功诈骗金额的3%，“二线”提成比例为4%至5%，层级最高的“三线”则可以拿到8%。若业绩优秀，他们还可逐步升级，甚至升为管理者主管新窝点。

记账分成、发放工资的团队一般设在台湾，称为“水房”。“水房”从“车手组”处获得赃款。专门转移诈骗财产的“取款组”被称为“车手”，也多设在台湾。“话务组”罗织骗局诱使受骗者深入的同时，会同时和“取款组”联系“叫车”（指提供可用的“安全账户”）。一旦受害者说出银行账户，“取款组”立即提供相应银行的“安全账户”对接。钱一入账，

短时间内就被转移。

在台湾，还有“车手团”专门研究如何快速转移、分解赃款，为诈骗集团提供服务。媒体报道称，一位天津受骗者在2013年9月被骗走697万元，警方发现，他的钱先被转至70余个账户，又被转至130余个账户，最后在台湾陆续被取走。

隐藏最深的是跨境诈骗集团的头目“金主”，他们常以“连锁店”的方式在各地开设诈骗“公司”。2010年，台中地检署发现一个诈骗集团“金主”在台湾地区开设了近30处窝点，在大陆、印尼等地又设有10处窝点。为了安全，设在域外的诈骗窝点一般仅运行几个月，而犯罪分子也常在短时间内将骗取的巨款挥霍殆尽，从而使追缴赃款的难度加剧。

中国刑警学院刑侦系教授许昆在一项研究中分析，在20年间，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经历了从“台湾——跨海峡两岸——第三国（地区）”的演变，诈骗手法也推陈出新。例如，诈骗“话术”就经历了几个阶段的迭变：从中奖通知、亲友出事、遭绑架诈骗到银行卡被盗刷，再到假称“你有一张法院传票”，近年又出现假冒公务人员要求查询被害人账户。

因为“挣钱快”“处罚轻”，在台湾，有近10万人以面向大陆实施改号电话诈骗为生。公安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电信诈骗的发案数量年均增长20%至30%。2015年，以台湾人为骨干的电信诈骗犯罪团伙实施诈骗犯罪占全国发案案件的20%，但造成的损失占比却高达50%以上，千万元以上大案要案基本都为台湾电信诈骗集团实施。孙晴告诉本刊记者，“4·13”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年龄多在20岁到30岁之间，中学学历者居多，其中有一人刚刚成年。

阻击困境

“4·13”案件的宣判备受社会各界瞩目，其后折射了跨境电信诈骗长期面临的赃款难讨、追责困难的处境。这是大陆第一次从境外将台湾犯罪嫌疑人押回审判，而在此前，被抓捕的嫌疑人被送回台湾后，多有被轻判又重操旧业的例子。

犯罪成本低让电信诈骗在台湾地区广受诟病。台湾未对电信诈骗单独立法，只以普通欺诈审判，最高刑期为5年。林金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其2011年曾在台湾被捕，但当时的窝点负责人只被

台中市法院判了1年零10个月，他被关了6个月就放出了。

一项数据显示，电信诈骗者在台湾被判处刑罚的不到10%。2016年4月15日，几乎与“4·13”案件同时期，20名台湾电信诈骗嫌疑人被马来西亚遣送回台湾。但因相关犯罪证据掌握在大陆警方手中，这批嫌疑人到达台湾机场后就被释放。此事在台湾岛内引发争议，有台湾媒体刊发评论称，此举将使“社会治安付出代价，无辜民众继续受害”。还有媒体报道，一位被骗取了钱财的大陆居民，费尽周折追踪到“车手”在台湾被抓，但他赴台湾讨公道时，却发现其已不在押。

北京警方曾公开表示，大陆公安机关虽采取各种措施追赃，但截至2016年4月，仅从台湾总共追缴回20.7万元人民币，其他案件赃款绝大部分被台湾犯罪嫌疑人转移、挥霍。

猎财的暗网也捕获了不少大陆的公职人员。其中一起震动舆论的案件发生在2015年12月29日，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局财务主管兼出纳杨某先后遭遇自称是“农业银行总行法务部”和“上海松江公安分局”的电信诈骗，将该局账户上1.17亿元资金转移出去。由于案情重大，当地公安局投入500余名警力展开侦查，最后追踪到一个由台湾头目在非洲乌干达搭建的诈骗窝点。2016年1月，62名犯罪嫌疑人被抓捕，其中10名为中国台湾籍，涉案资金上亿元被冻结。

许昆分析，跨境电信诈骗犯罪正在呈现个案损失不断攀高、瞄准目标更加精准等特点，并且涉及的范围更广，犯罪集团规模不断壮大。在2009年向域外转移后，台湾电信诈骗集团的涉案数额屡屡攀高，曾制造“2010年3月29日深圳群众王某被骗2264万元案”“2010年11月2日云南群众揭某被骗2311万元案”等案件。

电信诈骗之恶昭彰，由大陆审判台湾犯罪分子被解读为既可维护受害者权益，又可震慑两岸犯罪分子。以“4·13”案件为开端，不断有台湾电信诈骗嫌疑人被遣返回大陆。2017年8月3日，在捣毁了雅加达、巴厘岛等地的5个犯罪窝点后，143名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从印度尼西亚被押解回国，其涉及200余起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涉案金额高达2000余万元。近日，西班牙国家法庭也裁定，将两批共计214名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嫌疑人引渡回大陆，其中来自台湾者占据多数。

但跨境电信诈骗的各环节分处多个国家和地区，也使警方办案面临很大挑战。有知情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4·13”案件的“金主”目前在台湾，尚未到案。

技术监管失守

即使严惩了台湾犯罪分子，阻击电信诈骗仍将面临多环节失守的困境。珠海格力集团副总裁陈伟才曾在“两会”上公开指责，跨境电信诈骗频发，存在多环节监管不力的问题，如对通信线路和银行网络的监管。

腾讯安全云库总监、资深网络安全专家邵付东解释，境外团伙给用户拨打诈骗电话，目前基本是通过VOIP网络电话实施，他们通过专门的线路商购买运营商的通讯线路，并搭建VOS服务器接入，就可方便地使用改号软件向大陆拨号。

而在取款环节，犯罪分子常利用网上银行技术实现赃款的快速转移、分流，以躲避司法机关的财产冻结。陈伟才在调研中发现，一笔3800多万元的被骗款在20个小时内就被取走，诈骗集团雇用了5个洗钱转账团伙，使用了大陆17家银行的3607张银行卡和台湾26家银行的797台取款机。他建议，应让“买卖银行卡入刑”，同时，运营商也应对未拦截诈骗电话担责。

电信分析师付亮告诉本刊记者，工信部对于拦截境外诈骗电话已有所行动。在2016年10月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信部总工程师张峰透露，中国的运营商被要求通过提升技术手段，对号码传送不规范的可疑电话号码和来电“一律拦截”。同时，互联网企业也被要求清理整治网络平台对改号软件的售卖。此前，改号软件可在网络轻易买到，有的售价仅两三百元。但邵付东提醒，诈骗分子擅长钻营，其可通过更隐蔽的渠道获得改号软件，并通过更改电话号码形态，进入中国通信网络的多个接入点内找到拨进电话的空间。而为了躲避资金追查，在将资金逐级转移的过程中，他们又会将资金转入支付宝等第三方，使资金追查难度增加。

打击跨境电信诈骗或许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付亮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提出担忧，随着软件技术、互联网技术、电信技术等的融合，诈骗分子也将更新技术，以降低运营成本，“他们也在做大数据，可能会骗得更精准”。

中读专栏

三联生活
传媒有限公司

陪孩子一起 听音乐

雪枫老师带来的
音乐故事

主讲人

刘雪枫

古典音乐理论学者，音乐评论家
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
曾任三联《爱乐》杂志、
《留声机》中文版、《交响世界》主编

为孩子精选180首动听迷人的经典名曲
订阅即享全年美妙的亲子时光



音频

图文

纯音乐

每周二、三、五、周六更新



1

王新生：明治维新无法用简单的因果关系进行说明

记者 刘周岩

“奔着 A 的目标去，可能半路就去了 B，还没到 B 又变成了 C，最终落到了 D 的结果，明治维新就在这个过程中误打误撞地生成出来。很多时候历史无法用简单的因果关系进行说明。”

150 年前的 1868 年，日本开始了史称“明治维新”的现代化转型过程。明治维新成为日本历史最重要的转折点。如何在日本自身的历史脉络中理解明治维新？今天的日本人对明治维新是一种怎样的感情？本刊专访了著名日本史学者王新生。王新生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日本近现代历史与政治，代表著作有《现代日本政治》《日本简史》等。



2



3



4

1. 描绘 1853 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舰队打开日本国门后在横滨与日本统治集团会面的油画

2. 1885 年一户日本人家的餐前准备

3. 1875 年一幅刊登在伦敦报纸上的名为《日本文明化过程》的油画，画面展示了明治时代的街头部分日本人已开始穿西装，以融入“文明”世界。福泽谕吉将社会激烈变化的明治时代的生活称为“一身二世”

4. 明治天皇（1852~1912）。“王政复古”、明治维新开始时他年仅 16 岁，时局主要由长州藩和萨摩藩上层统治者操控

三联生活周刊：1868 年 1 月 3 日（农历一八六七年十二月九日），萨摩、长州两藩发动政变，宣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废除幕府，成立新政府。当晚召开由新政府成员参加的小御所会议决定命令幕府将军德川庆喜辞官纳地，统治日本 260 年的江户幕府宣告结束，明治时代正式开启。这次政权更迭被视作明治维新的标志性事件。在此之前，日本国内的形势是怎样的？

王新生：“王政复古”以前就是日本的江户时代，由德川氏控制的幕府统治。江户时代日本是双重的二元政治，一方面是幕府将军与天皇，天皇不掌握实权，将军掌握实际权力，另一方面是将军与大名，将军控制全国四分之一的领地，但是大名在自己的

领地上有高度的自主权。江户时代末期的日本社会处一种相当停滞的状况，无论是农业还是人口的发展。

直到 1853 发生了彻底改变日本社会的黑船事件。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舰队驶入日本，强迫幕府开放港口。将军顶不住外国人压力，在 1854 年订了《日美亲善条约》，这激起不少势力的反对，幕府内部对反对派搞清洗，又激起新的叛乱。自此，日本社会的微妙平衡被打破，所有政治势力都陆续登上历史舞台。

三联生活周刊：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把文明的演进归为“挑战与应战”的模式。在第一次面对来自西方的挑战时，日本国内的政治势力是以怎样

左图：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新生

右图：1872年，明治天皇与日本及英国官员在横滨火车站出席日本第一条永久铁路建成仪式。该铁路由东京至横滨，全长19公里，由英国人设计建造



【王旭华摄】

的方式和心态应战的？

王新生：在美国人到日本之后，统治阶级的上层、将军和大名等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主张是否和外国人谈判，下级武士阶层则发起了“尊王攘夷”的运动，强烈排外，要“杀掉洋鬼子”，很像我们的义和团。

对外国人的乱砍乱杀引发了两场局部战争，因为装备技术上的全面落后，日本人完败。这两场战争彻底改变了下层武士的观念，他们开始向西方学习。这是日本民族的特长，只要发现你是强者，我就无条件地、彻底地向你学习。为了更好组织起来进行变革，下层武士为主导的势力决定推翻幕府统治，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尊王攘夷”变成“尊王倒幕”，16岁的明治天皇被利用，大家就以天皇的名义倒幕。经过一场不大的内战，幕府统治被终结。

三联生活周刊：新的明治政府建立之后，主要是哪些势力主导，从哪些方面进行了变革？

王新生：主要是由幕府时代比较有实力且支持变革的长州藩和萨摩藩的精英政治人物主导，进行了一系列学习西方的变革。首先是首都由京都搬迁

至江户，也就是今天的东京，建立近代国家统治体制，1873年“废藩置县”，由传统封建体制向近代官僚管理体制转型。同时完善法制的建设，标志性事件是1889年明治宪法的颁布，同时还有民法、商法等一系列法律的出台，称为“六法齐全”，其中民法制定的时候有很大争议，论争了10年。不过这里面也不全是实际的变革，有的只是为显示日本已经“文明”了，好方便和西方谈判、取消不平等条约。

再有就是普及教育、进行工业化建设、发展军队等一系列措施。九所帝国大学，三菱、住友、三井这些财阀，都是在明治时期创建发展起来的。生活习俗上也有很大改变，当时政府专门发布了一条“禁止裸足令”，不允许国民光脚，因为按照西方的标准这是不文明的，哪怕日本气候潮湿也不行。结果导致日本人脚气病一下变成国民病，当时缺医少药死了不少人。江户时代因为宗教等因素日本人很少吃肉食，天皇也开始带头吃牛肉。

三联生活周刊：在明治维新中，被称为日本历史上最伟大天皇之一的明治天皇本人发挥了什么作用？

王新生：我觉得明治天皇个人发挥的作用很小，他是一个被包装的人物。名义上他是许多改革措施和法律的制订者，但实际上真正把控政治权力的元老们希望他离政治越远越好。他只是被塑造成一个权威符号，起到凝聚国民认同、效忠国家的作用。明治天皇其实很少有机会做决定，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前他对战争持消极态度，但并不起作用。

三联生活周刊：明治维新以前的幕府时代和“二战”后的西式民主，日本都有长期稳定的政治制度，从明治维新到“二战”这不到百年是日本政治制度变革最激烈的时期，大致上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王新生：从明治维新到“二战”，日本经历了元老政治、政党政治和军部政治这三个阶段。明治时期是元老掌控实际权力，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政党政治但很快权力被军部夺取。明治宪法里实际上有两条致命的制度缺陷，一是没有规定谁来任命首相，二是没有规定谁来统率军队。这两个明显缺陷在明治时期是不突出的，因为都是元老们轮流或共享权力，但是元老们一旦不在了，这样的缺陷就会演变成严重的问题，后来军部裹挟日本走向军国主义道路和这样的制度漏洞有很大关系。

元老们过分自信了，他们相信自己在的时候不会出问题，但没有想到他们过早离世或离开权力中心。明治一代最有能力最聪明的政治家伊藤博文1909年在哈尔滨被安重根刺杀，如果他活到20年代，日本近代政治走向很可能不同。

三联生活周刊：“二战”以前，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为唯一一个实现了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看，有哪些解释可以说明这场变革运动的发生及“成功”？

王新生：很多不同的学说都可以对这个“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提出解释，但都不充分。比如在日本有深厚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尝试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角度解释，但比较困难，江户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和生产力变化并不突出，经济是相对停滞的。如果按照马克思·韦伯的思路，从伦理变化解释资本主义在日本的产生，可以解释一些。从汤因比的“挑战与应战”模式，无法完全说明为何不同国家都面临外部压力，只有日本实现了现代化转型，还是要考虑内部因素。

原东京大学教授三谷博先生研究了一辈子明治维新，也不能完全给予阐释，其利用的一种研究方

法叫复杂系统，简单说就是没有原因的变化。按照他的思路，参与并主导这场运动的下层武士，最开始也没有明确的想法和路线图，奔着A的目标去，可能半路就去了B，还没到B又变成了C，最终落到了D的结果，明治维新就在这个过程中误打误撞地生成出来。这种现象确实存在，很多时候历史无法用简单的因果关系进行说明。

三联生活周刊：今天的日本人对明治时代是一种怎样的感情？

王新生：日本人很怀念明治时代。日本的国民作家司马辽太郎，他的很多历史小说比如《坂上之云》代表了一种对明治时代乐观和进取精神的强调，被称为司马史观。司马史观中心意思就是说明治是好的，昭和是坏的，明治是向上的、发展的时代，昭和被军部引入了歧途，最终在“二战”中日本走向灭亡。当然，我认为这是有点问题的，因为两个时代不是能够割裂开的，明治和昭和，有因才有果，但司马史观确实代表了很多日本人的态度。

日本人每年都会纪念打开日本国门的佩里，在他登陆的地方举办盛大的化装游行，其中佩里的角色最受男女老少的欢迎，走到哪里都是喝彩一片。这在中国是很难想象的，我们绝对不可能在虎门炮台像纪念英雄般纪念敲开我们国门的鸦片战争中的英国人。曾经有新华社记者记者在纪念佩里的现场问日本人他们怎么想的，日本人的回答是：“他给我们带来了近代文明。”日本人在明治维新的历史评价问题上，抱持了一种相当实用主义的态度。☑

高清杂志免费下载QQ群：280594200



孙歌：明治维新并非值得中国人羡慕的现代化转型方式

记者 刘周岩

“中国人对日本有一种说不出的自大和自卑。中国人常常觉得我们有几千年的文明，是宗主国，日本文明发展得很晚，不过是近代占了便宜。好像日本很光鲜亮丽地就变成了一个发达国家，觉得都是明治维新带来的。但是历史的事实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身在其外，无法感受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内在创伤。”

明治维新改变的不仅是日本，更深刻波及近代中国。先人一步现代化了的日本成为古老中国向西方学习过程中的榜样和中介，也成为近代中国无尽灾难的源头之一。如何在中日现代化转型比较的视野下看待明治维新？什么是明治维新留给我们的启发与教训？本刊专访了著名日本思想史学者孙歌。孙歌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政治学博士，代表著作有《主体弥散的空间》《竹内好的悖论》《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思想史中的日本与中国》。

三联生活周刊：日本中国学研究者沟口雄三曾有如下论断：“中国的近代和日本的近代并不是辛亥革命和明治维新的产物，相反，是中国的近代成就了辛亥革命，日本的近代成就了明治维新。”中国近代成就辛亥革命很好理解，因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间经历了漫长的动荡与艰难转型。不过日本近代成就明治维新该如何理解？1853年发生黑船事件，美国以炮舰威逼日本第一次打开国门，1868年就开始了明治维新。与中国相比，日本在应对西方挑战时，似乎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他们的转型过程更少“弯路”吗？

孙歌：我认同沟口先生的判断。他的意思是说，不是哪一个具体的事件——比如辛亥革命或明治维新，导致了现代化，而是说外来的刺激使历史发生了变动，变动的结果最终呈现为这样的事件。这是与从现代化命题出发看历史不太一样的出发点。今天我们关于日本明治维新的印象是，好像黑船事件敲开日本国门后，日本国内只在短时间内有过尊王攘夷的排外运动，然后很快达成共识形成民族国家，实现了现代化。这其实是过滤了历史里边那些复杂而且是关键性

的环节之后的抽象说法。

从浓度来讲，日本明治维新一点也不比中国从鸦片战争经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的浓度低，而且也不是那么顺利的转型。明治维新建立的明治政府也不是铁板一块，它是一个藩阀政府，主要由长州藩和萨摩藩的精英人物构成其核心集团。这个核心集团又在19世纪70年代因为征韩论看法的对立而分裂了，随即在日本国内发生了西南战争。广义上的明治维新持续了几十年，其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内在紧张，绝不亚于清末民初转型期的内在紧张。福泽谕吉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他说明治维新时期的人是“一身二世”，你在明治维新时期等于活了两辈子。这是充满内乱和各种历史可能性的时期。

当然，从规模与构成方式上看，日本是个小国，中国是个大国，中国比日本远为复杂。它需要同时解决多民族政治体的重建与次殖民状态的问题，而且面临着割据还是统一的选择，日本的侵华战争又加剧了这种选择的紧迫性，中国的转型过程必然要更艰难。相比之下似乎日本的转型看似容易得多，不过，很难说日本“一下子”就转到了现代国家轨道上来。

三联生活周刊：明治维新是自上而下的变革，但一般民众的态度和社会情绪似乎体现出了足够的配合以实现如此之快的一次西方化转向。这和日本人的文化性格有关系吗？

孙歌：转向快慢说白了就在于士兵和老百姓是否听话。日本人纪律性非常强，这一点和社会构成的方式有关系。相比于古代中国，日本社会的流动性更小，长子继承制的传统保持了家业的稳定性，社会分工十分明确，这样的社会比较容易建立自上而下的秩序。明治维新时期，对于老百姓来说，所谓西化给他们带来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比如本来日本普通百姓是没有姓氏的，为了便于管理，明治政府下令要百姓给自己搞个姓氏，大家就纷纷凭借各种灵感给自己取姓氏。比如家门口可以看到山包的，就叫“丸山”，在河汉口的，叫“江口”。还有，日本人原来只吃鱼和飞禽，不吃陆地上的走兽，为了增强国民的体魄，明治政府号召百姓吃肉，老百姓也改变了饮食习惯。甚至日本的佛教僧侣，也由于政府的指令开始吃肉、娶妻生子。所以福泽谕吉对日本的佛教有批评，认为这种跟着政府指令走的佛教很可疑。对于普通人而言，明治维新



(藤小川攝)

日本思想史学者孙歌

并不是政治变革，而是生活方式变革。即使在意识形态上，他们接受了要建立强大的日本这种说法，但是他们在生活层面理解“强大”的意义。甲午战争之后，女教育家下田歌子创建实践女子学校，建校宗旨就是培养有知识的现代妇女，以便生育教养体魄强健心灵健全的男子，为国效力。至今实践女子大学也仍然是一所文化教养、烹调缝纫这类技术性课程为主要科目的大学。

明治维新之后，明治政府强化了对于“公”和“私”的空间性规定。就是说，政治需要在官府这个空间里讨论，在私人领域以及社会生活领域这个空间里不能讨论“公事”即政治。虽然五条誓文第一条就是“万事决于公议”，但这个公议其实是要在“御前会议”上开展的，不是哪里都可以“议”的。这个习惯直到今天都还存在。我在日本有时故意问一些普通百姓对政治的看法，他们都会说“官家的事我们可不懂”，这一点和中国老百姓是完全不同的。当然现在已经不是明治时代了，日本人也常常上街游行，但是政治不会成为普通日本人茶余饭后的话题，这一点没有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一种关于中日现代化转型对比的常见说法是，明治维新是“成功”的，而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一系列转型努力都是“失败”的。19世纪50年代中日都受西方压迫，起点类似，但到了这一世纪末，中国在半殖民化压迫下越陷越深，日本则基本完成了国家独立、经济和军事建设，反而变为了压迫

其他国家的“列强”之一。你怎么看中日现代化转型“成功”与“失败”的比较？

孙歌：我觉得“成功”和“失败”的判断方法在判断历史时并不那么有效。我们不能只对一时一地的结果做出评判，而是要看历史长时段延续的发展轨迹。从这个角度，难说明治维新是真正成功的。

明治维新之后，紧接着的是两场战争，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年的日俄战争，这也是明治政府后期主要做的事。这两场战争给现代日本蒙上了非常沉重的阴影——因为他们都打赢了。前一场是和同文同种的曾经的宗主国，后一场是和白人，这两次重大的胜利给整个日本国家和民族留下的记忆是后患无穷的。日本在战争中尝到了甜头，从此走上了不归路。日本国内在明治维新以后有很多遏制军国主义的努力，但都没法成功，直到“二战”战败。我个人认为，“二战”后期日本敢于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除了走投无路外，也和日俄战争的集体记忆带来的盲目自信有关。这种以主动发动战争完成的现代化方式，并不值得中国人羡慕。

中国从前近代的王朝体制向现代国家转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是一种脱胎换骨的代价。如果说日本的转型是向外的，那么中国的转型是向内的。结果就是日本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改变，而中国却在不断地革命。

三联生活周刊：不停发动对外战争，是否和明治

政府的根本性质有内在联系？

孙歌：对外扩张是明治政府解决国内问题非常重要的手段，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日本从幕府时期就有武人执政的传统，这和中国文官执政不同，武人执政后自然会倾向于打仗。靠对外扩张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也是当时欧洲的现代国家，尤其是日本的学习对象普鲁士所采取的方式。战争自身十分消耗国力，这就不会对战败国提出割地、赔款的要求，一旦尝到甜头又会准备发动新的战争，进入恶性循环。战争不仅是获取物质资源的手段，也是改变社会风气的途径。例如西乡隆盛，他主张征韩论不仅是为扩张，而是觉得明治维新盲目西化，造成了奢靡享乐的风气在朝野上下流行，他认为是非常有害的，希望用一场战争来清除这样的风气。总之，以武力解决问题是明治时期最基本的方式，这对日后的历史进程发生的负面影响不能低估。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说“中国人对日本有一种说不出的自大和自卑”，这种复杂的悖论情绪是否就来源于对日本现代化转型过程的一种想象式理解？

孙歌：中国坊间确实是有这样一种对明治维新混合了羡慕、妒忌的潜意识。近代以来饱受战乱、对日本和西方列强的割地赔款，对中国人的记忆塑造是非常深的，让中国人觉得近代没受过殖民迫害的日本躲过一劫，心理很不平衡。中国人常常觉得我们有几千年的文明，是宗主国，日本文明发展得很晚，不过是近代占了便宜。好像日本很光鲜亮丽地就变成了一个发达国家，觉得都是明治维新带来的。但是历史的事实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身在其外，无法感受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内在创伤。有日本传媒统计日本的抑郁症比例是非常高的，一个完全幸福的社会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抑郁症比例呢？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政治经济方面的结果，明治维新的西方化过程对日本文化直至今日的自我定位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日本思想家竹内好在上世纪40年代批判日本文化“转向”特性时曾讽刺：“文化总是从西方来的。”他认为日本向强者（西方）看齐的“优等生文化”导致自我意识的丧失，反倒是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虽然挣扎得多，但正是在挣扎的过程中保留了确立文化上的自我的可能性，鲁迅是做出这种努力的杰出代表。以竹内好为代表的强调日本文化主体意识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反思明治维新的？对我们反思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有何启发？

孙歌：竹内好本人有一句非常精辟的话：明治维新大于明治政府。他想去发掘的，正是明治维新这个历史过程比明治政府所作所为更丰富的可能性。竹内

好尤其关注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西乡因为坚持征韩论遭反对，辞职回乡后发动反政府的西南战争，兵败而死。竹内好在这里看到了“抵抗”和“革命”的因素，这是他认为日本文化中最需要但是始终缺少的，他希望激活历史的另外可能性。竹内好最欣赏现代中国文化的，是不安于稳定和自我批判的能力，他把孙中山、鲁迅、毛泽东打成一个序列，核心的思想信条是“不断革命”。应该说，正是日本文化的优等生性格，反衬出了竹内好思考的深度。

对竹内好他们而言，一个国家建立主体性需要有主体性的国民，这是明治维新没能完成却开了先河的思想与文化课题。明治维新时期的思想家，比如福泽谕吉、中江兆民，都留下了这样的思想遗产。福泽谕吉因为“脱亚”论出名，实际上那只是很短的一篇文章，他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对民众启蒙。《文明论概略》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念，是把“智”放在比“德”更重要的位置上，这和中国人习惯的排序是不同的。福泽谕吉认为，没有“智”的“德”就可能是伪道德，无智之人会固守外在的、空洞的道德信条，不会使道德成为公共生活的纽带；“智”主要指的是公共智慧，就是在特定时间、空间上进行准确判断和选择的能力，这也是对政治能力的基本要求。因此智慧不可能是固定的教条；世上有伪君子，没有伪智者，就证明了这一点。要想造就有道德的国民，先要使国民拥有智慧。与福泽谕吉同时期，中江兆民则论述了进化的多样性问题。他反对只把西欧的现代化视为唯一进化形态的单线思维，认为不仅欧洲有进化，非洲食人族、土耳其、波斯也各自有自己的进化道路。他特别指出，进化之神的大敌就是不问时间地点的脱离实际的言行。这当然是有具体所指的，中江兆民批评的是盲目的欧化与盲目的武力扩张。在甲午战争之前，他就警告明治政府不要轻易与中国为敌，倡导日本对世界采取和平政策，避免战争，减轻人民负担。可以说，中江兆民体现了福泽谕吉所提倡的公共智慧，更显示了大于明治政府的明治维新的另类可能性。

中国人太急于现代化了，但我们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许多问题都没有得到认知。日本思想家的这些思考，比如福泽谕吉提出的“智”的重要性、中江兆民提出的进化的多样性、竹内好提出的明治维新大于明治政府的视角，这些思想遗产都是耐人寻味的。如果我们能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自己的历史，或许我们的公共智慧也会更成熟一些。在明治维新150周年之际，我们可以以此为契机，深入思考自己面对的思想课题。■

三联生活周刊 专题集结

《穿越丝路： 发现世界的中国方式》

这是一部纵横 1500 年的中西交融史。《三联生活周刊》编辑部历时一年，足迹踏遍丝绸之路沿线，从历史、经济、文明、器物、现场几个角度，深度挖掘“一带一路”对中国未来的巨大战略意义。



《大学的精神： 教育是让一个人成为 最好版本的自己》

全方位了解世界名校，以及精英学生是如何生活和学习的，从中为你困惑的教育问题寻找答案。



《关于人生， 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来自 童书》

献给那些内心柔软、深沉爱着这个世界和孩子们的人，你的感受我们都懂得，只等你来读，其后的共鸣会让你感动到热泪盈眶。



《匠人匠心： 用一生，做好一件事》

修故宫的人李永革、沉香雕刻大师郑尧锦、龙泉四老、紫砂徐门……本书介绍了近 20 位中国传统手艺人及其他他们承载的手工艺，传达出传统手工艺人的纯粹的精神之美。



微信书店



天猫旗舰店

流淌开去的壶中日月

文 / 钟小武



(上图) 粮食基地；(下左) 坚守自然，五谷酿就五粮液；(下右) 五粮液古窖

在宜宾的两天，不论漫步在水流奔腾的金沙江边，还是藏身于午夜街头的路边小摊，我总能闻到空气中飘散的浓郁而醇厚的酒曲味道。这似乎并不奇怪，地处金沙江、岷江、长江交汇之地的宜宾，素有“中国酒都”之称，也因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为“在地球同纬度上最适合酿造优质纯正蒸馏白酒的地区”。

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酒大概是最能碰触灵魂的饮品，也往往能在最短时间里，让人卸下心中防，坦诚以待。12月19日晚，由五粮液集团主办的“2017中国国际名酒文化节·国际名酒品鉴夜”便再次印证了这一点。帝亚吉欧、保乐力加、百富门、富邑等世界名酒品牌齐聚五粮液，共同成立了“一带一路”国际名酒联盟。在各类顶级名酒的品鉴台前，不同国籍与背景的人们，以酒为媒，把酒言欢。穿插于名酒品鉴之间的是代表各国特色的文化表演，比如中国的昆曲，美国的踢踏舞，西班牙的弗拉明戈舞，一时之间，

衣袖飘飘，举杯频频。如果说昆曲代表着优美精致的中国传统文化，无疑，白酒便是中国酒文化的最佳名片，而白酒之中，又尤以采用泥窖固态发酵、混蒸蒸馏的独特工艺制作的浓香型白酒为典范。据统计，浓香型白酒的市场份额要占到市场总量的70%以上。

作为中国浓香型白酒的典型代表与行业领军品牌，五粮液所传承的酿酒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千年之久，而在宜宾鼓楼街至今仍在使用的数十口明代古窖池，迄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由于以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粮食为原料，“合五粮之精，和五行之气”，这种以往称作“杂粮酒”的白酒，于1909年正式得名于世。

“千年老窖万年糟，酒好还要窖池老”，这几乎是人们谈及浓香型白酒必然会提到的一句话。然而，历史需要传承，市场亦需要开拓。近年来，五粮液将国际化作为未来开拓的重要方向。12月18日由中国酒业协会主办、宜宾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五粮液集团公司承办的“一带一路中国名酒文化高峰论坛”，无疑不论对五粮液还是中国白酒的国际化之路，都具有重要意义。

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白酒是世界最古老的蒸馏酒，但比起威士忌、白兰地、清酒等世界著名烈酒，在国际市场的开拓上依然有很大差距。据统计，2016年中国白酒的整个出口额15.72亿美元，这一数据甚至远不足国外一个名酒品牌在中国的销量。在“一带一路中国名酒文化高峰论坛”上，中央财经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院长周卫中还列举了一组数字：“酒类进出口总额，出口跟进口比大概是1:3，海外游客到中国的消费跟中国游客到海外消费比差不多也是1:3，每年有1亿人出国，人均消费1.2万亿，占GDP的1.87%，外国游客到我们这儿来消费大数不到700亿美元，就是4千亿元，两个1比3。”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在12月19日宜宾举行的“中国浓香型白酒高峰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宝国，就论坛的英文翻译，特别指出白酒应该直接翻译为拼音“Baijiu”而非“Liquor”。在当晚的国际名酒品鉴夜上，五粮液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彭智辅也向我介绍，中国酒业协会已经做了规定，以后向外推销白酒，不能叫Chinese Liquor或China Liquor，就应该是拼音的“Baijiu”。尽管中国白酒品类繁多，仅香型就包括浓香、酱香、清香等12种类型，但走出去时最需要有一个统一的脸谱。

中国白酒如何走出去？几个月前，五粮液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曙光在哈萨克斯坦交流时便提到：“一是对接好海外市场的政策及法律法规；二是建立中国白酒的技术标准体系，要简单明了地向海外消费者传递清楚；三是要依托中华文化推动白酒走出去。”

事实上，在法规与标准之外，如何讲述源远流长的白酒文化尤为重要。

中国是抒情诗的国度，也是酒的国度。诗与酒，自古就是滋养这个民族文化的两大源泉。据统计，全唐诗中与酒直接相关的诗篇达到1.2万篇。以古代诗人而论，陶渊明一生所作的1240首诗，40%跟酒有关；杜甫的1400首诗，300首与酒有关；李白1500首诗作，170首跟酒有关系，比例最高的是女词人李清照，114首词有57首跟酒有关系。“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江湖夜雨十年灯，桃李春风一杯酒”，几乎每个读过点书



国际名酒品鉴夜——昆曲表演

的人，都能随口吟诵出几首与酒相关的诗句。

而由于酒在诗文中的大量出现，证之以诗，诗歌本身也提供了人们了解那一时代饮酒的风尚与品类。有趣的是，人们从李白的“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醖醅”等诗句，便能很自然地推论出，李白喝过的不仅有黄酒，也有白酒与葡萄酒。如何饮酒，同样折射出一个时代的风貌与气象，至今我依然能想起高中时所读台湾诗人余光中所写《寻李白》中的诗句：“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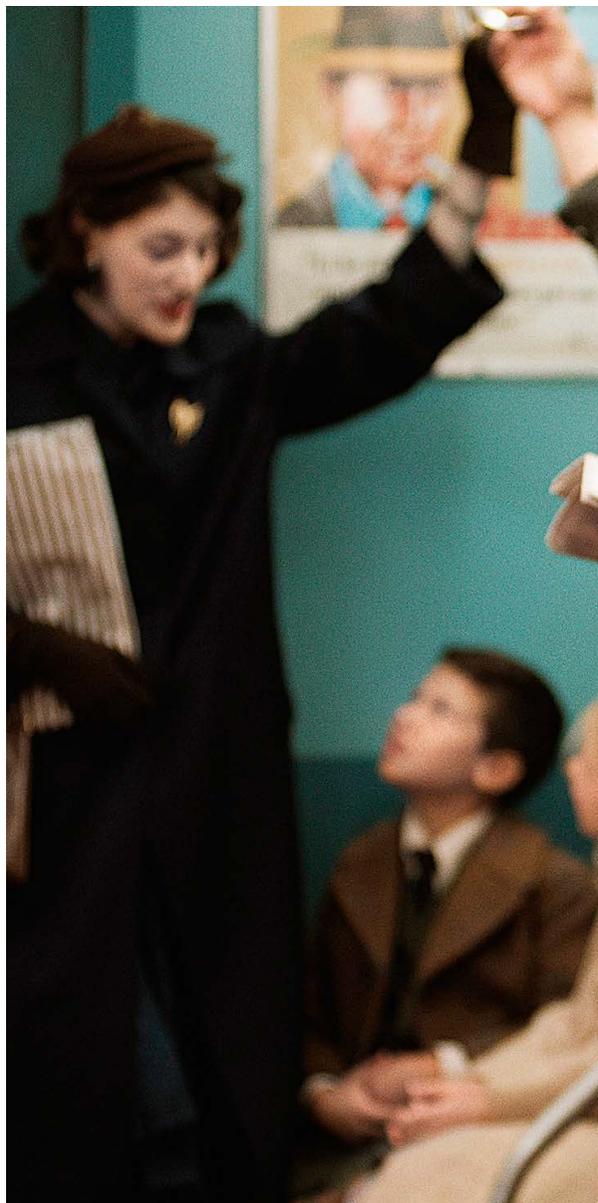
更内在的，酒文化很多时候亦折射出中国文化的核心气质。在《水浒传》“武松醉打蒋门神”一回，在一处叫“快活林”的地方，酒店门上有一幅对联，上联“醉里乾坤大”，下联“壶中日月长”，一言空间，一言时间，一个酒字，俨然吞吐八荒四野、上下千年。其中，“壶中日月长”一句，与中国园林所谓“壶纳天地”、以小见大的美学精神异曲同工。扬州个园一角的四季假山前便提有“壶天自春”四字。南北朝诗人庾信在《小园赋》中，说他的小园就是一个壶地：“一壶之中，壶公有容身之地。”背后的故事则是，东汉时有个方士叫费长房，一天在街上遇到一个买药的老翁，在药店悬一壶，每天罢市后便跳入壶中，号称壶公。有趣的是，其他人看不到，只有费长房一人在楼上看到，好奇之下便去拜会。老翁让他明天再来，随后邀他一起进入壶中。壶中华楼雅阁、美酒佳肴，妙不胜收，二人于是在里边尽情享受。

翻开煌煌典籍，酒文化的故事汗牛充栋，言之不尽。它们，不仅属于爱酒懂酒的国人，同样应该属于八荒四野的酒道中人。讲述这些故事的主角，未来无疑属于像五粮液这样的站在新时代起点上的名酒企业。■



左图：琼安·里弗斯不算是米琪这个角色绝对意义上的原型，但现实里她一直活跃到2014年去世，而且拥有非常热烈而丰富的人生

右图：《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剧照。上世纪50年代复古风格也成为本剧另一看点



“麦瑟尔夫人”有什么了不起？

记者 / 驳静

喜欢单口喜剧的人，会在亚马逊自制剧《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中发现更多乐趣，而不仅仅是失婚女人的觉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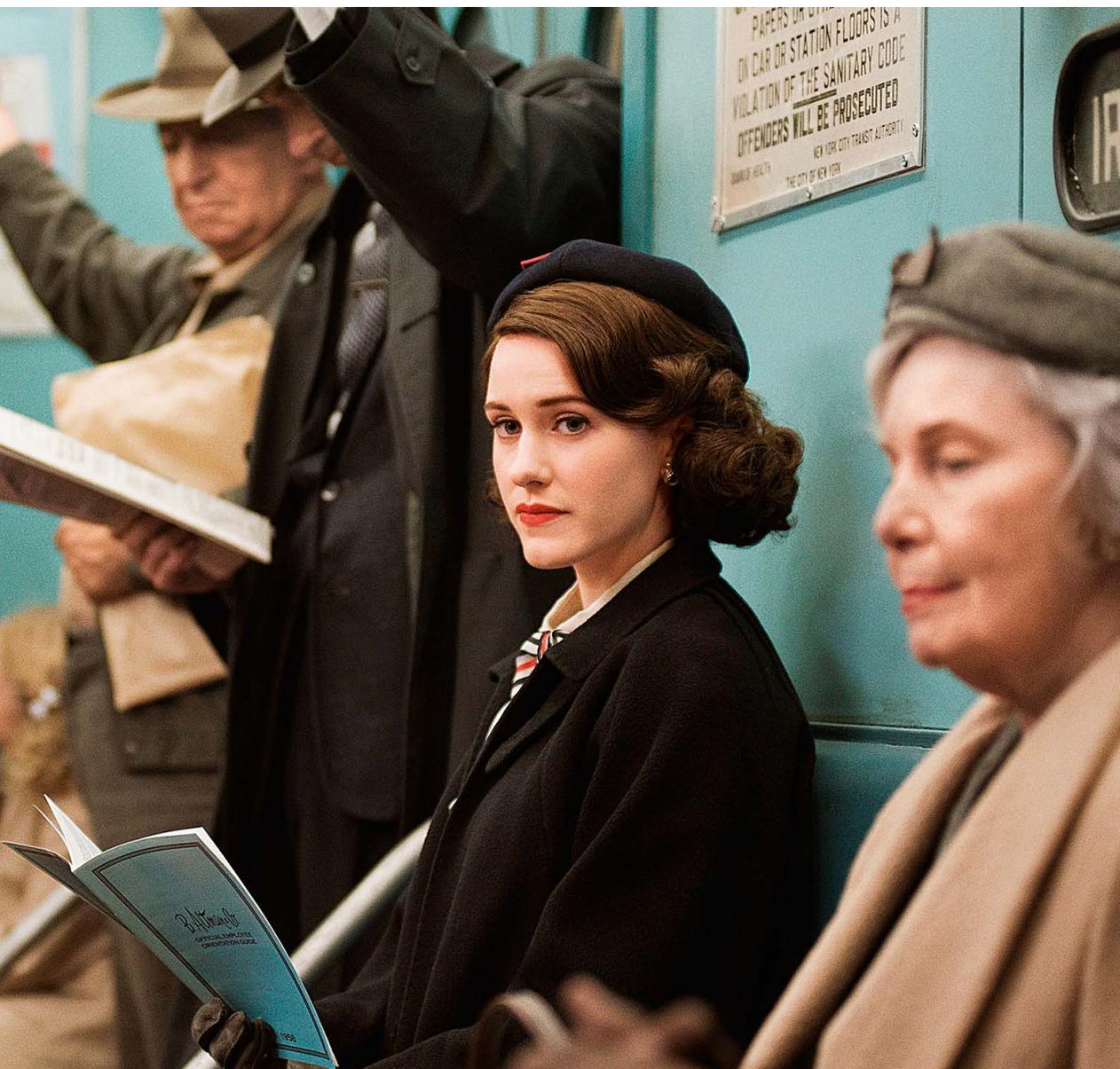
从家庭主妇到单口喜剧表演

《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The Marvelous Mrs. Maisel) 故事设定称不上特别新奇。它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纽约，女主角米琪·麦瑟尔出生于上西区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大学教授，讲授数学。她婚后育有两个孩子，跟丈夫乔住在曼哈顿一栋高级公寓里。丈夫在他父亲的公司打理生意，但有一个还挺特别的个人爱好：表演单口喜剧。

所以这对上流社会夫妇，时常出现在格林威治村的酒吧里，其中常去的是“煤气灯”(The

Gaslight Café)。妻子贤惠机智，在那里不只充当观众，还时常给“煤气灯”经理苏西带一锅拿手好菜，讨好她，以便能分给丈夫一个黄金表演时段——俱乐部江湖就是这样，跟经理关系不好，分到一个白天没什么客人的时段，那还怎么表演呢？

第一集前半部分基本就在展现米琪堪称完美的个人生活。完美到什么程度呢？每天，米琪都会将自己身体各个部位尺寸量一遍并记录下来。乔从来没看过老婆素颜，因为每天晚上，直到乔睡着，米琪才偷偷起身去卸妆。躺下前，她还会将窗户打开一条缝透气，顺便拉开窗帘，这样早上透进来的第



一道光能照在脸上唤醒自己。这个时刻一定是早于丈夫设定的闹钟，她才有足够时间化完妆躺回乔的身边。仅是这一幕，其实就足以说明米琪对自我要求之高，以及对婚姻尽心尽力。

一切都很完美，直到丈夫告诉她，他爱上了女秘书并且要离开她。说着就迅速收拾了一个小行李箱，走了。

故事开头听上去挺烂俗，但这还只是第一集。这部剧并不是《我的前半生》，浅表地讲述“离婚女子如何逆袭”，或者，“一个单亲母亲的奋斗史”。往后看，你会发现编剧其实野心挺大。

该剧将米琪放到上世纪50年代的纽约，这个时期单口作为喜剧形式本身正处在变革当中。而家庭妇女们，又正在经历那个时代的女性主义觉醒，所以米琪这位无意中开始单口喜剧的女性表演者，既有个人成长，某种程度上也是“时代缩影”。

在《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以下简称《麦瑟尔》）第1季的8集当中，米琪先是有过两次即兴表演，后来是成为她经纪人的苏西带着她巡演——说是巡演，其实是去格林威治各个俱乐部申演，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修正每一个笑话。比如，她在百货公司化妆品柜台当售货员时得到了一个关于“伊丽

尽管直到今天，喜剧仍然是个被男性主导的行业，50年代的单口喜剧先行者当中，却有不少女性先锋，菲利斯·迪勒、琼·里弗斯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者。

“莎白·泰勒”的灵感，几番试验，最后这个笑话讲成这样：一个男性顾客走向她，问：“我想买点儿能让我老婆像伊丽莎白·泰勒的化妆品。”我让他掏出钱包，拿光了所有的钱，说：“这样，在感觉上，你的确是娶了一个泰勒。”

经过努力，米琪在第一季中创作出了一个“tight ten”，意思是说，在这10分钟的表演里，观众听到的是密集紧凑的笑话，就像剧中苏西所说，“许多人需要好几年才能雕琢出这么一个紧凑的10分钟内容”，而米琪这么快就做到了。对单口喜剧感兴趣的观众，会在这些喜剧人创作生活的细节里找到快感，原来他们是这么工作的，原来完整表演10分钟是如此不易。

50年代的第一次蓬勃

尽管直到今天，喜剧仍然是个被男性主导的行业，50年代的单口喜剧先行者当中，却有不少女性先锋，菲利斯·迪勒（Phyllis Diller）、琼·里弗斯（Joan Rivers）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者。米琪这个角色虽然并没有真正的原型，里弗斯却是最接近的一位。

剧中出现的“煤气灯”也确有此店。它开业于1958年，是五六十年代格林威治村一带众多艺术家的聚集地之一，“垮掉的一代”诗人、民谣乐队以及喜剧演员们都将这里当作试验场。米琪从这里开始，因此将它称之为主场，如同现实中里弗斯曾将名为“The Duplex”的酒馆称为主场一样。里弗斯在60年代就已经非常活跃，她当时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单口表演程序（routine）——你30岁还没结婚，你就会被贴上“剩女”标签，但一个男人，90岁还未婚，却被称为“黄金单身汉”——活在2018年的中国观众发现这个主题并不过时。

在里弗斯她们这一批喜剧人之前，女性单口喜剧多半是歌舞式的或百老汇式的，并没有真正以在

说话内容中制造笑点为己任。另有一些成功的女演员则与男性搭配出现，像是我们的相声需要一个捧哏角色。

剧中米琪第一次登台，喝了很多酒，是个冲动的意外，内容也完全即兴，倘若给这10分钟起个标题，或许可以叫作“我丈夫跟他的女秘书跑了”。今天美国女性单口喜剧表演里已很少使用这个老套主题，但在五六十年代却正当时，它也与里弗斯所擅长的内容同属一个范畴。

米琪这段即兴表演被录制下来，两位发烧友为这位不知名表演者灌制了100份拷贝，说是想“试试水看受不受欢迎”。事实上，单口喜剧五六十年代的第一次蓬勃真的与唱片业发展有重大关联。里弗斯60年代发行过两张喜剧唱片，而在《麦瑟尔》中，不断出现人们口中的单口喜剧传奇鲍伯·纽哈特（Bob Newhart，年事已高，在《生活大爆炸》中客串Proton教授），1960年发行了他第一张喜剧专辑，获得了巨大成功。格莱美奖甚至破天荒将“年度最佳唱片”颁给了这张喜剧专辑，纽哈特也因此获得“年度最佳新艺术家”，此后格莱美再也没有将此奖颁给过喜剧人。

在北美，近几年单口喜剧正在经历“第三次蓬勃”，尤其是Netflix制作了大量单口喜剧专辑，观看者众多。2016年亚裔喜剧人黄阿丽（Ali Wong）曾在国内引起过热烈讨论的单口表演专场《小眼镜蛇》就是其中之一，长达50分钟。从一个“tight ten”到50分钟专场，这几乎也是可以预见到的剧中米琪的努力方向。

时代先锋们

米琪虽然是个虚构人物，剧中另一位单口演员兰尼·布鲁斯（Lenny Bruce）却确有其人，是目前剧中唯一真名真姓的现实人物。他是该领域内另一位先锋，比里弗斯更早出名。在《麦瑟尔》的编剧兼导演艾米·谢尔曼-帕拉迪诺（Amy Sherman-Palladino）的少年时代，这位喜剧界大名鼎鼎的人物会出现在她家后院，跟她父亲老谢尔曼谈笑风生。布鲁斯的先锋之处在于，他开始触及政治等敏感领域，不仅仅是“让你发笑”，而变得更锋利、更政治、更个人，调侃“更危险的本质”。而老谢尔曼正是那个年代的活跃分子。所以，当2012年老谢尔曼去世，艾米希望能够创作一点东西去纪念父亲和他

那个时代。

艾米成长环境里就满是这样一批喜剧人，所以她深知喜剧人生活中的压抑，“他们可不是从来都像台上那样快快活活的，如果他们真的是，他们就成不了真正的喜剧人”。所以她安排给米琪的喜剧生涯，就是从“失去一切”开始的。

扮演米琪的是1990年出生的瑞秋·布罗斯纳安(Rachel Brosnahan)。她上一次给观众留下印象还是在《纸牌屋》，剧中，她扮演那位跟一个国会议员发生关系随后被收买要求保持沉默的高级妓女。她原本只有5句台词，分布在两集里，由于表现出色，又跟与她演对手戏的迈克尔·凯利(Michael Kelly)之间有很好的化学反应，到了第二季有了8集戏份，第3季又有两集，并借此被艾美奖提名最佳客串女演员。《麦瑟尔》剧中她第一次担任主演，许多人看完后的反应是，“瑞秋终于等来了属于她的好戏”。在IMDb公布的2017最高口碑剧集前十中，该剧名列第三，布罗斯纳安也在金球奖音乐/喜剧类别中提名最佳女主角。

《纽约时报》评论说，米琪这个角色扮演者，得像麦瑟尔夫人一样“了不起”才行，而布罗斯纳安做到了，她亦庄亦谐。《麦瑟尔》是部年代剧，置

景、服装都令人想起《广告狂人》。布罗斯纳安穿着高定时装出现在纽约街头时非常养眼，可一站到俱乐部里麦克风前，从自己的生活开始调侃起，讲重口味的笑话，又都十分说服人。

与其相对的是剧中那些男性角色。米琪的丈夫乔是个“巨婴”式人物，怯懦而大男子主义；她父亲则是刻板的数学教授，笃信女性传统义务是结婚生子，迫切希望女儿跟抛弃她的丈夫复合；乔的父亲则干脆常常对着儿子喊“你觉得你比我厉害吗”。他们都受制于男性自尊，甚至成了这种自尊的牺牲品。

正因如此，许多评论认为《麦瑟尔》是在“向父权叫板”。一个原本将婚姻作为毕生使命的上西区家庭妇女，意识到了自己的才华，从这个角度，这部剧的确可以论证，当女人将婚姻凌驾于自我之上，个人才华多么容易因此湮没。所以它的确可以刺激我们去讨论包括“女性主义”在内的严肃题目。

但对编剧艾米而言，在特朗普时代的美国，《麦瑟尔》不是一个洋洋得意的女性主义的童话故事。米琪在那个时代有她自我觉醒的部分，但她的觉醒不是为了女权而女权，内在动力还是她的喜剧才华和热爱。☑

《读书》2018年第1期目录

王东杰 中国世界观最早的幻灯片

万曼璐 朱熹究竟懂不懂古音？

周 濂 “另类右翼”与美国政治

顾 昕 美国按揭型凯恩斯主义的前世今生

杨念群 “新史学”十五年：一点省思

短长书

家具传奇共劫波(方继孝)·潘天寿的嬗变(张晴)·漫长的等候(石厉)

韦 森 “改革没有完成时”

王 宇 为什么纸币最早在中国出现？

傅 谨 陈丁沙之问终究要回应

元同惠 《世界人权宣言》里的中国元素

康子兴 《联合法案》与不列颠“法意”

乐启良 法国绝对君主制的“阿喀琉斯之踵”

品书录

语言的寓言：《拉比的猫》的文学传统(张怡)·关于马克思博士论文参考文献的考察(曾宪亢)·歧异的文献 流动的文本(郭宝军)

高旭东、沈文慧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创新写作

吴晓东 让主体与历史彼此敞开

卜 键 朕亦一书生

李庆西 “小水滸”与“大水滸”

范 可 困惑于“我们”与“他们”



生活需要读书，
《读书》丰富生活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读者服务部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邮购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100125 国内代号：2-275



(阿拉伯纪实摄影项目支持)



(阿拉伯纪实摄影项目支持)



▲ 埃及摄影师赫芭·卡利法作品《家庭制作》通过 Facebook 寻找拍摄对象

西班牙集体项目《环形国度》得益于互联网的数据开放性



英国摄影师马克·佩奇通过网上资料图片虚构制作出《海边的苏德利》



连州，一场“摄影民主化”实验

记者 / 张星云

在一座 40 万人口的县级市举办国际当代摄影展，讨论互联网影响下的摄影民主化，并期待通过博物馆影响当地居民的艺术审美，这是件容易的事情吗？

精英，大众

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在 2017 年已经是第 13 届了。除了一年一度、为期一个月的临时展览之外，刚刚建成的连州摄影博物馆也在这届摄影节期间开幕。在广东省这座 40 万人口的县级市，于是有了中国第一家公立的当代摄影博物馆。

每年的这个时候，连州的街道两旁，除了屋檐下挂满的腊肉、板鸭和当地人支在街头的麻将桌外，还贴满了国际摄影年展花花绿绿的海报。文艺青年、“老艺术家”、外国摄影师、出版发行从业者和媒体记者们涌入这座小镇，与当地老百姓一起生活几天。

连州市西边，“米兰时尚酒店”对面有个大斜坡，从斜坡上去，几间旧粮仓便是摄影年展每年的主展馆。而新落成的连州摄影博物馆则在连州老街上，何健翔与蒋滢两位年轻建筑师的初衷是设计一座“去中心化”的博物馆建筑，“开放，很好地融入当地日常生活”。这座博物馆由果品厂旧房改造而成，水泥、旧房瓦、红砖以及金属混合使用。而博物馆开幕当天，充满设计感的现代建筑亮起了灯，警车在老街前后两头设立了禁行障碍，出租车司机告诉我，开幕前几天，会有洒水车开到老街每天冲洗好几遍街道。

我问了联合馆长弗朗索瓦·萨瓦尔（François Cheval）一个问题：“从广州到连州都需要坐 4 个小



委内瑞拉摄影师卡洛斯·帕里斯作品《合一》

时大巴车，更别提从北京或者上海过来了。摄影博物馆可是常设机构，你觉得谁会来看展览呢？”

萨瓦尔曾做了10年法国尼埃普斯摄影博物馆馆长，他给了我一个很有野心的回答。他说除了为北上广的观众展示中国当代摄影作品以外，他认为这座摄影博物馆会成为大众的免费博物馆，能够影响连州当地人，让他们也喜欢上摄影。“在中国，数码时代让人们早已离不开手机和电视，但实际上很多人对影像的意义并没有特别的意识。”

即便此前已经办了12年，以“实验性”和“开放性”得名的连州摄影年展依然在寻找着与这座县级小城的平衡关系。除了创立摄影博物馆，突破的渴望同样体现在今年的展览主题上。在经历了栗宪庭、鲍昆、费大为、克里斯托夫·菲利普斯(Christopher Phillips)等著名策展人往年策划的“这个世界存在吗？”“故事，离真相有多远？”“告别经验”“扩张的地域”“无乐不作”等较多精英色彩的命题后，今年连州国际摄影节则以“你的自拍杆(与你)”为题，看起来回归了大众。

“自拍杆其实是一种象征物，我们探讨的是关于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时代之下，摄影发展的现在和未来。”连州国际摄影年展总监段煜婷解释说，这些年的连州摄影年展通常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对摄影文化的研究，关注社会，一种是探索摄影本

身的变化。“今年主要侧重后者，尤其是讨论社交媒体对摄影的推动。”

摄影年展邀请诸多策展人和艺术评论人进行了一场认真的讨论会。在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的影响下，人们自拍，分享于网络，用于社交。和原来相比，摄影的目的甚至都改变了。现在互联网就提供了海量图片，所有人都可以轻松地获取这些图片，影像早就没有了公众和私人之分，职业摄影师和摄影爱好者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因此在互联网带来的“摄影民主化”影响下，摄影师们如何在图像过度泛滥的时代重新定位自己，成了讨论会的中心主题。

“当下的摄影已经从唯一的瞬间美学转为了开放的图像与传播系统。”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馆长王南溟这样说道，“因此解释成为了图像的重要工作，而摄影本身退居第二。”台湾学者郭力昕则思考作为艺术家的摄影师如今应该更贴近大众化摄影，还是反而强化精英属性。

显然这场精英摄影与大众的“沟通”比想象中要难。

网络，现实

与形而上的专家讨论不同，此次展出的艺术家作品普遍流露出对互联网影响下摄影这一主题的悲



连州摄影博物馆





英国摄影师雅克布·伯格《脸的剖析》探讨数字化时代个人隐私权

观。法国及西班牙籍策展人桑德拉·莫纳克（Sandra Maunac）、纽约国际摄影中心策展人乔安娜·利汉（Joanna Lehan）、中国当代艺术策展人张冰共同担任今年主题展策展人，他们带来了来自美国、英国、西班牙、阿根廷、南非、日本、埃及、中国的 20 位艺术家的作品。

互联网本身成为了摄影师图像的获取来源和创作灵感。社交网络改变了人们的沟通方式，创作故事也由互联网而起。埃及摄影师赫芭·卡利法（Heba Khalifa）的作品《家庭制作》是从 Facebook 上一

个女性话题私人小组开始的，很多穆斯林女性在小组中分享自己的个人遭遇，如流产、家庭暴力、社会歧视。卡利法通过 Facebook 分别联系她们，单独约见，并说服她们成为拍摄对象。她会专门为她们每个人的故事制作特别的布景。拍照，以及公开摄影作品的过程实际成了这些穆斯林女性敞开心扉的一种释放方法。

社交网络不仅能够帮助摄影师寻找拍摄对象，也能够直接成为素材来源，如今在别人影像上的创作早已不被视为“盗图”。英国摄影师马克·佩

“我们的展览希望能够唤起社会彼此共享的精神。”策展人桑德拉·莫纳克这样表示。而对于连州当地，这些外来人所谈论的“摄影民主化”的实现过程依然漫长。

奇(Mark Page)为了展现这种数字化对摄影的影响，从互联网上寻找诸多拍摄英国海滨度假小镇的图片，将它们下载、打印、剪裁、拼贴，并建成立体模型场景进行拍摄。作品《海边的苏德利》最终呈现了一个由资料图片虚构而成的英国海滨小镇风情，既有英国摄影师托尼·雷·琼斯的影子，又有马丁·帕尔的风格，佩奇以此质疑传统纪实摄影在当下的意义。

而另一些摄影师则更加悲观，他们通过作品批评网络的肤浅和危险。雅克布·伯格(Jacob Burge)是个腼腆的英国大男孩，他对网络的批判思考，来自于自己的切身经历。他毕业后在英国一家电话销售公司工作了8年，每天在办公室自己的小格子里给陌生人打电话卖产品，电脑屏幕会显示出来一排排电话号码，以及对应的姓名、个人喜好等信息，伯格根据这些具体信息说服接电话的人。他觉得这份工作“很没劲”，所以辞了职学习摄影，后来他去了东京，以教英语谋生，并开始认真进行自己的摄影计划。他会经常跑到东京街头街拍，回到家再将这些照片通过电脑进行处理，将人物的脸部“切割”成无数个小长方体，摆放在原片以外，完成作品《脸的剖析》，以展示数字化时代公共场所的监视系统如何侵犯了每个人的隐私权。

委内瑞拉摄影师卡洛斯·帕里斯(Carlos Paris)的作品《合一》则表现的是对网络暴力的担心。他在YouTube网站上找到一些用手机拍摄的视频殴打、凶杀等暴力行为的视频，并用摄像机对准播放视频的屏幕进行长曝光，最终呈现出一种模糊的画面。帕里斯认为网络成为了暴力传播的手段，无人知晓这些暴力分子是否被绳之以法，而网民则通过网站消费这些暴力画面，观看、留言、转发，他对画面做的模糊处理是想表达抽象的画面下真实存在的暴行。

也有摄影师用一种戏谑的方式调侃网络生活的现状。生活在纽约的中国艺术家组合黄乖儿和汪润

中，将虚拟世界中最常见的鼠标箭头制作成实体模型，背着它在纽约时代广场来回走动，并从公共监控摄像头中对画面进行截图。其作品《一个箭头带来的边界问题》试图展示的是虚拟和现实世界以假乱真的这种体验，以及摄像头背后监视者的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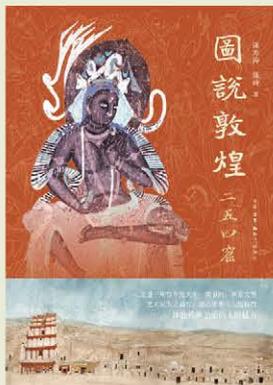
展览中为数不多展现互联网积极影响的作品来自于一个集体项目“环形国度”。2013年，生活在西班牙的三名工程师和一名建筑师在网上创办了一个博客，旨在记录经济危机和房地产泡沫对西班牙土地外貌变化的影响。这是一个开放的博客，所有人都可以通过谷歌地图和图片编辑软件参与这个集体项目，仅需将原先土地样貌的谷歌地图画面截图与改造后相同地点的截图并列。如今这一项目已经记录了上千条土地样貌变化的数据，发起者完全开放数据，发起众筹，出版了同名画册，正是网络的开放性促成了这一项目的完成。

“我们的展览希望能够唤起社会彼此共享的精神。”策展人桑德拉·莫纳克这样表示。而对于连州当地，这些外来人所谈论的“摄影民主化”的实现过程依然漫长。尽管中国已经拥有14亿手机用户，连州也已经举办了13年国际摄影年展，但当地居民依然远远没有得到摄影作为一种当代艺术形式的普及。

摄影博物馆对面的小卖铺的老板对这座新建成的博物馆有些失望，她去过北京，去过故宫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她很遗憾连州的这座新博物馆“没有兵器，也没有古画”。而在博物馆和几个展览区域间拉活儿的电动三轮车司机，则觉得摄影年展每年对他来说最大的收获是开幕的几天能多赚一两百块钱车费。等客期间，他也去博物馆里逛了一圈，让他印象最深的作品是博物馆里庄辉拍摄的一组老照片，其中有几幅车间工人的肖像照，他觉得很有意义，因为他在开摩的之前，就是连州县城南边玩具厂的工人，如今玩具厂已经停工。

但对当地政府而言，在摄影年展背后，是更大的发展野心。由地方政府全资建设的连州摄影博物馆有了“全国第一家公立当代摄影博物馆”的名声，然而，机构应如何继续推动摄影艺术的研究与教育？美术馆和艺术机构最终是否能成为摄影得以锚定的港湾？这些依然有待规划。无论如何，连州摄影博物馆项目已经是清远市及其辖下连州县级市计划中的一部分，未来将建设的机场和高铁有可能进一步帮助这座县级市带来更多的游客。■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由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供图)



图说敦煌二五四窟

陈海涛 陈琦 著 定价：96.00元

敦煌莫高窟是中国古代艺术的宝库，全书以北魏时期的第254窟为例，从细读南北两壁的壁画入手，有序地循着窟内空间展开，结合建筑形制与壁画、彩塑内容，对石窟的营建和构思做了整体解读。通过这样一个有代表性的个案，可以超越一般的知识性介绍，使读者和观众更深层次地领会图像背后的精神与义理。

白沙宋墓

宿白 著 定价：98.00元

1951年，宿白主持河南禹县白沙镇的3座北宋雕砖壁画墓的发掘，并于1957年出版《白沙宋墓》报告。这不仅是一份客观、忠实、完整的考古发掘记录，更以注释的形式提供了大量眼见之物以外的文献和图像史料，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宋代社会生活的原貌，为中国历史考古学开创了物质文化研究的典范，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中国的一日：1936年5月2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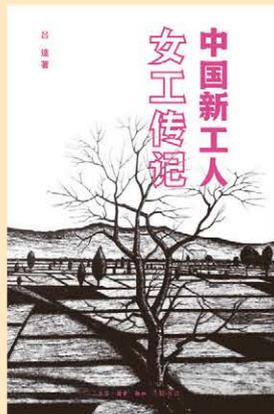
茅盾 主编 定价：52.00元

《中国的一日》初版于1936年，它记录下了1936年5月21日这一天里，全中国各个阶层、各种处境、各种职业的人们的“所见所闻、所做所感”。城市的慌乱、农村的崩溃、富有者的荒淫、饥饿者的挣扎、小市民的彷徨、求索者的奋勇……都活泼泼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

吕途 著 定价：56.00元

“中国新工人”三部曲的第三部，吕途通过访谈记录了34位中国女工的所思所想、生命故事。这些故事延伸出了两个历史：一个是时代变迁的历史，一个是个人的生命历程。当代中国的巨变深刻地塑造着每一个人，而不同年龄段女工的成长经历、谋生历程，也从不为人知的角落见证了中国社会的转型。



灵台无计逃神矢：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

严安生 著 陈言 译 定价：40.00元

甲午战争之后，志士们大举到“同文同种”的邻国去寻求维新的范本。汉唐以来的文化宗主国与附属国，半殖民地化的旧帝国与明治维新成长起来的新帝国，进而是甲午战争之后的被害国与加害国，在时间纵轴上的古今恩仇与位置关系的变迁，作者将这种正负交错作用视为留日精神史的整体磁场。

土摩托看世界3：行走世界之巅

袁越 著 定价：79.00元

远涉南北极地，考察在这两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如何深刻地影响整个地球的未来；深入古巴、津巴布韦和斯里兰卡，去探讨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袁越用持久不变的好奇心、与时俱进的知识储备、巨大的热忱和勇气，探求那些不易去的风景和不易解的难题，分享种种独特的体验。





相遇在 数字设计的未来

文 / 钟和晏

图片版权 © Design Society

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建筑系教授阿希姆·门格斯的《ICD/ITKE 研究亭》，2013~2014 年

数字技术的应用引发了设计领域的众多可能性和不确定性，设计该如何依附数字技术来改变生活、创建新的社会文化场景？科学家、设计师与工程师该如何回应这些变化并对未来做出设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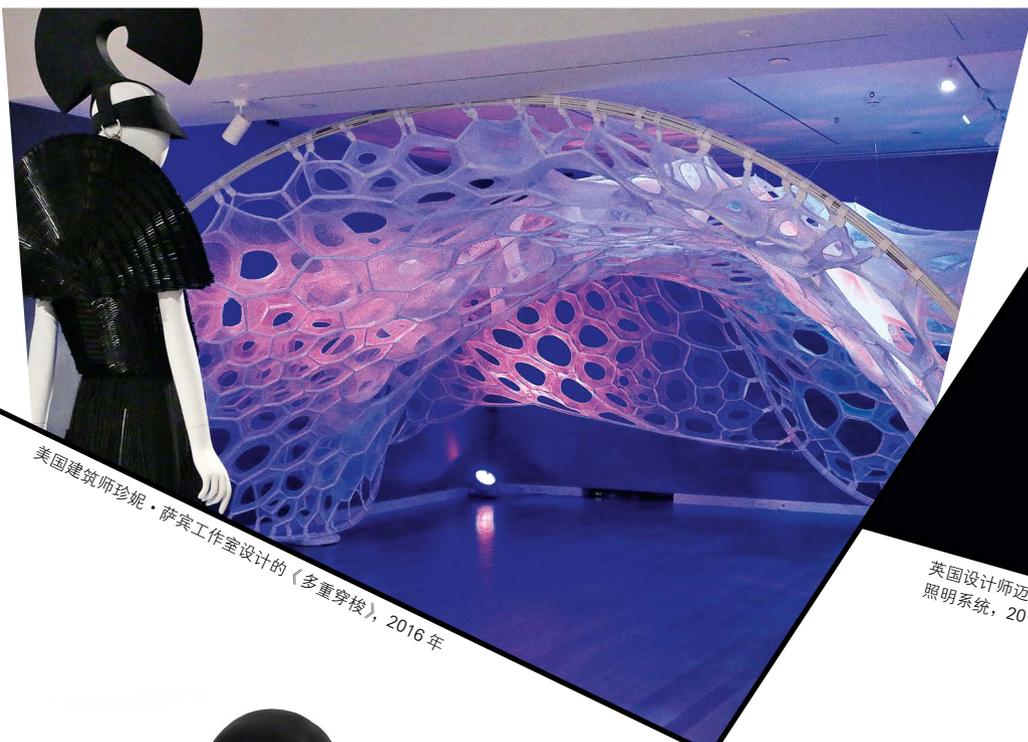
今年 89 岁的日本建筑师槇文彦 (Fumihiko Maki) 第一次去蛇口勘察设计互联 | 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的项目基地时，还是 2011 年 11 月份的时候。那时他对深圳的了解并不太多，他的槇综合计画事务所也还未曾在中国建造过任何项目。

他看到基地的南侧面对着广阔的海景，隐约能辨认出香港岛的轮廓，北侧被附近的青山环绕，东边毗邻绿草如茵的城市公园。自然条件本身的美好打动了这位久负盛名的建筑师，他事后说：“我感受到了这个地方的能量，我认为我们应该给它甚至给整座城市带去一些重要的、值得纪念的东西。”

他在白纸上用寥寥数笔画下最初的设计草图：正



张周捷设计的 SQN-F2C 椅，2011 年



美国建筑师珍妮·萨宾工作室设计的《多重穿梭》，2016年



英国设计师迈克·扬为 Lasvit 创作的“超级幸运草”照明系统，2017年



荷兰设计师艾丽斯·范·荷本设计的 Damesstop 女装，2011年



帕特里克·朱伊恩设计的 Solid C2 椅，2015年

中间的两叶船帆点明大海的位置，海的远处是群山，艺术中心的建筑轮廓出现在画面右下方：三个朝向不同方向的梯形体块，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的本土语境：山、海和城市，底层有阶梯一直通向屋顶花园。

大概6年之后，这张简略的草图已经演变成现实的存在——一座占地面积约2.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1万平方米的新型文化中心。站在蛇口望海路上，眼前是被白色花岗岩和带格栅玻璃幕墙包裹的新建筑，如同一艘停泊在港口的白色巨轮。

2017年12月初，由招商蛇口创立的设计互联 | 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正式开幕，它被定义为“以设计驱动社会发展”的综合创新文化机构。作为一个多用途的建筑，它的中央轴线贯穿着从城市到海洋的两端，总共六层空间（地上四层、地下两层）中容纳了展馆、剧场、多功能厅、工作坊、教育机构、品牌店等多种设计体验场所。

如果站在附近的高楼向下俯瞰，艺术中心的结构变得一目了然：整个建筑由平台和三个向外出挑的体块构成，平台内部划分为展馆和零售区，三个分别朝向远山、公园和大海的体块是剧院、餐厅和多功能厅，百叶格栅的玻璃幕墙让外部风景一览无余。多面体的银色轻型铝板覆盖着体块的屋顶，因为不同的倾斜角度，呈现出清晰的外形和阳光下的明暗面。

在平台部分，展馆和零售区是两个相互偏移的网格体系，这两个体系交叠在一起，产生出三个室内广场。广场不仅在建筑体量中充当空间隔断的角色，也连接了垂直方向的上下空间。建筑两侧，铺



毛毡毯 *Sundew* / 吴燕玲 (Elaine Ng)

设计师吴燕玲 (Elaine Ng) 的“毛毡毯”体现了手工艺在数字设计中的作用，这是一件受肉食植物启发的声控装置，纱线和施华洛世奇水晶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借助内置感应技术，这些手工编织和制作的植物造型会对周围的声音作出反应，实时产生互动效果。



林欣杰作品《城市密码：漫游者雕塑》，2014年

着绿色草坪的宽大台阶吸引人们向上攀爬一直到达开放的屋顶花园，眺望周围的山海景观。

可以说，公共性和开放性是这座新建筑显而易见的特征。早在1964年的《集群形态研究》专著中，横文彦就提出他的“集合形态”理论，探讨建筑物之间以及建筑物在建筑集群中的相互关系。多年来，“开放空间的集合形态”可以说是他的重要设计主题，期望人们更关注空间关系而非建筑结构。在他看来，未来城市应该围绕开放空间进行规划，因为空间比建筑物更灵活，并为公众提供多样化的使用可能。

他把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称为“功能多元的迷你城市”，“空间化”是围绕空间创建结构和形式的过程，“社会化”则是空间最终供人使用的过程。“满足人们基本欲望的是空间而不是建筑形式，这其中也包含了潜在的社会欲望。”直到今天，这位年届九十的建筑师仍然这样强调他的主张：“换言之，在我的

建筑化过程中，重要的是赋予这种欲望空间以形式，这也是我对现在盛行的地标性建筑的批判看法。”

在艺术中心里，面积最大的构成部分是1200平方米的主展厅，单根的柱子撑起9.5米高的空间，自然光从富有仪式感的玻璃天窗倾泻进来。由“设计互联”策展的“数字之维”设计展就设在这里，向观众展现一个由数字技术构建的沉浸式新奇体验世界。

如同艺术中心的建筑空间强调与周边城市环境的关系，选择“数字技术与设计”的主题作为开幕展，显然也和深圳这座城市具有明显的对应关系。设计互联馆长奥雷·伯曼 (Ole Bouman) 对本刊说：“这一切完全是植根于深圳的语境下呈现的，珠三角地区正经历着向知识型和创意型社会的转型过程，与近几十年相比，新的经济模式对创意产业和技术创新更为依赖。”

2016年，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超过50%。互联网创建了新的社会交往和消费形式，对社会生活、经济和政治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影响和冲击，手机屏幕成为我们与社会连接的重要媒介。尽管如此，在众多专家对未来的预测中，这种数字化转变才刚刚开始。

例如麻省理工学院数字经济专家安德鲁·麦克菲（Andrew Mcfee）认为，我们正在经历的是第二个智能机器时代。技术的表现已经出人意料，像无人驾驶的汽车，计算机以更灵活的方式诊断疾病、回应人们的需求，智能设备能够记忆人们的行为偏好、模仿人的判断等。到2025年，电脑运行速度将比2013年快64倍。

所以，“数字技术的应用引发了设计领域的众多可能性和不确定性，设计该如何依附数字技术来改变生活、创建新的社会文化场景？科学家、设计师与工程师该如何回应这些变化并对未来做出设想？”“数字之维”展试图用来自国内外设计师、工程师和创客团队的60个设计案例，对这些问题做出分析和调查。

这里有数字技术制作的家居服饰、实验性的建筑结构，也有指向未来人机关系的交互装置和实验项目等，结合人机智能的数字化设计呈现独特的美学和造型。数字方法和物理方法、机器和手工制作、当代思维与传统价值、人造材料与仿生逻辑，在这些案例中，重要的不是讨论科技的运用，而是讨论科技本身的可能性，将新技术的发展置于想象性的日常情境中。

荷兰建筑事务所MVRDV提供的展陈设计借用了迷宫的概念，1200平方米的空间被分隔为层层递进的双层迷宫，配合数字相遇、数字交互和数字参与这三个部分，构成一条探索性的观展路线。从“机器会设计吗？”到“传统能被设计吗？”，再到“互动体验能被设计吗？”，每个部分始于一个令人困惑的疑问，它们被投射在入口处的地面上。

迈克·扬（Michael Young）是长年在香港工作和居住的英国设计师，他为LASVIT设计的“超级幸运草”模块照明系统出现在“数字相遇”部分，基于他的工作室对于具有内在逻辑性的数学网格系统的研究结果。白色波希米亚吹制玻璃单元被成对排列安装在几何形钢框架上，它也是一个可以定制的编程吊灯，提供无限增长的可能性，而不是传统照明的固定形式。

如果没有数字化工具，这件作品是无法实现的，迈克·扬目睹了过去20年中设计三维软件的演变。他在视频采访中回忆说：“25年前，当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数字科技这回事，我当时做设计就只有一把尺子和一个杯子，用来画直线和弧线。数字技术有趣的部分在于它对设计师工作方式及材料处理方式的影响，还有市场对此的反应。”

数字工具为设计师带来新的可能性，生成式设计软件让繁复夸张的造型不再是难题。尽管如此，设计师根据手工经验对材料和形式进行判断，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步骤。迈克·扬说：“我们的设计团队通过研究用户行为与需求，在产品中注入打动人的情感因素，这是计算机无法取代的部分。”

Sky Yutaka是建筑师李国欣和矢野丰也创办的香港建筑事务所，他们为“数字交互”部分提供了一件交互式设计作品《借景》。“借景”这一名字来自明代造园家计成的园艺美学概念。这是一组开放在水箱底座上的机械花朵，形状类似于折纸。每个花形元件中安装了能够探测人体运动和光线变化的动态感应模块。当你靠近这些模块化的机械花朵时，计算机控制的光信号被传送到它们的花瓣上，控制花瓣的一开一合。

这是对未来都市庭院的一种想象，矢野丰也说：“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我们对景观本身及其表现手法的理解也在发生转变，重要的是将人的感官重新融入感知空间的方式中。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想技术和人的价值之间一定会出现一种丰富我们体验的新关系。”

当数字仿真技术被应用于建筑和设计，原材料成为后自然（Post-nature）可编程物质的一种独特形式，同时具有综合性和几何特性。设计与技术的结合意味着设计超越了模拟的操作模式和构造，因为定制数字工具的普遍应用，能够更容易、更快速地配置建筑结构、尺度和编排流程。借助计算机的力量能够打破传统结构的法则，生成新的建筑形态。

在艺术中心门前的户外草坪上，矗立着一件纤维线缠绕而成的洞穴形状装置，像是一个甲虫外壳被放大无数倍之后，突然降落在那里。这件名为《ICD/ITKE研究亭》的作品并非艺术装置，而是斯图加特大学建筑系教授阿希姆·门格斯（Achim Menges）对双层轻型结构的一项研究成果，在未来也许会激发建筑中设计、建模和施工过程的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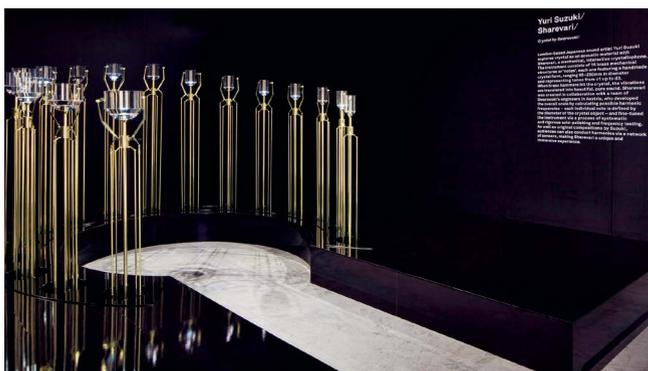
门格斯是斯图加特大学计算设计研究所（ICD）



多重穿梭 Polythread/ 珍妮·萨宾工作室

美国建筑师珍妮·萨宾 (Jenny Sabin) 研究建筑和科学之间的交集，将生物学和数学理论应用于材料结构的跨界设计中。她注意到针织和梭织技术的发展已经可以制作出高性能的复合织物，被运用于航空、汽车、运动和海洋工业中。

受蜂窝网格形态的启发，她的装置作品《多重穿梭》是由针织轻质材料和玻璃纤维管制成的独立的可居住形态，玻璃纤维管在建筑中很少使用，而针织材料能够回应阳光的变化。她在这件作品中展示了设计、概念化和机器制造之间的相互关系，结合了数字和模拟制作过程，数字能力为设计带来了特殊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Shareveri/ 铃木尤里 (Yuri Suzuki)

为了探索水晶作为声学材料的可能性，日本声音艺术家铃木尤里创建了一件机械互动水晶装置 Sharevari。乐器由 16 个黄铜机械结构或者说音符组成，黄铜柱顶端直径 95 毫米到 250 毫米的水晶体代表从 C1 到 D3 的音调。当黄铜锤击中水晶时，振动被转化成美丽、纯净的乐曲。Sharevari 也是一件互动乐器，它能够感应观众的肢体动作并即兴创作乐曲。

的创始人，以在仿生学、机器人制造和新材料方面的开拓性研究而闻名，侧重于深入探究生物世界的轻型结构，以此生成新的材料、形式和质地。

该所和建筑结构与结构设计研究所 (ITKE) 一起，与图宾根大学的生物学家合作，对自然轻量结构的功能原理进行了分析概括。在调查过程中他们发现，翅鞘 (Elytron) ——甲虫的翅膀和腹部的保护壳——是一种符合材料高效建造的构造模式。翅鞘的形态基于双层结构，被名为“蕈体柄”的柱状双重弯曲支撑件连接。

门格斯在他的研究阐述中写道：“基于这种生物结构原理，我们生成了一个双层模块化系统的建筑原型。机器人的制造特性和抽象的仿生原理被同时融入设计过程中，展示生物结构原理以及材料、形式和机器人制造之间的协同作用。”

将生物构造原理转换成建筑应用的过程中，常规的模板和模具方法就不适合了。为了制造特殊的几何双曲面模块，研究团队开发了一种机器人无芯卷绕方法，由两个机器人协作，在两个定制钢制框架之间进行纤维缠绕，提高了材料的使用效率和几何造型自由度。

2017 年的“聚合墙”是斯图加特大学计算设计研究所的另一项研究成果，展示了另一种新型材料计算方法。聚合墙由几千个用回收塑料注塑成型的颗粒组成，这些多臂颗粒的几何形状出自电脑的计算，极像是被简化了的千纸鹤折纸。

机械臂把塑料“千纸鹤”从上方投放下来，一点点地聚合在一起，最终堆砌成一道坚固的墙体。虽然每个颗粒之间不相互粘连，但它们的接触力足以在水平和垂直方向支撑整个结构，参数化的施工过程使得聚合墙能快速和可重复地安装。在这种情况下，它开辟了垂直结构设计全新的可能性。

人与智能机器就这样在新兴的设计方法中相遇，设计师与工程师、程序员就这样以跨学科实验创建出过去难以实现的结构、材料与形式，人机合作更像是一种不断实验和自我学习的过程。英国建筑策展人露西·布利范特 (Lucy Bullivant) 对此这样评价说：“这一切彻底改变了诸如人与机器、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技术与人类价值观之间的创造性调解成为中心议题。这是两者之间亲密接触的故事，在过去的十年中，故事主人公的身份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而这个故事还在源源不断地展开。”

“我想为具有社会理想的项目工作”

——专访深圳设计互联馆长奥雷·伯曼

三联生活周刊：设计互联自我定义为“以设计驱动社会发展”的综合创新文化机构，它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哪里？

伯曼：如今的时代形态之一即互联性，通过互联人们可以实现同步化，拉平并重新树立自己的社会关系。当代设计也已经成为一门包容性的学科，成为制造、编码、组合、协同和传播等多元文化的共同要素，每个人都能参与进来。设计正在以超越物品的形式组织我们的生活，构成与世界互动的交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为“设计互联”而不是设计博物馆，我们的标志中有圆形、正方形和交叉的X。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创建连接，在中国和欧洲、设计与社会、设计人才和企业机会、不同学科、公众和博物馆之间等等，在文化、商业和公共建筑这些不同功能之间建立联系，我们希望能够以设计促进、影响和激励周围的世界。

三联生活周刊：它和常规的设计与艺术馆有什么不同？

伯曼：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来研究，它到底应该是一个怎样的机构。不只对设计进行展示与讨论，还能对它进行培养、测试、孵化与证明。建筑本身从各个方面协同了设计互联，从我们楼层的平面图上就能感受到整个项目的丰富性。观众、会员、捐赠者、合作伙伴等在这个平台上进行沟通、协作和创造，我们希望能够创建出一种文化中心的新型模式。

三联生活周刊：设计互联每年的运营费是多少？

伯曼：到目前为止设计互联的总投资是13亿元人民币，但每年的经营预算，说实话我也还不知道，这取决于我们自己的经营能力，而不是上级机构的拨款。我们是一家文化企业，不仅有文化部分，也有商业部分，需要找到两者之间有趣的重叠，产生新的收入形式，在不同部分之间产生交互作用。我们可能把展览中的新知识变成商店里的新产品，或者使用在教学培训中，如果我们能够吸引更多的观众、赞助商和捐赠者，获得更好的场地租金收入，相应的文化部分的预算也就越高。

三联生活周刊：你为什么接受设计互联馆长的



设计互联 | 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是日本建筑师槇文彦在中国的第一个项目

职位？毕竟把全家从荷兰搬来深圳也是一项大的决定吧。

伯曼：我在2013年担任第五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UABB）策展人，展览就是在蛇口价值工厂举办的，深圳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城市了。接受这一职位的深层动机是出于我想为具有社会理想的项目工作，具有这样的尺度规模和社会职责的文化项目，可能全世界也没有多少。在荷兰，20世纪曾经有段时间充满了用设计创造一个更好社会的精神，无论从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景观、水处理、医疗保健等各方面，设计都非常具有前瞻性。现在的荷兰设计变得很别致、很好玩，但设计师失去了那种前瞻性，失去了创造更好社会的精神。相比之下，深圳是一个富有社会能动性的城市，强调个人发展和表达，这种积极的能量是我喜欢深圳的原因。在中国，我希望设计师能够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其实可以具有宏大的社会愿景，用设计为社会做出贡献，而不只是把设计作为个人的艺术声明。

三联生活周刊：设计互联的开幕展“数字之维”（Minding the Digital），它背后的策展思想是什么？

伯曼：如果说数字（Digital）代表信息技术，那么思维（Minding）就代表了人的思想和智慧，我们通过它要表达的其实是数字技术世界里“人”的因素。我们希望人们理解，重要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深入思考我们应该怎样使用这些技术，用它们来创造什么。从展览中你可以看到，虽然技术基本相同，但是不同的设计师可以创造出各种不同的作品，得出各自不同的结论。这种丰富性不是来自电脑，而是来自人的智慧，“数字之维”希望借此激发更多的社会创新和想象力。☑



麦当娜身穿紫色古驰套装出席 Billboard 颁奖

潘通 2018 年度代表色是“紫外光”



紫外光彩彩妆套装

2018 是紫色的

记者 杨聃

紫色经历了从代表权贵到反主流文化的转变，如今被选为年度颜色，正是因为它的复杂和不确定。

暧昧模糊的年度颜色

很快你会发现，像身处于莫奈的画作中那样，空气是紫色的。不久前色彩趋势预测机构潘通（Pantone）宣布将色号为 18-3838 的“紫外光”（Ultra Violet）定为 2018 年度代表色，它是一种紫偏蓝，类似于寰宇星云图那种调调的颜色。这让不是那么活跃的，至少在大众视线中不是那么活跃的一系列紫色被聚光灯打了个大大的光圈。

虽然潘通年度颜色是专家们在世界各地寻访，剖析流行文





范思哲的紫绿配

新晋品牌 Sies Marjan
2018 新品General Idea
2018 春夏

化得出的结果，并非针对时尚行业，但在 T 台上，紫色风潮确有体现。9 月的米兰时装周期间，整个古驰 2018 春夏秀场都沐浴在“紫外光”的温柔滤镜中，106 套秀款中有不少全身紫外光的造型：紫色的连身裤、闪闪发光的褶边礼服、夹克配天鹅绒裤。以“宇宙的神秘”为主题的设计师品牌克里斯托弗·凯恩（Christopher Kane），也使用了这种带有渐变光的紫色虹彩面料。Sies Marjan 采用了紫色和蓝绿色渐变的组合，它和蕾哈娜彩妆品牌 Fenty Beauty 新出的 Galaxy Collection 有相同的即视感。

事实上，紫色很少出现在时装领域里，一是因为它对肤色要求高，其次因为不好搭配，大面积的紫色如何也低调不起来。同时，它也是一种具有镇静功能的颜色，据说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在创作时会穿上紫色斗篷，威尔海姆·理查德·瓦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在涂满紫色的房间里创作就会文思泉涌。

始于千禧年的潘通年度颜色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极少选择紫色这种暧昧模糊的色系。自从 2016 年首次把粉晶和静谧蓝两种颜色选为年度色而引起广泛讨论之后，大家越来越期待每年的颜色背后可以有更多含义。比如 2017 年的草木绿被解读成“给处于纷扰社会与政治环境中的人们带来希望”，2018 年紫外光的官方描述为“一种复杂的颜色，正如我们处于一个复杂的时期”。

外国媒体的解读就更加感性了，比如 Fast Company 网站的说法是：“我们正在和政府搏斗，他们想要推翻多年来在公民权利、经济正义、环保主义等方面的进步。我们正在面对有关性别不平等和虐待的丑恶真相。但同时，由于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的创新，我们也以更快的速度迈向未来。”

虽然我对趋势这种“刻意”的行为并没有太多认同，不过对研究一种颜色还是饶有兴致的。毕竟，色彩和时代确实有关系。旧的白、红、黑三元体系跨越了东方文明、《圣经》、古希腊罗马文明在内的古典时代以及中世纪前期，在中世纪文学、地名、人名、寓言和民间传说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比如最早版本的《小红帽》就是以这



巴黎世家紫外光色长靴是最潮单品之一

样的颜色规则来划分故事角色。直到13世纪，更加现代的颜色体系丰富了新的组合。

色彩历史学家认为，洗染活动内部的明细分工与对混杂的反感息息相关，这种反感源自渗透了整个中世纪的圣经文化。混淆被认为是恶劣的行为，它被视为违背了事物的秩序与本质。所以人们会把两种颜色并置或重叠但不会混在一起。在15世纪以前，任何有关颜色制作方法的文献中，无论是洗染还是绘画，都没有记载蓝色和黄色混在一起为绿色的方法。绿色是从天然的颜料中提取的，同样的限制也出现在紫色身上。

在启蒙时代的文学和早期浪漫主义文学中也能找到一些有趣的现象。歌德用《少年维特的烦恼》将蓝色推广到了整个欧洲，众多年轻人都效仿这位恋爱中的绝望主人公的服装，蓝色燕尾服或上装搭配黄色背心或短裤。这种蓝色热进而影响了绘画、雕刻等有形艺术。



有“王子”之称的美国流行音乐家普林斯生前和他的雅马哈紫色定制钢琴

从18世纪80年代起，文学的彩色符号大量涌现。德国的浪漫主义对蓝色尤其推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诺瓦利斯未完成的小说《海因里希·冯·奥夫特丁根》(Heinrich Von Ofterdingen)。小说中中世纪的一位吟游诗人在梦中见到了一朵蓝色的小花，它代表了纯粹的诗意和理想的生活。就这样蓝色在各地被诗歌冠以美德，成了象征爱情、忧郁和梦想的颜色。难怪美国黑人音乐形式布鲁斯(Blues)也以蓝色命名，这种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慢四拍节奏的音乐，想要表现的正是忧郁的思乡之情。

如果以同样“严谨”的方式来解读紫色，它所表达的可不只是莎士比亚在《安东尼和克萊奧帕特拉》中的描述：“她（埃及女王）坐的那艘画舫，就像在水上燃烧发光的宝座：舵楼是黄金打造的，帆是紫色的，发出异香，连风都为它害起相思来了。”

运动与变化中的紫色

波斯人和犹太人喜欢紫色，但为紫色赢得如今声誉的是罗马人和拜占庭人，他们都曾穿着紫色染料染成的衣服君临天下。文献记载，公元前49年的一次重要晚宴上，恺撒刚刚打败了庞贝，克萊奧帕特拉为这位年事已高的英雄举办了一场盛宴，据说宫殿都用紫色的斑岩石砌边，“十分奢华，炫耀得没了止境”。几个世纪后，拜占庭的君王们纷纷效仿，建造紫色的宫殿，这便有了“生于紫色”(Born in

Purple)的典故。紫色同时变成了权力、贪婪和奢华的象征。

许多古典时代的评论家都评论过紫色这种等级现象，普林尼曾写道：“紫色是用罗马权杖和斧头劈出来的颜色。它所染上的每一件衣服，都沾上了胜利的金色荣光。”但因为当时它是从软体动物（海蜗牛或是骨螺）中提炼出来的，会散发着浓浓的鱼腥味儿。有专家指出，即便这种染色方式染出的布料放上100年或是更长的时间，只要用手指轻轻摩擦布料，手上仍然会留下味道。难怪普林尼对紫色的昂贵表示不解：“这不过是一种带着刺激性气味，色泽很灰暗，而且还带点绿光，仿佛是海洋在发怒的一种颜色而已。”

约翰·盖奇在其著作《颜色和文化》中写道，希腊语紫色含有双重含义，指代运动和变化。这也许是因为在紫色的染制过程中，发生了多次颜色变化的缘故。但变化正是闪耀光泽的前提，也是奢华时尚的前提。

1522年，西班牙国王征服哥斯达黎加之后，派出特使加吉尔·冈萨雷斯·德·达维拉(Gil Gonzales de Davila)去考察，他发现了珍珠和紫色，从此哥斯达黎加便以这两样东西著称。西班牙国王还给达维拉带回来的紫色染料取了个名字——新世界皇家紫色。

1856年，维多利亚女王命法国工匠爱德华·科赖撒为阿尔伯特亲王的生日打造一个橱柜。当时，靓丽的塞夫勒(Sevres)珐琅瓷重新流行起来，受到这股潮流的启发，这只橱柜做得十分喜庆明快，上面有两位身穿紫色衣裙的金发女孩被绿松石叶子和粉红色花朵簇拥着。到了1858年，伦敦、巴黎和纽约的每一位女士，只要能买得起就都会穿着“紫红色”衣裙。

另一方面，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紫色曾是英国葬礼中十分适宜的颜色。当乔治六世1952年去世的时候，伦敦西区的服装店赶紧把黑色和紫色的灯笼裤严肃地放在橱窗里。黑色和白色象征着两个极端，紫色作为彩虹光谱的最后一种颜色，代表着已知国王的边界和未知国王的开端，这也许可以解释它适合葬礼的原因。

伊丽莎白一世只允许王室穿紫色，然而，紫色并不是历史上唯一被严格规定穿着范围的颜色。1197年，查理一世制定了《衣制法令》(Assize of Cloth)，规定低层阶级只能穿灰色衣服；在欧洲各地，

任何需要表现严肃与保守的人物都禁止使用饱满或鲜艳的颜色；清朝，明黄色只能由皇帝穿。

考古学家齐利亚·纳托尔(Zelia Nuttall)的文章中描述了在墨西哥海边城市特万特佩克，大多数妇女都穿着手织的“土耳其红”裙，上面有黑色或白色的窄小条纹，但吸引她眼球的是用两倍宽的棉布织成的紫色裙子，它们用细密的橙色或黄色线连缀着。纳托尔认为这种裙子展示了对色彩搭配十分精到的理解，毕竟，紫色和黄色为互补色，当两者同时出现时，紫色被衬得格外紫，黄色被衬得格外黄。在1915年，这种裙子价值10美元，价格是其裙子的四五倍。

在艺术领域，莫奈被认为对紫色成狂，评论家称其为“violettomania”。在《日出·印象》这幅画中，暖黄色的太阳光洒在泛着淡绿的水面，蓝紫色的帆船在水面上泛出模糊的倒影，缥缈的光影把一切都笼罩在紫色的氛围里。20世纪其他的艺术家也十分善用紫色，乔治娅·奥基夫(Georgia O'Keeffe)用不同色调的紫色创作了1926年的《黑色鸢尾花》，她用色彩和形式传达了更多的无形力量，比如温暖、敏感和活力。

在波普艺术中，安迪·沃霍尔的丝网印刷画少不了这种霓虹的色彩，但对紫色贡献更大的是他的朋友伊莎贝尔·科林·杜佛尼(Isabelle Collin Dufresne)。1967年，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紫外光”，紫色的头发，紫色的眼影，紫色的嘴唇成了她的标签。和她一样将紫色从奢华过渡到反主流文化最前沿的知名人物中，还包括音乐偶像普林斯(Prince)、大卫·鲍伊和吉米·汉瑞克斯(Jimi Hendrix)。

在亚特兰大的最后一场演唱会中，普林斯弹奏钢琴献唱的最后一首曲目正是发表于1984年的《紫雨》(Purple Rain)，歌名刚好和当时使用的雅马哈紫色定制钢琴相匹配。即便在普林斯去世后，他的紫色帝国依旧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2016年春天，从纽约布鲁克林市政厅到澳大利亚及苏格兰的艺术场馆都投射出紫色光晕来致敬这位流行偶像。

还记得希拉里在总统败选演讲时，特意穿了一套拉夫劳伦的灰色套装搭配深紫色真丝衬衫，身后的克林顿也打了紫色的领带。据说之所以选择紫色，是为了表达想要弥合分歧的愿望。的确，代表民主党的蓝色和代表共和党的红色混合起来不正是紫色吗？

“好” AI “坏” AI：科幻世界中的未来

文 / 萧伯恺



《星战8》的三名主角机器人和工作人员合影。前左：由演员 Anthony Daniels 饰演的 C-3PO；前右：R2-D2；后：第7部新加入的 BB-8

科幻与现实

1977年3月，当“星战之父”乔治·卢卡斯刚完成第一集《新希望》时，首次小规模试映后观众却沉默一片。朋友们认为尚未完成后期特效的版本糟糕透顶，只有斯皮尔伯格坚信这部片子会获得空前成功。斯皮尔伯格是对的。同年9月，观众不惜排队几个小时买票进入影院。它不仅狂收1.9亿美元超越《大白鲨》成为史上最高票房影片，而且已经晋升为美利坚原生的国民神话、经典流行文化样本。如今，系列最新作《星球大战8：最后的绝地武士》刚在全美上映，2018年1月5日与中国观众见面。

好莱坞知名编剧米利厄斯曾说：“《星球大战》把孩子们从六七十年代反正统文化的风气中带离出来，让他们重新对美国的科技感兴趣。”观众们无限向往影片中炫酷的黑科技，光剑与原力、反重力引擎、星际战斗机让影迷们着迷不已。少年人不仅乐意打扮成绝地武士或突击队，还会在自家车库手工仿制道具，完整体验太空英雄的代入感。

几乎每个“科技宅”都想要“千年隼号”作为圣诞礼物，作为标志性飞船，不管是老一代还是年轻一代主角，都靠驾驶它一次次逃离危机。而事实上，星战中飞船的超空间跳跃技术，需要超乎寻常

的电脑数据运算，才能确保安全路径以规避因天体质量而造成的事故。2017年11月，IBM公布了50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机样机，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进展。量子计算远远超过了传统计算机的运算速度，使用范围不局限于航空航天领域。比如在化学领域中，工厂需要大量的能源制造肥料，以往的方法只能反复进行试错实验，现在研究人员可以用量子计算机从分子层面模拟分析变化，大大提高了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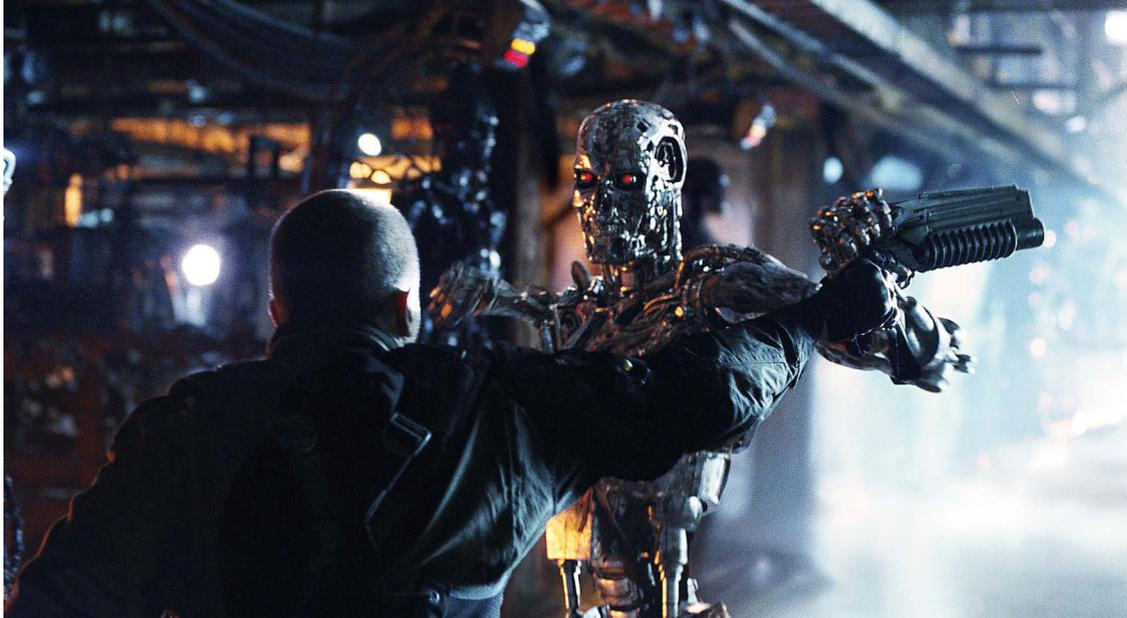
军事装备也是“星战迷”们津津乐道的项目。浑身武器的赏金猎人波巴·费特，头盔内的可视屏幕能帮助其洞悉各种隐藏的敌人或者潜伏的危险。事实上，IBM的超级成像技术正在给人类提供一双洞悉一切的“眼睛”。它能把各种不同的电磁光谱结合起来，用以探测更多肉眼看不到的东西，并且在设备体积上做到了便携，这将帮助人们更好地洞察和理解周边的世界。未来，我们能够更好地看清道路，看透迷雾或暴雨，探测黑冰等难以看清的危险路况。将这些技术运用到手机后，便可通过拍摄照片来分析食物的营养价值，判断食物是否安全可食用。在医药和银行领域使用超级成像技术则可以帮助用户识别欺诈行为。

近期一档名叫《科学与星球大战》的科普视频节目，就在借上述经典桥段，探索今日的科技水平如何接近电影中的设定。科幻作品的魅力之一，就在于能给未来更生动的描述。有些正在实现，有些还遥不可及。

“好” AI，“坏” AI？

科幻大师雷·布雷德伯里曾经说过：“科幻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而是为了预防未来。”因此科幻中的未来未必美好，还有可能充满毁灭和堕落。越洞悉科技发展趋势，作者笔下的未来越接近现实。拿近年最热的人工智能（AI）来说，常有两类不同的描述模式。

第一种模式认为AI能严格遵守机器人三大定律，主人命令至上，未来将是安全和谐的。星战中近百种型号的机器人，分属战斗型、服务型、工程型等。智能机器人多半还拥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它们和宇宙中的居民一起生活，为星际旅行和日常生



由卡梅隆创造的机器人杀手“终结者”，金属骨骼外覆盖仿生皮肤就可以乔装人类

活带来难以替代的作用。

一对最著名的智能机器人角色——话痨的礼仪机器人C-3PO，会上百万种语言，懦弱但忠诚，关键时刻总能出其不意地拿下一局；爱冒险的宇航技工R2D2，里面塞满了各种工具附加臂，这使它成为了了不起的驾驶帮手和计算机接口专家，不停地挽救主人公于水火。站在人类的角度，这是“善”的AI。

与之相对的是，在《黑客帝国》的设定中，机器人逐渐开始觉醒，它们反对人类的欺压，试图争取平等的“人”权。和平示威无效后，人类与机器人的战争爆发并持续多年，最终更强大的机器人获胜。由于能源枯竭，人类被当作机器人的生物电池，身体由机器饲养，思维则在程序创造的虚拟世界中生活。这正是第二种模式——具备了自我意识的人造生命体，当感知到自身比创造者优越有力，控制与被控制的矛盾便会无限放大，导致它们去奴役或毁灭“造物主”。与前一种AI相对，这种失控的AI往往被称为AI之“恶”。这种模式展现的未来看似遥远，但正是因为许多科幻作品早早做出的启示和警醒，让致力于AI发展的欧洲国家已开始着手严格立法和监督。

AI：人类的自我进化

科幻是科学的童话，也是关于未来的寓言。只要一朝没有尘埃落定，“善”“恶”AI的对垒还将长久继续下去。《星际穿越》中陪伴马修·麦康纳的机器人塔斯，智力卓越，救人于水火；而《终结者》里的“天网”则为人类送上核弹大礼，战车碾过累累白骨。

不仅是AI，自科幻文学的奠基之作——玛丽·雪

莱的《弗兰肯斯坦》诞生起，无数科幻作品都在对科技的无限向往与莫名恐惧中摇摆前行。前有先驱威尔斯有关阶级分化、人类变异的《时间机器》，后有巨匠阿西莫夫笔下帝国终结、文明将倾的《基地》寓言，星条旗下悲观的菲利普·迪克告诉你仿生人时代并不美好，赛博朋克的都市在《银翼杀手》的镜头下绝望又迷离，华语科幻扛鼎之作《三体》，更让人类一遍遍艰难抉择，感受宇宙黑暗森林法则的残酷无情。

科技无限向上，而人性并不如此，科幻作品既展示了人类对未来的希望，也反复诉说着深沉的忧虑。

IBM、微软等科技巨头却从未在这种忧虑前止步。事实上，“好”与“坏”也并非完全对立，IBM对AI技术的研究与思考已经脱离了割裂的二元论。AI是什么？IBM并非制造一个人类的奴隶或对手，IBM的AI是增强智能，强调的是更强大的自己，是个体能力的无限延展。通过技术的进步，IBM让医生拥有对抗病魔的能力，让艺术家写出洞悉人心的作品，让科学家更加睿智而高效。它是你手中的筷子，是头脑中不断链接的神经元。它不是被独享的，而是赋予每一个普通人超凡的能力。

AI的世界也是人的世界，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通过AI每个人都可以是未来世界的英雄。

科幻通过想象力在构造未来，科学也在通过技术落地去实现未来。正如霍金所说，它们之间是双向交易，人类将在现实的世界中实现科幻世界的可能性未来。未来之路，也是AI之路。在这条路上，人类正在通过AI实现个体的“进化”。与达尔文揭示的“进化”不同，它是一场新的革命。■

康熙的雅克萨之“算”（二）

更东的东巡

文 / 卜键

对于驱逐罗刹、收复黑龙江左岸被占领土，康熙帝惦念和思谋已久。

他已在酝酿着一个宏大规划，包括设置边疆军政大区，建立黑龙江将军衙门，在左岸修筑黑龙江城，设立官庄、驿站与粮台……而第一个小举措，是派理藩院侍郎明爱远赴雅克萨，探明虚实，查看地形，并警告俄人退出大清疆界。明爱经索伦抵达那里，代表朝廷发表了一份声明，也与该堡首领作了一次鸡对鸭讲式的对话。他质问敌酋为何侵占中国之地，要求他们迅速撤离。对方则态度傲慢，说什么奉沙皇之命而来，要退也得报沙皇批准。明爱回来后向皇上奏报：雅克萨系一座木城，宽约15丈，长20余丈，墙上有四层枪眼，墙外设木桩与两重围栏，堡内约有300余人。清朝臣子的情报往往如此，看起来头头是道，实则与事实悬殊较大。据俄人的记载，当时的雅克萨堡宽36俄丈、长40俄丈，俄丈虽短于我们的丈，总面积仍被少算了约三分之一；且城中有多门大炮，城外木栅壕沟内插满箭镞。真正打起仗来，这种误报漏报会造成致命损失。

康熙二十年（1681）十月，清军攻取昆明，吴世璠自杀，属下5000多人投降，云南底定。此类来自重大战役的喜讯，称作“红旗报捷”，要以八百里加急飞奏京师。玄烨在十一月十四日深夜得悉，兴奋之情难以抑制，急忙跑到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宫中报喜，次日又去告庙谒陵。他也提出明年东巡的设想，要将这次大胜祭告葬在关外的太祖太宗，但又绝不仅仅此一项目的。

差不多在十年前，康熙帝曾经有过一次东巡，到盛京即返。康熙二十一年（1682）的第二次巡幸，更向东开进六七百里，重点巡视了新兴军镇乌喇一带。乌喇，又作吉林乌拉，位于松花江畔，满语意思即沿江之地。这里水道畅通，附近为莽莽无尽的原始森林，自明代起就是伐木造船的地方，故又称“船厂”。宁古塔将军巴海已奉命移镇乌喇，率领督标精兵至属界接驾。巴海是清初为数不多的满族读书人，得中满洲榜探花，历任秘书院侍读学士、经筵讲官，接替父亲沙尔虎达的总管之职，后升任宁古塔将军，至此已历20余年，应能明白皇上远行之深意。三月

二十五日，康熙帝行抵乌喇，亲率皇太子及扈从王公大臣等面向东南，望祭长白山。清廷以白山黑水为满族发祥地，仰望白山，黑水自也存于心中。

此次东巡的队伍格外庞大，京营与盛京等处精兵大多扈从，据记载达六七万人之众。春汛已至，化冻的道路一片泥泞，加上连续两日大雨，河渠水涨，桥梁多数被冲垮，大队行进极为困难，而康熙帝全不介意，坚持抵达松花江边。时值三月，江面上春水溶溶，玄烨登上御舟，检阅乌喇水军。为追剿哥萨克匪帮，宁古塔清军在顺治年间就配属舰船火炮，具有了较强的水上运兵和作战能力。而在东巡之前，兵部又奉旨从福建等地调来一批经验丰富的水师官兵，驾驶战舰由外海经辽河辗转驶来，故此次松花江大阅水军，场面甚为壮观。玄烨心情愉悦，大阅后亲自撒网捕鱼，命挑选最好的鲟鳇，腌制后驰送京师，请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享用，也赐予随行勋贵大臣。青年皇帝思绪飞扬，由鱼儿入网联想到聚集人才，即兴赋诗，“天下才俊散四方，网罗成使登岩廊”，是知天子所思所想，无不与政治相关联。

第二次东巡最著名的御制诗也于江畔吟成，即《松花江放船歌》：

松花江，江水清，夜来雨过春涛生。浪花叠锦绣，采帆画鹢随风轻。箫韶小奏中流鸣，苍岩翠壁两岸横。浮云耀日何晶晶，乘流直下蛟龙惊。连樯接舰屯江城，貔貅健甲毕锐精，旌旄映水翻朱纓，我来问俗非观兵。松花江，江水清，浩浩瀚瀚冲波行，云霞万里开澄泓。

年轻皇帝的诗激情豪迈，也不乏艺术夸张。东北为满洲根本之地，以马队为主，兵勇擅长骑射，历来不重水师，各军镇仅有少量小型船只，而且大多数简陋破敝。巴海等为皇上的水上检阅作了最大努力，加上从南方调来的大型战舰，总算撑起了场面，而离攻剿罗刹的实战需求尚远。康熙帝既要保障边疆与部族百姓的安宁，在内乱甫平之际，也不愿与强邻沙俄发生大规模战争，明明是检阅水师，检视部队的水上作战能力，却在诗中加一句“我来问俗非观兵”，该诗传递出复杂信息，既有他所一贯倡导的重民思想，也有素来秉持的节制谨慎，更多的应

是抚绥边疆的自信。松花江放船，为的是扬帆进击，大清舰队由松花江辗转奔赴雅克萨战场，收复黑龙江左岸被占领土，当是这位青年皇帝设想的场景。

康熙帝在乌喇一住就是十余日，多次召见将军巴海与副都统萨布素、瓦礼祐等人，详加询问，听取他们的汇报，考察其人品才识和对边情的判断。皇上也真的借机“问俗”，宴请年迈将士与地方长者，了解到军队管理的弊病与士卒生活的艰辛，甚至包括流放人员的悲苦。御驾返回之日，玄烨专门向全体官兵颁布特旨，发放红包，鼓励他们镇守边疆，卫国安民，并指出兵丁“役重差繁，劳苦至极”的状况，应予改变。回京后不久，玄烨又就东巡所见，接连发出两篇谕旨。先是说宁古塔一带流放人犯太苦，命内阁以后将流人安插在生存条件稍好的地方。皇帝慈悲为怀，但其中也不无备战的因素，一旦在黑龙江打起仗来，宁古塔和乌喇都是重要的后勤保障基地，太多流犯晃晃悠悠，总有些不太放心。

玄烨更关心的还是驻军和满人的生活。地方官员会极力呈现最好的状态给皇上看，可他自有一套“访询民隐”的办法，知悉不少实情，深为忧虑。他在返京后传谕巴海、萨布素等人，逐项列举那些额外差徭：三月的觅捕鹰雏与驯养，宁古塔的八月放鹰，乌喇的冬寒抓山鸡，也包括过多的围猎，分肉不均，差派士兵打鱼等，命一律革除。攘外必先安内。康熙帝也对军伍的训练、巡逻以及侦探敌情提出要求，对新满洲的安置、农田的耕种收获表达关切，并命各级武官体恤兵丁及其家属。

历代清帝共有十次东巡，以康熙帝此行最为靠



《康熙帝出巡图》屏

东。限于多种原因，他未直抵黑龙江，却显然是为了黑龙江而来。玄烨在后来曾说起，自亲政之日起就关注罗刹的入侵，那时的他还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通过这次东巡，亲自考察边镇驻军，已知不能单纯依赖乌喇宁古塔兵，知他们难以独立完成收复黑龙江左岸之役，但仍希望巴海与两位副都统整饬军伍，振奋军心，尽快作出大的改变。☑（待续）

好看的电影以及不错的书

文 / 张斌



电影《我，汤娅》剧照

美国《体育画报》近年来有个好传统，岁末必有一期特别文艺一下，一组洞悉体育传媒的特稿格外扎实，制作考究。其中最有趣的当属年度最佳体育电影、图书、纪录片和播客的排行榜，指引我们看好看的电影，读不错的书。

2017年美国体育电影的年景不好不坏，《性别大战》更有大片气质，大咖云集，一行历史前行的脚印从故事中清晰穿过。但《体育画报》更青睐《我，汤娅》一片，授予其年度最佳影片称号。单看片名，如坠五里云雾，如果给你汤娅·哈丁——这个名字，你会有啥反应呢？对的，就是那个曾经的花样滑冰高手，牵绊在冰上运动最大丑闻中的女主角。故事带我们回到1994年1月，美国女子花样滑冰锦标赛，赛前发生离奇袭击案，参赛选手南希·克里根训练后在体育馆外遭到一名男子用警棍击打，右膝受伤，当即倒地痛哭失声，口中连声哀号道，“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会是我？”

男性袭击者逃离案发现场，但其形象被监控录像拍到，几天后落网。罪犯身份爆出后震惊全国，他居然是哈丁的前夫兼保镖吉罗利，难道他是为了哈丁铤而走险戕害竞争对手吗？哈丁成名早，几乎是那个时代全球第一个完成三周跳的女选手，1991年拿下全美冠军。一年后的世锦赛，美国奇迹般的三人登上领

讲台，克里斯蒂·山口夺冠后宣布退役，获得银牌和铜牌的哈丁与克里根脱颖而出，竞逐女一号。

哈丁难度领先，成绩更佳，但克里根更受公众青睐，俨然上升为“冰上新女皇”，广告签约不断，而哈丁身居冷宫愤懑异常。前夫兼保镖出头袭击最强竞争对手，哈丁旋即被千夫所指，一封寄给报纸的匿名信则披露了这一阴谋的策划过程，司法介入后唯一的难点就是哈丁是否为该案主谋之一。袭击者提交一张纸条试图证明哈丁参与了密谋，但最终证据不足。哈丁竟然参加了随后举行的冬奥会，获得第八名，克里根神奇伤愈，赶上了一个月后举行的冬奥会，获得银牌。

此案过程曾被拍成名为《金牌代价》的纪录片，哈丁在其中出镜接受采访，侃侃而谈。克里根则只有一句话，“哈丁一辈子都欠我一个道歉！”澳大利亚女明星玛歌特·罗比饰演哈丁，赢得赞誉。

《性别大战》的历史复原性超好，当年网坛雌雄大战的一段佳话深度挖掘，历史人物的多面性得以展现，最终位列第二。《环药赛》(Tour de Pharmacy)由HBO奉献，一堆明星入主，活生生地展现职业自行车圈内的药物丑闻，值得看看。

年度体育图书前三名是《阿里：一生》，642页的巨著，需要勇气才能读完。作者试图给出完美答案，解释为何阿里成就最伟大。《连捷：最历史感的纪录》，书名其实比这还要长一些，不仅讲述了棒球名宿迪马乔连续56场比赛本垒打纪录诞生的传奇历程，而且附带还讲了同时代另外两位人物与棒球的不解之缘。《运动改变：蒙塔多的生与死以及冰球的未来》，NHL后卫蒙塔多因脑部慢性伤害，2015年35岁即英年早逝，这本书启发人们反思冰球运动。

最佳体育纪录片毫无悬念地属于了《伊卡路斯》(Icarus)，片名是希腊神话中人物的名字，蜡制的飞翔双翼被阳光融化，坠海丧生。该片展现了揭穿俄罗斯兴奋剂丑闻的曲折过程，导演称众人的努力好似“西西弗斯神话”。《耻辱》一片探究了2003年大学生篮球球员邓尼被暗杀的过程，暴露了谋杀者、球队教练的丑恶人性。《卡特输掉了什么？》执着记录了名剧《胜利之光》里原形球队之一后来的命运起伏，真实传达了得克萨斯州的橄榄球文化。■

新时代中国军事的“看点”补遗

文 / 宋晓军

当地时间 2017 年 12 月 25 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网站（CBS）上推出一篇题为“军人退休将会变得更加复杂”的文章。看了这篇文章的大致内容后，我不仅想到了近来国内媒体上一些以中国军队武器装备新进展为主的年终盘点文章，还想到了我在 2017 年第 45 期《三联生活周刊》上撰写的一篇题为“新时代中国军事的‘看点’”的专栏文章，为此，我想就这篇专栏文章再做一点补遗。

先说 CBS 上的文章。文章的大致内容是：根据《2016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有关军人退休金制度的改革方案，从 2018 年 1 月 1 日开始，占美军人数 83%、服役不满 12 年的约 100 万军人将面临“二战”以来最大退休金制度改革后的“双向选择”。鉴于篇幅有限，有关美军此次的“双向选择”内容及其复杂性有机会我可以再说。我现在想说的是：根据 2017 年 11 月 10 日国务院和军委公布的新版《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条例》和中国国防与军队改革的进程，从 2018 年开始，中国军队中也会有相当数量的军官和士官面临着一次“双向选择”。简单说，就是选择脱军装转成为军队服务的文职人员或脱军装“自主择业”，还是选择穿军装继续留在军队（其实情况还要复杂一些，我简化了一下）。而这部分军人的“双向选择”，可能比美军所面临的“双向选择”更为复杂。

为什么说 2018 年开始中国军队中一部分军官和士官面临的“双向选择”更复杂呢？简单说，我在《新时代中国军事的“看点”》一文中，只采用了一种“宏大叙事”的方式，大致描述了军队在“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原则下重塑后，可能呈现出的一种整体状态，而并没有涉及军队中具体的“人”。事实上，在军队整体状态的重塑过程中，很多军官和士官的个人及家庭生活状态很可能也会发生变化。比如说，一些军官和士官在面临“双向选择”的同时，其所在部队可能会因改革进行调防，使他们的家庭离开原来生活居住的地方而转到一个新地方。这样对一个军人家庭来说，可能就会面临着住房、家属就业、子女上学等一系列的新问题。特别是在目前中国区域发展还不平衡的现状下，这些新问题很可能对他们的“双向选择”产生影响。而这正是 2018 年后中国军人中一部分军官和士官面临“双向选择”时的复杂性所在。

那么如何才能让这种“复杂性”变得更简单一些呢？一个根本性的答案是：国家要有一个区域发展更平衡的大环境。其实在上一篇专栏中，我引用了十九大报告中的相关内容，并进行了评述。在引用“2035 年实现军队现代化”的内容时，其实报告中有一句作为前提的话是：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一致。那么“国家现代化进程”在十九大报告中是如何描述的呢？有这样一段话：“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其实，这段描述就是前文所提到的那个根本性的答案。

最后我想说的是，军队的现代化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从“数量”到“质量”的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武器装备会越来越先进、昂贵，而且使用这些武器装备的人的流动性也难免会越来越大。所以说，未来我们的媒体在观察新时代中国军事的“看点”时，不能仅仅关注武器装备的变化，还要关注使用这些武器装备的军人和他们的家庭。因为毕竟他们都有“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时他们也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大环境。☑



（视觉中国供图）

2017 年 12 月 3 日，驻守雪域高原即将退伍返乡的武警西藏边防总队训练基地下士张军帅向新兵讲解阻车钉使用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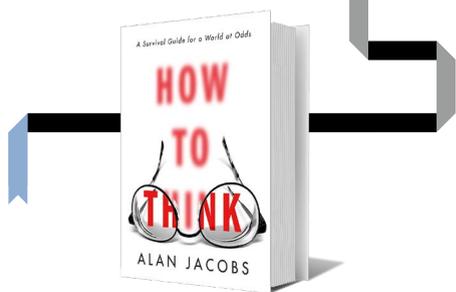
思考的艺术

主笔 / 薛巍

美国学者艾伦·雅各布斯在《如何思考》一书中说，思考本来就是一件困难的、耗费时间的事情，如今各种海量的、混乱的信息更是加大了思考的难度。



美国学者艾伦·雅各布斯与他的著作《如何思考》



没人愿意动脑思考

美国英语教授艾伦·雅各布斯认为，近年来学者对思考的科学做了许多思考，但冷落了思考的艺术。心理学家卡尼曼说我们的思维有快和慢两种，快思考是直觉性思考，让我们迅速判断、对给定情境立即做出解读。慢思考是有意识的思考。我们大部分是作直觉性思考，只有当我们察觉到问题、矛盾和异常时，慢思考才会介入。心理学家乔纳森·哈达特用不同的术语来描述这种差异：他说直觉性思考就像一头大象，有意识的决定者是骑手。其含义是，我们的直觉性思考非常强大，有自己的主意，但可以被轻轻地加以引导——技艺高超的、了解大象的

意愿的人能引导它。“卡尼曼认为我们思考时要注意克服自己的一些偏见。但基本的问题是，我们都决心要避免思考。只有很少的人愿意思考。思考让我们感到麻烦和疲惫。思考会迫使我们脱离熟悉的、舒适的习惯，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复杂，会让我们跟自己敬佩或爱恋的人争吵。”

让思考变得更困难的是，我们每天接触到大量自称信息的东西，其实都是些胡说八道。这也不是新鲜事。艾略特在近百年前就写到过19世纪产生的一种现象，1920年他在《完美的批评家》一文中说：“19世纪堆积的知识或至少是信息造成了广泛的无知。当要知道的太多，当那么多知识领域用同样的词表达不同的含义，当所有人都对许多事情略知一二，一个人就很难弄清他是否知道自己说的话了。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或者当我们知道得不够多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情绪代替思考。”

热点事件发生后，在事实没弄清之前，我们该如何站队？我们只能努力先形成一个观点，之后再修改也不是不可以。丘吉尔曾经说：“不会改变主意的人什么也改变不了。”有人指责经济学家凯恩斯朝三暮四，他回答说：“当事实改变时，我就会改变我的想法。你会怎么做？”艾伦·雅各布斯说，人们以这些名言来证明，我们应该保持头脑的开放，不要固守教条。但对于很多事情，我们就应该持坚定的信念而非开放的心灵，不然我们就无法取得认识和社会的进步。

切斯特顿曾经批评威尔斯以为开放头脑的目标就只是开放头脑，但开放头脑的目标跟张嘴一样，是为了咬住某个坚实的东西。但不幸的是，我们都在该坚定时不够坚定，在不该坚定时又十分坚定。雅各布斯说，对此我们应该采取中庸之道：既不固执又不怯懦、犹豫。洛杉矶道奇棒球队经理汤米·拉索达曾经说，管理球员就像手里抓着一只鸟，抓得太紧就会把鸟捏坏，抓得太松鸟就会跑掉。在思想上持一种立场也是如此：信念的坚定程度要介于死板和松弛这两个极端之间，不能犹豫不决，但也要随机应变。这很难做到，更复杂的是，知识也许是模拟的（渐变），做决定却往往是数字的（非此即彼），你也许认为某个候选人会比他的对手做得更好，但

并不是绝对肯定，而在投票时却不能把 70% 的票投给 A、把 30% 的票投给 B。有时证据不充分或者相互矛盾，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只能尽可能地得过且过。

情感会妨碍理智的思考吗？

许多人认为，为了很好地思考，一个人必须完全是理性的，而理性要求压抑所有的情感。雅各布斯以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的经历来反驳这种观点。约翰·穆勒的父亲詹姆斯·穆勒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对他严加培训，三岁就让他学古希腊语。小穆勒承认在这种养育方式下长大很艰难，他在自传中没有提及他的母亲，也很少提及他的弟弟妹妹，除了说他做过他们的老师。他说他父亲在与孩子们的道德关系中主要缺少的成分就是温情，他和大多数英国人一样，以显示感情为羞事，把感情深藏心底，永远不给它流露的机会。

在 1826 年，20 岁的穆勒经历了一场精神危机：假如生活中的所有目标完全实现，假如你所想望的全部制度和思想的改变就在这个时候完全实现，你会觉得非常快乐和幸福吗？一种不可遏制的自我意识明确地回答不。至此，他的生活所寄托的整个基础崩溃，他感到一片空虚。读书解决不了他的苦闷，把他的感受向人倾诉也得不到宽慰，他觉得他的父亲不能理解他精神上的痛苦，也没有必要使他想到他教育的失败，朋友们不会理解他的处境。这段时间他仍能做日常例行的公事，但只是机械地凭习惯的驱使去做，对于这种状况他觉得他不可能忍受一年以上。好在 1828 年秋天他读了华兹华斯的诗歌，把他从沮丧复发中解脱了出来，他分析这是因为华兹华斯的诗在动人的美景下含蓄着感情，蕴藏着由感情渲染的思想。

詹姆斯·穆勒在培养他儿子时专注于培养他的分析和批判能力，认为诗歌在这个计划没有什么作用。但小穆勒发现，分析的习惯会磨灭人的感情，分析的习惯对深谋远虑和洞察力来说是有利的，但对热情和德行来说却永远是根部的蛀虫。分析的头脑一直在区分、辨别，直到把整个精神世界变成碎片。这个头脑从哪儿获取能量把事物复原呢？小穆

勒认识到，被动的感受性也需要培植、熏陶、滋养和指导。之后感情的培养成为他的伦理学和哲学信条的重点。

穆勒对感情和想象力所作的辩护有两点。一是指出用分析能力解决问题是不够的，尤其当一个人的目标是要改善世界的话。一个人必须有一定的品格，有着把分析的成果组合成正面叙述的能力和倾向，才能做出有意义的行动。第二点是，当感情得到恰当的培养，当一个人生命中感情的部分是强烈而健康的，他对世界就会做出充分的反应。被风景之美打动是风景应该得到的反应；被穷人的处境打动是那种处境应得的反应。后一个例子跟穆勒尤其有关，因为他想做社会改革家，如果他的分析让他发现在一个富有的国家有人遭受贫穷是不公正的，如果他的感情跟他的分析不相称的话，那这个人就有问题。如果没有出现恰当的感情，他甚至不会劳烦去做揭露出不公正现象的分析。如果没有培养出情感，分析的功能可能根本不会起作用。穆勒认为，不可能把分析和感情分开，要做出真正的思考，整个人必须被调动起来，所有功能都要登场。

雅各布斯说，一些思考貌似不理性，其实换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很理性。《纽约客》作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认为，美国篮球运动员威尔特·张伯伦有件事做得很不理智：他不擅长罚球，如果采用低手投篮，他的命中率会提高。但他不愿意这么投，因为人们认为这种姿势很女人气。也就是说，他因为担心别人对他的看法而牺牲了自己的成功。格拉德威尔做了一个错误的假定：如果张伯伦理性地思考的话，他唯一关心的将是他职业上的成功。但张伯伦在工作之余最感兴趣的事情之一是跟女人上床。他在自传中说他跟两万女性上过床。为此他在个人魅力方面需要一个好的名声。如果他想勾搭的女性听到有人说他的投篮姿势很娘娘腔，他可能就会因此而放弃这种命中率更高的投篮姿势。再说了，他继续采用以前更加阳刚的投篮方式又会怎样呢？也许每场比赛只是少得几分，但并不会影响整场比赛的结果。他为了创造更多的勾搭女性的机会，而放弃一些工作上的成绩，这一决定也许在道德上很可疑，但绝非不理智。☑

西红柿该不该放冰箱？

文 / 袁越

蔬菜和水果最好吃新鲜的，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常识。但是如今大家工作都很忙，街边的小菜摊又都被关了，很多人只能选择隔几天去一次正规菜市场，买一大堆蔬菜水果带回家慢慢吃，于是问题就来了。

这些蔬菜水果到底是应该放在阳台上，还是放在冰箱里？

英国一家专门研究食品浪费问题的非政府组织(WRAP)在2017年底刚刚公布了新版的食物存放指南，建议大家把土豆、洋葱、地瓜、香蕉和菠萝放在室温条件下保存，其余的水果蔬菜如果不是当天吃的话，都应该尽快放入冰箱，保存在0~5℃的条件下。

这份指南颁布后，细心的读者立刻发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把西红柿列入不能冷藏的食品清单？此前几乎所有的食品专家都建议西红柿绝不能放冰箱，否则就会影响口感。

确实，在网上搜一下“西红柿保存法”，几乎所有的文章都建议大家一定不要放冰箱，因为西红柿里的风味物质会被低温所破坏。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有科学实验为证。原来，西红柿之所以好吃，除了里面的糖分和酸性物质外，还有一大类西红柿特有的风味物质也很重要。低温会破坏这些物质，把西红柿变得风味全无。

更糟糕的是，这种破坏是不可逆的。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丹尼斯·提耶曼(Denise Tieman)博士2016年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低温会破坏西红柿的风味基因，使之彻底失活，因此即使是在吃之前从冰箱里拿出来放至室温，这些风味物质也不会得到恢复。

当然了，低温保存的西红柿更不容易变质，这样做可以减少浪费，也许这就是WRAP建议大家把西红柿放冰箱的主要原因。问题是，也许会有更多的人因为西红柿吃起来变得味同嚼蜡而将其扔掉，这样不就不得不偿失了吗？

针对这个问题，英国《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为WRAP的新建议正名。文章认为，如果是刚从园子里摘下来的新鲜西红柿，家里的温度又不是特别的高，当然是室温保存比较好。但如今我们在超市买到的西红柿大都已经是在运输或者储存过程中经历过低温了，其中的风味基因

已经失活，再用室温保存也救不活了。另外，如果是盛夏季节，家里的温度超过30℃的话，也不见得更好。所以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話，最好的办法是把西红柿保存在7~10℃的环境里，否则的话放冰箱也没错。

这篇文章提醒我们，食品的保存是一门大学问。通常情况下保持风味和保鲜是两个相互矛盾的诉求，很难两全其美。比如面包，低温会让面包更容易变得不新鲜，应有的香气全无，所以WRAP建议面包应该在室温下保存。不过室温保存的面包更容易发霉变质，所以如果短时间内吃不完的话，最好的办法是把面包用塑料袋密封起来放在冷冻室里，吃之前拿出来再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大部分风味还能恢复。

那么有没有办法两全其美呢？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生物技术。英国诺丁汉大学的生物学家格拉姆·塞缪尔(Graham Seymour)博士利用最新的基因修饰技术(CRISPR)培育出一个西红柿新品种，可以在常温下保存两个星期而不变质。塞缪尔将结果写成论文发表在2016年出版的《自然/生物技术》(Nature Biotechnology)分册上，但由于公众对基因工程技术的盲目反对，这类新品种很难获得批准。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育种专家们之所以选择生物技术来培育新品种，不一定是因为传统品种不好，而是因为现代生活方式产生了很多特殊的需求，只能通过新技术来满足。☑



大家都有病



朱德庸

<p>因爱情而受伤， 因善良而受伤。</p>	<p>因信任别人而受伤， 因负责而受伤。</p>	<p>因愚蠢而受伤， 因无知而受伤。</p>	<p>这是一个随时随地内心 都会受伤的年代。</p>
<p>我想借十万。 (你得先在本行 存一百万。)</p>	<p>我如果有一百万就 不必借十万了。 那你得有相 对抵押品。</p>	<p>我如果有相对抵 押就不用借钱了。 没本事就别 来借钱。</p>	<p>我如果有本事就 不会来这儿了。 反正我在上班， 要这样绕一天 也行。</p>
<p>想发财太容易了， 我有一堆想法……</p>	<p>到处都是商机， 就看有没有胆子了……</p>	<p>如果你有资金，我就有立 马让你翻几倍的生意……</p>	<p>要约我？可以呀，明 天吧，现在我正忙。</p>
<p>老天爷，可以问 您一件事吗？</p>	<p>2018年我会发财吗？</p>	<p>不会，你会比 2017年还穷。</p>	<p>老婆，今天不跨年！</p>
<p>5, 4, 3, 2, 1, Happy Nwe Year.</p>		<p>买了新年衣服，吃了新年大餐， 开了新年派对，2018没什么 不一样呀？！</p>	<p>当然不一样。</p> <p>商人们……</p>

小畜记

文 / 胡成瑶 图 / 陈曦



我们家曾经养过一只奇丑的猪，脸黑，鼻短，多皱。有一次我实在忍无可忍地对它说：“你真的好丑啊。”它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然后哼出一声浓重的鼻音。我也不懂它的意思，就去跟祖母说了这件事，她大吃一惊，说：“猪也有丑的？我觉得它蛮好。”凡是祖母经手过的东西她都会认为天下第一。

有段时间，家里养了三十头猪，那个暑假弟弟高考结束，在家当起了“猪倌”。每天伺候三十头猪三顿饭就累得够呛。他苦中作乐，天天观察猪这种生物。

有一次，他把煮得滚烫的猪食倒进槽里，那丑猪一嘴就叉过来，结果烫得嗷嗷大叫，忙不迭地把猪食吐出来。“你猜它有多聪明？”弟弟问我。

“它用脚在土里刨了几下，刨出新土，然后含在嘴巴里降温。”可是它笨就笨在重复犯过的错误，槽边有个坑，大约就是它长年刨土的结果。

猪比较懒惰，永远是一副虚无主义者的样子。吃饱了哼哼，没吃饱也哼哼，既不满足也无追求。

但是鸡就不一样了，一副乐颠颠的样子，让我都相信虫子是真的那么好吃，而且它们一律都有一种为虫子献身的牺牲精神。在挖地的时候，常常不小心就挖到鸡的脖子上——因为它们看见一条肥美的蚯蚓就冒死冲上来。在被人一锄头挖得晕头转向之后，它还是没放掉嘴里的那条蚯蚓，躲到一棵茶树的后面去享用。没等眼前的金星散尽，它又冲过来，又一条蚯蚓！

祖母是个迷信的人，我们家从来没养过猫，有一天竟然跑来了一只猫，她喜出望外，因为她的理论是一个家败落了连猫都留不住，而一个家要兴旺了就会有猫跑过来。

这只猫凶悍无比，完全不是我们家的风格。没来多久它竟然把别人家的一只猫咬死了，从那以后它就建立了在这一带的霸主地位。只要看见谁家的猫伙食不错，它就赶在别人开饭之前走过去夺人口食。

虽然它在外名声狼藉，在家里却是温顺可人。它喜欢在我脚背上打滚，或者在小腿上蹭来蹭去，“喵喵”地叫几声，说不出的惹人怜爱的劲儿。它很黏人，有时下雨的深夜里，父亲一个人觉得寂寞，就会在房

间里走来走去，而猫就醒过来，“喵”的一声，好像在说“我在这里呢”。

二叔家有只狗，养了十七八年，在狗辈中也算是高龄了。因为它的嘴巴是乌黑的，所以取名叫“乌嘴”。

乌嘴在我的记忆中从来不咬家人。我有时三四年回一趟家，回去，它朝我吼两声，我叫一声“乌嘴”，它凑过来，在我的腿边闻闻，就走开了。它记得我。

乌嘴除了看家，还帮堂弟打猎，每年夏天，收获很多野兔子，都做了火锅，下了酒。冬天，它跟着大批人马去深山里打野猪，据猎人说，它是个很好的“赶角”。它负责发现野猪的踪迹，然后把野猪追赶到猎人布下的埋伏点。很多次，猎人们扛着重达一两百斤的大野猪回来，扔在廊下，我们凑过去看，野猪的四个蹄子两两捆在一起，胆子大的用手去戳戳，看它还活着没有。乌嘴在死野猪旁边咻咻地窜来窜去，它的鼻息喷到我们的脸上，一副自豪无比的样子。

前几年我回老家，二叔说乌嘴瞎了。我问：“怎么晓得它瞎了？”二叔说：“它到处乱撞，出门都会撞到头。”有一天，乌嘴出去转悠，一天一夜没回来。二叔急死了，到处找，找了一整天，快天黑的时候走到一块茶田，在草堆里发现了它。家乡的茶田像迷宫，天知道它为什么突然心血来潮跑去茶田，它眼睛瞎了，怎么走都撞到茶树，最后卧倒在草堆里，等死。我记得以前它随大队人马去打猎，在一处很陡峭的悬崖走丢了，它就像狼一样嚎叫，最后大队人马回去找到了它。可是这次，乌嘴大概已经没力气叫了。

偌大一条土狗，那天二叔把它像抱婴儿一样抱了回去，从此，它也不敢出“远门”了。第二天，我去二叔家，看见乌嘴，果然它的眼睛没有眼白，眼睛只是黑黑的两个洞。天冷，火炉生起来了，它躺在火炉边睡觉。从它痴肥而安然的样子看，主人把它照顾得不错。

我们乡下人，对于自己身边的人或者物总是特别地珍惜，那种绵长的情意会一直持续到生命的终点。☑



CHINA TEA LIFESTYLES
ANNUAL CONFERENCE
茶生活年会

2017

茶生活年会

获奖名单

中国茶影响力品牌

鼎白茶业 杭州龙冠实业
孝文家茶 雨林古茶坊

中国茶匠人匠心奖

陈海标 同睿堂 刘嵘
“斗记”茶业创始人 冰岛古树晒红复兴者 武夷岩茶新领军人物

王传意 杨丰
鼎白茶业创始人 隆合茶业创始人

主办  生活周刊

承办  熊猫爱茶研究所

卓越LS50 一套完整的有源系统



LS50 Wireless

展示LS50 Wireless。一套完整的有源系统，看似一对外观精美的扬声器。从头至尾采用192kHz/24位高清数字信号路径，230瓦x2放大器，双放大器双单声道配置，经过出厂优化。搭配校时DSP分频器，使屡获殊荣的 Uni-Q 音质进一步升华。

体验LS50 Wireless，感受音乐的卓越音质。

KEF.COM

KEF
沉迷·高解像